社会与历史译丛

历史学家的思想和方法



[法]伊曼纽埃尔·勒鲁瓦·拉迪里 著
杨豫 舒小昀 李霄翔 译






ISBN 7-208-04194-6



定价 24.80 元
易文网:www.ewen.cc



社会与历史译丛

历史学家的思想和方法

Le Territoire de L'historien (Tome 2)

[法]伊曼纽埃尔·勒鲁瓦·拉迪里 著

杨豫 舒小昀 李霄翔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学家的思想和方法/(法)拉迪里著;杨豫,舒小昀,李霄翔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社会与历史译丛)
ISBN 7-208-04194-6

Ⅰ.历… Ⅱ.①拉…②杨…③舒…④李… Ⅲ.①法国-中世纪史-研究②法国-近代史-研究③历史-研究方法 Ⅳ.K5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36691号

本书据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4年平装英文版 The Mind and Method of the Historian 译出。

责　任　编　辑　吴书勇
封　面　装　帧　甘晓培
编辑、出版总策划　朱金元

·社会与历史译丛·
历史学家的思想和方法
[法]伊曼纽埃尔·勒鲁瓦·拉迪里 著
杨　豫　舒小昀　李霄翔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2.375 插页 4 字数 262,000
2002年9月第1版 2002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100
ISBN 7-208-04194-6/K·957
定价 24.80 元

中译本前言

严格地说，伊曼纽埃尔·勒鲁瓦·拉迪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1]的《历史学家的思想和方法》并不是一本纯粹的关于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的著作，但是，其中各章以及提供的个案研究又准确无误地阐述了系统的史学理论和方法，至少能让我们更深切地品味史学研究在这位大师手中发生的变化。

勒鲁瓦·拉迪里是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年鉴学派第三代历史学家的重要代表，早已为中国史学界和读者所熟悉，尤其是他的那部称作“精神考古学”的杰作《蒙塔尤》是一部心态史的典型作品，已于1997年翻译为中文出版。[2]

勒鲁瓦·拉迪里生于1929年7月19日，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先后在蒙特佩利尔公立中学（1955年）、索邦大学（1970年）、巴黎第七大学（1971年）、法兰西学院（1973年）任历史学教授，在长期担任法兰西学院现代文明史讲座教授期间兼任其他的重要学术职务，包括《年鉴》杂志的主编之一，法国伦理和政治科学院院士等。1987—1994年，他任法国国家图书馆馆长。1996年，勒鲁瓦·拉迪里因在历史学中做出的重大贡献而获得法国荣誉军团的勋位。他还先后荣获日内瓦大学、密执安大学、里兹大学、莱斯特大学、约克大学、匹茨堡的卡内基－梅隆大学、达勒姆大学、赫尔大学、都柏林大学、蒙

特利尔大学、海法大学、牛津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等多所著名大学名誉博士的称号。

勒鲁瓦·拉迪里的历史研究最早是把兴趣集中在民众精神和态度的领域中，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心态中。他的博士学位论文研究的就是在法国中世纪末期朗格多克地区农民的集体心态，不仅描绘了他们的物质生活状况（贫穷的文化），还分析了他们对生活和死亡的看法，他们在瘟疫面前的忧虑和恐惧。1966年，这篇博士论文以《朗格多克的农民》（*Les Paysans de Languedoc*）的书名出版。

如果说《朗格多克的农民》是勒鲁瓦·拉迪里在心态史研究中的最初尝试，那么，十年以后即1975年出版的《蒙塔尤——一个说奥克语的山村，1294—1324年》（*Montaillou, village occitan de 1294 à 1324*）则可以说把心态史研究推上了顶峰。勒鲁瓦·拉迪里因一个偶然的机会在梵蒂冈图书馆内发现了一批13世纪地方宗教法庭的记录。那是普瓦蒂埃的帕米埃主教雅克·富利埃在1318年至1325年主持审判时留下的。勒鲁瓦·拉迪里发现在114名被指控为异教徒的“罪犯”中有25个人来自同一个小村庄（即蒙塔尤），而这个村庄只有250名居民。这个现象引起了他的注意。有意思的是，那位充当法官的主教是个喜欢刨根问底的人，在审判过程中对这些“罪犯”反复盘问，特别是对他们信仰、道德行为、社会联系，任何细节都不轻易放过。他敏感地意识到这批档案“为研究农村普通人民的精神观念提供了机会”。[3]值得注意的是，他利用这批档案试图还原的并不是有关某个异教宗派（卡塔尔派或纯洁派）的宗教史（他说这并不是他的目的），而是使用农民自己提供的直接证词再现蒙塔尤这个村庄里农民的日常生

活、社会关系、宗教信仰、习俗礼仪、性观念和实际的性生活，简言之，重现普通农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世界。此后，勒鲁瓦·拉迪里在《罗曼人的狂欢节》（*Le Carnaval de Romans, 1579—1580*，1980年）、《说奥克语地区的钱币、爱情和死亡》（*L'Argent, l'Amour et la Mort en Pays d'Oc*，1980年）、《茉莉花的女巫》（Jasmin's Witch，1987年）中不断地探索和推动了心态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

勒鲁瓦·拉迪里对历史研究做出的另一个突出贡献是推动了跨学科历史学的研究。他尤其注重地质、气候、瘟疫、细菌等因素在历史演进中的作用，并把这称作"没有人的历史"。他在1967年出版的《公元1000年以来的气候史》（*Histoire du Climat depuis l'An Mil*，1967年），就是其中的典型。在写过"气候史和写作"和"雨天和晴天的历史学"两篇文章之后，他感叹道："一个梦想悄悄地实现了，这就是科学家们在他们各自的领域工作时长期向往的跨学科研究的梦想，这就是他们对那个已经失去的知识统一的世界的不断向往。"[4]

同样，勒鲁瓦·拉迪里并没有忽视传统历史学的世袭领地——政治史，但他也同样努力对这个领域进行了改造。出于这样的考虑，他把眼光集中在法国大革命前的"旧制度"（*Ancien Régime*）的研究上，重点放在"行使权力所围绕的物质性环境"，即研究那些"对决策过程有影响力的不可轻视的压力集团"，在方法上则主张把"现代的社会—经济分析方法同发源于古代的谱系分析方法以及因此而激发的人类学分析方法结合起来"，其最终目标是建立起有关旧制度研究的潜在的政治科学。[5] 他的这个历史思想和方法充分体现在《君主国家》（*L'Etat royal*，1987年）、《旧制度：从路易十三到路易十

瓦》(*L'Ancien Regime, de Louis XIII à Louis XV*. 1610—1770, 1991年)、《乞丐和教授普拉特(1499—1628年)的世纪》(*Le Siècle de Platter, Le mendiant et le professeur*, 1995年)、《圣西门——宫廷制度》(*Saint-Simon, le systeme de la Cour*, 1997)等著作中。

在勒鲁瓦·拉迪里的史学思想和实践中,他特别强调历史研究的科学化。在他看来,历史研究科学化最重要的标志之一是历史学的计量化,甚至断言没有使用计量方法的历史研究不能视为真正的历史研究。的确,历史研究的计量化带来了历史学的"一场革命"(勒鲁瓦·拉迪里语)。数学语言的精确性、通用性、可比性和简洁性能够使其对历史现象的分析优于文字分析,数学模型能够把一些难以用文字综合和表达的复杂关系简洁地表达出来。计量化使历史学家有可能从新的角度和标准对过去公认的结论进行检验,做出证实、推翻或修正,开辟过去不被重视或不曾充分利用史料的新领域,有助于认识普通民众的生活经历与他们的态度和感情。但是,随着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的兴起,历史研究的理论基础又一次遭遇了挑战,"对过去的变化做出连贯性的科学解释"的可能性这一观念已经引起广泛的怀疑。[6]特别是在"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的影响下,历史学应当科学化还是应当文学化,重新成为争论的话题,因为有人说,历史研究的目标是追求客观性,这样的观念不能成立,理由是历史学家总是变成了作为他们思考对象的那个世界的囚徒。他们的思想和观念总是被他们所使用的语言范畴所限制。因此,语言不是指称事实,而是构造了事实。这个观点得到了雅克·德里达的进一步论证,并提出了语言是独立符号体系的观念。历史学家的

工作必须依据文本，而这些文本并非指称它外部的世界。用德里达著名的格言来表达，"在文本之外，一无所有"。[7]文本独立存在于它的作者之外的观点如果应用于历史学则意味历史学家的工作归根到底是属于文学工作。勒鲁瓦·拉迪里对此如何进行反思的呢？不妨看看他在1997年出版的著作《历史学家：数学和文本》(*L'Historien, le chiffre et le texte*)。

勒鲁瓦·拉迪里及时地把他对历史思想和方法的思考写进了《历史学家的领域》(*Le Territoire de l'Historien*，1973年，1978年，2卷本）和《在历史学家当中》(*Parmi les Historiens*，1983年，1993年，2卷本)。其中，《历史学家的领域》的第2卷，也就是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在翻译成英文版时单独成卷，书名为《历史学家的思想和方法》，本书因此也沿用英译本的书名。如果没有可能读到勒鲁瓦·拉迪里的其他著作，先读读这本书，不失为了解勒鲁瓦·拉迪里史学思想和方法的一条"捷径"。正是出于这个理由，我们将它翻译出来，以飨读者。

《历史学家的思想和方法》是由勒鲁瓦·拉迪里的几篇看上零散的演讲和文章组成，其实构成了一个严密而有机的整体，而且避免了一般的史学理论和方法论著作中常见的那种艰深难懂的哲学性推理，易于捕捉他的思路。从内容上看，全书可以分为与上述的评论相对应的四个方面。第一个方面由"静止的历史"(第一章)、"一种概念：疾病带来的全球一体化(14—17世纪)"(第二章)和"危机与历史学家"(第九章)组成，可以说是一部宏观的历史。作者向我们呈现出透视历史的一种新的框架，即"人口—生态"系统的演进。历史的全部进程在这个框架中获得了全新的解释。作者提出的"由疾病

带来的全球一体化"以及"危机的创造性效应"的概念,不仅为我们提供了解释过去的工具，也可以用来评价人类在新世纪面临的转变,读来令人耳目一新。

"扎绳:魔法阉割"(第三章)和"16世纪的法国农民"(第四章)构成了本书的第二个方面,是对心态史的诠释。作者以法国近代早期一种民间流行的魔法阉割的现象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恐惧为实例，运用心理分析学的方法去解释反映在其中的深层的心理现象。作者还以充分的事实"把16世纪的法国农民看作是历史的客体。他们作为生产者和再生产者，所有活动的最终结果都是为了恢复压迫他们甚至有时将他们碾碎的生态系统的稳定。这就是16世纪的农民以他们自己的方式造成的制度平衡并阻碍了农村的任何革新"[8]。这种统治着法国农村的生态系统到18世纪才开始改变。

那么,这一切是如何改变的呢?作者在"巴尔扎克的乡村医生"(第五章),"聚焦鲁埃尔格"(第七章)和"社会人类学家布雷顿的雷蒂夫"(第八章)等三篇文章中以丰富的第一手资料,甚至使用巴尔扎克的小说,向我们描绘了法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道路。这一种与英国工业化(兰开夏模式)完全不同的道路，作者将它称作"农民和手工业者式的"和"小资产阶级"的工业化道路。

至于"凡尔赛一瞥"(第六章)可以看作是本书的第四方面。作者在这里以路易十四时代的廷臣圣西门公爵的长篇回忆录为依据,对凡尔赛宫内部的派别和集团进行分析,可以说是继拉布鲁斯和勒费弗尔对旧制度的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解释之后，使用人类学和谱系学并借助文学批评的方式对旧制度所做的典型分析，论证了他所试图建立的"政治科学"。有人

说这种方法是"回到孟德斯鸠和托克维尔那里去"。此文内容丰富,读起来不仅饶有兴味,而且很有启迪。

由于本书的某些部分是勒鲁瓦·拉迪里在法兰西学院的讲学,在翻译中我们尽量保持作者的口语化表述,这样也许可以让读者直接体会到作者的音容和诙谐。本书的第一、二、九章由杨豫翻译,第三、四、五章由舒小昀翻译,第六、七、八章由李霄翔翻译,杨豫通校了全书并做了最后的统稿工作。我们深知自己的学识浅陋,由此引起翻译中的错误和不足,在所难免,祈望读者和大家批评指正。

杨 豫

2002年7月7日

注 释

[1] 国内亦有译作勒华拉杜里或勒·罗瓦·拉杜里。

[2] 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山村》,许明龙、马胜利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3] 见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蒙塔尤》,前言。

[4] E. Le Roy Ladurie, *The Territory of the Historian*, Chicago, 1973, P. 291.

[5] E. Le Roy Ladurie, *The Mind and Method of the Historian*, Chicago, 1984, p. 149, p. 173.

[6] Lawrence Stone, "The Revival of Narrative: Reflection on a New Old History", *Past and Present*, No. 85(1979), p. 19.

[7] Jaques Derrida, *Of Grammatology*, Baltimore, 1976, p. 158.

[8] E. Le Roy Ladurie, *The Mind and Method of the Historian*, Chicago, 1984, p. 121.

目　录

中译本前言

第一章　静止的历史……………………………………………… 1

第二章　一种概念:疾病带来的全球一体化

（14—17世纪）………………………………… 35

第三章　扎绳:魔法阉割……………………………………… 111

第四章　16世纪的法国农民 ……………………………… 129

第五章　巴尔扎克的《乡村医生》:简单的技术与

乡间传说……………………………………………… 160

第六章　凡尔赛一瞥:1709年路易十四的宫廷…………… 193

第七章　聚焦鲁埃尔格——纪念雅尼纳·费尔德-

雷库拉………………………………………………… 224

第八章　社会人类学家布雷顿的雷蒂夫:

18世纪的勃艮第乡村 ………………………… 272

第九章　危机与历史学家…………………………………… 351

英文版译者注………………………………………………… 375

小辞典………………………………………………………… 376

第一章　静止的历史[1]

1

作为本年度在法兰西学院的讲座，我希望来讨论一下14到18世纪之间的，或者更准确地说，从1300—1320年到1720—1730年之间的这个现在已经消失了的世界上的经济和社会，我们甚至可以把这个世界称作一个传统的经济—人口实体。如果“作用”这个词在这里的使用是恰当的话，那曾经是个产生过“作用”的世界。出于实际的缘由，我本人从事研究的以及因此而熟悉的这个目前已构成六边形的世界，就是当前的法国，而在当时，它全然是个观念上的实体，而且可以肯定地说，它决不是一个国家实体。在我将要讨论的这个时期内，在这个区域范围里，人口大约为1500万到2000万人之间，我们将会看到在此期间人口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低谷。如果说我们的邻国，德国、意大利，也许还有西班牙，还没有开始类似研究的话，那么总有一天这样的研究可以而且完全可能会开展起来。但在英伦三岛上未必如此。确实，与此种类型的研究截然相反的就是英国。P·拉斯勒特的《我们失去的世界》(以非凡的直觉)第一次对英国做了类似的研究。在所有的西方国家中，英国的世界有可能是最不典型和最缺乏稳定的一个。

我打算用来达到本人目标的工具和方法当然不是来自于

传统的历史学，即使在当前传统史学声称它由于移植的原因而获得新生的时刻，也是如此。我想人们将会同意这样一种观点，使用科学的方法去对待历史学，可以让我们远远地超越对机会、事件和阴谋在人类事务中发挥的作用所作的思考，而这种思考是社会学不屑一顾的。如果我们将历史学置于普罗克鲁斯特之床上，用亚里士多德和修昔底德时代以来就未曾变化过的尺度来衡量，我们确实应当还原这样的思考。因此，冒着被人们指责为唯科学主义的危险，我今天要在这里为这样高尚却原始的事业作一番辩护。我本人忝列其中的年鉴学派的许多历史学家，在拉布鲁斯和古贝尔而不是里克特和阿米安·马赛兰的先导下，虽然并不像人们所说的那么天真，却是相当直率的。用我们的观点来看，在研究机会的时候决不能将它与必然性割裂开来，甚至是在，或者说特别是在必然性以可统计的规律或概率为表现形式的时候。

从这点出发，可以肯定，我的本意决不是否定对事件的研究具有创新的可能性（即使这并不完全值得让塞诺博斯学派复兴。在过去的五年多来，人们承认塞诺博斯学派产生于一种假革命历史学派，他们甚至认为脚注也是中产阶级的）。但是，科学意义上的和不加贬低意义上的研究事件的历史学（陈述事实的历史学），有一些上佳的著作完全属于这一类，它们的目的是为了衡量各种事件造成的影响，试图把事件坚实地置于背景之中，在时间维度上往后推移，但更注重的是往前推移，去探索所讨论的这个事件是否确实"造成了差异"。例如，美国福格尔学派的"克莱奥学"试图去发现美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诸如独立战争等，是否对经济史上的事件产生过作用。在方法上，他们发明了一种历史—虚构场景，而在这个场景中

所讨论的那个重大事件并没有发生。然后，历史学家便以捕捉这些按时间先后发生的结果所组成的链条为研究的出发点。这种对事件的研究所产生的背反引导着实践者们走向计量化，最终把他们拉回到质量最好的旧式计算器上去。如果用饶勒斯的有关爱国主义的一番话来说，对事实的一知半解使人们远离计量化，但经过对事实的长时间了解以后，又把人们不可抗拒地拉了回来。事实证明，在经济史这个公认的专门领域里，这样一种实验对于那些希望事件能够像过去那样占据主导地位的人们来说，并没有得到很大的宽慰：即使18世纪70年代的美国革命未曾发生，也不能改变导致这场战争发生的其中一个背景，即宗主国向大西洋彼岸的种植园主和殖民者支付的烟草价格。相反，历史学家保罗·波瓦的著作给予了这种研究方法以更多的鼓励。波瓦使用了回溯法去探索他所选择地区，即混和林区的经济史和政治史中的人物和重大趋势（这几乎应当是心理学家从事的工作），他从朱安党人起义的最初和短暂的精神创伤中找到了法国西部保守主义的根源。从这个看上去是天定的必然事件的根源中，他发现了偶然的变化，但关键的问题是，他是依靠事后的而不是事前的假设去发现这个偶然变化的。[2]

3

至于严格地以事件为中心的历史学或"瞬间"历史学，无论是反动派还是革命派写的著作，在我看来都是为了满足一种可能是合法的却往往是琐细的需求。正如马歇尔·麦克卢汉所指出的，在大众媒体有时会混淆用语并偷换著作和思想中的逻辑的时代里，"瞬间历史学"很容易倒退到近距离叙述事件的习惯做法上去，即古滕堡等人以前的中世纪编年史所带有的那种特征。这并不会让人感到惊异。

但是，这样一些论著，往往传达了对当时代人们的态度所获得的深刻印象。除了极少数的和天才的例外，这里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说这些著作不应当是这个样子，它们仅仅是目击者的叙述，并带有这类方法的所有优点和缺点。

我所主张的手段和方法也未必就是某些（应运而生并往往带有创造性的）时髦哲学向历史学家推崇的那些手段和方法。从最新的马克思主义流派中我获得了一个教益。这个教益几乎是无法察觉的。那就是说，归根到底，在初步分析的经济和社会关系中，在更深层次的生理现象中，而不单单在阶级斗争中，我们必须寻找推动民众历史前进的力量，至少在我所研究的这段历史时期内以及我所关注的人口问题上。确实，自从我们开始谈论"没有引擎"的社会，即发展极其缓慢的前工业世界中的社会时，这样的标新立异就更加可以宽恕了。至于说到语言学（我的一些同事，他们几乎都是非语言学的专家，近来预言说语言学从今以后将成为社会科学的王后），我当然不会低估语言学所发挥的重大作用，但这毕竟超出了我力所能及的范围。一方面我承认对词语抱有很大的研究兴趣，但另一方面我也必须承认，迄今为止，我个人的纯粹爱好将我引向用更少的时间去对待词语本身，而用更多的时间去关心这些词语所指称的事物，尤其是当这些从档案中反映出来的"事物"至少是以集体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时候，因为它们具有现实中的基础，不能把这些事情简单地降为人们谈论事情的方式。例如我正在思考的土地所有制问题。也许，当论及词语时，我就像是雅克·奥佐夫所描述的那种19世纪的半文盲：我做工不是为了学会计算数字，更不会去考虑要学会阅读！

因此，我要强调的是，由于我必须从事我自己专门领域中的工作，根本不带任何歧视，也从不旁骛。出于这个理由，我更关心的是我们脚底下的岩层的地质学。这比那种公认令人着迷的地理学课程更使我感兴趣。当然，对于任何严肃的文化史来说，地理学都是至关重要的。就我的目标而言，语言的丰富和外形可以初步勾画出地形考古的概况，为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做好准备。无论是探矿学、考古学，还是地质学，都要使用发掘和钻探的技术，因此是十分相似的。

人类学长期以来就是我最喜欢的一门邻近学科。尽管如此，还是应当承认，历史学家在这个领域中是非常谦恭的实践者。历史学家靠手中的检索卡片去阅览无数的档案和有关社会事实的原始资料，就像人类学家不厌其繁地对他所研究的那个社会中的成员提出问题并把一切都记录在笔记本中一样。然而（一旦转到人类学的或结构主义或功能主义的更高层次上的抽象和更加庞大的计划时），事实往往证明，无论是长期以来的历史学还是处在目前状况下的社会学，都缺乏起码的技术，以便将所有这些宏大的理论彻底地加以应用。我在法国几所大学里多年从事教学所获得的经验足以让我相信，我的专业所真正实践的是讲授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的功能主义(它的最终目标常常受到挑战)。在我们大学的各个系里，有些东西往往并不发挥功能。但是，圣西埃不是马拉尼西亚，也不是特洛布里昂岛上的茹西埃园。[3]马林诺夫斯基事先设定的和谐也许对那个珊瑚岛是有作用的，但与我们这个用玻璃和混凝土建造的校园没有太大的关系。大学校园就经常出现抨击社会反常现象的倾向。我甚至怀疑这些和谐与今天西方社会中的许多反面现象没有任何关系。也许你

们会说，那么，好吧，如果说我们的大学的一些功能现在被剥夺掉了，但至少它们的结构依然存在着呀。作为一名教师，从我的工作出发，这是否会让我最终放弃功能主义，而越来越接近于结构主义呢？说实话，我早就采取了这样一种立场，并不需要任何引诱，无论是生理的还是个人的诱导。当我把结构主义的方法运用于解释制约新大陆的亲缘关系或神话的规则时，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不由得使我对这种方法的效果要由衷地表示称赞。遗憾的是，当我用它来解释欧洲这个完全不同的历史时，这种方法又不是可以随便应用的良方。研究南美的纳丹·沃奇特尔不可能用列维－施特劳斯的技术去解释古代秘鲁的社会历史，也不能用它来解释当代的社会史以及与此相关的神话、制度和家庭结构。但在我们这个大陆的人类组群的划分上，无论是传统的还是当前的划分，除了农村中那些今天还保留着的婚配规则以外，制约诸如婚姻的规则（尽管也有例外）却是开放的，是没有结构的，以致无法应用人类学所提供的那种网络。它们会让任何最高级的电子计算机甘拜下风。研究欧洲的历史学家将会发现使用结构主义的那种有关符号交换的真正和详尽的技术并不能达到他们的目标。就目前的研究状况来看，这些技术可以应用于研究其他的大多数文明。但是，他本人也认为这个原理的一般定义“作为一种方法而言，是与知识同时诞生的，它的目的是理解外在于自觉表现的现象，可以依据有限的参数把它们之间的关系以及全面的转变系统化”。[4]半个世纪以来，法国最优秀的历史学家，从马克·布洛赫到彼埃尔·古贝尔，都做了系统化的工作，他们事实上都是结构主义者。他们自己有时意识到了这一点，但有时则未必。至于其他的历史学家，他们根本就没有意识

到这一点。

说句过分的话，我们还注意到了，在今天这个跨学科关系的概述中，以过去为研究对象的人口学家从事的探索已经走得很远了。对于这些探索，我本人应当进行一些思考，它已经将人们带入了可以恰当地称之为心理学或心理分析学的知识领域。这个领域对于历史学家而言，实在是太生疏了，甚至可以说是一窍不通。然而，我去涉猎这样一个有争议的领域本来就是因为我自己的贫乏和错误造成的。我当然没有什么贡献可以同阿兰·贝桑贡在这个领域中丰富的发现相比。不过，我的研究工作以非常谦恭的方式曾两度把我引向西格蒙·弗洛伊德久已开创的光辉道路。我所从事的有关生育控制的研究，让我同那个19世纪最后20年里还是一位年轻医生时的弗洛伊德在维也纳提出的论点发生了必然的联系。他与病人的接触迫使他必须去思考维也纳上层社会的生育控制是如何开始的。以此为背景，他考察了在他看来最早实行避孕措施的已婚妇女所遭受的心理创伤。按照当时流行的解释，这样的心理创伤是当时那种原始的而且令人无法满意的避孕技术造成的结果。对于心理学家而言，弗洛伊德的论述也许只是医疗史经历过的一个典型阶段，但对那些并没有掌握18和19世纪的这类档案的历史学家而言，弗洛伊德的人口心理学著作所做的陈述仍然无法用我们所掌握的证据来加以证实。 6

再举一个有关反常行为的事例。由于对城市和乡村的民众宗教史发生了兴趣，于是，我开始去研究塞文山区以及巴黎的圣麦达尔区（前者是胡格诺教徒的地区，后者是詹森派教徒

的地区）的痉挛行为。弗洛伊德和布罗伊尔的论述痉挛性歇斯底里的早期著作对现在的专家而言似乎已成为过时的著作。但在这里，又是他们的著作把我引上了某些令人感兴趣的假设。这些假设涉及到很久以前的痉挛性歇斯底里的性别和文化的根源。

在这两个事例中，我关心的是早期的弗洛伊德，即那位发现俄狄浦斯情结以前写作《致弗利埃斯》和《癔病研究》的年轻医生。我的研究工作首先让我(以后仅是偶然地)涉及到弗洛伊德早期的著作。公正地说，这样的一些研究可以看作我的真正专业的附属品。最后，这些研究揭示了历史学家在知识上的局限性，而非弗洛伊德的分析与我们这门学科的关联。这使我联想起十年以前处在那样的困惑之中，当时听到了乌尔姆大街发出的强大呼声，[5]使我们这些历史学家从反对教条主义的恍惚中惊醒。我们当时正沉缅于档案馆中，突然听到一个惊人说法“马克思从未年轻过”。那么，对于这位心理分析学的缔造者，我作为一名历史学家必须说一句相反的话。7 我的专门研究仅仅涉及到他年轻时的著作，我可以坦诚地说，弗洛伊德对我而言将永远年轻，或者可以说永远是中年的。

我的讲座说到这里，请允许我使用最初是罗兰·巴特对某些人群说过的那句话：作为历史学家，我们是“前卫中的后卫”。我们把这句话留给那些在更为复杂的学科中工作的研究者，这些学科正在着手承担真正危险的任务。他们是开拓者，有时甚至冒着生命的危险，一往无前地去探测将要带来全面进展的那些矿藏。我们历史学家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人口学、经济学，当然也包括计量经济学等计量科学的分支所创造

的财富。我们在不知羞耻地掠夺他们，但也在尽可能地做出回报。我们掠夺人口学的资源，但给予了它历史的维度。我们也掠夺了马克思、李嘉图和马尔萨斯的经济学，还有当代的经济学理论；我们还得益于人类学。从我们的角度来看，人类学在方法论上取得的积极进步大于它所取得的成果。接触一下定义相当准确的传统社会，比如说威因·爱德华提出的生理学模型，有时给我们的裨益超过了最时髦和最风雅的形式语言学（我们永远无法弄懂什么是个人语型）。与此同时，我们感到我们在继承着一种传统。正如人们所熟知的，经过一个很长的孕育期以后，年鉴学派于20世纪20年代在马克·布洛赫和吕西安·费弗尔的手中诞生了。到了30年代，恩内斯特·拉布鲁斯继弗朗索瓦·西米安之后让年鉴学派带上了计量的特征。我所继承的费尔南·布罗代尔以及现在仍在巴黎、雷恩、图卢兹、艾克斯普罗旺斯等地从事教学的许许多多历史学家们，使这个现在已成为中心的学派有了非官方的永恒特征。这个学派就像它所研究的许多社会一样，也是应运而生的。如果从长达一个世纪的背景下去看待自己的一生，（借用一个比喻来说），它就像是一只老鼹鼠，持之以恒地挖掘着地道，决不愿意舍弃地下的陈列室，但对地面上发生的事情却表现出全然冷淡的态度。人们可能听说过认识论有了全方位的突破，从膝盖到脚踝和脚背，全都缝补起来。年鉴学派的历史学家依旧巍然不动，冷静地增添着他们的数据。尽管历史上的一切已经被人们说过了，但它依然在参与真正的科学积累的劳动。对于当前世界发出的呼声，无论是来自巴黎时装商店的还是来自取消了等级的超市发出的迫切需要，它并非无动于衷，但决不媚俗。

8

计量的方法使历史撰述方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要想了解它的影响，只要读一读罗伯特·福格尔和斯坦利·恩格尔曼的最新著作《苦难的年代》。[6]这是一部有关美国黑奴制度经济学的著作。如果你们允许的话，这里不妨暂且来思考一下这一试验对历史学家意味着什么。这部著作的写作所依据的是统计测量，而人口普查报告和种植园的账目又使得这样的统计测量得以进行。这部著作所依赖的一系列计算如果不使用计算机是无法想象的。作者的结论是自相矛盾的，甚至引起了某种丑闻。粗心的读者或心怀恶意的读者难免会把这本书看作是在偷偷地为奴隶制度辩护。事实上，这两位作者都满怀信心地支持着当今美国的黑人解放运动。他们极其成功地而且意义重大地首先揭示了 1865 年以后的那个所谓的解放年代实际上是奴隶生活中最为悲惨的时代。他们经过长期而艰苦的研究之后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从长期的角度来看，废奴主义者的、蒙上了一层薄薄面纱的法西斯主义与 1860 年以前种植园主赤裸裸的歧视一样，都是具有灾难性的。福格尔和恩格尔曼是反事实的虚构历史学的先驱。他们确实太过分了，甚至去衡量如果美国内战没有爆发的话，1889 年购买奴隶的价格是多少(肯定会上升)。他们经过这样的计算以后，用具体数字来支持他们的论点，这两位作者证明北美的奴隶制度是个暴利的制度。但无论如何，它在内战前的几年时间里决不是一种濒临死亡的制度。此外，它的实际效率事实上高于北方各州依赖自由劳动力的生产方式。南方的黑人奴隶是效率很高的劳动者，往往有熟练的技能，能够胜任城市和农村的劳动。他们过着正常的家庭生活，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不会因为某些个人的被出售而中断其正常的生活。他们

9

的物质生活条件(当然不是指他们的心理状态,因为他们的自由已被剥夺)与同一地区的白人工人所享受的物质条件是同样的。南方雇主剥削劳动的程度并不高。南方各州在1860年组成南方联盟,实际上就是组成了一个国家,尽管它在人类关系上的落后是臭名昭著的,但在经济上却是先进的。南方各州的经济表现可以用严格的计量方法来表达,远远超过了欧洲大陆上的国家(诸如法国和比利时等)。与老一套的想象相反,旧南方在各个方面实际上并不都是处在欠发达的状态下。仅从经济来看,它只被世界上两个最先进的地区,一个是英国,另一个是北方各州所超过。请允许我再重复一遍:福格尔和恩格尔曼通过这一具有潜在危险性的证明,并非要为任何意义上的奴隶制度的恐怖进行辩护或将其恢复。他们仅仅是成功地证明了前辈历史学家们使用了废奴主义者的宣传品所告诉他们的那些原始资料,因而未必能够重现真正的历史,即使他们在写作时有最善良的意图。我们欧洲的经济史学家,无论是年轻的还是不那么年轻的经济学家,都不应忘记这个教训。如果我们不以福格尔为榜样并吸收最成熟的经济学理论中的所有要素,法国历史研究的各个学派很快就会发现他们实际上成了井底之蛙。

在用开场白的方式进行了以上这些思考以后,我的讲座现在要涉及它的真正对象了,这就是从中世纪后期到18世纪初的某种传统的和农业的社会。从许多方面来说,它确实可以称得上是一个研究对象,有关它的统计方面的内容虽然存在着相当大的波动,但总是趋向于回到一个作为质点的固定不变的水平上。从任何意义上讲,我并不认为1300年至1700

年之间的"法国"（我指的是沃班时代的那个近似六边形的地区）是一个有机单位。法国在成为可以称作法国之前，仅仅可以用来作为世界的一个窗口。正是由于这个窗口，我们才有可能把这样一类的重大的人口学抽样孤立起来进行观察。到1700年沃班计算其人口的时候为止，这个地区有大约1900万至2000万居民。为了方便起见，我们暂且将他们称作法国人（以及法国妇女）。在国家和区域层次上对它进行的研究恰好都与1328年的户口计算发生联系，也得到各个省份的大量人口学研究成果的证实。所有这些都表明在这同一个区域里，在同样的边界内（这个边界在1320年当然是不存在的，这里仅仅是因为方便的缘故才加以使用的），大约在1300—1340年前后至少有1700万人。在1300—1340年到1700—1720年的整整四个世纪里，人口仅增加了200万人（这是历史纪录吗？）。除了1865—1945年期间，法国一直没有接近过人口学专家所说的那种人口的零增长，实际上也从未达到过人口的零增长。法国古典时期的体制所实现的那样一种人口自我制约的（无意的）方法并不是当代人所希望的，例如，流行病就是生态系统中的一个有效因素。这样的生态系统把人与他的生物环境、细菌环境和掠夺性的环境结合在一起。因此，我得赶紧说明这里简要勾画出来的模型只是事实，而这个经济一人口学的模型，并非是常规的，更不是人们所希望的。

关于从第一次农业革命（发生于中世纪的11—13世纪）到晚至19世纪的第二次农业革命的期间里，农业技术和粮食产量的停滞状况，法国历史学界近来已经有了一系列的发现。这里暂且不讨论18世纪这段情况不甚明了的状况，但我们可以有充分把握地说，让人口赖以生存下去的粮食产量大

致说来受到了1300年至1720年一种稳定的规范的制约。这一发现揭示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生态平衡状态，虽然这里还必须承认，在这段时期里出现了像钟摆那样的一些巨大的动荡和一些重大的倒退（但总是暂时的），就像是动物数量所发生的变化一样。有人怀疑，这个总的平衡状态是一种偏移或无规则，就像经济学家的图形一样，但从中仍然可以归纳出农村生活的形象。在幸免于砍伐的森林圈内，在11—13世纪的大批拓荒运动以后所扩大的空间里，农民从1300年至1720年一直生活在那里，繁衍了十二代或十三代人。他们的生活条件受到某种可能性的限制，表现为受到某些残酷因素的制约。这些限制因素似乎在1720年以后有所减缓，但并没有马上消失，甚至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1914年，法国农业人口实际上还与1850年的最高水平相当接近。从1320年至1720年的这一重要时期内，人口和粮食产量一直处于停滞状态，是一种真正的和长期的稳定。这些人口学家的参数和谷物产量使我们有理由去反对那些坚持认为有必要建立一个概念式的框架来作为分析前提的人。如果按照他们的说法，那些并非心甘情愿的帮工们的数字无论如何都无法归到某个概念中去（当他们不认同这样的分析时就把这些人从那个概念中删除掉）。相反，理论与证据的严重脱节，将会把我们直接带回到有关实际上属于停滞状态的特性的旧观点中去。

11

这个在生态上稳定以及在人口上接近稳定的社会并不总会表现出同等程度的平衡，至少是在紧接着前一个时期之后的时候。11—13世纪之间出现了一个真正的经济发展的长波，森林再次增多、人口数量回升。这一经济发展出现在封建贵族在自己的封地上所掌握的权力发生分散的世界上。毕竟

这个旧世界转向有利于社会发生真正巨大转变的环境。说它是巨大的，是相对于 1300 年以后整整四个世纪的停滞时期而言的。11—13 世纪，对封建制度有利的东西也对整个西欧有利，对于我们所选择的相应于今日法国的这个区域也是有利的。直到 1300 年以后，民族国家的创立过程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最终导致了世界大战的风险，而事实证明正是世界战争才是最有效地制止经济发展的手段之一，就像世界战争与许多其他的因素结合在一起，制止了哥特人时代和中世纪的经济增长一样。

从1300 年以后，到 1720 年（从“公正的”腓力国王到约翰·劳及其制度的建立，从所谓的恶性通货膨胀到良性的通货膨胀），经济发展的极盛时代已经结束。事实证明，过去曾经经历过较高水平的人口增长的人类社会以及整个生态系统（即自然加上农业，动物界的某种动物和植物界的某种植物，12 再加上人类），从这个地理单位内部和全人类的观点来看，已经有能力消除某些制约机制（以及下一步起飞所需要的其他机制）。这些机制可以阻碍经济发展，也可以制止水灾，或者说周期性地恢复人口总量，并达到一种更高水平的平衡，而不致发生重大的动荡。这个常规化的取得起初依赖的制动力是来自外源的力量，虽然这样的外源因素只是第一次以这样的方式出现。对欧洲而言的这个外源力量，对欧亚大陆来说却是内源性的，对稍晚以后的 16 世纪的整个大西洋世界而言也是内源性的。这一点并不难证明。总而言之，从 11 世纪以后，人口、贸易、商业、殖民地、宗教与军事方面的联系都在逐渐增强。西方的形态终于与同样厚重并且正在发展中的其他形态相遇和并肩，其中包括 13 世纪以后的中国和 16 世纪以后的

美洲。这里仅以前者为例：中亚地区在14世纪初由于成吉思汗和他的继承者给旧大陆的核心地区创造了政治和商业的和平环境，丝绸商队穿行，蒙古军队任意驰骋，也带来了老鼠和传播鼠疫的跳蚤侵扰。越来越多的细菌携带者首先在欧亚大陆，然后在大西洋两岸，为病毒和各种细菌繁衍蔓延创造了温床，给每个人都带来了灾难。这种共同开发资源的做法今天仍在发挥着作用。于是，细菌直接引起1348年的那场著名的黑死病，这在公元1300年以前是不可能的。这一系列的瘟疫引起了法国的大乱，直到有史记载的1720年在马赛爆发的最后一次瘟疫为止。同样的原因也造成了美洲1492年和1532年印第安人的大灭绝，其灾难程度甚于瘟疫在欧洲的爆发。那场灾难是由于卡斯蒂尔的征服者带来的传染病造成的，人们不能说是“完全无辜的”。他们又把病毒带了回去，这个灾难造成了欧洲人口的破坏。这确实是事实。但是，这不过是一次小小的报复，不能与拉丁国家输往墨西哥和秘鲁的新大陆人口的大批死亡相比。在14世纪和16世纪的这两次灾难中所形成的国际性影响，被详细而准确地记载下来了，它的罪责是不容置疑的。顺便说一句，在事件的历史学中，热那亚人承受了双重的罪恶负担。第一，由于它在亚洲丝绸贸易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并在加发设立了钱庄，商队从那里把瘟疫带到了西方。第二，由于热那亚最杰出的公民之一哥伦布领导了第一次征服，热那亚这个伟大的城市和港口也要为疾病的传播承担罪责。

13

疾病带来的全球一体化终于在1300—1650年之间结束了，人类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对于那两个年份之间建立的生态系统而言，这个全球一体化却成为潜在的稳定因素。但

是，这个稳定当然仅仅是依赖于把钟摆从这一端甩向另一端的方式来实现的，起初的摆幅（14 世纪和 15 世纪）是很大的，然后是适度的。在今天称作法国的这个地区内，在 1320 年至少有 1700 万人口，到 1440 年，这个数字下降到仅为 900 万人。但从 1550 年，而且一直到 1715 年，中世纪末的人口数字恢复到 1700 万，在 17 世纪这个"长时段"里，在略有些许出入的年份内，这个"六边形"里边，或者略大一点的范围内，人口数字浮动在 1900 万至 2000 万人之间。

然而，疾病带来的世界一体化并非惟一的制约因素。在 14 世纪到 18 世纪初之间可以明显看到另一个强大的制约"因素"在发挥作用，那就是战争。战争的操纵者是现代的或所谓现代的国家。从更为一般的角度来说，我也要对国际体系或国家间的体系进行谴责，因为它构筑了一个背景，而西方不同阶段上的冲突正是以各自的形态在这个背景中发生的。

在早期阶段（11—13 世纪）上，旧时代的战争全都发生在尚未出现裂缝的并紧密交织在一起的封建制度的范围内。这些战争依然是地方性的，只对这个结构中的一小部分造成了破坏。撕破的裂缝在极短时间内就能弥合起来。但是，当大规模的王国出现以后，情况完全发生了变化。大国受到其内部逻辑的驱使，由某些个人领导，从统计学的角度来看，这些个人都是短视的：野心是长期的，眼光却是短浅的。他们热衷于发动国际规模的战争，而事实又证明这类战争是无休止的，延续了 30 年到 100 年的时间。这类战争本身的杀伤力未必很

14 强，因为它们的杀伤力毕竟是决定于军队的数量，而军队的常备力量在一个长时间里不会超过 1 万人（虽然路易十四晚年时曾把 50 万人送上了战场）。因此，这样的杀伤力本身是不具

毁灭性的。但是，小群的军人，即“武装的暴徒”，则造成了我们所说的伤害性的副效应。战争传播了疾病。在战争期间，人数极多的军人、难民、游民和乞丐，身上带有传染斑疹伤寒的虱子和传染鼠疫的跳蚤，把流行病传播开来。在黎塞留梦寐以求的那场远征中，就有一支8千人的部队穿行了整个法国，从拉罗舍尔到达蒙特非拉。[7]仅仅通过由此而开始传播的流行病，这一小支部队在1627—1628年就造成100多万人死于鼠疫。然而，可以肯定的是，这些人从未怀疑过这是他们为征服新教徒，也就是为实现这位红衣主教的国内政策而付出的代价。

战争还带来了其他的副作用：牛马被征用，村庄被毁灭，磨坊和农场被摧毁，堆满谷物的仓库被夷为平地。这可以导致全部农业资本的消失。这样的事件伴随着各种类型的死亡，最终爆发为一场恐慌，在播种、耕地和收获等重要农事季节，却把担惊受怕的农民赶进了城墙之内以寻求安全。这些农民阶级面有菜色，陷于破产后，在某些最早消灭了富裕农民的地区，根本就没有他们的容身之地。在某些情况下，这使得旧制度的经济或生态—人口失去再次恢复的可能。1430年在诺曼底发生的就属于这类事件，造成了这个省的人口下降到只有百年战争前的28%。[8]奎伊·波瓦有充分的理由把这类事情称作“广岛模型”。此后，在圣女贞德的时代，战争、瘟疫、流行病和饥荒横行肆虐，其性质远远超过了经济的衰退。对由此造成的后果，如果偏听过时的经济主义者的说法，往往会被我们低估。《启示录》中的这四位骑手驰骋交错，造成了法国15世纪大规模的但暂时的人口衰减。说得更准确一点，中世纪后期的经济衰退是由一系列的因素和变量造成的，其中有主动的，

也有被动的、但两者相比较，被动的因素多于主动的因素。

15

在1560年至1715年的这段时间里，人口恢复和重建之后（1440—1560年之间的），战争以及伴随着战争的饥荒和流行病再次成为制约人口增长的重要因素。它为我们的经济—人口系统设定了上限，甚至引起了下一轮恢复前的衰退。有关的证据可见于我的朋友约瑟夫·戈瓦对什一税征收状况的全面研究，[9]我从中得益匪浅。在缓慢增长的这三个主要阶段中，不用说是伴随着可怕的痛苦，明显表现在我们的图表中。这三个阶段大致说来是宗教战争时期（1560—1595年），三十年战争和弗隆德运动时期（1635—1653年），以及路易十四统治晚年的战争时期（1690—1715年）。

说到战争是"马尔萨斯的制动阀"，这自然是指常备军这个未来的官僚制的模型。然而，这也让我们联想起"近代"国家的君主制。这似乎是一种绝对君主制，但显然是一种具有行政职能的以及强制性的君主制，也是庇护制度的根源，其表现形式是"政府部门"。这个"近代"国家是在14世纪至17世纪之间逐步形成的。它统治着整个领土，如果人们依赖过去的那种以政治为中心的历史学的话，确实是太过分了。事实上，如果从我们现在所关心的经济—人口系统的角度来看，君主制的国家只不过是一种野心罢了。从韦伯的观点来看，国家最初似乎成了推动现代化的力量。用彼埃尔·肖努的说法，大胆地称之为"技术结构"，指的就是它能够推动经济、文化和社会领域中的某些发展。但是，在14世纪到17世纪之间，这种增长功能往往被由此而造成的稳定效应所抵消。如果人们回过头来读一读彼埃尔·古贝尔的最新著作《旧制度》，[10]就会发现君主制的国家基本上是个军事制度，本身涉

及到欧洲的权力平衡。国家预算中有一半以上被军队所吞食，远远超过了过去的凡尔赛宫，而这个军队从许多方面来说无异于民族的坟地。因此，在1315—1715年之间，在制约生态—人口系统的主要因素中，必须考虑到国家和军队。这个系统产生了国家和军队，反过来又被它们所吞食。我从来就没有相信过泛圣经注疏学派和神喻的解释；也就是说，既然在所有可能的世界中，一切都是为了实现完美中的完美（就像瓜果的成熟是为了让家人分食一样），那么，西方社会需要为自己提供贪婪成性的国家，它们随时准备扑向彼此的喉咙，每隔30年左右便组织起一次大屠杀，以防止人口的过度增长，让幸存的人们分享平衡的果实。我可以把这种神喻的观点比作为了争论而扎出来的稻草人，但无论如何我也不同情它们。我只希望在这里指出，长期的平衡似乎是我所研究的这个对象的基本特征，这种长期的平衡只有在悲惨的状态下才能得到充分的实现，也就是说，要靠政治因而也要靠战争来实现。现在是这样，过去更是这样。总而言之，动物世界的生态需要仲裁者的存在。在17世纪的法国，战争就充当了仲裁者的角色，它的直接作用是造成死亡，它的间接作用则是通过赋税来造成危机和贫穷（就像人们在路易十四统治晚年可以看到的那种体现其时代特征的悲惨生活）。 16

事实上，国家在没有改变其方向之前并不能完全胜任推动现代化、造福于民和推动经济发展的作用，这种方向性的变化无法用更恰当的话来表达，我在这里暂时把它称作辩证的变化：1715年以后进入了消耗性战争的时代，开明地方长官的时代，以及收集事实和数字的官僚时代。启蒙运动的时代被视为18世纪的人口繁荣，是一个富裕的时代。启蒙运动和

1789年的革命为以后的几代人奠定了持久的基础，为向同一方向的进步提供了最后的推动力（尽管这个推动力在1792—1815年的战争中发生了短暂的逆转）。

有关国家的这些思考把我引向对某种东西的强调，这种东西可以描述为现代化的悖论之一。国家、战争、军队，以及伴随着它们而出现的一系列惩罚，多次以政策的名义使整个民族濒临深渊。这个政策在马尔萨斯所说的那种残酷约束的环境下，确实有助于人民避免由于人口数量的无节制增长而造成的不幸。但这种政治在16世纪的重大变化中也会带来同样悲惨的后果。不需要我来提醒任何人，生活在14世纪到17世纪甚至更晚一些时候的大量法国人，不仅仅包括少数贵族，都处于一个文化上相对稳定的世界中：他们说的是地方方言，依然保持着对其中有一部分仍然是由民间传说构成的天主教的忠诚，形成了他们宗教情感的基础。在这样的背景下，新教的宗教改革本身就是以印刷术的传播以及比例很小的一部分人口的识字水平的提高为基础，逐步演变成一场凶猛的喷发，开始否定机械论。人们无法把胡格诺派的头颅转而安放在自以为是的天主教徒的身躯上。如果人们试图让村民们放弃对圣母和所有圣徒的崇拜，那就只有等待着他们的报复，因为正是这种崇拜使农村居民改变了旧时代对树木的异教信仰，皈依了基督教的事业。1560—1680年间的自卫和讨伐式的反应，连带着变态和狂热的相互交织，动摇着这个民族的整个肌体（从而把自己融合为法国），直到南特敕令的废除，最后一次把外来的躯体驱赶出去，随着反宗教改革的调整而使天主教传统取得最后的胜利，由此再次显示出信仰的统一。在它的最早阶段上，即1560—1595年，否定的现象空前猛烈。它逐渐表

17

现为宗教战争的反冲，开始了生态—人口系统的大量出血，从而为这个系统提供了最强大的稳定性的影响。它终止了过去文艺复兴时期失控的人口爆炸，那时的人口就像兔子一样成倍地增加。由于这种反冲效应，现代化的努力再一次并最终增强了这个系统的收缩和停滞的特征，而这个系统是从1600年的大磨难中开始出现的，弥合和修补了创伤，然而，所有的伤疤原封不动地依然保留在原有躯体上。

当然，如果这一切都用战争来加以解释，显然是荒谬的，而且确实是愚蠢的。它仅仅是个不得已的做法，是我们这个系统的最后手段。在包含17世纪在内的这个时期里（1560—1715年），战争只爆发了三次（参见上文）。在战争之间是平静的时期。这个时期大致上分为80多年之久的危机和战争、80年的和平，至少是国境线内部的准和平。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伴随着战争的阵发还必定存在着和平时期的常规状态，即流行病的常规状态，它也制约着人口的增长，而且事实就是这样。弗朗索瓦·勒布伦的那部论述安茹的重要著作提供了有关这个问题的所有必要的细节内容。[11]他的个案研究特别值得称道，如果这样的措辞是得当的话。在18世纪，法国的其他地区仍然经受着人口急剧增加的痛苦，使人口从1900万激增至2700万，在这里却出现了例外，这块飞地制止了为人口爆炸设置极限的现象。布列塔尼和安茹便属于此类。那里的人口（尽管也存在增长的压力）在1700年至1789年控制在零增长的水平上。战争不能对此提供解释，因为安茹远离军事行动的中心地区，在路易十四、路易十五和路易十六的统治时期没有经历过战火，1700年以后从未发生过饥荒。因此，必须从其他方面寻找解释。弗朗索瓦·勒布伦毫不费事地就找到了 18

根源并证明传染病是安茹人口停止增长的主要原因。确切地说,任何地区只要出现了人口增长的迹象,几乎立即就会出现某些事情,例如这个地区立即就会出现卫生状况的恶化。那里的人们饮用的是卢瓦尔河里被污染的河水,阿米巴痢疾造成了成千上万人的死亡,使新近增长的人数完全消灭。无论人们会对安茹的甜蜜生活(*la douceur angevine*)怀有怎样的乡愁思念,这里都必须指出,这类极其原始和残酷的人口控制方式也可以在动物的王国中看到:例如在最接近人类的高级猿类中可见一斑。在一位英国动物行为专家所研究的岛猿中,[12]每当猿的数量增加时,造成了猿与猿之间身体接触机会的增多,赤白痢便大肆传播。相反,在每一次流行病之后,猿的数量减少,身体之间的接触机会也随之减少,这样就为幸存者提供了比较大的空间,使他们因此多少受到了一些保护,不受有害的身体接触。然后,猿的数量再次增加,直到引起下一轮的传染病,并依此反复。哎呀,痢疾之于安茹的人口和岛上的猿来说,就像是离心式调速器之于瓦特蒸汽机一样。

近30多年来,有一种理论获得了普遍的承认。这个理论认为,法国旧制度下的城市和乡村人口数量都是靠饥荒来调节的。那么,流行病的论点使这个理论受到了怀疑吗?未必。那种说法依然是正确的,即17世纪的饥荒尽管到1741年已十分幸运地受到了控制,但在那个年代仍然是非常可怕的。最近的一些研究极其有益地提醒我们,饥荒的发生不会脱离其发生的背景,而是一个与因果链相联系的"总体社会现象"。当我们向后追溯其原因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它与战争有联系。战争因其破坏性之大,既带来了眼前的灾难,也带来了沉重的赋税,往往造成了每一次饥荒得以发生的条件。[13]当我

们观察其后果时，又会发现饥荒与流行病有联系，并通过两种途径引起流行病：它通过营养不良为流行病提供了有利的温床；它造成了数量巨大的无家可归的带菌流浪者。总而言之，饥荒在我看来是一种“最终解决方案”，它是那么的恐怖，以致于人口平衡的机制很少需要走向极端去实现它的目标。在大多数情况下，在出现耗尽全部资源这个意义上的饥荒之前，内部和外部的制约因素（瘟疫、战争、流行病、晚婚等）已经在发挥作用了。可以这样说，它们不失时机地清除了人口增长的剩余层次，甚至于它们本身就有可能引起人口数量的大幅度下降。 19

甚至还有另一种现象，一般是与城市有关，而且有人会因此认为它与现代化有联系，但这个现象实际上对人口增长起着制动器的作用，把它维持在零增长上。18世纪，在巴黎地区的一个小村庄里，有142名巴黎儿童被送到那里去哺乳和寄养，所有这些儿童都在一年内夭折。更难以置信的是，就是在这个村庄里，正如马塞尔·拉奇维尔告诉我们的，在13个月的时间里（即两次受孕的正常间歇期内），有31名以上的婴儿一个接一个地从城市送给了同一对夫妻（他们是否患结核病?），妻子自己充当奶妈。所有这些小家伙仅在几周的时间内都一个接一个地死去了。这显然是一个有组织的杀婴或至少是不负责任的杀婴的极端和病态的案例。然而，这种悲惨的事例却是一个让人清醒的警示，它告诉我们，古典时代的大城市，尽管如此辉煌，但堪称“死亡城市”。或者，可以换一种说法，它们起到了防止人口繁荣的安全阀的作用，吸收了夜间从乡村来到城市的剩余人口。这些剩余人口中的大多数注定了要么死亡要么断子绝孙的命运，因为那里有迅速传播的肺

结核,因为那里有大批的婴儿被送出去接受惨绝人寰的哺乳,或者因为那里年轻妇女无法移居,她们要么不能结婚因此不能生育,要么由于晚婚而缩短了生育期(参见莫里斯·加尔登的有关里昂的著作)。[14]

我所描绘的这幅景像似乎过于悲观,好像其中包含着价值判断的成分,但事实上并非如此。确实,死亡对人口控制显然起着非同一般的作用。但是,那些看上去不那么严厉的制约手段,诸如避孕等,在我所讨论的这四个世纪里实际上并不存在。半宗教和半人类学性质的反对性行为的禁忌在西方国家长期存在,只是到了18世纪才开始在比较富有的阶级当中失去效力。在农民当中,这类禁忌到法国革命以后才消除(从这个角度来看,法国革命类似于人口学的伊斯兰教)。[15]

在我们讨论的这个时期里,初看上去,更有意义的是有关晚婚的资料。按照彼埃尔·肖努的说法,"这个习俗是古典欧洲最有效的避孕工具"。[16]确实,除了前于它的一个时期有严格的未婚贞操的习俗外,女孩的晚婚(25岁或26岁)意味着减少了三四次受孕的机会。它还有另外一个优点:婚事前保持独身的行为受到赞许,与各种禁欲教派,如清教派和詹森教派的意识形态是相吻合的。这种意识形态在1580—1780年前工业化的欧洲各地普遍存在并十分盛行。这种严谨的信念,如果人们相信马克斯·韦伯的话,后来成为小资产阶级和资本家阶级的精神兴起的出发点。但是,在17世纪和18世纪,或许是因为缺乏更高的目标,这种意识形态被家庭所使用,为在青春期至结婚之间的这段时间里有效地保持女孩的贞洁提供了理由。结婚之前,在旧制度下的村庄里,人们看来似乎必须接受一个很长的而且平静的等待时期,才能拥有或继承一

幢房屋，以便建立家庭。

晚婚的状况是一个被时间肯定的而且诱人的状态。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符合韦伯的关于严苛的个性的观点，也在人类学家和生物学家的一些发现中得到了证实。他们继卡尔·桑德斯和怀因·爱德华兹之后，在人类和动物世界中发现了限制人口数量的许多方法。例如，鸟类可能会采取减少鸟巢数量的方式。这个思路提出了一个有关人口控制的总的系统理论，既适用于人类，也适用于动物。对于把这些现象联系起来的做法，我不会提出质疑，因为我本人就对跨学科的研究饶有兴趣，而且认为这种研究有很高的价值，并试图对此作出某些贡献。然而，近来对旧制度下人口未能实现零增长的研究提出了完全不同的解释，强调了死亡在限制人口方面所起的重大作用，似乎比那些以禁欲为基础的比较"理智"的控制手段更为重要，理由是避孕的方法当时尚未出现。从这一点来比较，雅克·迪巴居埃提出的数学模型根本不承认晚婚是限制人口数量的因素。[17]

21

主张"静止状态"的理论家们把它定义为永恒的运动之一，而且在这个状态中存在着一种最终的趋势，中间状态再产生出属于初始状态的某些本质特征。这种再生产理论也可以适用于我们的农村生态系统：尽管上层建筑发生了重大变化，但依然可以发现这个系统（比如说在弗隆德运动的饥荒前夕以及在1693年和1719年之前再度出现的系统）最终会与三四个世纪以前的系统，即1315年饥荒之前的系统，相当接近。主要的参数，包括人口的、生态的、乃至社会的参数，发生了一些波动，但没有重大的变化。对于所有这些表面上的运

动而言，事情实际上保持着原样不变。在 1320 年或 1680 年的这两种情况下，活跃的农业人口无论从哪方面来看都长期保持在同一个水平上，使用几乎没有变化过的技术耕种着小块土地，单位面积的产量没有多大的提高。这样的单位产量无力避免成千上万的人们成为每 30 多年就出现一次的饥荒的直接或间接的牺牲品。确实，在那两个年代里，这个系统的运行接近于其能力的最大极限，濒临于生存危机，处于病毒传播的环境下。由此造成的生态灾难，从人口或从可耕地的面积这两个方面来衡量可能落到低谷（例如，在 1430 年、1695 年和 1711 年。后两个年份相对来说不是太严重）。不过，这样的灾难不能阻止这个系统按照过去的内部规范进行自我重建，并修复其创伤。在这种重建和恢复中自然会伴随着某些变化；有些变化甚至有可能是相当巨大的，除非它们与这个系统的整个逻辑保持着一致性。这样的转变，虽然未必是国家范围内的全面转变，但涉及到农业中关键部分的商业化。这当然表现在贵族地产（*réserves*）上，特别是这些地产的租赁，反过来成为启动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手段。这样的现代化可以发生在各个层面上：首先是国家的成长以及城市化，剥夺了封建领主的某些职能。到了 17 世纪，他们往往只不过是庄园主，充当政治委托人或地方警察的作用。他们失去了作为村庄里小宗族首领的某些功能。他们过去的权力，实质上是国家的权力，现在由官吏来行使，或由宫廷以及市政机构来行使。其次，商业化和城市化（再次）增强了领主地产的重要性，因为它们生产出了剩余的粮食和牲畜。相比之下，小农户没有能力上升到自足的水平之上。结果，从中世纪到 18 世纪，领主在实际上没有丧失其特质的同时，封建特征越来越少，资本主义的性质却

22

越来越强，或者说，成了地道的“重农主义者”。启蒙运动时期贵族的“反动”从其形式而言确实是反动的，但其内容必须涉及到创造利润。因此，1789年革命实行的把土地分成小块，变成农民的小地产，从经济的角度而言，反而明显地倒退了！

然而，这些实际上的微妙差异和例外，从时间上看要略晚于我们所研究的历史对象。总的说来，稳定的外观，其中当然包括在可能接受的限度内的一些变化，在1720年以前的这个时期依然占据着主导地位。总而言之，平均每亩的生产力在这个时期没有任何增加。正是因为这个低下的生产力，城市总是需要以大地产和封建地产为形式的大量土地来提供生存所需。无论在1300年到1720年之间发生过何种变化，都不足以改变生产方式，即小地产和封建地产的结合，而这个结合在这整个时期统治着农业的世界。

实质上的稳定并不等于一成不变。我已经提到了一个领域的变化。但是，在这个系统的内部还存在波动和摆动。威廉·艾贝尔步李嘉图的后尘，最近研究了这个时期的大摆动。[18]艾贝尔特别感兴趣的是正在发生变化的关系网络，它由社会结构的方式构成，介于波动的人口和可提供的土地之间。他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由各种变量组成的旋转环：在14世纪初，这些变量是指高额地租、低工资和土地的再分割；然后，在1350—1450年的这个时期，则是指小地产再次兼并，工资上升，劳动周的减少，地租下降，鼓励地主进行歹徒式的活动。在16世纪，人口增加，土地的碎化加剧，工资下降到最低点，相反，地租却上升了，使地主和资产阶级致富。然后，在下一个时期，地产和工资再次得到稳定，特别是地租在17世纪的某个时间上升到了顶点。

23

前面提到的贵金属运动是否与此有关呢？即从秘鲁流出并被采掘一空的财富。近来的一项研究建立在对硬币进行的放射性试验的基础上，实际上表明白银对经济的长期趋势发生的影响，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估计过高了。[19]在艾贝尔的描述中，技术革新对启动各种摆动的作用并不大。确实，摆动似乎是用来描述来回的运动、衰落和复苏，而不是用来描述任何长期增长趋势或相反趋势的一个词。

艾贝尔所说的重大经济波动，是由长期的大幅度人口变化造成的，也就是说，把所有的中间阶段考虑在内，它们是由生理因素和疾病爆发的节奏决定的。经济变化是由人口变化而不是以其他的方式造成的，即由假设的和现实的生活水平下降的效应造成的。这样的变化与其说是“马尔萨斯式”的还不如说是“李嘉图式”的。如果可以的话，我要在这里加上我本人对经济主义反对派的（主要是巴黎的）大合唱所作的一点稍微尖锐和不协调的评论。在包含 14 世纪到 17 世纪在内的这个时期里，经济是奴仆而不是主人，是被主宰者而不是主宰者。重要的是，在我们研究的这个时期的早期阶段上，经济进入了繁荣，似乎是最后一次驯从于决定其生死的强大力量。至于政治和阶级斗争的主宰作用，它们发挥力量的时代尚未到来，至少到那时为止尚未到来，而且，这种力量实际上是局部的。

从类似于这样的一个相当长期的角度来看，这个系统具有宿命论的性质：对它的反抗并不明显。经营磨坊的农民举行的起义不属于反贵族叛乱的模型（例如法国的扎克雷起义和德国的农民战争）。农村的叛乱，至少在法国，主要是向往旧日的美好生活。他们的矛头所向是技术革新，特别是盛传的新发展：渐进的外观，在系统的中心和周围，一个依然受到

24

崇拜的君主，人数激增的政府官员和包税人等“财政官员”。17世纪的农民起义，正如波尔奇涅夫和莫斯尼埃以不同的方式所描述的那样，本质上是对攫取了国家的这个军事和财政机构以及再次出现的财政勒索的敌视而产生的反应。总而言之，在1609年至1690年这个发生了一些重大起义的时间里，财政勒索使宫廷的支出从192吨白银增加到1050吨（相当于贵金属的重量）。[20]前面提及的起义并不攻击“封建”贵族和地主，尽管他们的利益在某些情况下遭到损害；事实上，农民起义常常需要在农民社区中自然形成的中介人，即地方领主、教区牧师和律师们来充当领导。直到启蒙运动时代的文化革命深入到农民群众的心目中并渗透到勃艮第等省份以后，才出现了向权威挑战的倾向，过去那些以反抗赋税为目标的起义现在开始把怒火转向贵族。

这里也可以提出相反的看法，正像我今天所提出的，这种本质上属于停滞的历史状态（包括所有的波动、延缓或灾难，以及所有的内部动荡）可能表现为相当急促地取消了所有重大的新发展，而这些新发展毋庸置疑确实在这个时期发生了，无论是牛顿的理论，帕斯卡尔神秘的经验论，帕平的烧锅，巴黎成长为一座大城市，还是以使用餐刀和餐叉为标志的文雅生活方式的传播。我从来就没有想到过要否认所有这些都代表了某种崭新的事物。但是，我这里所关心的却是广大民众变成了什么或未能变成什么。上层社会所取得的成就必须放在一旁，将它们置于不同的和更高的层次上。那实际上只是研究少数杰出人物的历史学所关心的内容。那种历史确实可以预示未来，但是直到目前尚不能让坚实的农村民众从窠臼中解脱出来，他们依然来回地摇摆在李嘉图式的摆幅内。

然而，上层社会的无能只适用于1720年以前的长时段中(至少是在法国；在其他国家，时间的划分可以不同)。从那以后，的确，上层社会的力量得到了复兴，在几个世纪的时间里逐渐建立起来，成为“临界质”，或者说造成了一场雪崩。这一场波动把社会带入了一种13世纪以来的农民群众从未经历过的真正的成长。革新的力量包括国家、现代化的教会、教育制度这种更加具有压制力但更加有效的制度；更加丰富的货币供应；更加成熟的贵族和资产阶级；经营得更加合理的地产；各处的文化水平有了更大的提高；更加理性的官僚制度；更加活跃的贸易；最后还有以不可阻挡的速度进行的城市化，迫使国民中(他们的生产力跟不上)产生更多的农民，以便有粮食来养活新兴城市的大批人口。这究竟是智慧还是愚蠢呢？天晓得。但是，它打开了潘朵拉盒子，迫使农业人口脱离了一直持续到路易十四去世时的生态系统，突破了中世纪的旧规范。到了启蒙主义时代，当然也包括此后的19世纪，才出现了突破。1328年的法国人口为1700万人，但到1700年只有1900万人，基本上保持不变。但是，到了1789年，达到2700万人，到1870年的普法战争时达到近4000万人。在欧洲的其他国家，人口的增加更为迅速。人口的激增，伴随着饥荒的消失，使得农业总产量的一定增长既是必要的又是不可避免的，更不用说用来运输谷物和食品的更加先进的交通工具了。如果要让人们免于饥饿，现在由土地可以提供的果实产量的增长必须至少相当于或超过一个国家人口的增长。在这个具体的问题上，我中止了参与那项自相矛盾但杰出的研究项目。我这篇演讲的前面部分曾经从这项研究中自由地吸收了许多内容，以便对停滞的历史作出定义，因为我认为任何人都不会

否定农业在18世纪所取得的进步。我所提到的这本书中最重要的论点之一就是从来没有发生过农业革命，然而，这个观点却得到了来自发生了农业革命的那个省份（法国的最北端）的详细证据的支持。事实上，除非人们承认法国在1670年有2700万居民（这个说法是完全不能接受的），[21]否则的话，他们就必须承认即使18世纪的法国没有发生过农业革命，至少也存在着活跃的农业发展。不管怎样，有关农民死后财产清单的一项尚未发表的研究成果为19世纪农民在旧制度下贫困化的神话铺平了道路（1973年举行的法国经济史学家会议上，M·鲍兰律向研究小组提供了一份关于消费研究的论文）。 26

紧紧箝制住我们国家的凯利班*得以成长的旧的物质强制力于是就在这样的拉力下破碎了。与此同时，意识形态革命的基础建立起来了。这样便可以比较容易地解释斗争性很强的农民却在18世纪80年代构成了少数人的喧哗的大合唱这样一个反题。这些农民第一次抱有与平等和废除某些特权相联系的期望。但是，与此同时，这也是最后一次奋起为捍卫小地产不受资本主义生产力进步的破坏而进行的斗争，在农村则是以贵族和"反动"贵族为代表，总而言之，为贫穷所困扰的农民所发出的双重战争的呼声有其自身的逻辑。

作为这次讲座的结论，我想再次说明，我们历史学家从社会科学中，特别是在决定我们应当研究的主题上，获得了巨大收益。由于时间所限，我要回过头来澄清一种误解。直到19世

* 凯利班是莎士比亚的剧本《暴风雨》中的主人公，是一名原始而长相丑陋的奴隶。——译者注。

纪，知识基本上建立在两种文化的对话上，即精确的科学和人文学科之间的对话。这是数学与直觉的对立，“几何学精神”和“观察力精神”的对立。当然，从修昔底德到米什莱的历史学包含在人文学科内。然后，沿着这一线索出现了“第三种文化”，即社会科学，它起初没有受到重视，但很快就为人所共知。在很长的时间里，它们欢欣鼓舞地与历史学家共存，这条线索可以从马克思伸展到涂尔干和弗洛伊德，一直在相互地交换着概念，跨越彼此的界线。然而，最近以来，旧的规则遭到了攻击。社会科学希望保持它们的声誉和纯洁性，开始对27 被指责为“软”科学的历史学实行关门经营。这场攻击的特征在于，由于这部分攻击者的熟视无睹，其中也不无夹杂着的怨恨，故意忘记了历史学自布洛赫、布罗代尔和拉布鲁斯以来也经历了科学化的转变。克莱奥趁社会科学洗澡的时候偷走了它们的衣裳，而没有注意到自己正赤裸着身体。今天，不管怎么说，这场驱逐历史学的运动已经基本结束，因为有一点已经十分清楚，那就是这个运动的前景很不美妙。人人最终都要服从亲眼看到的事实：如果没有关于过去的特别领域，也就没有建立人类科学的可能，就像不知道星体和银河系年龄的天体物理学一样。经过几十年的半失宠之后，一直是社会科学中灰姑娘的历史学，现在已经恢复了它的正当地位。确实，它现在显然需要选择一个退却的合适时机，千万不要像它在有些地方豪迈地宣称的那样变成一种自我吸收自我陶醉的精神活动。历史学透过眼镜应当去搜寻的不是自己的映象，而是去寻找一个崭新的世界。

注 释

[1] 本文为1973年11月30日在法兰西学院的就职演讲(正式发表时已作修改)。

[2] 保罗·波瓦:《东部的农民》(Paul Bois, *Les Paysans de l'Ouest*)。关于此书的详细讨论,参见笔者的《历史学家的领域》(*The Territory of the Historian*),第1卷,第7章。

[3] 圣西埃和茹西埃是巴黎大学的两个学院。

[4] J·-P·安托芬(J.-P. Enthoven)语。

[5] 这里指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路易·阿尔都塞,是《读资本论》等著作的作者,在位于巴黎乌尔姆大街上的高等师范专科学校任教师(英文版译者注)。

[6] 福格尔和恩格尔曼:《苦难的年代》(Robert Fogel and Stanley Engerman, *Time on the Cross*),波士顿,1974年。

[7] 比拉本:《人类和鼠疫》(J. N. Biraben, *Les Hommes et la peste*),巴黎,1975年,第1卷,第142页。

[8] 参见盖伊·波瓦:《封建主义的危机》(Guy Bois, *Crise du féodalisme*),巴黎,1976年。

[9] 约瑟夫·戈瓦和伊·勒鲁瓦·拉迪里编:《什一税收入的波动》(Joseph Goy and E. Le Roy Ladurie, eds, *Les Fluctuations du produit de la dîme*),论文集,巴黎-海牙,1973年。

[10] 彼埃尔·古贝尔:《旧制度》(Pierre Goubert, *L'Ancien Regime*),第2卷,巴黎,1973年。

[11] 弗朗索瓦·勒布伦:《安茹的人口和死亡》(François Lebrun, *Les Hommes et la mort en Anjou*),巴黎-海牙,1971年。

[12] 参见迈克尔·R·A·钱斯(Michael R. A. Chance)的著作。

[13] 有关这个方面的可信证据,参见让-马克·德巴尔的《1571—1793年蒙贝利亚尔的生计和谷物价格》(Jean-Marc Debard, *Subsistances et prix des grains à Montbéliard de 1571 à 1793*),蒙贝利亚尔竞争协会出版,《公报与回忆》(Société démulation de Montbéliard, *Bulletin et mémoires*),第71卷,第98分册,1974—1975年。

[14] 莫里斯·加尔登:《18世纪的里昂和里昂人》(Maurice Garden, *Lyon et le Lyonnais au XVIIIe siècle*),巴黎,1970年。

[15] 例如参见J·-A·加里亚日:《博韦五个村庄的出生率结构》(J.-A. Ganiage, "Structures de la natalité dans cinq villages du Beauvaisis"),载

于《诺曼底年鉴》(*Annales de Normandie*),1973年3月。

[16] 彼埃尔·肖努:《古典欧洲文明》(Pierre Chaunu, *La Civilisation de l'Europe Classique*),巴黎,1966年。

[17] J·迪巴居埃和M·德莫内:《大家庭的构成》(J. Dupaquier and M. Demonet, "Ce qui fait les familles nombreuses"),载《年鉴》(*Annales E.S.C.*)1972年7—10月,第1025页。

[18] 威廉·艾贝尔:《农业危机(6—19世纪)》(Wilhelm Abel, *Crises agraires(VIe - XIXe siècles)*),(德文原著的法文译本),巴黎,1974年。

[19] 例如,参见A·戈尔都和J·戈尔都(A. and J. Cordus)发表在1972年12月《年鉴》杂志上的研究成果。

[20] P·古贝尔:《旧制度》(P. Goubert, *L'Ancien Régime*),第2卷,巴黎,1973年,第136页。

[21] M·莫里诺的著作《经济起飞的假象》(M. Morineau, *Les Faux-semblants d'un démarrage économique*),《年鉴手册》(Cahier des Annales,第30期,第366页)明确提出了这个有重大争议的观点。他指出:"考虑到1680年至1700年之间各地过高的死亡率,可以假定法国革命前夕的法国人口回到了1670年的水平。"

第二章 一种概念:疾病带来的全球一体化(14—17世纪)[1]

28

人们对环境问题的兴趣大增，越来越关心作为当代文明特征的污染问题,并由此产生了一个有益的影响,即迫使历史学家以当代人们所关心的重大事情为出发点，去重新思考过去的某些重要方面。当我们从20世纪向前回溯,去看16世纪的时候,这种“反思”不仅要求我们彻底改变视角,实际上还要求我们改变方向。虽然我们的文明出现了或好或坏的变化,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地要求朝着抗菌无毒的环境进展,但因为接触机会的增多和交通工具的发展,今天的文明爆发细菌或病毒感染危险的几率可能更大。例如，源于中国香港或其他地方的各种感冒病毒可能通过受到感染的旅客乘坐飞机一次又一次地传遍世界各地。霍乱亦然。虽然它在今天已不像在19世纪那样是一种可怕的疾病,但最近却从受贫穷困扰的亚洲和黑非洲蔓延到地中海的夏季旅游者身上。尽管如此,今天的事实依然是,环境问题更多地是由于化学的而不是微生物的问题引起的。我们最为担心的还是一氧化碳、废气中的铅含量以及杀虫剂。人们普遍承认，携毒区正在影响着城市的空气、河水、甚至整个大气层。对流行病的担心,无论正确与否,并非反污染运动的斗士们最为关注的问题,尽管

对人类健康造成真正威胁的疾病今天完全有可能是通过航空旅行来扩散的。

当然，在古代或古老文明的经济体制中，情形与今天完全不同；当时相对简单的技术即使有可能产生污染的副作用，但微乎其微。不过，另一方面，从中世纪到"近代"，也就是从11世纪到16世纪，最早的成长着重表现为人口、土地开垦、城市化、贸易、殖民化、"十字军东征"、军事行动和征服活动等形式。由此建立起来的联系所创造的财富带有微生物污染的巨大风险：这个说法当然是不言而喻的。在此，我想超越神圣的永恒真理，直接提出下面的一个概念，将它应用到某个具体的历史时期，并作某些修正和扩展：这就是从伍德罗·博拉赫的书中借用的14—17世纪"疾病带来的全球一体化"的概念。我还要进一步说明，这种说法绝非虚晃一枪，而是力图将各种明显不同的现象重新分类并组合成一个复杂而又独特的体系：一方面是指西欧1348年爆发的瘟疫在14世纪、15世纪和16世纪造成的重大后果；另一方面指16世纪及其之后，新大陆的土著被疾病虐杀，出现了人口的锐减。在我看来，这种概念会派生出一种新的兴趣，从而使人们把注意力集中于美洲和欧亚大陆的人口在第二个千年中经历的严峻形势。

当我说到14—16世纪疾病带来的全球一体化时（为节约篇幅起见，以下我将简称为"一体化"），并不是指这个过程开始于1300年1月1日的子夜。事实上，大规模的流行病早在这个日期以前就已经出现，并且在各地广泛传播，尽管它们的活动半径不像后来变得那么大：例如，这里且不谈远溯至雅典的瘟疫，只要提到公元6世纪的大瘟疫就够了。J·N·比拉邦

和雅克·勒高夫对这次瘟疫已经做过了研究。[2]

我也不是说这个"一体化"的过程结束于1600年，抑或1700年：19世纪的霍乱传播足以证明这样的说法是十分荒谬的。在这篇文章中，我的目标只关注于它的阵发性：所谓疾病带来的全球一体化，即微生物的"共同市场"是如何形成的，换句话说，就是关注于这一共同市场是如何在1300—1600年间，通过一个激发的阶段，从欧亚大陆迅速急剧地传播到大西洋沿岸地区。 30

在这3个世纪中，因病原体在全球的传播而致死的人数空前绝后。

瘟疫带来的"一体化"

我得先集中谈几种具体的疾病。要识别出过去发生过的疾病谈何容易，这一点读者也很清楚。虽然教区档案是有关旧制度下人口信息的最丰富的资料，但也根本无法向我们揭示有关疾病的任何信息。幸好疾病史可以借助其他一些资料，而且往往是宝贵的资料（如医学调查、编年史、军事档案等），来进行研究。[3]这些资料告诉我们过去曾发生过大量因营养缺乏而引起的疾病，如山区的甲状腺肿大，这些疾病当然不在本文的讨论之列，但是，它们同样具有资料价值，收集了前面所说的一般性传染病，如天花、伤寒、斑疹伤寒、痢疾、沼泽地区的疟疾等的大量资料。我这里暂且不涉及一般性的传染病，首先来集中讨论一种细菌性疾病：淋巴腺鼠疫。

众所周知，瘟疫是中世纪旧大陆人口数量增加和活动的扩张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和有害的副产品之一。但许多研究

者往往不去讨论它的起源，仅仅是简单地探讨它的形成或迅速发展，就提出并论证了上述的观点。[4]正因为如此，我这里要从瘟疫的起源开始谈起：在疾病带来的全球一体化过程中，最主要的事件之一是滋生瘟疫的温床的出现。在导致瘟疫的三种“自然的”细菌中，[5]第一类是源于中国东北和中国东海岸的东方巴斯德氏杆菌（*Pasteurella pestis orientalis*）。“它导致了最近瘟疫的爆发，其中的一次瘟疫起源于19世纪末的中国。”这当然与本文所关心的早期历史没有直接关系。另外两类“细菌”是我们关注的焦点：一类是演变成使非洲大湖沿岸的各种啮齿类动物和跳蚤染上地方性病毒的古代巴斯德氏杆菌（*Pasteurella pestis antiqua*），另一类是在相似的条件下在中亚地区出现的中世纪巴斯德氏杆菌（*Pasteurella pestis medievalis*，这个名称本身就有一段故事）。

全球瘟疫生态系统最终归结到人和细菌的复杂关系。这种复杂关系建立在（老鼠、跳蚤、细菌和人类的）四方共生（*ménage à quatre*）的谐和功能论，或建立在有些研究者提出的（跳蚤、细菌和人类的）三方共生（*ménage à trois*）的谐和功能论的基础上。这类共生现象的存在及其地理传播的长期结果最终导致了属性的冲突和不相容；这种共生的“生态结构”是有限的，往往以三方或四方共生物的灭亡而告终。例如，跳蚤的繁殖需要严格的温度和湿度条件，而这些条件不能总是靠人改变生活习惯，例如冬季的室内取暖，来得到满足。所有这些理由说明，爆发瘟疫所需要的复杂条件（*dramatis personae*）依然主要存在于中非和中亚地区；欧洲只是偶尔出现了这样的条件，而且不是很持久，瘟疫光顾过那里只有两次（6—7世纪和14—17世纪），但都从来没有持续到两三百年以上。

在"一体化"时期，能把这些复杂条件带动起来并产生瘟疫的关键当然是跳蚤，尤其是老鼠身上的跳蚤：被感染过的跳蚤通过叮咬老鼠将细菌注入老鼠的血液，在腹股沟产生腹股沟炎。跳蚤也可以生活在人类身上，通过叮咬将瘟疫传播给人。不过，橄榄油的气味可以赶走跳蚤，因此能够用作一种预防剂。马的气味，特别是公山羊的气味也会驱走跳蚤(这些动物具有预防瘟疫的作用早已为人所知，16世纪中叶，当古贝维尔先生所在的村庄爆发瘟疫时，他就精心挑选了一只公山羊送给他姐姐[6])。普通人身上的跳蚤(*Pulex irritans*)也可以直接将细菌从一个人那里传播给另一个人，不需要靠老鼠来作中介。(最后，其他各类体外寄生物只生活在某种特定的哺乳动物身上，例如狗身上的跳蚤；正是因为这些生物只生活在狗身上，因此与过去两千年里欧亚大陆爆发的瘟疫毫无关系。) 32

瘟疫的生态基础一旦建立起来之后，两种学派对有关通过污染和接触来传播瘟疫的所有资料进行了研究。一派是以英国历史学家J·F·D·施鲁斯伯里为首的"老鼠派"，另一派是以法国的J·N·比拉邦为代表的"跳蚤派"。[7]

施鲁斯伯里的重要著作《英伦诸岛淋巴腺鼠疫史》向读者提供了有关老鼠传播鼠疫的全部论述，包括老鼠在全球传播和传染疾病中所起作用的内容，因此与本文的目的有密切的关系。施鲁斯伯里并没有把每种瘟疫的发生都归罪于老鼠。他认为，伴随着咳嗽和吐血的肺炎或流行性肺炎的爆发就完全是另一回事。肺部疾病是"传播恐怖的疾病"，主要是通过呼吸和带菌的唾沫在人与人之间传播，老鼠在其中不起任何作用。除了支气管肺炎这种瘟疫外（有时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瘟疫），施鲁斯伯里极力阐明他完全相信老鼠在传播瘟疫中

起了关键性的作用。确实，如果我们认同他的说法，那就是说老鼠可以通过肉食的方式直接传播病毒。不过，更重要的是，流行性疾病，或者说动物流行性疾病，会在黑鼠（*Rattus Rattus*）身上引发一种致命的败血症：老鼠身上的跳蚤吸食了受感染的血液后，胃部被充满巴斯德氏杆菌的血栓所阻塞，使它无法摄取食物。饥饿的跳蚤因此大肆叮咬它所寄生的任何生物的皮肤，无论是人还是动物。这样，老鼠的流行性疾病就变成人类的流行性瘟疫。

在中世纪的瘟疫流行的阶段即将开始或刚刚开始的许多地方，所有这些现象马上又与城市化和人口增长联系在一起。藏身在当时的小商小贩的破衣被和毡毯中而被携往四方的跳蚤，由于在它们用作临时居所的布包中找不到食物，变得非常饥饿，具有很强的进攻性。在中世纪，城乡贫苦人民的小茅屋也是老鼠和跳蚤生存的理想场所：跳蚤寄居在泥糊的墙壁中，老鼠藏身在茅草屋顶里。与此相反，富人的房屋可以更好地屏蔽流行性疾病，因为石墙让寄生物找不到躲藏之处，楼板把老鼠阻隔在屋顶和阁楼上，无法进入家人居住的地面。

施鲁斯伯里从这个结论出发，进一步叙述了啮齿类动物和寄生虫作为人类活动影响动物生存环境的所谓副产品的详细历史。据《英伦诸岛淋巴腺鼠疫史》一书的观点，罪魁祸首是黑鼠。在它身上寄生着 17 种跳蚤，其中有两种（尤其是印度鼠蚤，*Xenopsylla cheopis*）能够“成为瘟疫的传播者”。黑鼠显然是一种比较胆怯的动物，进攻性不强，因此，从 18 世纪以后，它让位于更具有进攻性的棕鼠或挪威鼠。此外，黑鼠不善涉水，在北部地区，它居住在房屋中并从那里打洞进入谷仓。尽管它不善涉水，但它充分利用了善于在木料上攀爬的本领，常

常登上旧时的木船把它带到国外(因此,它往往在一个相当大范围内,例如在地中海地区流动)。黑鼠并不是欧洲土生土长的,它迁移到那里只不过是因为那里人口居住的密度高,又有鳞次栉比的房屋、地窖、粮仓和城市居民(这让我们又回到了最初所讨论的动物对环境污染的问题上去了)。在施鲁斯伯里对英国的研究中,他考查了所收集的各种各样的档案,尽可能地描述出黑鼠传播到英国的准确时间表。在征服者威廉到达之前,或者说公元1000年前,英伦诸岛黑鼠十分罕见(因此不能说黑鼠是等到诺曼征服的那一天才渡过英吉利海峡的)。在《克尔斯》一书的手稿中,这个时间向前推移到了6—9世纪之间的某个无法确定的时段,并向我们说明有“两只老鼠在一对猫的眼皮底下一点一点地啃着圣餐面包”。1187年,“被人们称作黑鼠的大老鼠”受到了“伊佛主教的诅咒,被赶出莱茵斯特的弗恩斯教区,因为他的书被老鼠啃坏了”[8]。到13世纪,依然是在英国,黑鼠明显占了上风。它们在伦敦的存在被载入了当地的一部手稿,甚至提到有“两只黑鼠缠着一只猫”。账册和文学书籍中也经常提到购买老鼠夹和老鼠药的事。人们完全有可能会批评施鲁斯伯里的时间表并指出他使 34 用的材料是来自于一些插图,而这些插图与人鼠共居的实际历史毫无关系。据施鲁斯伯里的说法,老鼠在中世纪进入英国并为流行性疾病的出现提供了条件,为1348—1349年和后来爆发的瘟疫打下了基础。6世纪爆发的瘟疫从某些方面来说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来解释。[9]这场瘟疫影响了高卢南部,那个地区已经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城市化,到处都有迁居进来的老鼠。但是,在卢瓦尔河以北人口稀少的地区,由于人们居住的分散性,黑鼠也不多。更进一步说,正是因为没有老鼠,

英国才能够幸免中世纪早期这次瘟疫的影响。有人可能会指出，这正是北部地区17世纪以来经济、人口发展，还有政治和军事进步的原因之一。还有人甚至会提出，查理曼大帝可以把他取得的胜利归因于没有老鼠！[10]

我们再回到关于14世纪英国的讨论上：施鲁斯伯里把他的整个理论建构在老鼠传染的地理分布范围上。在14世纪40年代，"埃克塞特—约克一线东南部"的英国人口密集，人民勤劳，那里成为英国的瘟疫爆发地；实际上，作为一个自治地区，人们为其自治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1300—1330年，在这个包括威尔士在内的英格兰，人口数量约为400万人，[11]5000人口以上的大城镇大多数位于埃克塞特—约克线以东和以南。按施鲁斯伯里的理论，老鼠得以繁殖出足够的数量以保持在鼠科动物当中的一场动物性的流行性疾病，并反过来足以使人类遭受相应规模的流行性疾病，5000人这个数字是个可能的底线；按照施鲁斯伯里的说法，如果瘟疫要保持其足够的传染力，就需要靠跳蚤在人与老鼠之间不停地来回跳动。英格兰的南部地区也是经济最繁荣、人口最稠密的农业地区。那里还形成了运输谷物、干草、特别是羊毛的公路网络，使得老鼠得以乘车从一个城镇跑到另一个城镇。商人的沾满跳蚤的毛皮在携带寄生物方面也起了重要作用。正是这些寄生物成了细菌的传播者。这里还有大规模的集市以及坎特伯雷大教堂之类的圣地，常常有携带着感染了各种危险病毒的寄生物的朝圣者前来虔诚地参观和朝拜。我们再一次回到城市化这个关键的事件中来，尽管14世纪的英国并不发达，在约克—埃克塞特一线以南还有大量的城镇房屋拥挤在一起，瘟疫因此可以从一个家庭传播到另一

个家庭。与此同时，这些房屋的建筑还相当原始（往往是泥墙和茅草屋顶），养活了大批的老鼠和跳蚤：老鼠生活在茅草屋顶里，跳蚤生活在泥糊的墙中。比较现代的城镇房屋多数是用木材和煤炭烧制的砖来建造，能够防御寄生物。砖石可以抵挡老鼠的攀爬和打洞。中世纪约克—埃克塞特一线以南的地区同18世纪一样，有英国最好的农田，谷物的亩产量很高，[12]为老鼠提供了最喜欢的食物。一般说来，正是在英国东南部的城市和农业地区产生了黑鼠这种人类食物的消费者和病毒的特殊形式的栖息地。因此，14世纪在那里爆发瘟疫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相反，这一线以西和以北的地区，人口稀少，城镇不发达，不可能为这种摧毁性的瘟疫提供温床。

施鲁斯伯里的理论就是这样把老鼠当作罪魁祸首。研究瘟疫的法国专家J·N·比拉邦并没有对这位英国人的理论提出挑战，但他的研究更强调跳蚤的独立作用，至少是在西欧。在欧洲大陆历史上爆发的瘟疫中，靠老鼠发挥重要作用的次数实际上很少。

在加缪的以奥兰为背景的小说《瘟疫》中，他确实提到了老鼠的尸体。但那是在马格里布，他可能受到叶尔申的著作的影响，哪怕是间接的影响。叶尔申在讨论远东状况的著作 36 中谈到"鼠科动物在影响人类流行病中所起的作用"。[13]叶尔申的畅销研究著作让加缪的研究误人歧途了吗？这完全可能。从目前已知的真正的历史证据来看，很少有人提到海船上的瘟疫，也从来没有历史学家去计算死老鼠的尾巴。只有一本书好像提到了这一点。1348—1349年，希腊历史学家奈斯菲雷·格雷戈拉斯[14]注意到"瘟疫入侵了爱琴海诸岛，袭击

了罗德岛和塞浦路斯等地的居住者……狗、马和房屋中的老鼠都死掉了"。人们希望能在西方找到这方面的更多材料，但事实上几乎找不到。资料的缺乏（但只是让人有理由保持沉默的资料缺乏）使比拉邦不得不把注意力转到人身上的跳蚤（*Pulex irritans*）所起的特殊作用，把跳蚤作为人类当中瘟疫的直接传播者，而没有将老鼠作为中间的媒介。

比拉邦由此出发提出传播瘟疫的两种可能（或者不可能）渠道的理论：[15]

1."在人类体外寄生物很少的地区（如热带国家，当地的居民几乎不穿衣服），瘟疫出现的可能性很小，即使有，也是阵发性的"。"一旦（甲村或乙村）发生了这种情况，也只是被离开死老鼠身上的跳蚤意外叮咬的结果。"

2."相反（如在过去的旧制度下，人们都穿衣服，有的甚至穿得相当厚实），如果跳蚤在人身上出没，瘟疫流行就不可避免，人群聚集的市镇中心、集市以及军队和游行队伍行进的地方都会成为有利跳蚤繁殖的温床"；商贩和士兵行进的主要商路也如此；这些都是6世纪、14世纪以及后来一些时期多次在欧洲和非洲地区，随后又在欧亚大陆也造成污染的因素。

要决定施鲁斯伯里和比拉邦的理论孰对孰错（对于一个本身并不是医疗史专家的历史学家来说），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此，在下文中，我将尽量考虑两种理论提出的各种可能性，而它们往往会得出相同的结论。

37

前奏：6世纪的瘟疫[16]

无论是施鲁斯伯里所说的受跳蚤感染的老鼠，比拉邦所

说的跳蚤本身，还是叶尔申所说的细菌，都不是这时刚刚到达欧洲大陆的。早在公元543年，即1348年的800年以前，"中世纪早期的瘟疫"就到达了高卢，进而引发了一系列灾难性的瘟疫，至少一直持续到760年。然后，它消失了。由此第一次充分证明后来的、时间较短的瘟疫周期（14—18世纪）并没有同时出现在西欧的各个国家。[17]瘟疫未能同时在我们这个部分的世界上，即在西欧各国同时爆发，这种情况能否归结于维持（老鼠、跳蚤和细菌之间的）三方和谐关系所必需的生态平衡的复杂条件呢？这也与传染病在某个区域内流行所必要的条件相吻合。不管我们作出什么解释，事实是中世纪的早期与中世纪的晚期和近代一样，瘟疫经过了几个世纪的反复爆发以后，在西方消失了，然后便转移到非洲和亚洲地区；[18]大约在800年之后，又有可能发动另一次闪电式的袭击。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而且这与我们的生态问题和环境问题有关，6—8世纪瘟疫传播的地理分布，大致说来，与中世纪早期高卢和西方的城市化、人口和商贸网络的地理范围正好相吻合。这次瘟疫起源于埃及的西奈半岛，然后向西经地中海，推进到马赛和纳博讷等城市，即古代瘟疫活动的中心。此后，瘟疫又移向高卢的北部，达到这次传播的最北端，于542年扩散到特里尔，又于560年到达卢瓦尔中部，最后于580年前后到达罗讷省中部和阿尔比地区。正如比拉邦和勒高夫所说的："中世纪早期瘟疫的活动范围反映了6世纪和7世纪西欧黑暗时代的基本特征。维持城市的生活方式有利于流行性疾病向更大的范围扩散；亚历山大城、拜占庭和非洲与热那亚、马赛和纳博讷之间一直保持着畅通的商业联系，这些与东方交通的门户也成了疾病传播的门户（直到17世纪和18世

37 纪，威尼斯和马赛仍然在继续为此付出代价）；江河交通，特别是罗讷河—索恩河这条轴线的江河交通，极为重要；所有这些特征都反映在瘟疫传播的地理范围上。瘟疫传播的最北端是卢瓦尔河、马恩河、莱茵河和阿尔卑斯山一线，正好与交通和城市化的地理范围相当，而且恰恰是与东方的商路的终点。”

1348年的瘟疫，就像以前查士丁尼时代发生的瘟疫一样，最终也反映出了这样一个结构性的边线。可以说，6世纪预演了14世纪瘟疫的活动范围。但是，由于中间几个世纪发展的结果，到了1348年，瘟疫扩散的最北端和最东端远远超过了公元542年的范围。这一次瘟疫的传播远远超过了特里尔—莱姆斯—图尔—阿让一线，而这条界线在西奥多伯特时代和奇尔普里克时代成为瘟疫进一步推进不可逾越的障碍。以前的细菌防御线（*cordon sanitaire*）包括了法国和相当于古代高卢的整个地区（但两者都有特例），这当然不是由当局有意设置的，但在1348—1350年这条界线从南到北都被细菌突破了。随着中世纪即将结束，过去在6世纪几乎没有受到瘟疫影响[19]的英国、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的大片居民点也成为了黑死病[20]的可怕牺牲品。

这两次瘟疫扩散半径的不同更加有力地展示了它们之间的相似性。分别在公元6世纪和14世纪发生的这两场瘟疫中，瘟疫爆发和结束的实际范围都是人口扩张，稠密的公路网络和城镇网络所设置的极限。

墨洛温时代的瘟疫一旦遇到森林地带的阻挡，就成了强弩之末，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再也无力向巴黎地区的平原和高原推进。1348—1349年的瘟疫却犹如洪水猛兽，横扫了诺曼底一望无际的旷野和伦敦周围开阔的乡村，不可阻挡地向北推

进到苏格兰，向东则到达易北河畔。公元1000年后长达几个世纪的大规模开垦土地，改善交通状况，开放了与世隔绝的地区，砍倒了森林屏障，建造了一批批新的人口聚集点，实际是为这一结果铺平了道路。开垦的荒地以及新建和扩大城镇使各种携带着疾病的老鼠传播开来：这些老鼠，无论是在乡村以庄稼为食，还是在城镇以垃圾为食，都携带着大量跳蚤。[21]一旦时机成熟，它们就成为瘟疫的传播者，而这些瘟疫是墨洛温时代健康的、而且从未受到过污染的森林地区从未经历过的。

39

越过奥得河和波希米亚的山区（这些地区不是我们所要讨论的地理范围），情况就不那么简单明了了。在1349年和1350年，这里茂密的森林、半沙漠和相对空旷的村庄和农田，都延缓了感染瘟疫的老鼠、跳蚤和人的流动。结果，淋巴腺鼠疫和肺结核这两种瘟疫的前锋在某种程度上受到遏制。6世纪曾经阻挡过那场扩散到卢瓦尔河以外地区的灾难的那些因素，在14世纪再次发挥了作用：这次是发生在更北边，特别是东北部的地理范围，远远越过了在此期间规模大大增加了的德国人口中心，而这些地方正是因为早年居住的分散性才免受了第一次墨洛温时代瘟疫的侵袭。正如弗兰蒂斯克·格劳斯所指出的，只有当瘟疫到达斯拉夫地区时，1348—1350年瘟疫的扩散最后才因人口的稀少而受到阻止，但并没有完全得到控制。[22]

14世纪欧亚大陆的“汇合点”

对中世纪在法国和西方发生的瘟疫所做的比较研究首先

是强调多重接触的重要性，它是产生那些灾难的前提条件。这种分析方法有助于我们去理解瘟疫传播的各种方式，更有益于去理解瘟疫的起源这个带根本性的重要问题。这就是我们以下的篇幅关心的问题。要解释瘟疫是如何到达欧洲的，就要去寻找某些商路的"汇合点"以及在欧亚大陆与地中海之 40 间传播疾病的良导体，是如何在细菌出现于意大利和法国南部之前就已经形成了的。

在这一点上，如果我们要理解对于人类来说至关重要的一个进程得以触发的方式，我就必须简要勾画出为疾病提供场所的条件是如何形成的。否则，本文所涉及到的微生物污染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就无从说起了。

6世纪的瘟疫，也可以说是一次古代的瘟疫，可能起源于非洲的大湖地区。[23]在大湖的沿岸，叶尔申所说的各种自然的细菌，即古代巴斯德氏杆菌广泛传播，墨洛温时代人们受到感染的就是这种细菌。公元541—542年的埃及瘟疫起源于大湖地区和埃塞俄比亚，远及埃及和西奈半岛三角洲，经过红海，可能还有尼罗河流域，最后到达了亚历山大城和马赛等位于地中海沿岸的大城市。然后，它一浪又一浪的持续不断地污染，最终在两个世纪内逐渐遍布于高卢的南部地区。

1348年的瘟疫在性质上与古代以来的瘟疫不同，细菌传播路线也完全不同。这次瘟疫不是起源于红海，而是起源于黑海，不是起源于经由克里米亚的加发到埃及的西奈半岛，而起源于热那亚的账房、中亚腹地的鞑靼和聂斯托里亚居民区。

在亚洲大陆的腹地，当时和现在还广泛地生存着另一类巴斯德氏杆菌，由于它产生了巨大影响，因而专门划分成一类，称作中世纪的巴斯德氏杆菌。[24]医学专家们曾经描述过

乌拉尔山脉两侧广大地区的携带中世纪巴斯德氏杆菌的各种动物往来其间。[25]这些动物有生活在中国东北、蒙古和俄罗斯、土库曼斯坦以及西伯利亚的特兰贝拜卡利亚的土拨鼠(*tarabaganes*)；还有一种与小土拨鼠相似的小地松鼠(*spermophiles*，或 *susliks*)[26]，它们生活在俄罗斯东南部，身上的跳蚤有惊人的生存能力，可以在零下25℃的条件下生存，只要吸过一两次血就可以生存10个月之久。[27]细菌的另一个聚集之处是沙漠鼠等其他细菌的携带者，则要通过中间的寄生物才能生存。它们生活在俄罗斯东南部、伊朗的库尔德斯坦和里海附近的地区。当这些沙漠鼠死在地洞以后，它们身上的跳蚤和细菌仍然居住在死鼠的尸体上，等待着机会，迟早会把疾病传播给人类。巴尔塔扎德和他之后的比拉邦都谈到过这样的鼠类停尸房和有利于形成细菌生存的小气候。当夏天来临时，只要有机会，细菌就会被传染给其他曾经在沙漠鼠居住过的地方生活的同类，“与此同时，其他的啮齿类动物可能进入沙漠鼠的洞穴，成为跳蚤的供血者，这样便确保了它们的生存”。[28]

根据施鲁斯伯里的理论，在亚洲的远方也有土拨鼠和沙漠鼠的同类，即早已在欧洲定居下来的黑鼠：这种动物和其他啮齿类动物一样，从10世纪以来就迅速繁衍，在经过大量开垦的土地上，其数量急剧增加。城市化和人口的“起飞”使得它们在城镇、乡村和港口无限制地迅速增加，无处不在，无与匹敌，直到18世纪和19世纪才部分地被褐鼠所取代。1330—1350年的历史说明亚洲和欧洲的这两类啮齿类动物结合在一起，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死亡率。带有瘟疫的汇合点，像是一个驿站，在这一阶段上以相同的命运注定要把东方和西方连

41

接在一起，它们的地位逐渐被蒙古帝国的缔造者和丝绸贸易商人这两类“巫师的门徒”所取代，并不知不觉地成为了国际性污染进程中的传播者。

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呢？在1200—1260年间，蒙古处于成吉思汗和他的继承人的统治之下[29]，完成了对从中国到俄罗斯的亚洲和欧洲部分地区的统一；这为乌拉尔山脉和里海两侧古代世界微生物的汇合开辟了通道，建立起了一个细菌的共同市场。

就在这些边界发生推移的地方，很快建立起了一条横跨这一广阔地域的商路。在1266年前后，热那亚在克里米亚东南海岸的加发建立了殖民地。蒙古人带来的和平[30]使这个新商站[31]的先驱者能够安全和定期地利用“这条第一次取得绝对安全”的通路[32]——这种形势在中亚被成吉思汗统一并绥平之前是不可想象的。这条安全的新商路[33]把从事地中海和黑海贸易的热那亚商人带到远东。热那亚商人从加发越过亚速海，去往顿河口的塔纳，然后，顺着这条商路起初是用牛车，然后使用骆驼、驴和骡载货。当他们到达河边和里海，则弃车乘船，再驶向丝绸之乡中国的腹地。[34]14世纪30—40年代是这条商路最繁荣的20年，正是弗朗西斯科·佩哥洛蒂的《商业实用大全》一书所描绘的那段时间。这是一条成功的商路，聚集了来来往往的商人和货物，与传统的商路相比，这条热那亚—蒙古商路把中国的丝绸运到君士坦丁堡海岸边的集市上要便宜得多。[35]这条新商路和13世纪的发明一样也带来了好坏两方面的后果。1338年以后，这条14世纪中国的丝绸之路也成了瘟疫传播的坦途。

19世纪末的考古发掘对这条重要商路提出了新的解

42

释。1885年，俄罗斯考古学家奇沃尔松[36]从事于伊塞克库湖附近古代聂斯托里亚公墓遗址的发掘。它位于吉尔吉斯斯坦最东端的塞米列申斯克区。我们现在知道，这个地区正好处于瘟疫发源中心之一的位置上，在中世纪晚期，它也是在完全不同的背景下成为向聂斯托里亚传播瘟疫的中心。在发掘过程中，奇沃尔松发现了三块墓碑，墓志铭记载了埋藏在地下的死于1338—1339年瘟疫者的情况。此外，还有整批的墓葬记载了相似的资料，证明了1338—1339年的死亡率特别高。波利策写道："由此可以肯定，在克里米亚的港口受到感染之前的几年里（加发在1346年发生瘟疫），中亚的瘟疫已经非常严重了，疾病正是从那里用船传播到欧洲的。"[37]

如果波利策所言是可信的，那么，蒙古商路就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最早被人们所知的瘟疫的摇篮，塞米列申斯克、普尔泽瓦尔斯基和伊塞克库湖位于通往天山山脉附近的商路上，距离阿尔马雷和卡赫加尔等小镇不远。这两个小镇分别是从加发到中亚腹地的热那亚商路和中亚到中国的商路上的重要驿站。[38]1338年，导致瘟疫的细菌很有可能横扫了这个地区，使它成为第一个被感染的地区，然后，瘟疫通过跳蚤从一个病人传播给另一个病人，被土库曼的商人、蒙古的士兵和意大利的商人沿着这条轴线向西推进。显然，这是一个合情合理的假设，与我们所知道的一切都相吻合。随着时间的推移，瘟疫流行的路线以致命的方式向远处延伸。[39]

43

我们知道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这样的病菌是怎样在1346年被鞑靼士兵带到塔纳和加发的城门下。它们在中国—热那亚商路的克里米亚终点上，鞑靼人包围了加发，用弓弩将许多染病的尸体投掷到城墙上，结果使得这些致命的病菌

传染到守卫这座黑海港口的意大利人身上；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一些老鼠从城门下面掘洞进入城里。总而言之，这场围城战的幸存者，不管是健康的人，还是染病的人，都搭上剩下来的船只，逃往拜占庭、热那亚、威尼斯和马赛，将病菌传播到这些大城市，并从那里传播到整个西方。[40]

对于瘟疫在西欧的传播，现在已经有了一系列重要的研究，涉及到意大利、加泰罗尼亚、英国、葡萄牙和德国等国家。法国虽然已经出版了研究地区性疾病的专著，但还需要从全国范围进行综合的研究。在下文中，我将对瘟疫在整个法国的爆发情况作一适当篇幅的研究。这只不过是个大致的框架，并不期望用它来取代人们所期待的综合研究。我主要是从计量的方法和人口方面来讨论这个问题。

到1347年11月，或者说，最迟到1348年的1月，瘟疫已经到达马赛（是否通过克里米亚来的热那亚货船传播的？存疑）。马赛主教和他的所有修士都死于瘟疫。据说，无数的托钵修士也是死于这场瘟疫。在卡昂比埃尔的海面，幽灵船上船员全数死亡，他们的尸体随着潮水漂浮，被海浪冲刷，没有人对仍在他们身上的贵重物品发生兴趣。[41]

普罗旺斯的这场瘟疫不仅袭击了港口和城镇，而且波及周围的乡村。瘟疫迅速“站稳脚跟”，几个月内就扩散到朗格多克的城镇和农村、多菲内山区人口密集的居民区，继续传播到福雷和勃艮第的乡村和城镇。它还再一次沿着6世纪瘟疫行进的线路，即罗讷河—索恩河这条轴线扩散。在普罗旺斯的城乡，瘟疫再现了《启示录》中描绘的情形。家庭数量的统计可以告诉我们发生了同样的情况[42]；在穆蒂埃，我们掌握

了5个地区的人口数字，在1345—1354年间，家庭数量减少了75.4%，格拉斯镇的家庭数量1341—1351年间减少了45.7%，格拉斯司法区管辖下的3个村庄出现了同样大幅度的人口损失，在1345—1352年间减少46.5%。总体上来看，1345—1355年，大致上是黑死病爆发的时期，根据我们能获得的10个当地乡村和城镇的资料，家庭总数从8511个下降到3839个，也就是说减少了一半以上(54.9%)。

我们获得了足够多的档案证据，涉及到30来个村庄和县城。这些档案的时间起点略早一点，大约从1340年开始，但终点略晚一些，大约到1365年前后。在这两次瘟疫中，我们的人口统计资料至少覆盖了1348年和1361年爆发的两次瘟疫，但无法将它们区分开来。在这次抽样中，家庭总数从7860家(1340年前后)下降到4069家(1365年前后)，下降了48.2%。[43]

简言之，当1348年和1362年的头两次瘟疫结束时，普罗旺斯至少减少了40%的人口，其中大部分人死于1348年瘟疫第一次爆发的时候，这似乎是一个合情合理的估计(如果合情合理是一个可以用于形容如此残酷事件的恰当词汇的话)。我们怎样才有可能合情合理地描述清楚这场其可怕程度相当于今天中等规模的原子弹屠杀的灾难呢?

我们可以在居伊·德·肖赖克的话中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当普罗旺斯瘟疫在孔塔爆发时，他是一位勇敢的目击者： 45

> 这场大规模的死亡在我们这里开始于(1348年的)1月，持续了7个月之久。它分成两种类型：第一种持续了2个月；人们持续高烧、吐血，在3天内死亡。第二种在剩下的全部时间内一直发生着，也是持续的高烧，四肢溃

疡,溃疡主要出现在腋窝和腹股沟,在5天内死亡。(它)是一种如此严重的传染病(吐血时尤其严重),以致不仅生活在同一座房子的人相互传染,哪怕是看一眼,也会传染给另一个人。[44]

毫无疑问,孔塔的瘟疫分为两个明显不同的阶段。第一个是冬季阶段(1348年1—3月)。在这个阶段,肺炎或流行性肺炎发动了可怕的袭击:其特点是病人发高烧、吐血,造成极为快速的大批死亡;传染病通过呼吸(并非像肖赖克所说的只要看上一眼,他在这一点上犯了想当然的错误)直接在人与人之间传播。不用说,1348年普罗旺斯瘟疫的流行性肺炎的传染阶段特别令人恐惧,以后发生的任何情形都无法同它相比。另一阶段,接下来的5个月是春季和夏季,只爆发了淋巴腺鼠疫。尽管淋巴腺鼠疫也很危险,但它并不像流行性肺炎那样使大批人死亡。如果向后看的话,它向人们警告了即将要发生的事情,预示着将要爆发一种比较普通的瘟疫。这种瘟疫在14世纪以后爆发了数百次,其中大多数只发生了淋巴腺鼠疫,并发肺炎鼠疫的情况所占比例很小。在1348—1720年之间,在普罗旺斯和西方其他地方瘟疫再次泛滥的时期,大部分是淋巴腺鼠疫,只有极少数是肺炎鼠疫。

1348年普罗旺斯的这椿事件和档案遗留下了一个尚未得到解答的问题。这个问题很容易识别出来,却很难解决。这就是它发生的原因究竟是什么?究竟是什么引起了这场大规模的而且先是肺炎鼠疫然后又是淋巴腺鼠疫的复杂瘟疫的爆发?究竟是什么使得这场对西方人口产生巨大影响的灾难,即细菌性的瘟疫,能不受控制地发展(让我们祈祷将来永远不要

46

再发生这样的事情)?

这类问题[45]可能首先要从纯粹的疫病学中去寻找答案。人们总以为历史学和医学是能够解答这类问题的,只是在今天做不到而已。这类答案将涉及到瘟疫细菌的行为模式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的变化、它的变异以及它所遇到的其他细菌的竞争等问题。也就是说,对传染病模式的变化,除了它的确实存在以及它在某些关键时期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人口数量的波动之外,我们知之甚少。今天所进行的研究还很不全面,这些纯生物学的因素还包含着有关黑死病的那些尚未揭示出来的但极为关键的表象。其他一些更加表面的方面理解起来比较容易,但它们因此也提供了一条有用的方法,至少有助于我们去部分地理解导致这场灭顶之灾的各种不同因素。

首先是气候。1348年的孔塔和1921年的中国东北一样,流行性肺炎这种形式的瘟疫是在冬天出现的现象。春天一来,就消失了。肺部抗病能力与气温的升高有很大关系,这两个例子都说明它是季节性的,或者是地理性的(马达加斯加就是一例,这个大岛上,海岸线附近爆发的是淋巴腺鼠疫,而在内陆凉爽的高原地带出现的是肺炎鼠疫)。在1348年那个灾难性的冬天,流行性肺炎鼠疫遵循一种特定的时间模式来到了法国的南部。首先必须强调的是,流行性肺炎鼠疫——而不仅仅是淋巴腺鼠疫——很有可能是在热那亚的商船将这种病菌带入以后才导致了它的全面传播。[46]其次,正像1348年普罗旺斯鼠疫那样,在刚刚流行过淋巴腺鼠疫的地区,出现肺部疾病的可能性总是在冬季。因为,在12月份到3月份之间,呼吸系统并发症和再次感染的发生更加频繁、更加严重。正像人们只能预计的那样,普罗旺斯的居民在1348年1月完全可

47

能受到淋巴腺鼠疫的直接袭击，接着出现了败血症，因为细菌要寄生于肺部，而肺在隆冬季节是十分脆弱的。分散居住在普罗旺斯某些地方的一个或几个病人足以引发连锁反应。这就是事实上发生的情况。毫无疑问，第一个得了肺炎鼠疫的人肯定接触过许多人（在普罗旺斯，人们往往群居在一起），他肯定会咳嗽（因为这是冬季），病菌通过他的呼吸和唾沫任意传播，于是，他传染了家人、朋友、过路人、教会人员、公证员等等。这些人又传染给他们的亲朋好友。从这一刻起，连锁反应开始出现，隔离是惟一的出路。但是在法国南部的村庄里，贫穷的居民们是挤在一起互相取暖。独立的居所是房屋建筑师们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考虑的事情。

在这样一连串的事情发生之后，毋庸置疑，1348—1349 年冬天的情况特别严重。[47]朗格多克和普罗旺斯一般每三年会出现一次严冬，足以形成致命的流行性肺炎鼠疫的周期。流行性肺炎鼠疫一旦发生，就会同时地通过无数个带菌者迅速扩散。反面的证据是，只要等到春天来临，气温上升，咳嗽和发烧就会减少，呼吸器官更能经受袭击：根据肖赖克的记录，普罗旺斯的流行性肺炎鼠疫这时立即停止，转变成淋巴腺鼠疫。

社会史也许能出乎意料地部分解释严冬与肺炎流行的关系。一个人感受到的寒冷与温度计上显示的温度并不完全是一回事，前者还可以通过取暖和增添衣服来改变。14 世纪的普罗旺斯和法国南部居民的生活状况相当糟糕。可以肯定的是，在 14 世纪前期，普罗旺斯由于人口、山羊和绵羊的高度密集，森林受到严重破坏，[48]取暖用的木材严重不足。在当地的商业记录中，我们很容易找到制桶所需的木料、建筑工地的厚板材

48

和房梁、烤炉用的木炭等方面的资料，却难以找到喂火炉[49]用的那类木材方面的资料，这说明它在当时很少，即使有，也只是在开口式的火炉中使用。[50]在以后的十年里，在马赛这个无论如何都不能想象为人口稀少的城市里（1348年1—2月份的瘟疫就是从这里传播出去的），因为缺乏取暖用的木材，冬天非常寒冷。至于普罗旺斯的普通家庭，即使按14世纪的标准来衡量，取暖也不足以帮助屋内的居民抵御寒冷。几年前，在鲁吉埃对一座废弃的村庄进行了发掘。这座村庄可以追溯到1200年至1400年之间。[51]考古学家发现的房屋只不过是棚屋，没有楼梯和烟囱，地面高低不平，排烟的壁炉是从岩石上掏空的，全都塞在一个小过道里。然而，村庄里的很多社会活动在这里举行。居民的住房密集，杂乱无章。就像在普罗旺斯的其他地方一样，1348年瘟疫光临到这个遗址的穷人身上，有一半以上的村民死亡。他们的命运就和1920—1921年冬天成千上万地在寒冷的茅舍中因流行性肺炎鼠疫而死去的中国东北农民的命运一样。[52]

当时的普罗旺斯人住房很差，取暖设施也很差。那么，他们的穿着也很差吗？完全有这个可能。在马赛，从13世纪60年代到14世纪40年代的整个时期里，（来自朗格多克、法国北部和弗兰德尔的）各类皮革制品和纺织品的贸易下降了。[53]纺织品贸易确实与地中海的海洋贸易有密切关系，而皮革制品的贸易则更多的是一种地区性贸易。不过，从总体上来看，我们所掌握的皮革制品贸易和纺织品贸易的统计资料都说明了大致相同的情况。它们都说明14世纪普罗旺斯的当地居民不仅房屋里没有足够的取暖设施和舒适的环境，而且身上没有温暖的羊毛服装，脚上也没有厚实的鞋袜。1348年，一场冬

天的瘟疫，也就是流行性肺炎鼠疫，突然地降临在这些不幸的人们身上。他们为细菌的繁殖并为接踵而至的在连锁反应中出现的肺炎并发症提供了理想的温床，而他们自己却没有可能挺过那个冬天。

49

我们所关心的并不仅仅是那个冬天的支气管肺炎造成的大批死亡。我们还要说明 1348 年早春在普罗旺斯和朗格多克的流行性肺炎刚刚结束时就爆发的淋巴腺鼠疫的原因。

在这第二个阶段上，我们必须考察一下寄生物和有利于寄生物繁殖的混杂环境，因为这些是瘟疫发生的基本原因之一。淋巴腺鼠疫是一种败血症，不仅可以通过老鼠身上的寄生物也可以通过跳蚤叮咬传播给人类（参见上文），这不是我们发现的那种"老鼠—跳蚤—人—跳蚤—老鼠—人"的较慢的细菌传播周期，而是"人—跳蚤—人"的迅速得多的细菌循环过程。

究竟是什么条件致使 1348 年春夏季的淋巴腺鼠疫造成了如此大规模爆发的一场灾难呢？首先是因为人口的拥挤。很容易看出，在 1348 年的普罗旺斯，这是由于人口的增长、城镇发展、特别是乡村小城镇的迅速发展以及道路和商路的拓展带来的结果。其次，是因为卫生条件差，或者说在当时根本谈不上有什么卫生条件。在雅克·富尼埃于 1320 年前后编制的问卷调查中可以发现法国南部人们日常生活的详细描述。[64] 普通村民洗矿泉热水澡的例证仅有一例，那就是阿克斯泰尔姆的麻风病人以及蒙塔尤教区的教士回到那里去祈求好运时偶然洗过的一次澡。因此，洗澡并不是很常见的。对此，我们还可以补充一点，由于不注意卫生而助长了淋巴腺鼠疫的传播，而另一方面也可能是由于当地流行的抓跳蚤陋习。这种驱除

寄生物的方法在14世纪法国的南部非常普遍：最有力的一个证据是蒙塔尤神父的情妇——他可能有不只一个情妇——所描述的情形。她说蒙塔尤神父躺在桌子上或窗户边，一边捉跳蚤，一边道出泻药的一些秘密，或者谈论正在乡村街道上行走的某个女孩的迷人风采。朗格多克流行这种做法，有一个手指是专门用来捉虱子的，故名为“虱指”[55]。当然，用这种方法来赶臭虫和跳蚤等寄生虫本身就可能是很危险的，因为，“捉虱子的人”，无论男女，如果一不小心划伤了“虱指”，这些小寄生物所携带的淋巴腺鼠疫（或者斑疹伤寒）的细菌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进入他（或她）的血液中。 50

总而言之，就瘟疫爆发的可能原因或实际原因而论，我们也许还应该扪心自问，在这个从土伦港一直延伸到旺德尔港，或者更广泛地说，从热那亚延伸到巴塞罗那的被称作米迪的广大地区，在黑死病出现前夕，普通民众饥不果腹，降低了抵抗能力，破坏了他们的体质，从而为流行性肺炎的出现准备了条件。这显然是波利策针对中国东北的瘟疫而提出的合情合理的观点。[56]他说，饮食中的卡路里和维生素的不足为1921年哈尔滨附近贫穷的农村劳动群众的肺部受感染提供了条件。这些疾病反过来，在整个冬天，一个月一个月地又为这些不幸的人们感染流行性肺炎准备了条件。有人做过必要的修正以后，试图将中国东北的这种模式回溯性地应用于朗格多克和普罗旺斯所在的米迪地区。那个地区在1300—1348年间也出现了反复的食物匮乏和长期的贫困，[57]不仅影响到穷人阶层的住房和衣着，而且影响到他们的饮食。然而，我们不得不坦白地说，当今的历史学家和病疫学专家，如比拉邦等人，仍然不愿接受这种把营养不良作为肺炎爆发的决定性因素的

观点。“食物匮乏”的理论还不能完全否定，[58]当前比较恰当的做法应当是把它先搁置起来。有朝一日，等发现了新的档案证据，再将它从解释理论中清除出去也不迟。

尽管存在这些不确定的因素，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在普罗旺斯，就像在其他城乡地区一样，黑死病是贫穷、肮脏和杂乱的文化带来的结果。贫穷反映在人们的住房和穿衣上（如果不反映在饮食上的话），它使冬天变得更加严寒，从不干净的生活条件中产生出了肮脏，致使跳蚤成堆，不仅出现了（通过欧亚大陆和地中海之间的大商路而完成的）国际范围的混杂，也出现了地区性的混杂（人口的增长、城镇和大村庄的扩大、各种类型的贸易和移民）。由这三种因素构成的“文化”及其因严冬而将暴露出来的潜在危险，随着几个世纪以来普罗旺斯扩张的灿烂曙光而慢慢地成熟起来。14世纪初的这些问题已经在利翁海湾的周围地区[59]削弱了它的基本特征（例如大规模贸易的下降），然而，“瘟疫文化”的其他特征却由于1310—1340年的艰难年代而初露端倪，变得比以前更为强烈。在这些特征中最为严重的就是贫穷，这可以从持续出现的食物短缺和村民的不断抗议（反对高利贷和通货膨胀）[60]以及农业工人、园艺工人、葡萄收摘工的低工资等方面得到证明。[61]1348年引发一起大灾难的一切条件都已经成熟：这可能是前所未有的事情，至少过去从没有达到能够引起灾难的程度。如果偶然的严冬没有为瘟疫病菌增添力量并使之达到极点的话，瘟疫就可能不会发生。是不是有这样的可能：1347—1348年冬天不仅寒冷，而且潮湿。这样一种矛盾混合的气候条件在法国南部是很罕见的吗？这种假设无疑有助于解

51

释支气管炎的迅速传播，进而又为最厉害的瘟疫病毒提供了合适的繁殖条件。

跨过罗讷省和上阿尔卑斯山以北的地区，14 世纪中叶法国北部的瘟疫，与普罗旺斯的瘟疫相比，只不过要缓和得多，但在表面上却是简单地再现。首先来讨论一下这种表面上的相似，而这是产生于我们对有关统计数据的无知。如果学者们对其他省份的研究能像巴拉蒂埃对普罗旺斯所做的研究一样，对 1348 年以前和以后的家庭数量进行大量的统计，就不会产生这样的问题。那里的瘟疫比较缓和是一个历史事实：瘟疫从南向北，从法国的一端向另一端传播的过程中，威力已经减弱。我认为，对这种不断减弱的现象是可以作出解释的：普罗旺斯的瘟疫发生在冬季；肺炎及其结果因此而造成了破坏性的效应；此外，瘟疫在稍后的 1348 年春夏季节才到达法国北部。结果，北方的瘟疫以淋巴腺鼠疫为主，尽管可以肯定它的影响很大，但远远不及在南方发生的影响。如果那里必定要发生瘟疫的话，淋巴腺鼠疫也要比肺炎稍好一点。为了证明这种两恶取其轻的理论，人们只需沿着瘟疫传播的路线从南向北看一看就清楚了。 52

下朗格多克和普罗旺斯一样，也是瘟疫的起点，肺炎鼠疫在这里的破坏力最大，造成的死亡和破坏处处可见。罗讷省以东的其他地中海地区也是这样。卡斯特尔和阿尔比等市镇减少了 55%的人口(但图卢兹显然只减少了 30%)。或者是因为资料的缺乏，或者是因为还没有进行必要的研究，对于瘟疫在乡村地区造成的后果，我们所知较少。但是，在朗格多克的一些乡镇，死亡人数与普罗旺斯相当：由于 1348 年瘟疫的一次

爆发，或者说由于1348年和1361年的两次瘟疫的爆发，50%以上的家庭，或者50%以上有资格参加选举的人，被葬入了自家的墓地或公墓。在纳博讷及其周围地区，1348年冬天的瘟疫或"虱鼠疫"(也就是流行性肺炎)，据一位目击者说，夺去了四分之一人口的生命。春后接踵而至的淋巴腺鼠疫又将这场大屠杀延续下去。[62]在法国南部说奥克语的地区，无论是朗格多克、普罗旺斯，还是孔塔，都无力抵御这场冬季的流行性肺炎，但对淋巴腺鼠疫则可以有点办法：用山区农妇的老方法清除已经感染的淋巴，用煮熟的洋葱拌上无花果、酵母和黄油进行泥敷。[63]人们认为这场罪恶是英国国王的使臣带来的，而且把犹太人、贵族和麻风病人这三类人当作替罪羊。[64]

然而，再往北走，来到中央高原，瘟疫逐渐失去了破坏的潜力。山区的人并不会因为他们出生在山区而对叶尔申所说的病毒具有免疫力，从上阿尔卑斯山的加沃特人的经历中，我们就可以明白这一点。1348年，这些衣衫褴褛和穷困不堪的农民下山来到阿维龙，就是为了赚钱，以便能够安葬死者；但是，有一位编年史家写道，就连食尸鬼似的掘墓人也无法幸免，[65]他们好好地埋藏别人之后也受到了感染，然后轮到别人来将他们埋葬。如果说山区确实存在相对的免疫力的话，那么与其说是表现在体质上，还不如说表现在独特的环境中。这可以从弗雷和萨伏伊山区的例子中得到证明。

53

1348年5月，瘟疫沿当时北方朝圣者的主要路线罗讷河流域上行，到达里昂。在里昂，瘟疫就像一颗炸弹一样，向四面八方爆炸，在弗雷、萨伏伊和勃艮第形成了新的传染中心，朝西面、东面和北面扩散。

正是这些大城市和规模依次缩小的小城镇再一次成为疾

病的传播者。里昂的瘟疫第一次出现在晚春，然后，瘟疫沿着博若莱山脉和塞文山脉之间的山区传播到称作“小利马涅”的弗雷盆地。[66]这个“利马涅”的中心城镇弗尔是个重要的市场，首先受到了传染。1348年夏季，弗尔盆地周围村庄逐个地感染了淋巴腺鼠疫。从一个居民点到另一个居民点，瘟疫渐渐地扩散到弗雷东部的索瓦尔山区；瘟疫在1348—1349年的冬天越过山岭，并从淋巴腺鼠疫转换成流行性的肺鼠疫。瘟疫在这个地区发动了最后一次袭击，然后到达盆地最边缘的博伊斯－努瓦尔和弗雷山区这些人口最稀少的高原地区。从1349年的冬季到1350年11月，瘟疫停留在那里，并在不知不觉中夺走了大部分人的生命。[67]但是，这些海拔最高和对外最隔绝的山区（皮拉图山、马德连山和其他高山）由于远离大道和小路而得以幸免：不管是在1348年，还是在随后的年代，那里都没有受到瘟疫的传染。

于是，瘟疫就像陨星一样，落在弗雷山区的中心地区。瘟疫的传染从这个同心圆的中心扩散到邻近地势较低的山区，然后逐渐消失。这里的死亡人数所占的比例（在弗雷主要是死于淋巴腺鼠疫）没有达到普罗旺斯和朗格多克因肺鼠疫而死亡的那么大。1348年，弗雷的人口损失了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而仅仅几个月前，在地中海沿岸的省份，有许多地方损失了一半以上的人口，弗雷山区的这个比例更低，不到当地人口的五分之一。[68]

54

由此看来，在14世纪中叶，弗雷地区只有20%至33%的当地居民被送进了坟墓或公墓，和马赛和蒙彼利埃地区的死亡率相比，这确实是个不大的数字。但这足以在弗雷和孔塔地区自动地引起狂热而虔诚的民众发动大规模的鞭打运动

(flagellation)，尽管遭到了教士的反对。在南方，对1348年的这个非常事件有好几种不同的说法：人们赤着脚，身披麻袋布，捧着骨灰、呻吟着，泪流满面，平原地区的鞭打者则用鞭子相互抽打，他们相信这种做法可以将自己从上帝为惩罚人类的罪恶而把瘟疫降临人间的苦难中拯救出来。[69]

瘟疫以袭击弗雷地区的完全同样的方式，也袭击了萨伏伊乡间的村庄和小城镇。有关的档案证据似乎可以证明，在萨伏伊这个省份的某些地区，足足有一半的村民死去。在圣皮埃尔-德-苏斯，一个教区内的居民人数从1347年的108人减少到1349年的55人。在其他7个教区从303人减少到142人。难道50%以上的"教区"家庭就这样真的已经消失了吗？我们完全可以对此表示怀疑，因为在3年以后的1452年，圣皮埃尔和其他七个村庄家庭数量又回升到1348年的五分之四，看来，这些家庭是跑到某个地方并生存下来了。[70]在1348年已经"消失"的人当中，尽管这个数字无论怎么说都是肯定的，但有些人并没有死亡和被埋葬。一向惯于流动的萨伏伊农民只是逃了出去，然后，一俟瘟疫似乎不再肆虐了，他们又回到了原来的住地。[71]

因此，从这些数据来判断，萨伏伊的瘟疫可能属于淋巴腺鼠疫而不是肺鼠疫，而且与袭击普罗旺斯的那场灾难相比要轻得多。尽管如此，它仍然夺去了萨伏伊至少五分之一人口的生命，因此它在幸存者中产生了难以愈合的心理创伤，造成了难以估量的后果：从1348年的仲夏之日一直到8月，萨伏伊的村庄和小城镇（如耶讷和艾格贝耶），无论是否经历过瘟疫的磨难，还是曾经受到过瘟疫威胁，都指控犹太人向井里投了毒而把他们全部杀死。到了1348年的12月，尚贝里的犹太

55

人也被投进了监狱，后来被镇上的人所屠杀。[72]

继萨伏伊和弗雷之后，轮到了勃艮第来感受这场瘟疫的冲击。然而，勃艮第平原上发生的这场灾难尽管同样恐怖，却没有出现萨伏伊那样的情形，也没有发展到普罗旺斯那样几乎要种族灭绝的地步。这场瘟疫发生在夏季，基本上全属于淋巴腺鼠疫。在日夫里这个大村庄里，[73]沿着罗讷河和索恩河来到的瘟疫，在1348年7月的下半月爆发，在当年8月极为活跃，9月份则达到高潮，每天的死亡人数达到10人(9月10日达到最高纪录，有24人死亡)，到10月，疫情还很严重，但到11月19日就基本消失了。从它的高峰出现在8—9月，我们可以推断它不属于流行性肺鼠疫。据称，"仅有"615名受害者，还不及瘟疫爆发前夕日夫里人口数量(2000多人)的三分之一。[74]同萨伏伊和弗雷的情形一样，这里瘟疫达到最高潮时已经减弱，而没有像普罗旺斯和朗格多克几个月前的冬季所普遍经历的肺鼠疫那样，野蛮地引起大屠杀式的灾难(几近一半的人口死亡)。

再向北走，瘟疫在勃艮第的那种强弩之末的势头表现得更为明显。只要我们沿着瘟疫细菌经过巴黎盆地进入弗兰德尔的前进路线看去，瘟疫越向前进，影响越弱。早已有过这样的记载，在荷兰东部和西部之间的宽阔地带，形成了一条明确的分界线。[75]城镇和乡村要么基本上没有受到黑死病的影响(如布拉班特?)，有的甚至完全幸免于难(如林堡和埃斯拜尔)。这很像是"钳形"攻势中的两翼军队，一翼于1349年从法国逼进，另一翼于1350年来自德国，但没有完全汇合：在14世纪中叶最关键的一年，在布鲁日和根特周围留下了一个地区性的"避难所"，就在这个"避难所"的门前，瘟疫结束了。看

来，在1348年以及以后的年代里，法国的南部很有可能还形成了其他类似的"避难所"，其中之一看来是位于法国南部的普罗旺斯和卡马尔革的中心地区，在1348年流行性肺鼠疫高发时期，当地的博凯尔和塔拉斯孔周围地区的家庭数目基本上保持不变。[76]在贝阿恩[77]、比利牛斯山脉的广大地区和山区也形成了这样的情况，在1348年也成为抵御瘟疫的盾牌和隔离带。(但是，从长期的角度来看，比利牛斯最终还是没有能够逃脱瘟疫，1385年的人口普查数字表明，贝阿恩同它北面相邻的阿基坦地区一样，人口在持续减少。我们仅能假定，比利牛斯省的居民免受了1348年瘟疫的影响，却更容易地受到了随后十年"山区瘟疫"的侵袭，[78]不过，也许是他们移居到了周围地区因第一次瘟疫而出现的空闲土地上去了。）正如在弗兰德尔、贝阿恩和卡马尔革一样，在巴黎附近的农村地区似乎也形成了某个隔离地带，实际上依然没有被瘟疫所触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至今还是一个谜。

56

无论如何，在法兰西大区和香槟地区，人们怀着极度的担忧在等待着黑死病的来临。在香槟的乡村，如果我们认为当时的一位医生所说的话是可信的话，[79]在这场灾难到达之前就已经有了一些征兆：从南方刮来了热风，潮湿得令人不舒服，出现了春天的疾病和其他各种"痘疹"、痢疾和斑疹伤寒，这些都是14世纪常见的疾病。[80]当瘟疫真的降临时，前面所发生的这一切似乎都是理所当然的。瘟疫通过鲁瓦西－昂弗朗斯的乡村传到巴黎：首都的人口过分稠密，极易受到传染，因而遭受了重创。据说，在瘟疫最严重的时候，巴黎一天有800人左右死亡，在瘟疫爆发的18个月内共夺去了50万人的生命。这些数字可能不完全可靠，但至少可以说明，巴黎有大

批的下层民众在这个非常时期悲惨地死去。这个说法可以从地租的档案中,特别是从收入的档案资料中得到证实。在圣-雅克-奥珀伦斯医院,建筑工人的名义工资和实际工资从1339年到1348年一直是稳定的,在随后的一年里却翻了一番,工资增长的趋势一直保持下去,直到1360年时还有所提高,而这个时期的谷物价格尽管偶有浮动,却没有大幅度的攀升,[81]实际工资因此大幅度地上升。这是因为在瘟疫发生的时期有成千上万的工人死亡,劳动力市场失去了平衡,变得供不应求,幸存者的工资得以大大提高。工人阶级在巴黎的瘟疫的冲击中遭受了严重的损失,较高的工资只能算是一点小小的安慰。

57

然而,巴黎公民中的上层阶级只有比例很小的一些人死亡。[82]法兰西大区的乡村地区有时能经受住这场严峻的磨难,没有受到太大的损失而幸存下来。当然,有些社区损失惨重:例如,圣德尼正好不幸地位于鲁瓦西-昂弗朗斯这个鼠疫的源头和首都之间,是瘟疫的交汇点。一些村庄的人口数量减少太多,以至于连教士也离开了。还有些村庄在敲锣打鼓,吹起箫管,欢快起舞,组织起庆祝活动,祝贺自己幸免于难的时刻,却遭受到瘟疫的突然袭击。[83]然而,在法兰西大区的开普特旧领地的其他地区,在这场大瘟疫发生的整个时期,人们的生活依旧,没有遇到任何麻烦:瘟疫要么只是擦边而过,要么根本没有光顾他们,让他们平静地生活着。例如,在桑利地区的山谷、平原和森林地带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形:14世纪中叶对那里而言是一个特别快乐的时期,瘟疫只不过像是一场恶梦一样在远方一闪而过。[84]巴黎周围的一些乡村教区和地方也有完全类似的情形,而且可以从我们有幸掌握的在瘟疫

发生前后的人口普查报告中得到证实。例如，在蓬图瓦兹附近的加尔日，1327年有90名佃户向圣德尼的修道院长交纳地租，到1351年还有86名佃户在继续交租。即使当地的黑死病确实造成了某些人的死亡，但和普罗旺斯和勃艮第的记载相比也是微不足道的。[85]

从教区档案资料中获得的这些结果，使我们能够对最详细的事实进行考察，证实了本文各处对全国人口所作的估计。在加尔日，毫无疑问还有巴黎和桑利地区周围的其他村庄，黑死病可能很活跃，但比南部要轻得多，[86]也比不上马赛（朗格多克）或日夫里（索恩卢瓦尔）。这些都对交纳地租的佃户总数不发生影响。

总之，我要做一个不甚准确却有启发意义的比较。当人们在考查罗讷河和塞纳河之间地区的黑死病造成死亡的最后统计时，必定会联想到原子弹的爆炸：它们的后果尽管都是恐怖的，但实际上依然存在着差别，距离爆炸点越远，后果越轻。在本文讨论的地区中，受瘟疫影响最严重的看来是一直受到奥克语文明持久影响的地中海地区的南部，那里的瘟疫主要属于流行性肺炎。高度危险的"沉降物"随后扩散到法兰西大区、皮卡底和诺曼底，那里的瘟疫主要是淋巴腺鼠疫而非流行性肺鼠疫。造成的影响则因地区、社会集团和城乡地区的不同而异。瘟疫影响的差别如此之大，幸运者有时甚至会恶毒地用它来嘲笑受难者："1348年，……诺曼底的死亡率如此之高，甚至皮卡底人都拿它来取笑诺曼底人。"[87]就是在法兰西大区这个卡佩王国的中心地区，瘟疫对首都的影响也比乡村地区大得多。1358年，那场瘟疫过去以后的10年，即史称扎克雷起义的划时代农民起义的前夕，巴黎基本上没有农民

58

这种革命的基础力量，但在许多村庄，农民的力量仍然和以前一样强大，至少基本如此。

这基本上是法国人对于细菌从中亚传播到巴黎和法兰西大区的第一次“汇合”所做的描述，要详细描述随后出现的瘟疫已超出了本文的范围（按比拉邦的说法，在1348—1530年间，瘟疫所波及的地理范围非常广泛，一般每年至少出现一次）。[88]相反，为了折衷，我更愿意来描绘一下在这一个多世纪里人口减少的情况，而且将这个讨论的范围仍然限定在法国。我将先讨论黑死病以前法国人口的情况，即1330年的前后，法国当时的人口数字达到最高峰；然后我再讨论鼠疫的流行和死亡相继出现的悲惨时期的人口情况，也就是1450年前后，这时法国的人口数字跌至谷底。

59

瘟疫发生前的法国人口

在黑死病发生前的一段时期，也就是大约在1330年或1340年，即15世纪中叶那场灾难发生前的100年，法国可以说是人口繁荣。在巴黎盆地、上诺曼底及中诺曼底、皮卡底、多菲内和中朗格多克登记的人口密度均达到了四五个世纪以后，即路易十四时期，甚至拿破仑时期的人口普查报告所达到的水平。鲁埃尔格、萨伏伊、普罗旺斯和尼姆地区的人口在1330年尚未达到这样的高峰，这些地区的人口数字比后来的18世纪略低，但肯定比这些地区在1440年前后的低谷时期的数字要高，从整个王国来看，1328年登记的户籍数也证实了这个地方性的数字。首先，以社区数目而言，在1328年，由国王派人直接管辖

的地区，教区的数字达到 2.4 万个，这个庞大的数字表明人口密度相当高，同时它本身也是一个后来从未被超过的高峰。在这同一领土范围内，1585 年的教区数是 2.3 万个，而 18 世纪末则在 2.1 万至 2.2 万个之间，在 1794—1795 年，教区数为 23117个。至于户籍数，1328 年在由国王派人直接管辖的地区内为 247万户，相当于 17 世纪末同一区域内的户籍总数(2919316 户)的84.6%。[89]还有一种计算方法，根据典型教区的平均人口(1328年，平均每个教区 99.93 户；1720 年为 114.27 户)为基础，得出大致相同的比例。用这种方法来计算，在我们有 1328 年人口普查数据的区域里，法国人口达到了 1720 年人口总数的 87.5%。[90]当然，这一数字充满了陷阱，因为在尚在接近事实的任何地方，我们都必须明白，这里只不过是个大约的数字。比如说，我们必须记住，在以后的时期里所并人的省份(普罗旺斯、多菲内、萨伏伊和阿尔萨斯)，人口也是同样地稠密，或者在 14 世纪初人口已过分稠密。如果是这样，那么，表 1 所估计的人口数字可以说是合情合理的计算结果。(这里用于比较的数据是由沃邦所提出的 1690—1700 年的人口数据，尽管这些数据并不完全准确，但能让我们做一些回溯性的计算。)

60

表 1 (人数单位：百万)

	A 1700年前后法国人口数 (17世纪末的 法国边界内)[91]	B 1328年前后 法国人口的估计数 (同样的边界内)
最高的估计数 (可能性不大)	20.9	18.3
中等的估计数	19	16.6
最低的估计数 (可能性最小)	17.1	15

有了这些统计数据，我们似乎完全可以合理地对 1328 年在今天这个“法国”境内的人口数字作出估计。经过 13 世纪的人口快速增长以后，到这个人口高峰时期，大约估计为 1600 万到 1700 万人。人们只要考虑到当时可以维持所有人生存的条件和手段是多么匮乏，就可以看出 1328 年的法国人口是个很大的数字：他们不仅没有我们今天这样高度生产力的农业资源，而且那些简单的额外因素也被部分或完全地剥夺了，而正是这些额外的因素使法国 18 世纪的人口能够高达 2000 万人，甚至达到后来的 2500 万人，并使这些人口能够维持在充足的生活水准上。在这些额外因素中，有些是至关重要，还有一些是次要的：例如对外贸易和殖民地贸易、货币供应、城乡工业、城市网络、行政管理机构和资本主义企业，当然，显然具有刺激作用的还包括生产技巧和经济学家的能力。所有这些因素在 14 世纪上半叶要么根本不存在，要么非常微弱，而正是这些因素在后来的 18 世纪发挥了关键作用，使得当时的国民经济在没有出现技术革命的情况下也得以繁荣起来。

从逻辑上讲，14 世纪前 40 年里，尽管当时不时发生的灾荒导致了人口的死亡，但人口过于稠密的社区必然会遭致灾难。虽然有些地区取得了值得称赞的成就，例如波尔多地区酿酒业，巴黎中部平原大地产上的谷物种植业，但这些并不能改变整体景象的色彩黯淡。大批拓荒的活动到那时早已结束，在边缘空地和森林旁边停了下来，而这些地方对于满足木材和燃料需求是不可缺少的。长期以来，中世纪的“边界”一直在向外推进，为农场以及为市场而生产的果园开辟新的地盘，但这时也不再向前推进了。粮食的单位产量已经达到顶点并稳定下来，由此而产生的不幸的经济稳定，毋宁说是经济

61

停滞，并不难解释：中世纪末期带来了一些革新，包括磨坊、轮犁和马轭等等。这场农业革命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对罗马时代或哥特时代的经济产生了有益的反弹，但是到了后来，在未来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农业技术似乎失去了推动力。

在14世纪初，当时的大量人口面临缺乏经济增长的困境，但还不是严重的危机时刻（危机这个被频繁使用的词意义过于空泛），但以农业为主的社会发展还是受到遏制，或者说大致上如此。它对于诸如1315年饥荒那样带来的前所未有的短期困境表现得更加脆弱。在这种不利的环境下，农民不得不屈服于李嘉图和马尔萨斯所说的那种真正意义上的风暴，在高地租、低收入和小块土地耕作不足这三重负担下备受煎熬，直至死亡。土地所有者趁农业人口增加而导致的对土地需求的增长之机来提高地租、领主捐、什一税和赋税等各种捐税。劳动力供应的过剩造成工资的迅速下降，无论是货币工资、实物工资，还是两者混合的工资，都是如此。最后，此前几个世纪的人口增长造成了土地的不断分割，这就在全国形成了小块土地星罗棋布的永久性模式，这些小块土地不得不与领主直接经营或雇用佃农耕种的大地产共存，从而导致了摩擦，这一点人们是可以想象得到的。尽管这样的私有地产并不像人们以前所认为的那么广泛，[92]但显然是不可忽视的。

这种不断积累起来的艰难处境并非是不可忍受的。例如，法国农民在悲惨的17世纪所经历的困苦比这还要多得多，他们的社会也没有因这样的紧张而崩溃。但是，诸神在

62

1340年却站在了他们的对立面。我们在历史书中耳熟能详的百年战争中一次又一次的军事斗争发生之后，1348年的瘟疫

又引发了一系列的灾难。这些灾难可以全部地或部分地归因于细菌，造成了人口的锐减。在这一百年中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磨难之后，最后在1445年的前后，人口下降到了谷底，成为后来衡量人口的“底线”，用它来计算黑死病之后人口新的“下降”，无论是很久以前的还是更近时期的人口下降。

人口状况：最低的人口数字（1445年前后）

我们的讨论再次从南方开始，然后向北方推进。在普罗旺斯地区，我们掌握了可以进行比较的数据：在黑死病之前，这里有7万户家庭；到1471年，只有3万个户主；而在1765年有了13万栋房屋。[93]这里所使用的计量单位（家庭、户主、房屋）严格地说来是不可比的，但毫无疑问是位于最南端的这个大省的人口在中世纪末的最低数字（3万人），与此前和此后的几个世纪所估计的最高数字相比，至少少了一半。在朗格多克，所有已掌握的数据，包括选举登记、领圣餐的登记、赋税清单等，也都可以有相似的估算来相互映证。[94]大致来说，15世纪（1410—1480年之间）的档案无一例外地证明了当时的人口数字与黑死病之前或文艺复兴之后的数字相比，下降了50%。（这里的“文艺复兴之后”指的是16世纪后期，乃至与17世纪相联系的那个最悲惨的时期，当然，还包括18世纪。）

我们掌握了日内瓦主教教区[95]（其部分地区覆盖了今天的萨伏伊）家庭数量的统计资料，按照日期的不同，这个数字在200—500个村庄之间。如果以100代表1443—1445年的人口最低数字，我们可以用两种方法来进行计算：一是将1470年的数据考虑在内，二是将它忽略不计，这样我们可以重新编

制出 1339—1518 年人口变化的一系列指数(参阅表 2)。

表 2　日内瓦主教教区

年　份	按第一种方法计算的人口指数	按第二种方法计算的人口指数
1339	234.8	234.8
1411—1414	115.2	115.2
1443—1445	*100*	*100*
1470	98.5	101.2
1481—1482	99.5	130.1
1518	128	

这些准确无误的数据揭示出了日内瓦主教教区的人口数量在 1339—1411 年之间有迅速的下降,接着,到 1443 年以前,人口仍继续下降 (到 15 世纪中叶, 这个主教教区的人口仅为 1339 年的 42.5%)。随后,出现了增长的停滞或者说稳定,随便你愿意叫它什么,但这就是 1470—1482 年以前的秩序。从 15 世纪 70 年代开始, 人口略有恢复, 在 1482 年到 1518 年之间出现了快速增长, 但即使到了 1518 年, 日内瓦主教教区的农村人口也远远低于 1339 年的高峰期。

63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看 15 世纪日内瓦湖畔人口下降和停滞时期的情况:值得一提的是,这种下降和停滞的根本原因不应归之于任何形式的军事冲突。从 14 世纪中叶到 1475 年的整个人口下降的时期,日内瓦主教教区一直处于和平之中,因此必须对这种人口下降作出其他解释。或许是农村人口的外迁吗?如果是这样,也只是次要原因,因为 15 世纪的日内瓦正处在发展过程中,规模虽然很小,但有能力吸纳一部分流离失所的人口。因此, 这个原因至少与人口下降之前的现象有关,即瘟疫和其他流行性疾病,再加上这一时期欧洲普遍开始

的人口—经济下降周期，此外还有严重的市场萎缩，而这本身又是持续的高死亡率所导致的人口减少的结果。要证明瘟疫对这个地区的影响，我们只需要看看小学校长托马斯·普拉特对悲惨童年的回忆。他描述了他童年时代在瑞士看到的周围的人总是病恹恹的，他所说的这种不健康的状况，即使到16世纪初，依然非常普遍。"我和父亲就是在伯恩地区的桑恩收购羊毛。他在那里染上瘟疫而去世。在我的兄弟姐妹当中，我只见过两位姊妹[伊丽莎白和克里斯蒂娜]。克里斯蒂娜比斯塔尔登去世早。她在布尔根死于瘟疫，同她一道去世的还有她家中的八个人。"[96]

64

试图寻找日内瓦人口趋势准确状况的历史学家可以在当地找到整套的详细统计资料。从那里面呈现出来的情况是相当典型的(甚至包括人口下降的百分比)，可以代表整个阿尔卑斯山北部的命运：例如，在多菲内和福西尼，1475年的记载表明当时的家庭数量只有1339年的47.7%，沿着伊泽尔河流域的山区被划分为当地居民全部向外迁移的地区：从流行性疾病和其他灾难中幸存下来的人们一走了之，离开了贫瘠的土地，迁居到山下富庶的平原去，填补了瘟疫在那里留下的真空。[97]

感谢位于北面的勃艮第留下了大量家庭统计资料，我们可以现成地获得有关中世纪晚期该省人口的综合状况。这些人口资料与巴拉蒂埃所提供的普罗旺斯的人口资料十分相似。我们已经知道，勃艮第地区深受黑死病之苦，仅日夫里这个小市镇就死去了三分之一的人口(参阅上文)。结果，正像人们所预计的那样，一些唾手可得但项目相当集中的数据表明，与13世纪后期处于最高峰的人口数量形成了鲜明的对

比，15 世纪的人口数量跌入了低谷。（在今天的科尔多省的）圣罗曼庄园的 4 个村庄中，1285 年有 119 户家庭，也就是说有大约 500 名居民；到了 1423 年，只有 36 户家庭，整整下降了一半以上，从 1430 年到 1460 年，家庭数量一直保持在 30—50 户之间。[98]在勃艮第的称作奥日的另一个村庄，[99]1268 年有 70—80 户家庭；在 1375—1400 年间约有 50 户家庭（乞丐占其中的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二）；经过连年灾难以后，到 1423 年，只剩下 13 户家庭（其中只有 3 户家庭有经济支付能力）；然后，到 1430 年有 15 户家庭，1436 年 28 户，1444 年 34 户，1450 年 42 户，最后，到 1470 年，恢复到大约 50 户家庭。因此，那里人口数量的最低谷出现在 1420—1430 年。直到 1445 年，那里的人口仍然只有 13 世纪人口最高峰时期的一半。概言之，人们无论是看前面提到的 5 个村庄，还是看索恩河畔的沙隆的城区和郊区，[100]人口在 1360—1413 年之间都大约减少了 58%，整个勃艮第的人口数量在 1420 年跌到谷底，尽管在 1425—1450 年某些地方出现了人口的复苏，但该省的人口形势仍然不好。

65

勃艮第的这些数据在玛丽－特蕾斯·卡伦近来的研究中得到充分的证明。她发现，1423 年托纳里地区的 10 个村庄里共有 352 户家庭（这个数字远远低于 1400—1402 年的数字）。同样是在这 10 个村庄里，到 1700 年前后共有 940 户家庭。我通过查阅索格伦的研究结果，也可以证实这一点，[101]在托纳里地区，中世纪晚期人口最少的时候只有现代人口高峰时期的 37.4%，这里还不包括人口达到最高峰的时期。

巴黎地区（包括蒙特莫朗西教区和乔沙副主教教区在内的大约 80 个教区）的人口在 1328—1470 年间至少下降了三

分之二。[102]在桑利司法管辖区和博韦地区，人口也有相同幅度的严重下降。诺曼底的情况更糟：据近来一位历史学家的研究，1450年考克斯地区的一些居民区的人口与1315年登记的人口相比，损失了四分之三。[103]这些地方出现的几乎难以置信的人口下降，直接原因当然是受到了战争的影响，但其中的大部分原因（因为战争还同时带来了其他形式的死亡）还有饥饿以及我们特别关注的瘟疫。饥饿是收成被抢劫以及农业设施遭到破坏而引发的结果。瘟疫则是通过士兵和流浪乞丐所携带的跳蚤引发的。

让我们暂时放下诺曼底所经历的痛苦（居伊·布瓦就是由于受到诺曼底这个历史时期的启发而提出了“广岛模式”的理论）。在它西边的布列塔尼（这是一个与诺曼底和法兰西大区完全不同的省份，在百年战争期间远离法国的“巫术之源”），1390年前后的人口达到100万到125万人（瘟疫前的人口数据还不清楚）。到1450年，那里的人口下降了四分之一：每四户家庭当中就有一户荡然无存。但必须记住的一点是，布列塔尼人在15世纪中叶有100万人口的这一数字应当与17世纪末这个数字为200多万做一番比较。[104]

波尔多地区没有中世纪晚期的准确的人口数据。但是，波尔多大主教在1459年进行的一次人口普查报告显示，[105]在330个教区的抽样中，四分之一的教区已经被完全或基本上废弃。那里的大部分村社后来得到恢复和繁荣。既然如此，人们怎么能够否认这样一个结论，即1459年那里的人口数字远远低于以前的年代，即低于战争和瘟疫爆发以前英国人统治的时期呢？根据近来的一些研究，那里的人口有可能减少了三分之二。 66

关于瘟疫对15世纪法国最北端以及法国之外的说法语地区发生影响的特殊问题，我将放在本章的最后来加以考虑。所有这一切都表明，尽管这个地区的危机有时不像其他地区那么明显，但决不会更好一些。根据记载，在阿图瓦的三分之二的村庄里，1229年有2121户家庭，到了1469年，那里只有1222户家庭。[106]虽然这里的人口下降幅度不像法兰西大区或诺曼底（损失72%）那么大，但与中世纪的“美好旧时光”相比，这些数据毕竟表明下降了43%。康布雷地区15世纪的人口数量低于比较幸运的16世纪：1444年，在12个村庄里有495户家庭，相比之下，1469年有563户家庭，1540年为640户家庭。[107]但是，证据又一次证明，康布雷周围地区15世纪的这个人口“谷底”（相对于16世纪的人口高峰而言）是与普罗旺斯和朗格多克同样严重的。

我们再转向埃诺地区：一些著名的历史学家认为，比较明智的做法是把中世纪晚期因受瘟疫的影响而损失的人口数字估计得低一些。但事实上那里的人口损失可能很大：黑死病沿着死亡之路推进之后，有记载表明，在一些残存的村庄里，家庭数量损失了一半（根据G·西维里的数据）。此后，埃诺地区的人口持续下降，尽管下降的幅度稍小，从1365年的3.1万户家庭（这是我们知道的黑死病后的最早数据）下降到15世纪人口最少的两个时期（1400—1424年、1479—1501年）的2.2万户。[108]这两个谷底时期是分别出现的，中间经过了一个幸运的恢复时期，到1450年前后增加到2.8万户，这个数字接近于1365年的数字，但仍比黑死病前的“峰顶”要低得多。[109]

因此，尽管这些数据反映的情况还不算太糟，但我们仍然

可以看到,阿图瓦地区乃至埃诺地区,在这场危机中同样经受了苦难。只有来到了更加北面的地区,我们才能发现人口受影响比较小的地区。在黑死病显然没有触及到的布拉班特地区,家庭数量从14世纪中叶的9.2万户下降到15世纪后期的7.5万户,综合起来考虑,遭受的损失较小,只减少了19%。[110]

67

借助于这些有记载的但不同的数据,考虑到通常所做的一些保留和大约的估计,特别是考虑瘟疫在法国的最北部地区造成的灾难规模比较小的事实,我们现在可以归纳出法国人口的总体状况。然后就那个时代法国人口变化的问题提出几点看法。

在法国人口的高峰时期,据我们所知,在1330年前后达到1700万人,在1700年前后达到1900万人。在法国人口最少的时期,即1440—1470年前后的人口,如果说是可以确定的话,可能少于1000万人。按照最低的计算方法,而且无疑是一种过低的计算方法,那么,如果与1328年人口最高峰晚期的数字来对比,1000万人意味着减少了42%。

1000万人这个数字应当是个合理的估计,其中的800—900万人生活在农村地区。无论怎么说,这是中世纪末期人口处于下降时期可能出现的绝对的最高数字。

造成人口下降的罪魁祸首是死亡,往往被描述为中世纪的"死神的舞蹈",因为没有理由可以相信15世纪的法国人特别不会生育,或故意地不愿生育。当时的结婚年龄(对于那个时期结婚年龄的情况,我们知之甚少)可能不会比1600—1800年之间的更高。在此后的几个世纪里,因为死亡率相当低,法国许多地方的女子到25岁以上才结婚的这个事实并不妨碍

人口呈跳跃性的增长，至少在18世纪是如此。因此，当回过头来看15世纪，并不像人们一直以为的那样是因为晚婚导致了人口的停滞或者骤然下降。

既然如此，15世纪人口数量之低是否可以用有意识地使用拒绝生育子女的这种原始的避孕方法，或者是年轻女子因饥馑、贫穷和焦虑出现了闭经来解释呢？有关这方面的资料我们掌握得不多，但并不能因此就说明这种情况的存在。一些现有的资料涉及到向刚刚生育过子女的母亲分配额外食物的

68 规定。于盖·内弗利用这类资料计算出了康布雷地区一个村庄的平均生育间隔。聊胜于无，他的研究揭示了该地区生育率的水平。[111]他认为，在人口数量较低的时期（1468—1482年），平均生育间隔为29.5个月，相反，在人口数量较高的时期（1559—1575年），平均生育间隔为30.5个月。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中世纪人口下降时期的康布雷妇女的生育水平并不比17世纪高产的博韦妇女更低。然而，康布雷的妇女即使做了这样值得称道的努力，却没有制止人口的减少，至少未能制止后来影响到路易十一统治时期人口的停滞状态。由此可以推断，必定有别的因素在发挥作用，从而使她们所做的努力付之东流。我们是否可以怀疑这种因素就是当时出现的高死亡率？是不是因此而缩短了婚姻伴侣的寿命，致使一方或双方在妇女充分生育前就已经去世了？这里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它可以解释以下这种现象：尽管生育率是完全正常的，但是，在我们可以称之为“前马尔萨斯”的那个时期，在康布雷地区的这个村庄里，1476年到1481—1482年间，每个家庭生育子女的平均数（大致相当于出生率，原文如此。——译者注）为2.2人，而在1559—1560年到1574—1575年之间为3.1人。15世

纪的夫妻分离得太快了，尽管他们有旺盛的生育能力，但和作为后代的夫妻相比，他们生育的子女反而较少。

表 3　15 世纪法国"人口低谷"时期的人口状况

部分或全部位于今天法国的地区	与黑死病前的人口数字相比的人口下降比例	与17世纪的人口数字相比的人口下降情况
普罗旺斯	57%	
朗格多克	50%	相同
格雷西沃丹	60%	
日内瓦主教教区	57%	
勃艮第	大于50%	
巴黎地区	小于2/3	
诺曼底	小于3/4	
布列塔尼		50%
阿图瓦	43%	
埃诺	可能小于1/2	

高死亡率是这个时期人口减少的主要原因。在中世纪晚期引发死亡的诸种原因中，主要是瘟疫，而且总是瘟疫占据着主要地位，细菌和跳蚤的孳生成为人类传染疾病的两个主要途径。

15 世纪，无论在什么地区，如索恩河畔的沙隆地区，平均每十年都会出现一次瘟疫[112]，但有些地方有可能是每两年、每三年或者四年就会出现一次瘟疫，还有些地方甚至频繁到每年出现一次(如图卢兹地区[113]，它与法国的南部地区一样，比北部受到了瘟疫的更多困扰)。总的来看，城镇遭受的苦难更为严重，但乡村也绝不会幸免。在 15 世纪的法国全国，瘟疫

69 的降临就像是家常便饭一般。它每年都会降临到这个王国的这个地方或那个地方，从不例外。从全国来看，瘟疫的周期只有非常短暂的间隔（在1350—1450年的整个期间，间隔期从来没有超过两年或三年）。有些地方每年都会出现瘟疫，例如在卡昂、贝济耶和博韦的附近，只是年份不同而已。在这种魔力般的周期下，瘟疫像一位不速之客，会随时突然地降临。晚至1840年，当瘟疫已经在西方消失了很久以后，有些伊斯兰国家依然经历着这样的周期[114]。有些地方在当时采取了类似于欧洲在16世纪中叶使用过的简单的预防措施（如隔离病人等），以减少瘟疫在穆斯林世界发生的次数。通过这样的对比，似乎可以推断，15世纪的欧洲人，特别是法国人，对这种灾祸依然是毫无抵御能力的；直到后来，人们才开始理性地同它斗争，而且最后到17世纪才取得成功。在中世纪晚期，人们仍然将得救的希望寄托于到圣·罗克去朝圣，或者仅采取一些毫无意义的虚张声势的活动。当时，他们的做法看上去好像是没有什么可担忧的，根本不采取16世纪，特别是17世纪

70 和18世纪的卫生官员、行政官员甚至军事当局越来越多采取的那些消毒、疏散和隔离等积极措施。其结果是在中世纪后期的任何十年中都会出现大量的新墓碑，人口锐减，延长了人口的停滞，遏制了人口的恢复。在15世纪的后期，不同的地方在不同时期都出现了这种相同的情况。

读者可能会提出反驳。他们认为，在法国，无论是战争、饥荒，还是瘟疫，都不是加速人口减少的重要因素。为此，我们必须借助于比较史学去寻找答案：在欧洲的其他国家并没有出现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的情况。确实，在1340—1450年之间，

德国、意大利、英国、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加泰罗尼亚和葡萄牙都经历了这样或那样的战争，但这些国家的人民躲过了在法国的土地上进行的百年战争期间的那种无与伦比的巨大灾难(事实上，百年战争这个词对法国以外大多数欧洲大陆国家来说并没有实际意义)。然而，到了中世纪晚期，这些国家与法国的情况十分相似，都经历了人口的下降，时间长达一个世纪，下降的幅度达到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罗讷河流域泥炭沼泽中的花粉图形说明，德国在14世纪后期所经历的悲惨时期(*Wüstungen*)是从公元1000年到18世纪中最为糟糕的时期，而且持续的时间很长。[115]由于把战争这个在整个欧洲范围内发挥作用的整体因素排除出去了，我们就必须寻找别的解释。或许是因为饥荒?或许，可以更加笼统地说，是因为长期连续不断的生存危机吗?显然都不是。饥荒本身决不能解释西方为什么出现长达一个世纪的灾难性的人口下降。从中期和长期的角度来看，连续出现的饥荒不可避免地会形成其自身缓和的条件：需要养活的人口减少了，能够获得的食物就会增多。因此，当我们说到大规模的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人口危机，根本不可能是因饥荒而引起的。更加笼统地来说，1280—1310年的人口过度增长，达到了人口的"顶峰"，引起了14世纪初的人口过剩，这不仅可能而且实际上也确实上升到了人口稳定的顶峰(波斯坦运用马尔萨斯的传统理论证明了这一点)，并从中世纪的人口数字上开始出现极其缓慢的下降。(我们发现后来在大致相同的条件下也出现过类似的人口稳定状态，例如在16世纪的人口爆炸之后，17世纪出现了人口的稳定)。但是，这里没有什么根本性的理由可以说明14世纪初过多的人口，仅仅是因为过去有过这样的情况，就非要造成

71

1348年以后所记载的那些悲惨事件不可。既然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就必须指出别的因素：这就是在西方国家造成差异的那个因素。这个源于欧洲之外并形成于欧亚大陆的因素就是叶尔申所说的细菌。如果没有这场来自欧洲之外的致命灾难的附加作用，就很难看出14世纪前期的过剩人口怎么可能从自身内部找到把自己向反面转化的辩证动力（这里用的是黑格尔的某种王顾左右而言他的表达方式）：到了1450年，人们可以发现，几乎在所有的地区，人口都下降到了一个令人惊讶的低水平上，与黑死病之前的人口状况形成了极大的差异。

我们暂时放下这个先例，看来，这是一个根本无法替代的先例，一个造成人口普遍而急剧下降的共同因素：这就是流行性疾病，特别是反复爆发的瘟疫所造成的死亡，而这又是我前面试图概述的引起瘟疫的细菌在那些环境下发生了"汇合"而导致的结果。瘟疫的每次地区性的爆发都属于整体的而且复杂得多的过程中的一个部分（艾贝尔的著作，尤其是波斯坦的著作，对此做了精彩的综合性描述）。因瘟疫的爆发而首先带来的人口下降可能导致一系列经济危机，包括经济停滞和萧条，这反过来又会导致某种"帮派战争"（"gang warfare"——波斯坦语），并进一步引起人口的灾难。但是，那些次要的因素本身根本不能说明1348—1450年之间西欧人口发展中的那些特殊的和空前绝后的特征。之所以说它是空前绝后的，那是因为只有现代的核战争或细菌战争才能与它相提并论。中世纪末期发生的那场生物灾难所立即呈现出的普遍性和恐怖程度，如果对导致瘟疫的病菌在这个因果链中所具有的重要地位没有恰当的认识，就无法理解那场生物性灾难的本质。[116]

伍德罗·博拉赫对美洲印第安人种族灭绝的研究　72

众所周知，14 世纪和 15 世纪微生物带来的一体化肯定对西藏地区以西的欧亚大陆，特别是对西欧产生了影响。它也可能对中国造成了影响，因为有证据表明中国在中世纪晚期(按欧洲的历史分期方法)出现了人口下降的先兆。

但是，从 15 世纪最后几年和此后的 100 年或者至少 50 年开始，瘟疫的蔓延又向西面跨出了一大步，跨越了大西洋。从那时起，美洲大陆的广袤土地也感受到了“一体化”的影响。它所产生的破坏能力在规模上远远超过了欧洲，尽管它在欧洲的破坏力已经是够令人咋舌的。为了讨论美洲历史上发生的这个具有启示意义的事件，我们必须参考伍德罗·博拉赫的著作。

加利福尼亚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博拉赫修正了苏埃特伯的理论，或者更准确地说，推翻了苏埃特伯的理论。苏埃特伯也是伯克利的历史学家，他拒绝承认墨西哥在殖民征服之后发生过任何灾难。[117]为了反驳他的理论，博拉赫引用了各种各样的大量档案：包括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时期的壁画、墨西哥当地人的著作、西班牙人所做的原始调查报告和人口普查报告，还有税收资料，以及全部的纳税收据、每个家庭的估税资料和每个家庭的人口数。以此为基础，通过相当简单的计算，就可以十分合理而准确地估计出当时被征税的人口数字。完全准确当然是不可能的，用博拉赫的话来说，最后得出来的数据以百万计或以十万计，仅仅是对“可能范围内的中间数字所做的估计”。

通过这种方法，博拉赫和他的研究小组估算出了殖民征服前墨西哥的人口数字。确实，在科尔特斯到达之前，那里早就能够靠种植玉米来满足大量人口的需要，但已经出现了达到马尔萨斯的人口饱和点的征兆：据掌握的情况，15世纪已经发生过数起饥荒，长期以来将人作为牺牲品的做法毕竟可以解释为“一种符号，标志着那里的地方文化包含有利于限制
73 人口的成分”。为什么不能这样解释呢？

但是，有这样一种说法，最糟的结果并不总是可能性最大的结果；灾难最终还是发生了，但并不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不是因为与来自外界的传染病发生接触，在15世纪的墨西哥出现的马尔萨斯趋势本来会像17世纪的欧洲那样，也只不过变成一次长期的人口停滞而已。

1519—1521年，科尔特斯摧毁了阿兹特克帝国，正是这场来自外部的征服所造成的冲击引起了人口的下降；应当承认这个国家的人口数字并不是太稳定，但是，只要它能够坚持住不受来自外部的传染，本来是可以在单一民族的背景下保持住人口的相对稳定。

表 4

时间	居民数(单位：百万)
1519年	11.0
1540年	6.4
1565年	4.4
1597年	2.5
1607年	2.0
1650年前后	1.5
1700年	约2.0
1793年	3.7

在表 4 中，S·F·库克和 L·B·辛普森[118]作出了初步的估计，他们给出的数字反映了墨西哥中部的人口在科尔特斯的征服之后发生的“大失血”。

最早时期的数字高得令人吃惊，但到了 1650 年却迅速地下跌到了最低点，这比任何冗长的评论都更为有效地说明了西班牙的侵略和占领对墨西哥的人口所造成的影响。随后，博拉赫在他的第一本著作出版以后所进行的后续研究中，进一步拓展了时间的上限和下限，证实了他对这种灾难得出的印象。博拉赫对 1547 年编制的资料《巡视全集》做了仔细研究，促使他把时间向前推移去修正 16 世纪前期的有关数据。[119] 表5 的数据即是把这些数据同 16 世纪后期的数据集合在一起。[120]

表 5

时　　间	居民数(单位:百万)
1518年	25.2
1532年	16.9
1548年	7.4
1568年	2.6
1580年	1.9
1595年	1.4
1608年	1.1

这样的一些数据指出，1518—1608 年之间墨西哥人口数量下降的速度持续保持在年平均 3% 至 6% 之间。如果按地区来计算，墨西哥中部沿海的低地地区，人口下降的速度特别快，因为同其他地区相比，那里更容易与外界接触，也更容易受到传染病的影响。墨西哥高原地区与低地地区相比，健康 74

状况比较好，处于不太容易受到传染的位置上。如果不是按照绝对数字而是按照百分比来衡量，1580年以后人口下降速度开始放慢。这时，墨西哥的地方性斑疹伤寒刚刚结束，那是一种最严重的疾病。从1580年以后，瘟疫的影响有所减弱。然后，在16世纪的最后20年内，墨西哥的人口数量落到了最低点。以这个数字为基线，经过了一个很长的时间以后，实际上就是在1650年以后，墨西哥的人口才有可能开始恢复。但是，这种恢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只是有限的和局部的。

有关米斯特卡三角洲地区[121]的专题文献也补充和证实了伍德罗·博拉赫所做的总体估计。(参见表6)

表6　墨西哥米斯特卡三角洲地区的人口数字

时　　间	居　民　数
1520年	700,000
1532年	528,000
1540年	100,000
1569年	57,000
1660—1670年	30,000
1742年	54,000
1777年	74,000
1803年	76,000
1826年	65,000

这里的数据再次表明，人口下降速度开始的时候绝对是灾难性的。但是，从1580年以后，如果以下的表达方法是正确的话，一旦人口数量达到了最低点，人口下降的速度便开始缓和了。米斯特卡三角洲地区的人口从1650年才开始了痛苦而缓慢的恢复过程，直到1850年之后才实现了真正迅速的人口增长，从此以后，人口的增长速度确实是十分惊人的。

75

博拉赫对人口总数的计算也从他对1520—1650年这一时期仔细研究的一系列补充数据中得到了证实。他首先注意到了瘟疫在发生过程中存在着明显的种族差异：印第安人的人数减少了，然而，白人移民却对他们带来并传播的各种疾病和瘟疫具有免疫力，或受到了较好的保护。1570年，在墨西哥中部有6万名白人，1646年为12.5万人，1742年达到56.5万人，1772年有78.4万人。与此同时，印第安人在遭到种族灭绝时又伴随出现了严重的食物短缺，这些食物通常是由作为有人身依附关系的有色人种向他们的白人主人提供以满足他们的需要；到16世纪末，鸡和火鸡的供应中断，以谷物形式交纳的什一税下降。西班牙殖民者建立起的由他们经营的大地产制，试图弥补当地农业越来越严重的不足，最后也因为劳动力的短缺而彻底失败。稍微值得安慰的是，随着美洲的印第安人越来越少，数以百万计的牛羊却取而代之（动物入侵并取代人类，或者毋宁说取代人类的尸体，由此而产生的后果是不可挽回的土壤破坏）。强制性的劳动制度、以债务为支付形式的半奴隶制度或者把劳动力固定在教会地产上的这些做法，成为殖民者的固定方式。他们希望以此来补偿劳动力的严重不足。正如14和15世纪的欧洲一样，在墨西哥的西班牙人发现，随着劳动力的匮乏，墨西哥劳动力价格的增长快于原料和农产品价格的增长。因此而急剧攀升的工资还不是当时出现的惟一问题。以高度的劳动密集型方式生产的纺织品，价格在1520—1610年间上升了20—30倍；相反，谷物的价格却主要取决于纯自然要素，因此，在谷物市场上，价格上升表现得不是那么明显。1580—1600年以后，墨西哥劳动力的短缺还表现在银矿上。结果，17世纪前期当地人口不足成为白银短缺的

75

76

原因之一。这反过来又窒息了遥远的地中海沿岸国家的经济。这个状态一直持续到1670—1700年以后人口和采矿业最后得以再度兴盛。甚至教堂的建造也与新西班牙的人口走势密切地吻合：博拉赫指出，在西班牙人统治的头十年里，那里出现了大批教堂，以赞美上帝的荣耀，正如后来的欧洲，在工业革命的全盛时期出现了建筑热，以赞美利润的荣耀一样。大批印第安人劳动力分配到为了唱赞美诗的建设工地上。然而，到了1576—1579年以后，教堂的建设者不得不放弃他们的工程，倒不是因为他们贷款已经用完，而是因为没有泥瓦匠，特别是根本没有劳动力来建造上帝的殿堂，也没有足够的信徒去上教堂。

博拉赫对人口减少的原因和由此伴生的一系列现象作了简要考察。他得出的结论是，这些主要是随着“疾病带来的全球一体化”而发生的瘟疫所造成的结果。毫无疑问，这当然是为西班牙人的殖民活动这个历史上最为残暴的事情涂脂抹粉，但同时不能否认印第安人在某些地方采取了一种显然是自杀的态度，要么是躺下来等死，要么就是拒不生育子女。但这种性质的原因只是次要的和部分的，最关键的因素还是疾病。亚洲和非洲的那些后来沦为欧洲人殖民统治之下的地区，并没有出现如此大规模的种族灭绝或种族文化灭绝的记录，这就是一个明证。旧大陆本土的人口保持着稳定，然后又出现了增长。在古代世界，与殖民地的接触具有相对温和的性质，这决不是因为当时的征服者特别仁慈地对待殖民地，而是由于当地沦为臣民的土著居民对长期游荡于欧亚大陆和欧非大陆的微生物具有免疫能力，或者说部分地具有免疫能力。相反，西印度群岛、墨西哥和南北美洲却不得不接受所有

77

的病原体突如其来的冲击。这些病原体在旧大陆上已经漫游了几个世纪之久，而在1500年前后刚刚发现的这些后来构成新西班牙帝国的新领土却从未遇到过这些病原体。正是出于这个理由，像麻疹、天花、各种感冒和猩红热等刚刚从欧洲传来的一些比较温和以及不温和的疾病却对大西洋彼岸造成了灭顶之灾。墨西哥的地方性斑疹伤寒在1570年末夺走大批土著居民的生命，死者在剩下的当地居民中占有很大的比例，而这种流行性疾病“很可能只是一种感冒，对白人毫无害处”。[122]后来，大约在1700—1750年的这段时期，已经感染上了梅毒的南加尼福利亚的印第安人又成为瘟疫、天花、斑疹伤寒、痢疾、麻疹的牺牲品。[123]欧洲人带来了瘟疫和流感，有些流感十分严重，但有些则不太严重。这两种疾病的盛行夺走当地许多人的生命，而其中的大部分人以前从未患过这两种疾病。两种疾病会师一路，不分清红皂白地迅速蔓延开去，给美洲的土著居民造成了一场真正的浩劫。

受到瘟疫传染的并不仅仅是墨西哥地区。纳森·瓦赫特尔最近从事的研究清楚地描述了这个“一体化”对秘鲁的科迪耶拉山脉地区造成的影响。瓦赫特尔指出，从皮萨罗的征服时代到16世纪末，当地的死亡率高得惊人。[124]在印加帝国传统的领土范围内，1530年前后（准确地说是1524年），也就是在受到第一次瘟疫的袭击之前，人口约为700万至800万人左右（或许多达1000万人）。但是，到了1560年，那里的人口数字下降到250万人，在30年的时间内至少下降了60%。到1590年，那里的人口在130万到150万之间，在这30年间又下降了40%。这些数据表明，从总体上看，秘鲁人口的下降不如墨西哥高原那么具有灾难性，因为在同一时期内，墨西哥高

原有 95%的土著居民死亡。这些数据还说明，秘鲁人口“坍塌”的速度和墨西哥一样，在逐渐放慢：从 1560 年到 1590 年的人口下降速度不如 1530—1560 年那么严重；1590 年标志着最严重的人口灾难的结束，但从人口学的角度来看，直到 16 世纪末，那里的形势依然是灾难性的。

秘鲁的流行病，扼要地说，是这样发生的：

1. 1524—1526 年发生了麻疹和(或)天花。在秘鲁，这些传染病在殖民征服前已经非常流行，因为病毒已经从欧洲人先行到达的墨西哥通过土著居民传播开来，并由各种渠道传播到秘鲁。可见，白人在他们到达之前已经把细菌送了过来。

2. 1546 年发生了一种无法确诊的致命性传染病，其特征是患者的头部和耳部出现疼痛。

3. 1558—1559 年发生了天花。

4. 1585—1591 年同时发生了天花、淋巴腺鼠疫和斑疹伤寒，在不同的时间向不同的方向传播；还出现了咳嗽和感冒，并伴有发烧，可能是流感。

当研究者在调查人口减少的原因时，印第安人在接受询问时大胆地谈论到他们所受到的粗暴虐待以及征服者强加在他们身上强制性劳动。但他们也着重强调了流行性疾病所起的致命作用。到那个世纪结束之时，随着人口的减少，土著居民的饮食状况不断有所改善(欧洲在 1348—1350 年的黑死病以后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形)。秘鲁人甚至错误地把食物丰裕也看成是导致高死亡率的原因之一。如果他们的这种指责是针对殖民者带来的烈酒所造成的有害影响，可以肯定地说，他们快要说到点子上了。他们正确地指出了烈酒也造成了死亡。

加勒比海群岛的死亡

由于博拉赫和瓦赫特尔的研究工作，我们对“微生物一体化”在美洲大陆上人口最稠密的地区造成的问题有了一个全面的印象。博拉赫在这个领域的研究工作还跨越了一个更广泛的地域，延伸到了讨论加勒比海群岛特有的耐受性：在过去，这些岛屿长期没有受到病菌的感染，而现在受到了来自西方的殖民者和海员带到海岸边的病原体突然而猛烈的侵袭。[125]

博拉赫对这些群岛的研究说明，在欧洲征服世界的时期，某些文化的人口模式与美洲大陆相似，也就是说，他们会像蛋奶酥一样崩溃，确实，除了土著居民与入侵者的混血儿外，几乎没有人能够幸免，他们实际上遭受了微生物所完成的“肉体消灭”。相反，在遭遇到来自白人世界的殖民者时，另一些群体却屹立不动，甚至还会扩大。这两类人口行为之间的分界线引出了微生物一体化这一观念的核心问题。 79

加勒比海群岛的人口几乎完全消失了，尤其是在圣多明各岛。即使在第一流的历史学家当中，他们对哥伦布到达之前的圣多明各岛人口的估计也大相径庭：根据皮埃尔·肖努[126]1964年的估计，1492年圣多明各岛上的居民为300万人，伍德罗·博拉赫对大量的档案进行了认真研究之后，提出那里的人口在700万到800万人之间。[127]他还附了一张表格，以显示人口的持续下降，这就是我复制在下面的这张表格（见表7）。这些数字确实让人震惊，我这里暂且不论他追求精

确性的负责精神。

表 7　圣多明各岛人口的下降情况

年　代	居 民 数
1492年	可能700万到800万
1496年	3,770,000
1508年	92,300
1509年	61,600
1510年	65,800
1512年	26,700
1514年	27,800
1518年	15,600
1540年	250
1570年	125

相反，查理·魏林登在布罗代尔纪念文集中写的一篇文章[128]却认为，"在哥伦布启航之前，海地岛上的居民总数只有"5.5 万人或 6.5 万人"。[129]事实上，魏林登没有吸收博拉赫的最新研究成果（1971 年），博拉赫的著作提出了准确的数字，证实乃至扩大了肖努所估计的数字。博拉赫和魏林登这两位历史学家对人口下降速度的估计完全不同，也同样是事实。根据博拉赫的说法，海地总人口的下降，幅度最大的时期是在 1492—1570 年，在当地居民的幸存者当中每年都有 40% 的人死亡，那里的人口真的是按照几何级数下降的。然而魏林登并没有提出进一步的解释，只是把他的估计建立在纯粹猜测的基础上，只愿意承认在殖民征服的第一阶段上，即从 1492 年到 1509 年，海地的人口总数下降了 33%，在 1492—1514 年间则下降了 50%（他正确得出结论，"这已经非常可怕了"）。[130]

80

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不能在魏林登或肖努与博拉赫共同提出的结论之间作出选择。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三位作者都同意我们这个观念中的一个重要的论点：在1492—1570年之间，圣多明各岛上的土著居民（除了少数混血种人）全部或者几乎全部灭绝了。同样地，这三位作者也同意传染病是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圣多明各岛同其他许多岛屿一样，起初受到了很好的保护，但突然间被推到了人们之间接触的前沿，沦为牺牲品。在世界上这个不幸的事先没有获得免疫力的区域里，受到了传染病细菌的真正冲击。

现在我们来讨论海洋的变化，这将涉及到太平洋上的岛屿。博拉赫通过全面的研究之后指出，尽管人口下降的百分比有时不是很大，但几乎总是灾难性的（见表8）。

表8

澳大利亚	1780年前的土著居民为30万人 1937年为8万人
塔斯马尼亚	殖民征服前的当地人为2000人 1876年基本灭绝
新西兰	殖民征服前可能有100万毛利人 1939年为4万人
夏威夷	1778年前后的居民为40万人 1853年为7.1万人 1890—1900年的当地人为4万人
马克萨斯群岛	殖民征服前的居民为8万人 1939年只有2000人
关岛	1668年的有7万人至10万人 1733年为1654人

可见，大洋洲这些地区像16世纪的美洲一样，遵循着人口下降的同一种模式，尽管由于殖民化的时间差距，大洋洲人 81

口下降的出现要晚得多。可以看出，那里的人口行为模式与亚洲(中国、日本、印度)乃至非洲的人口模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即使出现了人口停滞时期，或者是出现了暂时或长期的人口下降时期(特别是因为奴隶贸易的缘故，非洲表现得更为明显)，我们仍无法将古代世界的殖民地人口的减少与美洲和太平洋岛屿上因细菌而出现的种族灭绝相提并论。从这种角度来观察，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的情况尤为显著。这些群岛虽然同邻近大陆上的几大文明地区比较接近，但其人口行为模式仍然属于“亚洲式”的而非“太平洋式”的：那里的人口没有“像蛋奶酥一样”崩溃。从18世纪的各个角度来看，虽然那里的人口出现过短暂的下降，但是，即使在殖民统治的全盛时期也出现了人口的正常增长。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很简单：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通过若干交通路线与远东大陆上邻近的国家一直保持着接触。因此，这两大群岛处在包括人口稠密的印度和中国在内的亚洲微生物共同体中，而这个共同体在许多个世纪以前就与欧洲发生了联系。从病疫学的角度来看，西方人的到达给菲律宾人和印度尼西亚人带来的危险不像给日本人、中国人和印度人那么大。另一方面，太平洋上的群岛处于更远的东方，没有可能通过长期的接触的方式来获得部分免疫力，因此，从18世纪以来，他们就像两个世纪前的美洲所经历的那样，被细菌的洪流所淹没。

我想用伍德罗·博拉赫的明快结论来结束这部分讨论，只不过对他结论中的某些地方做些浓缩和简化：他曾提纲挈领地写道，在原始状态和人口下降之间并不存在任何联系，但是，一旦与欧洲发生的接触建立起来，与欧洲发生交往之前的那种孤立程度或孤立主义就与人口解体的规模发生了联系。

这充分说明破坏人口增长的最重要的因素是传染病的传播。与欧洲到远东的远距离商路发生联系的地区，在一个相当长 82 的时间里吸收了各种疾病产生的影响，因此，他们可能恢复并形成免疫性的抵抗力。新大陆以及后来大洋洲上的人们生活在完全或基本上完全与世隔绝的状态中。他们用了几十年的时间才吸收了每种可能传播的传染性疾病造成的影响。他们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接受了欧洲和远东要用几千年的时间才能接受的那一系列冲击。

事实上，在人类殚思极虑而成功地实现世界的一体化之前，细菌和病毒已经带来了世界的一体化。[131]

结　论

在本文的结论中，让我再次引用博拉赫所写的那最后一句话，但愿我不是削足适履。

在本文中，我的出发点是很早以前就存在着一个"疾病共同体"的论点：这个共同体并没有扩展到整个欧亚大陆，而且根本没有到达美洲。事实就是如此，偶然事件总是可能发生的。这个偶然事件指的就是"汇合"。实际上，这种偶然事件发生的几率在中世纪晚期和文艺复兴的前夕已经增加了。随着世界人口的大规模扩张，如中国人、地中海和欧洲的人种、美洲的印第安人等，还有这些大规模人口之间的巨大的公路网络的开辟（还有大批老鼠和跳蚤的参与），并越过中亚的传染病禁区，向前延伸，偶然事件发生的几率进一步增多。当热那亚人无可置疑地成为流行病的传播者时，危险的势态变得非常紧迫。流行病开始越过黑海，向中亚地区推进，这时所遭遇

的是刚刚实现统一的蒙古人（他们对流行病的传播亦难辞其咎）。然后，同样又是这些热那亚人中的一批人向西航行，直抵伊比利亚半岛南端。人们不禁要拿它来与我们的时代相比。现代核武器的扩散带来的危险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极大的可能。

但是，如果把注意力集中到14世纪、15世纪和16世纪这个关键的阶段：由于遭受威胁的人口处在抵抗能力最低的状态下，欧洲部分地处在这样的状态下，而美洲几乎完全属于这种情形。因此，发生大规模的生态灾难和生物灾难的风险变得越来越大，可以说，无论造成破坏的载体属于何种性质：在欧亚大陆上主要是瘟疫，而在美洲（后来，还有太平洋上的群岛）则是各种传染病，结果都是一样的。在1348—1600年，世界上的大部分人口死于微生物的屠杀，特别是在欧洲和美洲（大洋洲暂时躲过了这一劫，后来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只不过规模小得多），在欧洲造成了大批的死亡，摧毁了美洲大陆、以及整个或几乎整个加勒比海地区。在14世纪和15世纪的欧洲和16世纪的美洲人口曲线急剧下滑，然后出现了痛苦的缓慢上升（欧洲出现在16世纪，墨西哥出现在17世纪的前期），最终影响到了迄今为止的世界历史的节奏，在人类的发展过程中，人口的作用是极其巨大的，是极本性的关键因素。除了人口之外，我们还面临着巨变性的灾难，其广泛程度是波斯坦的纯经济范畴无法涵盖的。被砍伐的不仅是这棵大树盘根错节的根系，而且是它的生命本身。

到1530年时的欧洲和1650年时的美洲，人口大规模和普遍崩溃的晚期阶段似乎已经结束。从此以后，以细菌为根源而引起的灾难基本上以地区性的规模发生，有些确实还具

有相当大的规模:例如,由于传染病和三十年战争的暴力共同发生的作用,德意志几近完全摧毁。在偏远地区发生的一个又一个种族灭绝的事件不仅决定了世界的历史,更是对世界意识的挑战,我这里所指的当然是18世纪以来的细菌传染给大洋洲土著人带来的种族火绝(参阅前文)。但是,19世纪仍然有霍乱的传播就证明了微生物的一体化尚未结束,即使是在欧亚大陆国家,也远没有结束。至少,它的影响像它在1348—1650年的大西洋两岸造成的影响一样能给人以启示。在近代,"疾病带来的 ·体化",作为扩张和贸易的罪恶伴随物已经逐渐丧失了其决定人类命运的能力。

注 释

[1] 本文原载于《瑞士历史杂志》(*Revue suisse d'histoire*),第23卷第4部分,1973年。

[2] J·N·比拉邦和J·勒高夫:《中世纪早期的瘟疫》(J.N.Biraben and J.Le Goff,"La peste du Haut Moyen-Age"),《年鉴》,1969年。

[3] 参阅J·P·德塞弗等主编:《18世纪末的医学、气候和流行病》(J.P.Dessaive and others, eds., *Médecins, climat, et épidémies à la fin du XVIIIe siècle*,穆东,巴黎-海牙,1972年)中J·P·古贝尔、J·迈耶和J·P·彼特等人的论文。

[4] 伊丽莎白·卡庞蒂埃:《论黑色瘟疫》(Elizabeth Carpentier,"Autour de la peste noire"),《年鉴》,1962年。

[5] R·波利策:《瘟疫》(R.Pollitzer, *Plaque*),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1954年。

[6] A·托勒梅修道院长:《科坦登半岛的乡村绅士:古贝维尔老爷》(Abbé A.Tollemer, *Un Sire de Gouberville, gentilhomme campagnard au Cotentin*),穆东,巴黎-海牙,1972年。

[7] J·F·D·施鲁斯伯里:《英伦诸岛淋巴腺鼠疫史》(J.F.D. Shrewsbury, *A History of Bubonic Plague in the British Isles*),剑桥大学出版社,1970年;J·N·比拉邦:《人与瘟疫》(J.N.Biraben, *Les Hommes*

et la peste),巴黎,1975年。

[8] 有关的各类参考书请参阅施鲁斯伯里:《英伦诸岛淋巴腺鼠疫史》,第12页。

[9][10] 比拉邦和勒高夫:《中世纪早期的瘟疫》。

[11] 对于瘟疫发生前英国的人口状况,学者们存在着争议。对这个有争议的问题,我本人没有发言权。这里所引用的数据是英国最杰出的人口历史学家之一E·A·里格利在《人口与历史》(E.A.Wrigley, *Population and History*,1969年)的第78页中提出的。

[12] M·莫里诺:《经济起飞的假象:18世纪法国的农业和人口》(M.Morineau, *Les Faux-semblants d' un démarrage économique: agriculture et démographie en France au XVIIIe siècle*),巴黎,1971年,第83页(《年鉴手册》第30期)。

[13] 比拉邦:《瘟疫:当代流行病学的概念》(J.N.Biraben, "Conceptions médico-épidemiologiques actuelles de la peste",载于《医学论坛杂志》(*Concours médical*),1963年1月26日。

[14] C·S·巴兹科斯(C.S.Bartsocas)引自菲利普·齐格勒的《黑死病》(Philip Ziegler, *The Black Dearth*,企鹅出版社,1969年,第113页,第296页)。见《医疗史杂志》第21卷(1966年,第4期),第395页。

[15] 比拉邦:《瘟疫:当代流行病学的概念》,第622页。

[16] 这部分的许多内容,我是受惠于比拉邦和勒高夫的前引论文。

[17] 比拉邦和勒高夫:《中世纪早期的瘟疫》,第1493页。

[18] 有关这些复杂的生态条件的论述,请参阅比拉邦的《瘟疫:当代流行病学的概念》,第620—621页,他在论文中认为,中亚地区的瘟疫基本上是长期性的流行病,而远东的瘟疫则是间歇性的。

[19] 公元6世纪的这次瘟疫只对莱茵兰地区造成了很小的影响。

[20] 为了对这两次瘟疫进行比较,请参阅比拉邦和勒高夫1969年发表在《年鉴》第1500—1502页上,有关公元6世纪瘟疫流行的地图、以及卡庞蒂埃1962年发表在《年鉴》第1017页上的地图(1348年的瘟疫)。

[21] 如果同意施鲁斯伯里的理论,情况至少会是这样的。

[22] 相比较而言,波兰没有受到黑死病的影响:参阅卡庞蒂埃的论文《论黑色瘟疫》,1962年。波希米亚也是如此,参见弗兰蒂斯克·格劳斯:《14世纪发生在波希米亚的瘟疫》(Frantisek Graus, "Autour de la peste noire au XIVe siècle en Bohème),《年鉴》,1963年、第720—

725 页。

[23][24] 比拉邦和勒高夫："中世纪早期的瘟疫"，1969 年。

[25] 波利策：《瘟疫》，第 15 页，第 269 页；比拉邦：《瘟疫：当代流行病学的概念》，1963 年，第 620 页。

[26] 波利策：《瘟疫》，第 269—271 页。

[27] 波利策：《瘟疫》，第 335—336 页。

[28] 比拉邦：《瘟疫：当代流行病学的概念》；巴尔塔扎德引自 G·吉拉尔：《地面的瘟疫与发掘出土的瘟疫》（G. Girard, "Peste tellurique et peste de fouissement"），见《医学快报》（*La Presse médical*），1964 年 5 月 30 日。

[29] R·格罗塞：《草原帝国》（R. Grousset, *L' Empire des steppes*），巴黎，1939 年；路易斯·汉比斯的《成吉思汗》（Louis Hambis, *Genghis-Khan*，巴黎，1973 年）以及尚塔尔·勒梅西耶-凯尔格热的《蒙古人的和平》（Chantal Lemercier-Quelquejay, *La Paix mongole*，巴黎，1970 年）提供了更完整的书目。

[30] 尚塔尔·勒梅西耶-凯尔格热：《蒙古人的和平》。

[31] G·I·布拉蒂阿努：《有关 13 世纪黑海地区热那亚经济的研究》（G. I. Bratianu, *Recherches sur le commerce génois dans la mer Noire au XIIIe siècle*），巴黎，1929 年，第 129 页。

[32] 尚塔尔·勒梅西耶-凯尔格热：《蒙古人的和平》，第 46 页。

[33] 有关丝绸贸易路线的完整书目，请参阅 J·埃尔：《15 世纪的起源》（J. Heers, *Génes au XVe siècle*），巴黎，1961 年，第 366—367 页（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书中的地图）；罗贝尔·洛佩兹：《欧洲的诞生》（Robert Lopez, *Naissance de l' Europe*），巴黎，1962 年，第 298—299 页；弗朗西斯科·佩哥洛蒂：《商业实用大全》（Francesco Pegolotti, *La Pratica della Mercature*），阿兰·伊文斯编辑，剑桥（马萨诸塞州），1936 年，第 21—22 页。

[34] 佩哥洛蒂：《商业实用大全》，第 21—22 页。

[35] 埃尔：《15 世纪的起源》，第 367 页。

[36] 《大不列颠百科全书》，1960 年版，"瘟疫"条；约翰·斯图尔特：《聂斯托里亚传教团的事业》（John Stewart, *Nestorian Missionary Enterprise*），爱丁堡，1928 年；斯图尔特利用了 1886 年到 1896 年出版的三卷本的《圣·彼得斯堡科学院论文集》（*Mémoires de l' Academie de Saint-Petersbourg*，第 7 集）中的一系列论文，特别是其中的第 34—

35 卷和第 37—38 卷。

[37] 波利策:《瘟疫》,第 14 页。

[38] 埃尔:《15 世纪的起源》。

[39] 有关瘟疫传播的年代,请参阅 J·格莱尼松:《危难时期:1300—1500 年》(J.Clénisson, *Le Temps des périls, 1300—1500*),第 67 页。格莱尼松在论文集《人类的变异》(*Les Métamorphoses de l' humanité*)中认为,即使瘟疫不是从加发传播到欧洲的,但无论如何也是中亚经由安条克和小亚细亚并最终传播给我们的。

[40] 我不敢声称这篇文章从事件的角度对黑死病(1348 年瘟疫的传统名称)的传播作出了新的解释。与之相关的内容,请参阅 F·A·加斯凯的《大瘟疫》(F.A.Gasquet, *The Great Pestilence*),伦敦,1893 年。该书于 1908 年用《黑死病》的书名在伦敦再版,其中还包括前文所提到的 P·齐格勒的著作中所做的其他叙述。对这些著作所做的批判性的评论,请参阅 W·M·鲍斯基:《黑死病》(W.M.Bowsky, *The Black Death*),纽约,1971 年,第 126—128 页。

[41] F·A·加斯凯:《大瘟疫》,第 39 页。

[42] 爱德华·巴拉蒂埃:《普罗旺斯 13—16 世纪的人口,与 18 世纪的人口进行的比较》(Edouard Baratier, *La démographie provençale du XIIIe au XVIe siècle, avec chiffres de comparaison pour le XVIIIe siècle*),巴黎,1961 年。

[43] 读者将会注意到,只受到一次瘟疫,即 1348 年的瘟疫影响的地区,人口下降了 54.9%,比经受两次瘟疫(1348 年和 1361 年的瘟疫)影响的第二类地区损失更为严重。后者的人口只减少了 48.2%。这一点多少会令读者感到有些惊奇。其原因是那些感到有必要在 1348 年的瘟疫之后立即重新计算家庭数量的地区属于受影响最大的地区,因而,在第一类地区存在一些错误的"衡量"。但不管怎样,从现有的所有资料来看,事实很明显,1348 年和 1361 年两次瘟疫的肆虐使普罗旺斯人口至少减少了 40%。

[44] 居伊·德·肖long克:《大外科》(Guy de Chauliac, *La Grande Chirurgie*),E·尼凯斯编辑,巴黎,1890 年,第 167—170 页(编者使用了根据孔塔的方言翻译过来的肖梭克著作的原始版本)。另外,J·德·斯梅在《弗兰德尔的编年史》(J. de Smet, *Recueil des chroniques de Flandre*,布鲁塞尔,1856 年,第 3 卷,第 15 页)中也引用了来自阿维龙的那封内容详尽的信件。

[45] 我要对巴黎巴斯德学院的默拉勒(Mollaret)教授表示感谢。他是一位研究淋巴腺鼠疫方面的专家。感谢他在与我的几次谈话过程中,他非常友好地提出的一些建议。

[46] 瘟疫经由克里米亚传播到君士坦丁堡时就转变为肺炎,这不是不可能的(反过来说,这也不能肯定的)。与此相关的内容,见加斯凯的《大瘟疫》第12—13页上所引用的让·康塔居泽尼(Jean Cantacuzène)的文章。又见C·昂格拉达:《对已经灭绝的疾病所进行的研究》(C. Anglada, *Étude sur les maladies éteintes*),巴黎,1869年。

[47] 从1347年12月持续到1348年3月的那个冬天,在C·伊斯顿的《西欧的冬季》(C. Easton, *Les Hivers dans l'Europe occidentale*,莱敦,1928年)一书中既没有说它是个暖冬,也没有说它是个严冬。在这场瘟疫发生的前几年里,蒙彼利埃的气候很湿润。(根据一位匿名医生1349年在《流行病研究》(*Tractatus de epidemia*)中所做的简单描述来看,那三年的气候是湿润的。这份档案藏于国家图书馆,拉丁文手稿编号7026,卷宗第86号,第227号和第209号)。看来,了解利翁海湾周围1348年1月和2月的天气状况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48] 特蕾莎·斯克莱弗特:《上普罗旺斯的文化:中世纪的林业和牧业》(Therese Sclafert, *Cultures en Haute-Provence, deboisement et pâturages au Moyen Age*),巴黎,1959年。

[49] 《马赛商业史》(*Histoire du commerce de Marseille*),是在加斯东·朗贝尔的指导下出版的,巴黎,1949—1959年,第2卷,第261页。

[50] 有关中世纪的烟囱和火炉的问题,请参阅F·布罗代尔:《物质文明和资本主义》(F. Braudel, *Civilisation materielle et capitalisme*),A·科兰出版社,巴黎,1967,第223页。

[51] 加布里埃·德·阿尔尚博(Gabrielle d'Archimbaud)向我指出了在鲁日耶进行的考古发掘工作。对此,我要向他表示感谢。

[52] 波利策:《瘟疫》。

[53] 《马赛商业史》,第2卷,第304—316页,正文和图表。

[54] J·迪韦尔努瓦:《帕米埃尔调查录》(J. Duvernoy, *Inquisition à Pamiers*),普里瓦出版社,图卢兹,1966年,第4章和第9章。该书的原版是J·迪韦尔努瓦发表的《雅克·富尼埃的调查录》(J. Duvernoy, *Le Régistre d'inquisition de Jacques Fournier*),普里瓦出版社,图卢兹,1965年(三卷本)。

[55] [56] A·蒙特尔和P·兰贝尔:《朗格多克的民歌》(A.Montel and P.Lambert, *Chants populaires du Languedoc*),巴黎,1880年。

[57] E·勒鲁瓦·拉迪里:《朗格多克的农民》(E.Le Roy Ladurie, *Les Paysans de Languedoc*),巴黎,1966年,SEVPEN,第1卷,第141页。又见W·艾贝尔的《欧洲农业危机》(W.Abel, *Crises agraires en Europe*),弗拉马林出版社,巴黎,1973年,第61页和注释1。

[58] 这个假设是根据B·贝纳萨尔的《16世纪末西班牙北部瘟疫研究》(B.Bennassar, *Recherches sur les grandes épidémies dans le nord de l'Espagne, à la fin du XVIe siècle*),巴黎,1969年,第53页以及其他地方的一些资料提出来的。

[59]《马赛商业史》,第2卷,第39页;巴拉蒂埃《普罗旺斯13—16世纪的人口》,第81页;G·勒萨热:《安茹王朝的马赛》(G.Lesage, *Marseille angevine*),E·德·博卡尔出版社,巴黎,1950年,第165页。

[60] 参阅斯克莱弗特的《上普罗旺斯的文化》和巴拉蒂埃的《普罗旺斯13—16世纪的人口》中引用的有关反高利贷的文本。这些文本反映了当时的反犹太主义。

[61] 勒萨热:《安茹王朝的马赛》,第164页(瘟疫前的低工资)。

[62] G·普拉:"阿尔比与黑色瘟疫"(G.Prat, "Albi et la peste noire"),载于《法国南方年鉴》,1952年;菲利普·沃尔夫:"有关法国南方人口的三项研究"(Philippe Wolff, "Trois études de démographie dans la France méridionale"),米兰,1957年;又参见沃尔夫写的《14世纪和15世纪图卢兹人口的"估计"》(Philippe Wolff, *Les "estimes" toulousaines des XIVe et XVe siècles*),图卢兹,1956年;E·勒鲁瓦·拉迪里:《朗格多克的农民》,第142页。《朗格多克历史档案》(*Documents de l'histoire du Languedoc*)已在菲利普·沃尔夫的主持下出版,普里瓦出版社,图卢兹,1969年("法兰西世界丛书"),第159—161页。

[63] 肖赖克主编:《大外科》1890年,第172页。肖赖克原先是阿维龙的一位农村小伙子。他开出了治疗的药方。后来他成为了当时最杰出的外科医生。(肖赖克:《大外科》前言,第89页。)

[64]《朗格多克历史档案》。

[65] 德·斯梅:《弗兰德尔的编年史》,第3卷,第16—17页。

[66] E·富尔尼亚尔:《13—14世纪弗雷地区的城市和交换经济》(E. Fournial, *Les Villes et l'économie d'échange en Forez aux XIIIe*

et XIVe siècles)，皇宫出版社，巴黎，1967年。

[67] 富尔尼亚尔：《13—14世纪弗雷地区的城市和交换经济》，第303 304页。

[68] 富尔尼亚尔：《13—14世纪弗雷地区的城市和交换经济》，第305—308页，第721页。

[69] 关于目击者对阿维龙及其周围地区的鞭笞所做的描述，请参阅德·斯梅的《弗兰德尔的编年史》，第3卷，第17页。富尔尼亚尔的《13-14世纪弗雷地区的城市和交换经济》对弗雷地区的鞭笞所做描述有些失实。

[70] 1352年，圣皮埃尔有102户家庭；1352年这七个教区有244户家庭。

[71] 皮埃尔·迪帕克：《萨伏伊省教区的人口》(Pierre Duparc, "Démographie de paroisses de Savoie")，载于《科学和历史工作委员会的哲学与历史公报(1610年创刊)》，1962年，第247页，第275页。然而，也正如迪帕克所说的，萨伏伊家庭的平均数量有可能缩小了。

[72] M·科斯塔·德·博勒加尔将这些文本收集在《中世纪萨伏伊省犹太人的景况》("Conditions des Juifs en Savoie au Moyen Age", collected by M. Costa de Beauregard)中，载于《萨伏伊省科学论文集》，第2集，第2卷(1854年)。以后的作者，如V·德·圣热尼和热尔松等，再也没有进一步提供有关这方面的新资料。

[73] 在卢瓦尔河畔的索恩，索恩河畔的沙隆行政区。

[74] 按P·格拉的说法，1360年有310户家庭。见P·格拉："日夫里教区的记录"(P. Gras, "Le registre paroissial de Givry")，载于《巴黎铭文学院图书馆馆刊》，第100卷(1939年)，第307页(上文中与日夫里有关的一整段都引自于该文)。

[75] 见E·卡庞蒂埃：《论黑色瘟疫》，《年鉴》，1962年，第1073页，引自H·凡·韦弗克(H. Van Werveke)的著作。

[76] 巴拉蒂埃：《普罗旺斯13—16世纪的人口》，第142—143页，其中要么是塔拉斯孔的家庭数量略有下降，要么是家庭数量同此前的1316年、1319年和1352年相当。但这方面的证据并不完全可信，年代也值得怀疑，1352年的数字可能是来自于未出版的1348年以前的记录。

[77] P·蒂科奥-夏拉：《加斯东·费比》(P. Tucoo-Chala, *Gaston Fébus*)，

比耶尔出版社，波尔多，1959年，第221页；又见该作者写的另一篇文章：《贝阿恩省的黑色瘟疫》（"Peste noire en Béarn"），载于《比利牛斯地方杂志》，1951年，第111—112期，我的参考书目来自于E·卡庞蒂埃的《论黑色瘟疫》。

[78] E.勒鲁瓦·拉迪里：《朗格多克的农民》，第142—143页和注释1。

[79] 达穆齐（Damouzy）语，见科维尔：《法国文学史》（Coville, *Histoire littéraire de la France*，第37卷，1959年，第529页）中的文章。

[80] 比较德塞弗等主编的《18世纪末的医学、气候和流行病》中彼得、古贝尔和迈耶写的有关18世纪的论著。

[81] 参阅G·富尔琴：《中世纪晚期巴黎地区的乡村》（G.Fourquin, *Les Campagnes de la région parisienne à la fin du Moyen Age*），巴黎，1964年，第227—228页；B·盖雷梅克：《13—15世纪巴黎手工业者的工资制度》（B.Geremek, *Le Salariat dans l'artisant parisien aux XIIIe-XVe siècles*），巴黎，1962年，第123页。又见J·法维埃的杰出著作：《百年战争后期巴黎的纳税人》（J.Favier, *Les Contribuables parisiens à la fin de la guerre de cent ans*），德罗兹出版社，日内瓦，1970年，第10页和注释22（年代跨度：1328年有20万名居民，1421年前后有10万名居民）。

[82] R·卡泽尔（Cazalles）语。参见他在1962年的《科学和历史学工作委员会的哲学与历史公报》上发表的研究成果。这份研究令人信服地证实1348年北部的贵族比南部的贵族所受的损害要小。

[83] A·菲利普在《黑色瘟疫史》（A.Philippe, *Histoire de la peste noire*，巴黎，1853年）中引自《纪尧姆·德·南日和圣-德尼的编年史》（*Chroniques de Guillaume de Nangis, et de Saint-Denis*）。

[84] B·盖纳：《中世纪晚期桑利斯—司法辖区的法官与司法人员》（B.Guenée, *Tribunaux et gens de justice dans le baillage de Senlis à la fin du Moyen Age*），斯特拉斯堡，1963年，第48—49页。

[85] 巴黎国家档案馆，S2620和S2621号档案（加吉斯的地租记录），富尔琴：《中世纪晚期巴黎地区的乡村》，第349页；多米尼克·樊尚-博凯：《加尔日-莱-戈内斯，1273—1400年》（Dominique Vincent-Bocquet, *Garges-lés-Gonesse, 1273—1400*），未刊博士论文，巴黎第七大学，1973年。

[86] 与此相关的问题，参见《朗格多克的农民》（1966年，第195页和注释

1)中引用的文本。

[87] 科维尔在《法国文学史》中引用的文本，第 390 页。

[88] 比拉邦：《法国、欧洲国家与地中海国家的人与瘟疫》(Biraben、*Le Hommes et la peste en France et dans les pays européen et méditerranéens*)，穆东出版社，巴黎－海牙，1975 年，第 1 卷，第 120 页(图表)。

[89] F·洛特：《1328 年的教区及家庭状况》(F. Lot, "L'état des paroisses et des feux en 1328")，载于《巴黎铭文学院图书馆馆刊》，1929 年。

[90] M·雷亚尔、A·阿尔芒戈、J·迪帕基埃：《世界人口通史》(M. Reihard, A. Armnegaud, J. Dupâquier, *Histoire générale de al population mondiale*)，巴黎，1968 年，第 90—91 页。我所计算的数据来自该书第 91 页附表上的总计。

[91] 引自 F·布罗代尔和 E·拉布鲁斯：《法国经济史》(F. Braudel and E. Labrousse, *Histoire économique de la France*)，巴黎，1970 年，第 2 卷，第 13 页)中 P·古贝尔(P. Goubert)的论文。

[92] 居伊·布瓦在《封建制度的危机》(Guy Bois, *Crise du féodalisme*，巴黎，1976 年)一书中强调了这个观点。

[93] 巴拉蒂埃：《普罗旺斯 13—16 世纪的人口》。

[94] E·勒鲁瓦·拉迪里：《朗格多克的农民》，1966 年，第 2 部分的开头。

[95] 参阅 L·宾兹的论文：《中世纪晚期日内瓦教区的人口》(L. Binz, "La population du diocèse de Genève à la fin du Moyen Age")，载于《安东尼·巴贝尔文集》(*Mélanges Anthony Babel*)，第 1 卷，日内瓦，1963 年。

[96] 《托马斯·普拉特自传》(*The Autobiography of Thomas Platter*)，英译本，伦敦，1839 年，第 3 页。

[97] A·费埃罗：《1339 年的弗希尼审判》(A. Fierro, *Les Enquêtes de 1339 en Faucigny*)，巴黎铭文学院未出版的博士论文(1964—1965 年)。又参见作者写的另一篇文章《多菲内的人口周期》("Un cycle démographique en Dauphiné")，载于《年鉴》，1971 年，第 959 页。

[98] J·M·佩塞兹：《对废弃的村庄进行的考古发掘》(J. M. Pessez, *Archéologie du village déserté*)，A·科兰出版社，巴黎，《年鉴集刊》，第 27 期，第 97 页。

[99] 见马丹－洛贝尔(Martin-Lorber)发表在《勃艮第年鉴》第 117 期(1958 年)上的文章。

[100] H·迪布瓦:"夏龙对家庭所进行的探究"(H. Dubois, "Chalon d'après les cherches de feux"),载于中世纪史学家协会出版的《中世纪的人口:原始资料和方法》,《尼斯学院年鉴》,1971 年。

[101] 参见玛丽-特雷斯·卡伦的论文《15 世纪的托内尔人》(Marie-Thérèse Caron, *Le Tonnerrois au XVe siècle*),南特大学,1972 年。

[102] G·富尔琴:《中世纪晚期巴黎地区的乡村》,第 364—365 页;盖纳:《中世纪晚期桑利斯司法辖区的法官与司法人员》。

[103] 居伊·布瓦:《封建制度的危机》。

[104] 见 J·德吕莫主持下出版的《布列塔尼史》(*Histoire de Bretagne*),普里瓦出版社,图卢兹,1969 年,第 182 页和第 206 页。

[105] R·布特吕希:《社会危机:百年战争期间波尔多的领主和农民》(R.Boutruche, *La crise d'une société: seigneurs et paysans du Bordelais pendant la guerre de Cent Ans*),波尔多,1947 年。

[106] 见《废弃的村庄与经济史》(*Villages désertés et histoire économique*,巴黎,1965 年,第 170 页)中 J·M·贝塞的论文。作者利用并引用了 A·博盖的一本(未发表的)著作(1956 年)。

[107] 见 H·内弗斯 (H.Neveux) 发表在《历史人口学年鉴》(1971 年,第 269 页)上的论文。

[108] M·A·阿努尔德:《埃诺会议的家庭调查,14—16 世纪》(M.A. Arnould, *Les Dénombrement de foyers dans le Comté de Hainaut, XIVe-XVIe siècles*),布鲁塞尔,1956 年,第 278—279 页;G·西维里:"埃诺和黑色瘟疫"(G. Sivery, "Hainaut et peste noire"),载于《埃诺的科学、艺术、文学、社会出版物及论文集》,第 19 卷(1965 年),第 433 页。(另外,参见 E·卡庞蒂埃于 1968 年在《年鉴》杂志上的论文,第 646 页。)

[109] 有关埃诺的黑死病这个主题(从 1286 年到 1365 年,家庭数量减少了 48.5%),请参阅西维里的论文《埃诺和黑色瘟疫》。

[110] 参见雷亚尔、阿尔芒戈和迪帕基埃的《世界人口通史》第 98 页和第 107 页所引用的 J·居韦利耶尔的著作《布拉邦特省的家庭调查》(J.Cuvllier, *Les Dénombrement des foyers en Brabant*)。

[111] H·内弗斯:《康布雷的谷物》(H. Neveux, *Les Grains du Cambrésis*),里尔第三大学的论文集,1974 年。

[112] 见 S·吉贝尔 (S.Guibert) 发表于《年鉴》上的文章,1968 年,第 1283—1300 页。

[113] E·勒鲁瓦·拉迪里:《朗格多克的农民》,第3卷,第942页。
[114] 比拉邦:《法国、欧洲国家与地中海国家的人与瘟疫》。
[115] 参阅奥弗贝克1557年绘制的花粉曲线,1962年《年鉴》第445页上复制了该图。
[116] 参阅W·艾贝尔:《欧洲的农业危机,9—19世纪》(W. Abel, *Crises agraires en Europe, IXe-XIXe siècles*),弗拉马里翁出版社,巴黎,1973年,第61—70页。
[117] 见博拉赫的《新西班牙衰落的世纪》(W. Borah, *New Spain's Century of Depression*)中所引用的索埃特伯尔(Soetber)的论著,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伯克利,1951年。
[118] 博拉赫的《新西班牙衰落的世纪》(第3页)所引用的S·F·库克和L·B·辛普森的《16世纪墨西哥中部的人口》(S.F.Cook and L.B.Simpson, *The Population of Central Mexico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耶鲁大学出版社,纽黑文,1948年。
[119] W·博拉赫和S·F·库克:《1548年墨西哥中部的人口》(W.Borah and S.F.Cook, *The Population of Central Mexico 1548*),1960年。
[120] 参阅S·F·库克和W·博拉赫:《人口史论文集:墨西哥……》(S.F.Cook and W. Borah, Essays in Population History: Mexico…),第1卷,伯克利,1971年;博拉赫和库克:《1548年墨西哥中部的人口》,1960年,第114页;库克和博拉赫:《1531—1610年墨西哥中部印第安人的人口》(S.F.Cook and W.Borah, *The Indian Population of Central Mexico, 1531—1610*),1960年,第48页。
[121] S·F·库克和W·博拉赫:《1520—1960年米斯特卡三角洲的人口》(S.F.Cook and W.Borah, *The Population of the Mixteca Alta, 1520—1960*),1968年。
[122] P·肖努:《美洲与美洲人》(P.Chaunu, *L'Amérique et les Amériques*),巴黎,1964年,第104页。
[123] S·F·库克:《1697—1773年南加利福尼亚印第安人疾病的范围和影响》(S.F.Cook, *The Exent and Significance of Disease among the Indians of Baja California, 1697—1773*),伯克利,1937年。
[124] N·瓦赫特尔:《失败者的看法》(N.Wacthel, *La Vision des Vaincus*),加利马尔出版社,巴黎,1971年,第140—150页。
[125] W·博拉赫:《美洲模式:欧洲扩张对非欧洲世界所造成的人口影响》(W.Borah, "America as a model: the demographic impact of European

expansion upon the non-European world"),《美洲学学者第 35 次国际大会纪念文集》(*Actas ymemorias del XXXV congresso international de Americanistas*),墨西哥,1962 年。

[126] P·肖努:"美洲印第安人的人口"(P.Chaunu,"La population de l'Amérique indienne"),《历史杂志》,1964 年 7—9 月,第 112 页。

[127] S·F·库克和 W·博拉赫:《人口史论文集:墨西哥和加勒比海地区》(S.F.Cook and W.Borah, *Essays in Population History: Mexico and Caribbean*),第 1 卷,伯克利,1971 年。

[128] [129] [130] C·魏林登:《哥伦布征服前的美洲人口:一个方法问题》(C.Verlinden," La population de l'Amérique pré-colombienne. Une question de méthode",载于《纪念费尔南·布罗代尔论文集》,第 2 卷,普里瓦出版社,图卢兹,1973 年,第 45,453—462 页。这篇只是偶尔讨论到墨西哥问题文章,没有提到博拉赫的著作,甚至连博拉赫的名字也没有提到,尽管皮埃尔·肖努试图从研究美国的历史学家的眼光出发,尽可能地做出忠实的解释,但读者仍然难以理解魏林登造成的疏忽。

[131] W·博拉赫:《美洲模式:欧洲扩张对非欧洲世界所造成的人口影响》,1964 年,第 387 页。

第三章　扎绳:魔法阉割[1]

84

弗洛伊德与历史学的关系是十分复杂的，至于他与历史学家的关系，问题就更多了。首先，他使一大批历史学家感到了震惊：一位历史学家本身如果没有心理分析的能力，他还能把心理分析作为一种研究手段应用于档案分析吗？学者们对这个问题里面所包含的伦理，从细节来说，是见仁见智，看法各异的。在这一点上，我得谨慎小心，千万不要把我的看法强加在他们身上。我的看法不仅是一个外行的看法，而且可能对这个问题造成亵渎。我们当然可以把这个并非无关紧要的问题先放在一边，但还是有必要对心理分析学的可能应用于历史学的有效范围做一个界定。埃里克・埃里克森在那部关于路德的著名著作中涉及到了历史上的一位杰出人物：他自身的伟大天赋使他的事业得以成为一项理性的事业。秉持相同的精神，阿兰・贝桑松选择了俄罗斯的悠久文化传统作为考察对象；而在另一本书中，他应用心理分析学去研究的对象不是历史本身，而是历史学家：这位历史学家就是米什莱。米什莱选择了巫术这样一个具有启迪意义的研究课题。他的研究成果同样也是令人鼓舞的。

我不是一个心理分析学家，更没有对自己做过心理分析，因此，我决定在表述下面的那些集体反常状态的文化例证时，

每一步都必须非常地小心谨慎。这篇文章把使用扎绳进行魔法阉割的各种证据集中到一起。魔法阉割是一种在16—17世纪的法国特别流行的现象。人们对扎绳所抱有的恐惧就相当于对旧制度下的人们产生影响的那些大惶恐。这些人当中包括农村社会的最下层的阶级。这是一种不由自主的恐惧，似乎与牲畜阉割的焦虑情结有关，无论是将它施于他人，还是作为被阉割者所经历的焦虑情结。本文的目的是通过直截了当的和旁征博引的方式陈述与这种恐惧有关的档案，这些档案可以追溯到扎绳阉割法最为盛行的时代，让这些档案的文本自己说话。我深知自己没有能力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但不应当因此而阻止别人超越我的这篇文章。

85 那么，让我们从一些字典中的定义开始，其中有些定义是非常明了的。根据《新编小拉布鲁斯图解辞典》所载，扎绳(aiguillette)就是一根两端带金属头的带子，就像鞋带一样。它也可以指一条功勋带，一种军服上的饰品，也可以指一根细条肉(大多是指鸭肉条，据另一本参考书的说法，是指一种很细的牛排)。

这个词还有其他的含义，可以在以上的辞典中找到，不过已经过时了，它与“带子”(ligature)这个词相近：扎绳是指用来固定袜子或马甲的绳子或编织带；在外科手术中，它又是指一根缝合线，是一种粗细各异的缝合材料，用来扎住肿瘤或血管，以阻止血管中的血液流动。

利特尔还引述了一些有关扎绳的稀奇古怪的说法：例如“像自由思想家之流的不可知论者拒不相信扎绳”(J·B·蒂埃尔：《论与基督教圣礼有关的迷信》，第4卷，第500页起)；

"将那些破坏成性的人和那些系扎绳的人革除教籍"(伏尔泰语);"如果不将这种扎绳或撒旦的魔棒斩断,男子就有可能丧失生殖能力吗?"(皮埃尔·德·朗克尔语)

在波苏埃的一篇文章中可以发现他在完全不同的背景下竟然对朗克尔(他曾拷问过的巴斯克的巫师)提出的问题作了令人奇怪的回应。利特尔也加以了引述。波苏埃写道,带子暂时终止了在神秘中产生的魔力。

最后,利特尔还提到了扎绳和带子这两个可怕的字眼所包含的但现在已过时的含义:他说道,它们被用来指"意在突然终止诸如圆房等某种身体功能的恶咒。"最后这种解释是把扎绳说成导致男人阳痿的神秘工具。

有两部重要著作为我们提供了有关这个主题的详细资料:第一部是修道院长米涅编写的《新神学百科全书》,50卷本,出版于19世纪中叶;[2]第二部是一本十分博学而且至今仍有使用价值的书,即J·B·蒂埃尔于17世纪编写的《论与基督教圣礼有关的迷信》。这位蒂埃尔曾在维布拉耶担任牧师。[3]

米涅和蒂埃尔都说,在形形色色的各种带子中,扎绳是非常特殊的一种(与性功能有关)。神秘仪式和罪恶的咒语能够通过它来限制"男人或女人身体上的某种能力"。 86

很多资料一般都把这种扎绳的来源归于恶魔。如果我们相信17世纪的神学家所说的话,一个男人如果被巫婆的扎绳弄阳痿了,就像一个人变成了哑巴,一匹马套上了马缰绳,犹如有故障的弓弩上的一支被施了魔法的箭。

> 费弗雷牧师在讨论虐行的一篇论文中写道,日常经验告诉我们,使用魔法很容易让一个男人在房事中阳痿,

> 这就像把舌头绑住让他说不出话来那么容易，借助于恶魔也很容易让欢快跑动的马突然停下来，固定和卡住磨坊中正在转动的轮子，给猎人的弩机施展魔法，抓住和放开一阵风，以及类似于其他巫师所能做的事情。[4]

米涅从古典文献或“圣经”中援引了各种文献：据说，闪、柏拉图、维吉尔、奥维德和其他许多人都曾经这样做过，或至少是提到过使用魔法使人阳痿的仪式以及把私处绑起来的行为；维吉尔在第八首田园诗中写道“哦！牧羊女，请用三个结把这些布条紧紧地绑在一起，并且说：维纳斯的镣铐，我将你缚住……”，叙述了施展要使一个人对性爱感到迟钝，却使另一个人达到疯狂的地步的做法。（但当我打算从技术上加以证明时，却可以肯定而准确地说，这样的魔带在中世纪之前从未出现过。在中世纪它列在“大阿尔伯特”的一系列秘密中。）

尽管这种使人阳痿的仪式在近代的欧洲处处可见，但是，甚至在遥远的东方也有这样的仪式。1708年出版的《初次北上》这本书的作者向我们讲述了他在俄国亲眼看到的事情：“我看到一个年轻人像疯子一样，从妻子的房间里冲出来，撕扯着自己的头发，叫喊着他中邪了。‘白’魔大师念出了符咒，解开了扎绳”（见米涅的词条“扎绳”，1846年）。

然而，这种导致性无能的巫术所带来的令人恐惧的灾祸，既不是在古典时代，也不是在彼得大帝时期的俄国。根据研究魔鬼的学者的看法以及专门玩弄迷信的巫师的说法，这种灾祸于16—17世纪出现在法国，在欧洲则出现在文艺复兴时代的后期以及巴洛克时代和反宗教改革时期。

87

> 皮埃尔·德·朗克尔在1622年写道，系扎绳成了一种非常普遍的做法，以至于谁也不敢公开结婚。人们发

现自己在不知不觉之中就被什么人用各种各样的方式系上了扎绳。即便是技术最娴熟的人也不知道它究竟是怎样系上去的。有的时候，这种符咒附在丈夫身上，有时则附在妻子身上，还有的时候则附在丈夫和妻子两个人的身上。它的魔力可能持续一天、一个月或一年。尽管夫妻中的一方深爱着对方，却得不到对方爱的回报。夫妻双方互相撕咬抓挠。也许是魔鬼将邪恶放在了两人之间[5]

皮埃尔·德·朗克尔深深地受到性的困扰，无情地烧死了许多巫婆，但作为一名见证者，他的说法却是十分可疑的。然而，在16世纪末，不止他一个人试图证明人们普遍相信扎绳、“带子”或捆绑的魔力。蒙田就是一位值得我们信赖的观察者，他曾经谈到“在婚姻中滥用‘扎绳’的做法是那么普遍，以致成了人们谈话中的唯一话题”。[6]这位大散文家不同意超自然的力量或魔力是造成阳痿流行的根源。在他那个时代广泛流行的蒙昧主义者当中，他算是独具慧眼，将扎绳简单地定义为“对忧虑和恐惧的印象”。但人们只需看一看他的散文(而标题却是《论想象力》)就会明白他的同时代人是相信扎绳的，常常认为他们在婚床上实际上成了扎绳的牺牲品。诺埃尔·迪·费耶是16世纪的一位勤奋的说书人，也同意蒙田的说法：他写道，在弗朗索瓦一世时代，有关扎绳的故事并不像今天这样流行。[7]人们也不像今天这样对扎绳怀有恐惧、对碰巧喊出自己名字的人都怀有敌意，因为当时的人们不担心驱魔者和巫师在婚床上会给自己带来不幸和不育。然而，塞莱斯丁僧团的修道院长和《撒旦仇恨录两卷》(1590年)[8]一书的作者弗朗哥·克莱斯贝却为我们提供了更有价值的记载。

在他看来，从1550—1560年以后，系扎绳的做法就非常流行了。作为一种解释，这位虔诚的神父自然把这归罪于胡格诺派的异教徒和渎圣的无神论者："我们的先辈从未经历过我们所看到的近三四十年来对神圣的婚姻所施加的那么多符咒和魔法，因为异端邪说的蔓延，在我们当中开始出现了无神论。"[9]

正是在(16世纪的)诺埃尔·迪·费耶和蒙田与(17世纪后期的)弗莱西耶之间的那段时期里，[10]扎绳从由一种乡下巫师手中产生的农村旧礼仪演变为一种众所周知的文化现象。文学作品反复地记载了这种现象，在故事中没完没了地加以叙述，在法律中也常常提到它：那是扎绳盛行的时代，让·博丹、皮埃尔·德·朗克尔和其他熟悉魔法伎俩的专家，具有作家的能力，还能烧死巫婆，他们都是令人敬畏的见证人。

在让·博丹以及他同时代的其他鬼神学家看来，魔鬼总的来说无力对男人的器官和感觉施加力量。[11]撒旦既不能剥夺男人的欲望，也不能使他们丧失运用手脚的能力。[12]

然而，只有一个例外，只有一种功能，那就是性能力，会受到魔力的制约。"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除生殖器官之外，无论是恶魔还是巫师……都无力通过法术剥夺一个男子身体任何部位的功能：她们(女巫)在德国就是这样做的，结果导致了生殖器被藏起来或从下腹移走。"[13]这里提到了德国，说明博丹是从那里获得生殖器官极易受魔鬼阴谋攻击这一观念。这个观念源于雅克·施普伦格1488年出版的《巫术》一书。施普伦格是一名来自科隆的修士，四处搜集巫术。正是施普伦格第一个确定了被魔鬼选作首要目标的身体部位；他用蛇来论证选择这个部位的合理性："由于得到了上帝的许可，魔鬼

对生殖器官拥有巨大的法力，因为地上爬行的蛇代表着肉欲之蛇。……从比喻的意义上，蛇象征肉欲，它从腹部爬过。"[14]蛇其实就是根据两性中的一种性器官的形象被创造出来的。

博丹正是在都兰、朗格多克，特别是在普瓦图，通过接触当地的巫术，才形成了他对扎绳的看法。1567年，当一次特别巡回审判在普瓦蒂埃举行的时候，后来写了《魔法》一书的作者当时正担任副王室检查官。一名以贤惠而著名的年轻妇女在他和他的朋友雅克·德·博韦面前表演了50种不同系皮花边的方法。公众带着惊恐和战栗把这种质地的花边称作扎绳。[15]巫婆可以用其中的一种方法只将妻子绑缚住，而让丈夫能够充分支配自己的性功能；另一种系扎绳的方法则是缚住丈夫，而让妻子完全保持性欲（在第二种情况下，丈夫出现阳痿，被认为是一种更常见的现象）。人们很容易就能猜出那是一场因这样的巫术仪式而带来的通奸诉讼。

89

其他的各种方法不仅可以判断出婚侣中的哪一方受到影响，而且可以确定符咒的效力持续的时间有多长。魔师的做法可以将夫妇"绑缚"一生、一年，甚或一天；博丹援引了图卢兹一对受到这种绑缚的夫妇的例子："尽管如此，三年以后，他们恢复了正常，生了很多孩子"。

阳痿表现为哪种具体的方式，则取决于在各种档次的系结中选择了哪一种：最精致的绑缚方式是将一对夫妻系在一起，使他们继续"深情地彼此相爱"；但是，每当他们刚要"走到一起，却极其粗暴地相互撕打着对方"。

最后，在某一种扎绳的影响下，肉体的性爱仍然可能进行，但却不会生育，从不会引起怀孕："夫妻通过（绑缚）可以防止怀孕，却不影响性交。"[16]这真是一种会受到某些现代人非

常欢迎的神奇的避孕方式！但对博丹和德·朗克尔这样的"古代人"来说，生育仍然是首要的目标，这种用符咒绑缚节育的方式，在他们看来，应当受到彻底的诅咒。

这种皮花边，即称作扎绳的东西，当然是不育的最高形式的代名词；只要它一直绑在一对已婚夫妇身上，打成结，沿着它的长度就会出现像肉瘤一样的肿块。这样的肿块像丘疹一样沿着扎绳突起，每一个肿块代表着如果没有这种黑色魔力的束缚那对夫妇就会生下的一个孩子。

这样一来，未能出生的孩子便成了扎绳的主要牺牲品，以至于连博丹也认为，这种符咒的使用犯有与流产甚至与谋杀孩子的生命一样严重的罪行："他(扎绳的施法者)是一个不容否认的谋杀犯：因为一个阻止孩子出生的人，与一个割断孩子喉咙的人一样，也犯下了谋杀罪。"[17]

就像孩子成为牺牲者一样，孩子也成了魔法的施行者：那些"不知巫术为何物"的孩子同样能知道魔带有可怕的秘密，因此，就在大人的婚礼上通过施魔法来采取报复行动。例如，我们读到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小孩给父母的一名刚结婚的女仆系上了扎绳，那名女仆只得跪下来求这个小混蛋解开它的魔力。[18]布卢瓦的副军事长官里奥尔对博丹说："一名妇女在教堂里看到一个小男孩在帽子的遮掩下，正在给一对结婚的人系扎绳。"那个小男孩被当场抓住，却成功地逃跑了。[19]

90

当然，作为一种黑色巫术的手段，扎绳也可以用魔法来解除。施魔者和驱魔者可能就是同一个人。普瓦图的尼奥尔在16世纪很流行系扎绳。1560年，一名年轻的妻子因丈夫被"系上了"扎绳，指责邻居使用了神秘的符咒。尼奥尔的行政长官不由分说地作出判决，将这个邻居"关进了黑地牢"，并且威胁

说，如果她不替那对夫妇"解开"魔法，就判她终生监禁。女巫吓得灵魂出窍，不得不照办。她要那个男人和妻子躺在一起。法官得知符咒已被解除，马上把那名被监禁的女巫释放了。这纯粹是一个杜撰的故事，以对女巫免除火刑而宣告结束。其中的道德说教显而易见："被系上扎绳"的人也能够被"解开"。天主教会很清楚这种事情，不得不两线作战：既要反对系扎绳的巫师，又要反对解开扎绳的巫师——好巫术和坏巫术一样应该受到谴责。[20]

博丹是一个鬼神学家，又以烧死巫师为业，完全可以理解，读者对他的话会表示怀疑，但一些没有偏见的目击者所写的东西却证实了他的说法。

1596年，瑞士医生托马斯·普拉特居住在朗格多克。我在许多场合下对他观察的准确性和敏锐性进行过验证。那年的3月23日，普拉特参加了一个名叫鲁维埃的商人的婚礼。他是蒙彼利埃的当地人。[21]他自始至终经历了婚礼的过程，甚至当新娘进入洞房时他也在场。"一个年轻人趁她经过时偷走了她的吊袜带。她穿着晚礼服坐在床上，所有的客人，不论男女老幼，都走上前来亲吻她，以表示祝贺和良好的祝愿。"

然而，一个黑暗的阴影笼罩着这一温馨的场景：就在这个晚上的欢庆活动之前，秘密地举行了白天的宗教仪式。"商人鲁维埃在蒙彼利埃以外的一座乡村教堂秘密结婚，没有证婚人。这是朗格多克的一种风俗，为的是防止被人系上扎绳。"

91

难道仅仅只有蒙彼利埃流行这样的风俗吗？并非如此。两年后，也就是1598年7月16日，托马斯·普拉特又参加了另一次婚礼。这次是在乌兹，[22]也出现了同样的恐慌。这位医

生感到吃惊的是，那对年轻夫妇不是在乌兹的教堂举行结婚，而是秘密地在附近的一座乡村教堂结婚，为的也是防止有人给他们系上“造成夫妻互相憎恨”的扎绳。

普拉特还详细描述了这种魔鬼般的仪式：巫师（巫婆）选在牧师说“上帝把你们连在一起，没有人能将你们分开”的时候施法，这个撒旦的仆人悄悄地接着念道“让魔鬼显灵吧”，同时，他从肩上抛出一枚“帕塔尔”（一种小硬币）。如果这枚硬币谁也找不回来——找回硬币意味着恢复新郎的生殖能力——那一切就都完蛋了；这个新婚的丈夫肯定会阳痿，至少在他的这场婚姻中会如此。然而，他对其他女人的性功能丝毫不受影响。人们不难想象，这不就是导致通奸吗！

普拉特严肃地补充道，人们一点也不怀疑是“魔鬼自己带走了这枚小硬币，并且将它保留到末日审判的那一天，以确保对罪行的诅咒”。

按照这个瑞士医生的说法，对这种“犯罪行为”的惩罚就是将施魔法的人绑在火刑柱上烧死。然而，这种仪式在朗格多克十分常见，诉讼人就是用这种方法来亲手报复他要报复的对手。普拉特或许有点夸张地指出：“因此，在一百场婚事中，在教堂公开举行的婚礼不足十场。”新婚夫妇在邻近的某个村庄秘密接受人们的祝福，然后再回到自己的城镇举行婚宴。

普拉特得出的结论是，扎绳是造成朗格多克的婚礼如此之少的原因之一。还有一个后果倒是始料所不及的：“就是那个国家人口为什么比我们少，而每个人拥有的土地为什么却比我们多的原因。”

普拉特的现场目击是相当可信的，因为他所描述的仪式

（扎绳和硬币）在当时有关扎绳的其他作品中都没有被人提到。普拉特一定是从朗格多克某个当地告密者的报告中摘录下来的。他的关于在婚姻中普遍存在施行魔法的证词也证实了博丹和德·朗克尔的说法："在所有肮脏的恶行中，没有比系扎绳更普遍流行的了，……人人都知道，法国非常流行这种邪恶的魔法，以致这种做法有时仅仅是为了取乐。"[23] 92

因此，在博丹、普拉特和德·朗克尔的描述中，系扎绳这种原始的做法究竟真正意味着什么呢？它是造成阳痿的一种技术，这一点毫无疑问。然而，更准确地说，它又是一种以人为的和心理的方式造成阳痿的技术，而不是自然的或先天的阳痿。皮埃尔·德·朗克尔把这两类阳痿明确地区分开来。一类是自然的性感缺失，"它就像晶体一样，是遇冷而凝结的水，使得生殖器官永远无法温暖起来"。[24]另一类是魔法的性感缺失，即扎绳作用的结果，这种现象当时在法国是那么流行，以致有脸面的人都不敢在白天结婚，只好在夜晚成婚，祈求躲避恶魔和他的信徒。[25]

在这一点上，德·朗克尔作了一个重要的区分。他说，扎绳不仅仅是一种使人阳痿的符咒。其实还确确实实是一种阉割方法。他说，"任何在场的人都不会怀疑，魔鬼不可能把阉割的技巧教给他的信徒，包括消蚀、切断、脱水和造成性感缺失的技巧"[26]。阉割的方法有许多种，他在《完全信服魔法而无宗教信仰及对宗教的怀疑》一书中列举了其中的十种。[27]其中最极端的形式实际上是完全切除生殖器官：他举了自己的同胞，一名波尔多绅士的例子，说这个人在恶魔的驱使下，"彻底地把自己阉割了"。[28]

不过，即使在德·朗克尔看来，自我阉割的这种极端形式

也只是特例。让我感兴趣的倒是普通的形式，即当时的那种系扎绳的仪式。在婚礼上系上一条带子完全是一种象征性的动作，怎么可能被所有与此有关的人都看成是进行阉割的魔法仪式呢？

7个世纪前，阿尔贝图斯·马努斯在《论灵魂》的第22册上第一个回答了这个问题。[29]据我所知，阿尔贝特是研究魔法的权威作者，首先提供了有关系扎绳仪式的描述：不管是以男人的还是女人的名义用绳索缚上了狼，此时也不能解开那个绳扣。这部著作的一个流行译本《小阿尔伯特秘闻录》告诉我们："从刚杀死的狼身上取出阴茎，然后走进你想施法的人家中，直呼他的姓名，一旦他答应了，就用一条白线系住那个狼的阴茎，那个可怜的人马上就会阳痿。"[30]

93

这些文本都清楚地说明了扎绳结的目的。它绝非一种武断动作，也不是毫无意义的仪式。扎绳是一个结，专门用于让性器官失去功能。那个狼的例子实际上就是象征着人。

这种切割法完全是模仿兽医的标准做法。

一种至少可以追溯到1590年，或者有可能更早一些时候的非常古老的做法，是用皮带（*fouettage*）阉割公羊，用扭拧法（*bistournage*）来阉割公牛和公马。在上述两种情况下，或在其中的任何一种情形下，人们用一条麻绳，或毛线，或皮带，紧紧地将动物的睾丸和阴囊系在一起，或仅扎住阴囊。在整个朗格多克地区，扎绳的做法都非常流行，扭拧法从何时开始，已无法追及。可以肯定的是在16世纪魔法和兽医的这两种方法在同时使用。大约在1559—1560年，普拉特记载下了前一种方法，而奥利维尔·德·塞尔则记载了后一种方法。当农场主打算阉割他的公牛或坎马格小公马时，首先是将睾丸扭拧

到阴囊上部（引自奥利维尔·德·塞尔朴实的表述："他将它们向上挤压到腹部"）。[31]然后，他将绑在阴囊上的麻绳或毛线缠绕三四圈，正好在睾丸的上方，使劲拽紧，再打上一个双结，这样可以阻止睾丸中的精液流出。

因此，扭拧法（其法语的字面意思是"扭两次"）包含前后相继的两个动作：先是把性器官向上推，然后是实际的结扎。在朗格多克的系扎绳仪式中也采用了相似的方式，施魔法者开始是将硬币向上抛过肩膀（硬币象征睾丸或者阴囊里的东西，法语中的 bourse 一词兼有钱包和阴囊两个含义），[32]然后，他再打上结，有时是一个双结。

你也许会说，兽医给动物进行阉割和对人进行阉割完全是两码事。事实上，并非完全如此。两者之间在操作方法上有很密切的关系。用扎绳对人进行阉割的做法很早就出现了：古希腊有一位英雄就在自己身上做过这种试验。在 12 世纪的图卢兹，城里人就是用这种方法来惩罚犯有通奸罪的市民。[33] 94
在欧洲之外的文化中，如在美洲和非洲，这种原始的理论和做法很容易就从动物移到了人的身上：希姆斯记录下了荷皮印第安人的首领塔拉西瓦的个人回忆。这本回忆录向我们讲述了他孩提时代的一件事。当时正在阉割一匹马，部落中的一个成年人以开玩笑的方式威胁他，说也要这样将他阉割了。塔拉西瓦非常害怕，等到他长大后，就把这个曾经迫害过他的人用绳索五花大绑起来，亲手为自己报了仇。更近一点，在中非部落中，如果巫医想让一个妇女防止怀孕，就取出鸡的输卵管，打上一个结，再将它煮熟吃掉。在东南非原德国的殖民地，居住着一种尧族人（the Yaos）。他们用树皮制成绳索，用它来擦鸡蛋，然后打上几个结。他们使用这种方法是为了诅咒妇

女，让她不能生育。在里夫斯族和尧族的这两个事例中，[34]我们看到了系扎绳仪式的所有特点。因此，阉割结的观念要么就是欧洲和非洲人的各个民族，从维吉尔的牧羊人到尧族的共同民间遗产的一部分；要么，阉割用的魔结也可以假设是在地中海以南和以北的两个大陆上的各自文化中独立创造出来的。这也不失为一种合理的假设。

用魔力的补救方法来解除扎绳的效力，有各种方法，但其基本特征是具有明显的象征性。这里有三种解除的方法，都有某些共同的特点：[35]如果一名"被缚"的丈夫想得到治疗，就应敲开满满的一桶白酒，让首先喷射出来的一股酒穿过妻子的结婚戒指。另一种方法很简单，他只要"让自己的小便穿过戒指"。第三种解除方法是对着他结婚时所在的教堂的锁孔小便。这三种"解除方法"都有一个显而易见的共同因素。他们断定，这样做的"仪式"从魔法上讲等同于夫妻渴望的性交，就男性和女性而言，这个对等之处就是让一方的射流穿过另一方的戒指。

这种魔法的象征疗法古已有之：按照蒂埃尔的说法，它肯定是由蒙彼利埃的一名中世纪的医生阿诺·德·维尔纳夫首先提出来的。[36]

95 事实上，还有另一些象征性的做法："在许多地方，未婚的丈夫将一枚做了记号的硬币放在鞋子里以防止别人用他的名字给他系上扎绳。"[37]蒂埃尔描述了这种做法，但没有作解释。蒂埃尔没有读过普拉特的著作，但他的著作却提供了一个答案：硬币等于魔法活动中的睾丸。[38]将做了记号的硬币放进鞋子里，就是丈夫以自己的方式将具有生殖力那个最宝

贵的部分安全地藏了起来，并做上了标记，让施魔者无法接触到。更准确地说，这种藏硬币的仪式正是基于此才形成的。从此以后、年轻夫妇必须经常不明就里地举行这种仪式。

与藏硬币的仪式相对应的是藏戒指的仪式：[39]新娘不是把硬币而是把戒指放在自己的鞋子里，而且在整个仪式期间，戒指一直放在那里。只有到她该跪在圣坛前做弥撒的时候才将戒指取出。

因此，扎绳包含着一种"危险"。尽管它具有神话的特征，却让很多人感到害怕：在法国各地，恋人们几乎都要秘密结婚，以避免系扎绳的施魔者将邪恶的符咒施加在他们身上。这种习惯变得非常流行，以至于一些省的宗教会议认为它们有责任去谴责按照这种精神举行的夜间婚礼：蒂埃尔引证了法国北半部的宗教会议有关这方面的大批资料，证明宗教会议在 1583—1640 年之间对这种做法进行了直接的谴责。[40]

还有一种试图获得通融的做法是，新娘把结婚戒指套上手指之前，让它先掉在地上。但是，这种做法在 1606—1647 年间也受到了 6 个宗教会议的谴责，其中的 5 个在法国北部，一个在意大利北部。[41]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对扎绳的恐惧，无论是从地区上看还是从社会阶层上看，都得到了广泛的证实。但是，这样的恐惧究竟反映了什么样的深层心理现象呢?除了重复一些众所周知的东西外，我不知道应当如何来回答这个问题：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中，对被阉割的恐惧占有重要地位。在这个领域里，像我这样的历史学家得老老实实地承认自己的能力不够，得把这个问题交给其他人去解答。从现在开始，如果有可能的话（或者愿意的话），应当由心理分析学家来利

用和解读这些历史摆在他们面前的资料了，无论他们是不是历史学家。

参考书目：

J·博丹：《巫师的魔凭狂》(J.Bodin, *De la démononomanie des sociers*)，巴黎。(我使用的是1580年版和与之类似的1581年版)

弗朗哥·皮埃尔·克莱斯贝：《撒旦仇恨录两卷》(Fr.Pierre Crespet, *Deux livres de la haine de Satan*)，巴黎，1590年。

N·希姆斯，《避孕医疗史》(N.Himes, *Medical History of Contraception*)，纽约，1963年。

P·德·朗克尔：《完全信服魔法而无宗教信仰及对宗教的怀疑》(P.De Lancre, *L' Incrédulité et mécréance de sortilège pleinenment convaiancu*)，巴黎，1622年。

J·勒高夫：《西方中世纪文明》(J. Le Goff, *La Civilisation de l' Occident médiéval*)，巴黎，1965年。

米涅修道院院长：《新神学百科全书》(Abbé Migne, *Nouvelle Encyclopédie théologique*)，第20卷，巴黎，1846年；第20卷，M·A·德·谢斯纳尔的著作标题是《迷信、谬误、偏见……辞典》(M.A.de Chesnel, *Dictionnaire des superstitions, erreurs, préjugés*)。

托马斯·普拉特：《小兄弟杂志》(Thomas Platter, *Journal of a Younger Brother*)，塞昂·日内特译本，马勒出版社，伦敦，1963年。

J·B·蒂埃尔：《有关圣事中迷信问题的论文》(J.B.Thiers, *Traité des superstitions qui regardent les sacrements*)，共有好几个版本，巴黎，特别是1679年版、1700—1704年版、1777年版，尤其是要参阅第四册。

注　释

[1] 本文原载于1974年3月《欧洲》杂志。

[2] 注意与米涅的《新神学百科全书》(Abbé Migne, *Nouvelle Encyclopédie théologique*，第20卷，巴黎，1846年版)中的条目"带子"(ligature)进行比较；又参见A·德·谢斯内尔(A.de Chesnel) 1856年所写的条目"扎绳"(载于米涅的书中)。

[3] J·B·蒂埃尔：《有关圣事中迷信问题的论文》(J. B. Thiers, *Traité des superstitions qui regardent les sacrements*)的第一版出版于1679年，我

使用的主要是1700年版、1704年版和1777年版。

[4] J·B·蒂埃尔:《有关圣事中迷信问题的论文》,1777年版,第4卷,第505页中引用了费弗雷:《论虐待》(Févret, *Traité de l' abus*),第5册,第4章,第6段。

[5] P·德·朗克尔:《完全信服魔法而无宗教信仰及对宗教的怀疑》(P. De Lancre, *L' Incrédulité et mécréance de sortilège pleinement convaincu*),巴黎,1622年,第316页。

[6] 蒙田:《论文集》,第1册,第21章。

[7] 诺埃尔·迪·费耶:《乡村对话》(Noël du Fail, *Propos rustique*),1547年。

[8][9] 弗朗哥·皮埃尔·克莱斯贝:《撒旦仇恨录两卷》(Fr. Pierre Crespet, *Deux livres de la haine de Satan*),巴黎,1590年,第17页。

[10] 这是依据米涅的说法,参见1846年版和1866年版。

[11] J·博丹:《巫师的魔凭狂》(J. Bodin, *De la démononomanie des sociers*),巴黎,1580年,第2卷,前言,第1页。

[12] 博丹在这一点上与费弗雷的看法不同(参阅上文)。

[13] 博丹:《巫师的魔凭狂》,1580年,第59页。

[14] 引文来自克莱斯贝的《撒旦仇恨录两卷》,第276页和博丹的《巫师的魔凭狂》,第59页。

[15] 博丹:《巫师的魔凭狂》,第58—59页。

[16] P·德·朗克尔:《完全信服魔法而无宗教信仰及对宗教的怀疑》,第316页,页边注,系引自博丹:《巫师的魔凭狂》,第58页。

[17] 博丹:《巫师的魔凭狂》,第207页。

[18] 托马斯·普拉特:《小兄弟杂志》(Thomas Platter, *Journal of a Younger Brother*),塞昂·日内特(Seán Jennet)译本,马勒出版社,伦敦,1963年,参阅以下的注释。

[19] 博丹:《巫师的魔凭狂》,第57页。

[20] 克莱斯贝:《撒旦仇恨录两卷》,第276页。

[21] 托马斯·普拉特:《小兄弟杂志》,第90页。

[22] 同上书,第171页。

[23] 博丹:《巫师的魔凭狂》,第57页。

[24] [25] P·德·朗克尔:《完全信服魔法而无宗教信仰及对宗教的怀疑》,第316页。

[26] 同上书,第322页。

[27] 同上书,第 320 页。

[28] 同上书,第 323 页。

[29] 阿尔贝图斯·马努斯:《论灵魂》(Albertus Magnus, *De Animalibus*),第 22 册,第 2 部分,第 1 章,芒斯特版,1920 年,第 1411 页。

[30] 米涅:《新神学百科全书》,1846 年版,条目"带子"中引用了该书的第 1 章,第 1007 列

[31] 所有这些资料引自热罗(Géraud)、费斯塔尔(Festal)和德罗尔姆(Delorme)的研究著作。主要引自《19 世纪通用大词典》(*Grand Dictionnaire Universel du XIXe siècle*,拉卢斯出版社,巴黎)中的长篇条目"强扭阉割法"。此外还引自该书中的条目"阉割"、"阉割法"等;又参见奥利维埃·德·塞尔:《农业戏剧》(Oliver de Serres, *Théâtre d'agriculture*),1600 年,第 4 卷,第 9 页。

[32] bourse 一词在 16 世纪含有性的意义已经得到完全证实,特别是在蒙田的著作中。[比较利特尔所引用的"睾丸袋、生殖袋"(*la Bourse des testicules, la Bourse des génitoire, etc.*)等语]

[33] J·勒高夫:《西方中世纪文明》(J. Le Goff, *La Civilisation de l'Occident médiéval*),第 158 页。

[34] N·希姆斯:《避孕医疗史》(N. Himes, *Medical History of Contraception*),1963 年,第 6 页、第 9 页。

[35] 蒂埃尔:《有关圣事中迷信问题的论文》第 4 卷,第 588 页;另外还有 P·德·朗克尔:《完全信服魔法而无宗教信仰及对宗教的怀疑》。

[36] 蒂埃尔:《有关圣事中迷信问题的论文》,第 4 卷,第 588 页。

[37] 同上书,第 4 卷,第 504 页。

[38] 上文所引用的普拉特的《小兄弟杂志》。

[39] 蒂埃尔:《有关圣事中迷信问题的论文》,第 4 卷,第 585 页。

[40] 蒂埃尔:《有关圣事中迷信问题的论文》,第 4 卷,第 509 页。

[41] 在蒂埃尔的同一卷,第 515 页。其中还记载了从 16 世纪到 17 世纪的大量法令。它们都与婚姻中的迷信有关。蒂埃尔所提出的年代略早于 M·考米特(M. Caumette)提出的年代。后者被 J·L·弗兰德兰的重要文章"晚婚与性生活"(J. L. Flandrin, "Late marriage and sexual life",载于《年鉴》,1972 年,第 1368 页)所引用。

第四章　16世纪的法国农民[1]

本文考察的是16世纪法国农民的历史：他们的经济史和社会史，可能的话，还要讨论他们的心态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对我并不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尽管至少对我的某些读者来说，它的真正重要性在于它的某些方面很有可能是一个崭新的主题，或者是一个可以更新的主题。过去几年里，在这个领域中涌现了一些有价值的新研究成果（例如J·雅卡尔的现已出版的论著）。从这些新的发现着手，来重新考察这个问题，也许是很有趣的。

我打算冒昧地从人口问题开始谈起，当然，这里指的是农村人口。16世纪的人口增长，在法国，指的是1450—1560年这段时间的人口增长（就西班牙而言，这个时间段不尽相同，人口增长的起始点较早），也就是从百年战争的结束到宗教战争的开始，这是一个完全肯定了的事实。但是，在过去如果不能说未曾做过，但仅仅是浅尝辄止的农村人口研究的领域中，最近却发现了一些数据，从而使我们现在得以就这个问题的某些方面进行更详细的讨论。

例如，我们可以举出诸如法兰西大区和巴黎周围广阔的平原地区之类的地区。很早以前，根据伊冯纳·贝扎尔那本已过时的有关这个问题的著作，我们就已经知道，在这些地区

的村庄里，农村人口在1460—1560年间有了大幅度的增长，仅仅在一个世纪内，那里的人口就恢复或接近了黑死病以前(1300—1400年)的人口水平。[2]

但是，雅卡尔在最近发表的内容广泛的论著中所证明的是，[3]1550—1560年前后，巴黎周围的农村人口的总数高于后来17世纪同一地区范围内的任何人口数字。换言之，到16世纪中叶，由于人口增长而增加的人口总数比这同一地区内在17世纪达到的总数高出20%—30%，或者还要多。

98 这里再举一个其他地方的例子：在巴黎郊区的巴涅、阿库尔和其他许多教区，1542—1550年前后在同一些村庄里受洗礼的人数，较之17世纪任何一个十年的相应数据，都要高出50%。

因此，我们可以推断，法国16世纪中叶已处于人口过多的状态。与此相反，在17世纪，至少是在巴黎附近却同时地出现了(人口减少的)危机形势。但与此相反的是，一种从农村地区向大城市迁移的理性行为却在增加，出现了抵消法兰西大区居民过剩的趋势。这一过程最终带来了城市人口与农村人口的更加合理和更为现代的平衡。但这一特征只适用于17世纪。16世纪尚未达到这一点。

至于其他地区，根据布瓦、克鲁瓦斯、勒布伦、古贝尔和其他一些研究者的结论来看，卢瓦尔周围地区(这里不是指上卢瓦尔)从地理上可以界定为法国的中部，这些地区在16世纪的人口增长呈现出完全相同的趋势：16世纪人口数量的最高峰出现在1560年前后，甚至在1580年，与17世纪的1640年前后相当，甚至还要略高一些。诺曼底的情况也是这样，人口数量在16世纪的70年代达到了顶峰。

南特等城市在16世纪也先行经历了巴黎的那种增长模式：南特的人口增长快于周围的农村，而且更有连续性和一贯性。1560年以后，城市居民的人数持续增加，而周围农村的居民却有一定数量的减少。这一方面是因为宗教战争的破坏，另一方面是由于农村人口的向外迁移造成的结果。当时的南特和巴黎通过吸收农村人口起着大致上相同的作用。

人们普遍认为，在16世纪50年代处于人口数量的高峰并出现了人口相对过剩的局面。这个观点也符合最近对法国南部的研究结果。在普罗旺斯和其他地区，黑死病时代之前的人口繁荣和1348年之前人口过剩的局面结束了，这是14世纪和15世纪的瘟疫和战争带来的结果。到1471年，普罗旺斯的人口下降到不及1320年人口水平的一半。到了1540年，那里的人口又部分地得到了恢复，而且这一增长得以持续下去。关于朗格多克，乔治·弗雷奇近来发表了一篇有关图卢兹地区的论文。在这篇论文中，他对他所发现的一份1536年人口普查的统计数据进行了计算。这些数据表明，上朗格多克地区（1536年）的人口，经过两代人时间的极其迅速的增长以后，超过了以后的17世纪以及18世纪早期的任何时期。

99

自然，人口的增长存在着好几种可能的模式，而且在各地区之间也存在着差异。同法国革命一样，法国的人口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法国人口最常见的趋势是快速增长。在1450—1560年间，法国人口可能翻了一番，换一个说法，就是人口恢复到了黑死病以前的水平。这还可以换一种说法，那就是到了1560年，从博韦到蒙彼利埃，从洛林到诺曼底的法国广大地区，人口数量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超过了1720年以前的任何时候。

另一方面，在法国最北部，也就是M·H·内弗斯所研究的康布雷的周围地区，还有比利时的说法语地区（埃诺、沃伦尼亚），人口增长的趋势可能稍有不同。北方各省人口增长幅度没有像法国大部分地区那样在1460—1560年间达到100%，那里的农村人口在1450—1550年间只增长了40%—50%（设定1450年人口指数为100）。

但是，这些差异仅仅表明了一种明显的矛盾。如果说法国这些最北部的地区或说法语的地区以及毗邻于它的其他地区，人口的增长和恢复的模式和南部各省相比没有那么引人注目的话，这只是因为在此前的1340—1450年间，那里的人口下降不及南部那么明显，特别是说奥依语和说奥克语的贫穷的法国地区，在百年战争期间受到了极其严重的破坏。这里有两种明显不同的状况，一方面是法国的大部分地区，另一方面是沃伦地区和法国北部省份。这两类地区在1450—1560年间所发生的事情是“生态系统”的恢复，而就是这同一个生态系统1340年以前就已经在运行着。但是，当1348—1440年间所造成的破坏并不强烈时，这种恢复当然也就不会太强烈：我刚刚定义的北部说法语的地区就明显属于这种情形。

100

如果允许的话，我现在要提供一些全面的数据：在本文考察的各个时期里，在“法国”这个六边形的地理疆界内，或者毋宁说是1700年的近六边形的地理范围内（也就是说，是在沃邦时代的法国疆域内，对人口学家来说，这是一个最佳的参照时期），“法国”人口的总体情况究竟是什么样的呢？（按家庭数量来计算），1328年的法国人口至少是1700万人（其中的85%居住在农村地区）。法国人口下降到最低点的时候，即

1440年前后，也就是百年战争即将结束的时候，还不足1000万人。至于1568—1580年，也就是大约130年到150年以后的法国人口数字，我们可以根据某些热那亚商业银行家的资料单独做出估计。[4]凭直觉来看，这些资料未必不可信：这些金融家信息灵通，完全有能力进行自己大致的和非正式的人口普查，从而能够相当准确地估算出他们得到授权去征收的间接税。我们还掌握了一位名叫弗鲁芒托的人提供的全面数据。他生活在16世纪70年代，是个有点古怪的统计学家。他做过一些事情，其中包括试图计算出满足教会成员个人需要的妓女和同性恋者的人数！他确实相当过分，竟然想确定每一个主教教区、每一个牧师、僧侣或主教所拥有的妓女和同性恋者这两类人的数目！如果因为他有这样的说法就不加考虑地谴责弗鲁芒托，那就大错特错了。他真的对人口问题感兴趣，例如对16世纪80年代末的每个主教教区和法国全国的家庭数字。然而，他（在金融秘密中）所统计的主教教区数据，有些不够广泛，又因他自身不幸的失败而被糟蹋了：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每当他用来确定某个主教教区的家庭数目时，总是喜欢5.2万户和5.8万户这两个数字！不仅如此，在合计了他自己的全部数据之后，他得出的结论是，1580年法国家庭总数为350万。恰恰就是这个总数，又被一个一眼就可以看穿的错误弄错了！我用弗鲁芒托自己的有关每个主教教区家庭数目的统计表，并用一个普通的计算器，重新合计了他的数据，立即就发现他完全是因为粗心而漏掉了100万个家庭（也就是400—500万居民）。将他的数据正确地合计，应是450万个家庭，而不是他得出的350万个家庭。 101

正因为如此，如果我们能够把每一种可能找到的资料集

合起来，尽管我这里没有时间来一一讨论这些资料[5]，那么，就可以合情合理地推断出，1550—1560年前后，在18世纪早期沃邦元帅时代的这个近六边形的疆域内，人口最少有1700万人，因此，至少相当于1328年的最低人口估计。按照近似的方法计算，人口数字接近2000万人，也许更多：如果考虑到相当大的边际误差，2000万这个数字并不是一个荒唐的假设。

对这些总体的估计需要作两点说明。第一，这个从1450年一直持续到1560年的人口增长和恢复过程一旦结束，随后一个时期（1560—1730年）便进入了人口的零增长状态，尤其是大多数地区的农村人口，这个状态恰恰是现代人口学家希望达到却又无法实现的状态。

就这一点而言，法国的人口与英国的人口完全不同：后者的人口在中世纪与17世纪之间的这段时期里趋向于某种程度的增长，而前者的人口，即法国的人口，从一个较长的时期来看，例如从1300年到1720年，虽然有相当大的上下波动，但保持着一种接近于稳定的状态。第二，以上的特征尤其符合农村地区的人口状况。城市人口总的说来在14—17世纪（因此也包含了整个16世纪）多少有了增加。但“纯”农民的人口总数基本上保持不变：即从14世纪初期的最低估算的数字1500万人增加到17世纪的同样是最低估计数字的1700万人。经历了14世纪和15世纪大“槽形”的下降和16世纪的稳定上升以后，人口趋向稳定。这种趋向稳定的转变引起了人口史学家极大的兴趣；例如，雅克·迪帕基埃用计算机对

102 1560—1730年这个人口稳定的阶段进行了模拟研究。他从某些固定的人口数据着手，考虑到瘟疫和天花对人口的影响，以结婚年龄和生育间隔为基础进行计算，以弄清所发生的实际

情况，试图确定究竟是哪些因素，比如说究竟是出生率还是死亡率，是人口的向内迁移还是向外迁移，才导致了这种稳定状态的出现。[6]

不过，我还是想回过头来适当地讨论一下16世纪的状况，并对制约1450年至1560年的农村人口增长的结构作一番简要的分析。确实，我们对16世纪的以村庄为单位的家庭重建研究远不及对17世纪所进行的那么多。尽管如此，依然有可能自然地得出某些结论；它会顺理成章地提出可能性的范围究竟有多大，或者提出某些合理的假设，所有这一切本来未必会在同一时间内发生。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看死亡率的数字。1480—1540年间的死亡率似乎低于17世纪。到1520年前后，即人口压力触发了严重的食物短缺之前，食物供应一直都很充足；所幸的是，在16世纪的第三个十年，也就是食物供应的形势越来越严峻的时候，瘟疫的影响也正在日渐消退，或者至少可以说瘟疫的浪潮所发生的频率越来越低，不再是每两年，而是每十年才发生一次，如果我们同意比拉邦的著作中所提供的证据，这是因为某些行政管理措施导致的结果。在城镇内部和城镇之间执行的这些行政管理措施，清除了垃圾，并实行隔离性的预防，从而第一次有了可能防止或至少是减少瘟疫的扩散。与此相反，在16世纪20年代以前，法国的某些地区几乎每年都要爆发瘟疫，从不间断。

16世纪人口的第二个结构性特征是结婚年龄的变化。按照肖努的说法，控制结婚年龄是欧洲自古以来最有效的避孕武器。居伊·布瓦在一本有关诺曼底的书中告诉我们，1550年前后，诺曼底的女子21岁就结婚，而到了17世纪，她们的

结婚年龄是 26 岁或 27 岁。早婚是导致 16 世纪高出生率的原因，这有助于解释这一时期的人口增长。

103 布瓦在讨论这一问题的时候，提出了以下这样一种模式：在中世纪，夫妻很年轻的时候就结婚，因为当时人的预期寿命虽然很短，但依然有必要抓紧时间来生育和抚养一个或更多的子女，以便继承父母的家业。1450 年之后，人们的死亡时间推后了，死亡时的年龄更大了，而早婚的习惯却延续了大致一百年之久，人口数量因此得以增加。

至于生育间隔的问题，16 世纪 50 年代和 17 世纪后期的情况看上去似乎没有什么差别，至少在康布雷地区：每隔 25 个月生一个孩子，换句话说，就是每两年生一个孩子。[7]因此，就我们现有的知识水平来看，从 16 世纪的人口增长转变为 17 世纪的人口稳定，这个事实最好还是用死亡率的变化或结婚年龄的提高，而不宜用生育间隔模式的变化来解释。尽管我们对于生育间隔的知识知之甚少，但它似乎没有太大的变化，因此无法解释人口的变化。

由于 A·克鲁瓦和其他几位研究者近来发表了他们的论著，这使我们得以了解到可以解释 16 世纪导致人口增长的其他一些因素。[8]首先，以奥古斯丁的学说为基础的性节制模式的某些方面似乎在 16 世纪已经开始发挥作用了（天主教会后来在 17 世纪将它强加给了信徒，而事实证明它确实是限制人口增长的一种有效手段）。这一点证实了雷纳尔的以纯神学的证据为基础而获得的发现。例如，在虔诚的布列塔尼省，那里的天主教扎根于异教和基督教相混合的民间文化中，性节制早在 1526—1600 年的伦特时期就成为一种流行的规则，远远早于特伦托城以及其他地区在反宗教改革时期才采用的那

些规则，计量史学因此告诉我们，不要夸大"非基督教"因素在反宗教改革时期之前对人口规模的影响。

然而，事实证明，这种性节制模式在17世纪才有效地发挥作用，在16世纪也许还没有开始发挥作用。例如，在1550年前后，私生子的比例可能相当高，尤其是在贵族当中（根据对奥弗涅的丰唐热家族和诺曼底的古贝维尔家族的研究，3个男性贵族可能有多达24个私生子）。相反，由于严厉而重新恢复活力的天主教会在17世纪所维护的纪律，私生子的比例大为降低。 104

那么，面对日益增长或恢复的人口，农村地区的生产、税收和消费的趋势如何呢？（将生产、税收和消费这些完全不同和难以分类的概念放在一起，显得多少有点轻率，但在讨论农民经济时，把它们放在一起考虑是合理的，因为当时的大部分农产品立即就被从事粮食生产的生产者自己消费掉了，即所谓的"自动消费"，而另一部分农产品在当地被农村的城镇和村庄里的居民、不从事粮食生产的农业工人所消费，这些人是从当地的农户手中购买粮食。）

农民，或总称为乡村的居住者，按照最低的估计，占总人口的85%。他们的谷物人均消费，一般都是粗粮，与社会上层和城市资产阶级大体相当，甚至可能还要多一些，因为后者常有机会吃肉。因此，人们完全可以推断，至少有80%或接近这个比例的粮食是由农村居民自己消费掉的。正是出于这个理由，可以说产量和消费量是相当接近的。此外，就全国水平而言，丰年有粮食出口，而荒年必须进口粮食，从较长的时间来看，基本保持平衡，因此，说法国的粮食产量和消费量基本上

相当,是千真万确的。

因此,人们完全有理由把谷物的产量和消费量当作一个问题来讨论。法国高等社会研究院第六分部出版了一部大部头的集体研究成果《什一税的生产》。我将依据此书来讨论1450—1560年间的这一问题。[9]

105 让我们先来考虑粮食的生产力问题。在《年度陈情表》一书中,莫里诺对施里克·范·巴斯的著作(它依然是这一领域的一本重要著作)作了批评性的重新评价。范·巴斯发现,粮食的单位平均产量(以收成对种籽的比例计算)从13—14世纪到16—17世纪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巴斯的这个结论就英国和低地国家的有限范围而言,无疑是正确的,但对于像法国这样一些也许不如北方邻国那么发达的国家而言,他的数据则过于零散,不足以充分证明已经出现了这样的增长。只要仔细地加以考察,似乎就可以发现,法国粮食的单位产量从13—14世纪、直到19世纪40年代,基本上保持着稳定,没有变化。总的来看,在东北部的冲积平原乃至布列塔尼,收成对种籽的比例一直稳定在6:1或8:1之间,南部的这个比例约为4:1或5:1。法国农业在19世纪以前实际上并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尽管在18世纪出现过一定程度的增长)。从中世纪到17—18世纪,法国粮食生产力的主要特征就是稳定;也就是说,粮食生产力在这一时期"被冻结起来了"。

就粮食的产量而言,依据我们对什一税的集体研究,似乎有理由得出以下的结论:

1. 大约在15世纪30年代,即瘟疫和百年战争之后的某段时间(南部可能稍早些),粮食产量降到最低水平,出现一个可以明确界定的"底线"。无论如何,在这个说法语的"王国"

里(参阅斯托夫、富尼亚尔和富尔坎等人的著作),无论是南部还是在北部,这一点都非常清楚。唯一的例外(已经有些超出了我们讨论的范围)是说法语和说佛来芒语的最北端的地区(沃伦和弗兰德尔等地),那里几乎没有受到百年战争的影响,在15世纪30年代仍保持正常的粮食产量。

15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法国谷物的"低"产量带来了大规模的饥荒,连17世纪最严重的欠收年,也没有造成如此严重的局面。

2. 紧随在这个"产量底线"时期之后出现了粮食产量增长和恢复的时期,农民返回他们曾经放弃的家园。在大部分地区,灌木覆盖着荒地,因为森林往往还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完全占领这些荒地,从而回到11世纪的那个样子,因此,谷物产量的恢复非常迅速、效率高,成本也不会太大。从1440年到1520年,谷物产量似乎有了持续的增加,可以说粮食产量的增长率已经重新稳定下来,超过或相当于人口的增长率以及对粮食总需求的增长率。这一同步出现的增长率带来了积极的后果,在1445—1505年间,基本上消灭了大规模的饥荒或生存危机。在这60年间,粮食价格曲线十分平稳。相反,在1520年之后(一直持续到1740年),这个曲线因粮食总需求的变化而出现了巨大的波动,而粮食总需求的增长又是16世纪上半叶人口长期增长导致的结果,一直持续到接近李嘉图和马尔萨斯所确定的粮食产量的上限。 106

依据最近根据什一税和贵族地产统计而制作的图表来看,1520年以后的粮食总产量事实上仍在继续增长,但增长速度比1450—1520年这一时期要慢。16世纪20年代的饥荒标志着一个转折点:1520年以前是粮食产量快速或比较快速

增长的时期，随后，在1520年以后则是粮食产量缓慢增长的时期。最后，到(宗教战争时期的)1560年以后，粮食产量的增长几乎完全停止。

因此，在1510—1520年前后，我们开始进入了李嘉图和马尔萨斯所说的境况，也就是说，进入了人口迅速增长、而对基本食品的总需求，尤其是城市的这个需求的增长更加迅速，从而超过了农业的供给能力的时期。

这就是对我刚才提到的新一轮的生存危机所做的解释。它还可以解释16世纪的价格革命，至少可以解释其中的某些方面。关于它们之间的关系，请参阅拉姆齐的《16世纪的价格革命》[10]以及傅朗的有关工资的论文(载于《年鉴》，1971年)。这篇文章讨论了价格相对于工资而出现的不同的演变。[11]

在价格革命发生的时候，当然没有理由说由此产生了计量理论，美洲白银的涌入有可能直接或间接地造成了价格的提高并推动了通货膨胀。但是，不同类别的价格(粮食价格、非粮食类食品价格、非食品类商品价格)上升的幅度不同。如果用让·博丹或米尔顿·弗里德曼的"金融史"理论来解释，是难以令人信服的，还不如用当时经济和人口的相反趋势来加以解释。正如英格里德·哈默斯特罗姆[12]所证明的(她的论证同样适用于法国的情况)，从16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或第二个十年开始，人口的膨胀速度，特别是市镇人口的膨胀速度，快于粮食的生产及其分配和销售的手段；对小麦的需求相应地急剧上升，在比例上远远快于非粮食类食品和非食品类的商品；与粮食的需求相比，对后两类物品的需求数量不那么明确，而供给又比粮食更为充沛(参见傅朗1971年发表在《年鉴》杂志上的论文所引用的数据)。粮食的价格产生了吸引

107

力，又在不断上升，成为大规模生产粮食的农业得以发展的巨大推动力，但事实也证明这种大规模的生产粮食的农业最终还是无力保持所需要的增长率。相反，16世纪的畜牧业却趋于停滞，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下降（例如在朗格多克地区）。在整个16世纪，市场的趋势引导农场主将精力和各种投资（尽管单位产量正在下降）集中在获得利润最高的作物，即粮食生产上去。这一策略排斥了任何农业革命的可能，因为农业革命这种性质的进步，至少在西方，依赖于牲畜饲养以及把牲畜粪便用作肥料。

西欧的农业革命实际上是发生在城市对肉类和奶类产品的需求恰好与人口的增长暂时停止相巧合的国家：例如15世纪的荷兰（据冯·德尔·韦所言）和1650年以后的英国（霍斯金斯）。

法国的情况完全不同。它的过多的人口在16世纪仍在不断增长：对粮食的需求变得极为重要，牲畜的饲养无力扩大，从而阻碍了它获得农业革命的任何机会。

至于16世纪法国的粮食总产量，可以说，在1560年前后达到最高点，这应该和另外两个同一类型的长期的"最高峰"进行比较： 108

13世纪末和14世纪初，也就是说，事实上是几乎整个14世纪的前期（黑死病发生之前），谷物产量的记录达到最高点：总共有5500万公担左右的粮食来满足（应当说并非是最有效地）1700万人（还要加上他们的牲畜）对粮食的需求和对种籽的需求。

第二个"峰顶"准确地说正好开始于1550年获得最高产

量的那一年，一直持续到18世纪20年代，尽管其间的粮食产量起伏很大，有时还相当剧烈：总共有6500万公担的粮食来满足大约2000万人的需求（当然，还要加上牲畜和种籽的用粮）。

1720年之后，粮食产量开始逐渐增加，最后突破了持续了好几个世纪（从13世纪到18世纪，见上文）的表面上不可逾越的“6500万公担”的顶点。

从粮食生产力和粮食产量的角度，以及从人口增长的角度来看，我们所看到的开始于1450—1550年间，并在1550—1650年间实际上已经取得的那些变化，就是中世纪生态系统的恢复，也可以说，这个生态系统在1550—1720年间第二次占据了优势。（1720—1750年以后出现了一种新的生态系统，其基础是缓慢而稳定的经济增长，而且在某些部门是可持续的增长。这种生态系统取代了我试图概括的那种以人口或粮食生产为特征的更加早期的生态系统。）

在偶然的情况下，当我使用“生态系统”这个词的时候，并不仅仅是个比喻。正像事实所表明的，我们所看到的14—18世纪的法国，有劳动密集型的农业，很多人从事农业活动，但单位产量相当低。从土壤和生态系统利用的角度来看，这明显属于环境保护型的。唯一的例外也许是在南部的某些地区（例如咖里哥群落，即灌木丛生的地区），那里的地貌侵蚀压倒了贫瘠的土壤和脆弱的森林带。

到目前为止，我们讨论的主要是维持生存的食物，即粮食。然而，在16世纪，甚至上溯到14世纪，当然已经存在着以市场销售为目标的农业形式。我在这里考虑到的主要是葡萄种植和葡萄酒的酿制。像粮食生产一样，它们不仅在16世纪

109

得到了恢复，而且有时产量有了真正的增长，超过了中世纪的黑死病以前的最高水平。

例如，南特地区就属于这种情况（根据唐吉以及特里默－德拉福斯的研究成果）。这一地区的葡萄种植业在1550—1570年间取得了真正的突破：南特的葡萄酒出口当时上升到接近3000万升，远远超过中世纪的乃至16世纪初的较低数字。但这只是一个孤证。如果看一看以向英国出口葡萄酒而著称的波尔多地区的葡萄种植业，并以波尔多港的出口来衡量，我们就会发现，1550年前后那里出口的葡萄酒远远超过了1470年，却明显低于更早一段时间的1300—1320年，当时每年从吉伦特出口到英国和北欧的葡萄酒就达8500万升（伯纳德）。

由此可见，总的来看，尽管存在一些重要的而且有时十分短暂的例外（参阅G·卡斯特对图卢兹的染料贸易的研究著作），我们在16世纪所实现的与其说是一个真正的经济增长过程，还不如说是一个在原先的稳定系统的框架内或进程内的恢复运动，至少就农业部门而言是属于这种情况。（相反，城市的情形截然不同：在这方面人们会发现革新和急剧的变化改变了中世纪的城市化模式，而城市化正是大瘟疫爆发之前的那些年份的基本特征）

说到这里，我想重新考察一下农产品的生产和分配的问题。农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在黑死病的时代发生了中断，但在16世纪50年代终于恢复到了中世纪和现代的“正常”水平。

第一类分配是“横向地”发生在土地占有和土地租赁的制

度中。在《朗格多克的农民》一书中，我已经说明了16世纪的土地租赁是如何向两个方向发展的。

110 一方面，由于人口增长和继承中的土地再分割，导致了小地产和小家产的分割（*morcellement*）。尽管区域专员们采取了预防措施，尽可能地仅以土地持有者唯一的一名继承人的名义保持一定比例的不可分割的地产，但在15世纪末和16世纪最初二三十年内，较大的家庭随着时间的推移仍在一代比一代更多的继承人当中一再分割地产，划分以后加以分配。正是因为这个缘故，16世纪的土地变得越来越零碎。农村开始看上去像是一个拼图板，或者像逐渐变得越发瘦小的小块图案组成的马赛克。

但另一方面，在同一时期、而且经常是在同一块土地上，又出现了相反的情况：几份小地产合并成一份大地产！富裕的市民、商人、新旧贵族、作为个人或作为团体（例如牧师会）的教会人员在开阔的平原上购买土地，并把它们连成一片；通过这样的方式，他们逐渐形成了一种习惯，扩大已有的大地产；或者，他们把相互隔离的小块土地结合为“外地”的地产，置于随着地形上下起伏的村庄中的“本地”地产当中。

这样一来，农民从这两个方面都遭受了损失。一方面，他们看到自己的地产由于家庭地产的不断分割而变得越来越小；与此同时，由于来自外地的（有时也有本地的）积累了财产的人购买土地，他的土地所有权发生了离异。

第一个问题，也就是土地再分割的问题，引出了法国区域人类学的一些具体问题，让·伊维尔在他的论著《法国习俗地理学》和另外两篇做了更深入讨论的文章中对这些问题做出了出色的回答。[13]这本书逐省地，或把几个省放在一起，全面

概述了法国和边境地区的继承习惯。这里仅用几句话来说明。首先看看法国的北部或最北端(诺曼底、弗兰德尔),那里的人有着牢固的种族传统,实行平均继承财产的规则:当没有继承人,或家庭中父亲或其他某个有财产的人去世后,家庭财产平均分成若干份,每一个子女(或者任何在家系中有继承者名分的后代)继承一份。这种习惯鼓励了土地的再分割。就此而言,它既是一种古老的习惯(因为它与佛来芒人和诺曼人的种族习惯相联系)、又是现代的习惯(因为它是一种平均主义)。相反,在南部,特别是在实行罗马法的地区,家长制至高无上的权力占据优势:父亲有权将土地不加分割地交给其中的一个儿子,但不一定就是长子,目的是为了保证土地的完整。但是,对南部以及北部的大部分地区所作的进一步考察证明,在文艺复兴时期,一般遵循以下的继承原则:属于家庭或户主的财产不再分割,土地由一对生活在特定住宅中的已婚夫妇转交给下一代的一对夫妻。财产的继承权要么是父亲传给一个儿子,如果没有儿子,则由岳父传给一个女婿。其他的已婚子女均无继承权,仅在结婚时获得一处居所(或一份嫁妆,*une dot*)。换言之,基本上存在着两种继承制度:第一种是根据家庭结构来分割继承权;第二种是家庭财产基本上原封不动地由上一代的一对夫妻交给年轻一代的夫妻来继承。一种制度基本上是建立在亲缘关系上,另一种制度则更多地是建立在婚姻关系上。

111

但是,事实证明,从长时间来看,16世纪的人口压力终究过大。尽管以上述及的那种“人类学的”区分并没有完全消失,但总的运动趋势是走向把地产分割成越来越小的小块土地,尤其是在巴黎地区,甚或在南部地区。

在前面一段文章中，我以朗格多克地区为例，提到了同时发生和并存的两种趋势：农民对土地的离异和土地的再分割。有趣的是，我们发现让·雅卡尔在讨论16世纪巴黎周围地区农村的论著中也遇到了正在进行着的同样类型的两极分化：甚至比法国南部表现得还要明显。[14]

1550年前后，在巴黎南部的胡雷波瓦，农民（这里使用的“农民”一词是指“农村地区的当地居民”）持有土地的平均规模为1.3公顷（略微超过3英亩）。在理论上这比养活一个家庭所需要的土地要小得多：因此，我们的农民远远生活在“起码的自给自足”水平之下，甚至无法满足“最低的生存”要求。这就是土地再分割的结果。

112

至于另外一种趋势，在巴黎附近的像胡雷波瓦的地域，60%的土地并不属于农民，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这些农民因人口压力和继承习惯而导致的土地分割已经变得穷困不堪。

在这不属于农民的“60%”的土地中，30%是领主的保留领地（换句话说，这部分土地是领主保留下来直接耕种的）。还有30%（即另一半）则是农民过去的持有地：它们（在不同的时期，而且大多数是在晚近）被城里人买走了，其中包括来自巴黎或其他地方的资产阶级和贵族成员。

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来看持这些数字。在这“60%”的非农民地产中，三分之一（也就是说，包括农民和非农民的“全部”土地的20%）属于传统的特权阶层的群体（教士和新旧贵族）；40%（这“60%”中的另外三分之二）属于资产阶级。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可以把这些人再分成两类：(1) 20%是“官员”；(2)20%是商人和其他非官员的资产阶级。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农民并不只是受到传统的压迫力量

的挤压,[15]因为这股力量(教士和贵族)造成的压力看上去毕竟是比较弱小的,只占有农村土地的20%。现代力量也许比传统力量让农民遭受了更加深重的苦难。在某种程度上,农民显然成了进步的牺牲品,农民手中40%的土地转移到了构成"现代性"支柱的资产阶级和官员的手中。从一般意义上讲,英国与法国一样,农村阶级丧失了对大部分土地的所有权。这个事实构成了早期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前提之一。但是,即使在诸如英国那样比较发达的国家,以及在法国的北部,直到17世纪下半叶,农村才有了充分的"资本主义"的成分,而在法国,这要等到18世纪,还有人说要等到19世纪。

113

我们再来看一看雅卡尔的重要著作。关于1550—1560年前后,胡雷波瓦的农业活动在贵族、资产阶级和农民等这些拥有地产的不同阶级之间的分配方式,他告诉了我们一些什么东西呢?

就农民而言,他们的财产主要是葡萄园和小麦地。贵族和教士由于拥有保留领地,实际上占有了所有的林地,或者说至少占有了不属于这个王国内的头号贵族和领主,即国王所有的全部林地。森林并不归大家所有:(贵族和教士的)特权从正面构成了障碍,即站在拥有森林的人那一方,他们只需看着树木的长大。至于资产阶级,他们没有资金,又被排斥在"等级社会"之外,没有获得森林财富的权利:但我们不必怜悯他们,因为他们继承了葡萄园和小麦地;他们中的一些人迫切地寻求这时在巴黎和其他地方刚刚流行的农村经济学论著,其最有影响的两位作者是艾蒂安和利埃博特。

到此为止,通过分析取自朗格多克地区和巴黎地区的一

些例子，我已经讨论了农业收入的横向分配问题，它是通过土地租佃的结构来运作的。从已经出现的情况来看，可以肯定地说，一方面是土地的再分割，另一方面是非农村的社会群体攫取了利润，使农民屈从于他们难以抵御的压迫和分化的力量。

在这种"横向"的考察之后，再来看一看对于收入(地租、利润和工资)的"纵向"分配，我们可以说些什么?先说说地租，我要对这个术语或概念做些解释。最广泛意义上的地租包括领主捐和什一税，而狭义的地租是指土地所有者依据短期(几年或两三个三年租期)出租土地所获得的租金。魁奈的"有产阶级"一词包括广义"地租"的各个方面。

114

首先来讨论领主捐。整整一个世纪(1450—1560年)对那些有权征收领主捐的人来说是个极其黯淡的年代。众所周知的通货膨胀使得领主以现金方式获得的各种捐税消失于无形之中。在漫长的时期内(从15世纪中叶到18世纪末)，由于硬币贬值到最低点，以现金支付的领主捐的实际价值损失了95%；其原因是粮食价格的上升是用图尔锂(一种货币单位)来表示的。在此期间，粮食价格实际上上升了20倍。因此可以说领主成了货币一次又一次"心肌梗塞"的牺牲品，直到1789年才获得了转机。尽管我没有时间在此继续讨论这个问题，但诸如"贵族的反动"和"封建制的再版"等这类普遍承认的观点是否适用于16世纪或18世纪，在我看来，已经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18世纪本来可能发生的一场延迟了的斗争，这场斗争围绕着固定捐税的条款以及反对涨价，关于这一主题，尽管背景稍有不同，但仍可参阅保罗·布瓦的《西部的农民》，他在这部著作中驳斥了领主反动的观点。)

总而言之，16 世纪所发生的是在货币领主捐逐渐消失之后，在社会上出现了“领主制的解体”（de-seigneurialisation）和“封建制的解体”（de-feudalisation）的进程。

那么，实物捐这一种捐税又是怎样的呢（我们知道，在领主征收的所有捐税中，除了保留领地外，它往往代表着一种苛重的负担）？关于这一点，雅卡尔的论文似乎也表明，实物捐远不像人们一直以为的那么流行，至少是在他认真研究过的法国的那些地区。

当然，必定有些省份属于例外，例如布列塔尼和勃艮第。它们在 16 世纪依然相对地落后，被牢牢地控制在领主制的桎梏下，当时勃艮第的那些贵族比巴黎的贵族更为有效地捍卫了自己。

不过，我们现在要转而讨论什一税这一主题。这方面的状况大不相同：15 世纪末和 16 世纪初，随着农业产量，尤其是粮食产量的增长和恢复，什一税的价值也以相应的比例增加。高级教士（什一税的主要收取者）因此变得越来越富有，这也就是后来导致宗教改革中的反教士情绪的诸多原因之一。

115

我们最后来讨论一般的地租。地租是地主以三年、六年或九年为期向农民出租土地所获得的收入。在 16 世纪战争爆发前的那些年份，地租自然地出现了增长。每英亩土地的地租最终和种籽的花费相当（即每英亩 250 升），但它的上升还没有达到 17 世纪那样实际上是让农民破产的地步。

16 世纪由国家征收的赋税并不太多，至少与 1640—1660 年前后的赋税相当。借贷的利率虽然很高（9%—10%），但实际上被价格革命所必然导致的通货膨胀逐渐抵消了。

总体上看，我们可以说，在16世纪，由社会上层阶级、教会或“有产阶级”（即贵族、地主、教士和国家）征收的捐税所占的整个比例并不过分。换一种方式来说，如果说“横向的”压力很大（请参阅上文），那么，“纵向”压力并不太大。1550年前后，领主征收的捐税占某块土地总产出的六分之一到三分之一，这个比例究竟多大要根据农民是租地持有农，土地所有者，还仅仅是佃农（他们承担的捐税最重）的身份而定。在17世纪，同样身份的农民在相同的条件下所缴纳的捐税可能达到了某块土地总产出的五分之一到二分之一。

至少从捐税的角度来看，16世纪中叶的农民在某些方面虽然比15世纪末的前辈们略差一些，但比起17世纪的后代和继承者来，却享有更大的“喘息空间”。

在16世纪的进程中，工薪阶层完全走上了贫困化的道路，这种情形基本上对大地主和租地农场主有利，后两者都能从比较低的地租和随着这个世纪的流逝而只要支付几乎下降为零的实际工资中获得利益。结果，他们的经营收入或“利润”得以积累，甚至增长。

116 事实证明，这种状态到了1540—1560年间特别明显，工资跌入谷底，随着富裕的租地农场主的利润的上升，他们似乎第一次进入了扬眉吐气的时代。

然而，1560年后，人口在粮食产量缓慢增长的背景下有所增加。特别是在1580年后，这一趋势有增无减，成为把工资水平推向贫困程度的动力，造成了边际劳动生产力的下降。于是，人口的增长也终止了。

在这些已经发生了变化的情况下，虽然实际工资（在1540年下降到最低点）并没有恢复，但下降速度在巴黎地区

放慢了(不过,实际工资的下降在朗格多克地区还持续了一段时间,直到宗教战争期间才减缓下降的速度)。依靠工资下降而得以上升的企业利润到16世纪后期也开始逐渐下降。

然而,从社会人口学的角度来看,我们应当重视这些一般性的思考,并且问一问我们自己,富裕租地农场主的数量与那些贫困农民的数量相比,在统计学上究竟有多大的意义呢?这个问题难以就全国范围来作出回答。我们不得不再次求助于区域研究的专著。我们还应该思考一下制约农村生活的二元结构这个人们十分熟悉的概念。这种二元结构论把农村居民分成完全不同的两类人:一类是富裕的农民:自耕农(*laboureurs*),尽管他们的绝对人数不少,但通常被认为是少数;第二类则是占绝大多数的没有自己的农具和牛马的农场工人或帮工(*travailleurs*, *manouvriers*)。

让·雅卡尔对他所选择的那些地区的档案进行了专门的研究。他的研究迫使我们必须对这一概念作一定程度的修正,至少在我们谈论"幸运的16世纪"时特别要注意这一点。(对于17世纪,他有完全不同的观点,而且事实证明他们的说法更加符合真相。)

雅卡尔在他对法国北部开放平原上典型的教区所做的抽样中,也发现了自耕农(*laboureurs*)和农场帮工(*manouvriers*),但根据他所引述的档案,后者在那个时代的农村社会中占有的位置似乎与迄今为止历史学家分配给他们的不同。 117

在阅读雅卡尔的著作时,我们发现胡雷波瓦的农村社会的顶端由一个小群体组成(他们不到5%,可能只占有劳动能力的农民总数的2%—3%):这个群体当然是由富裕的租地农

场主和领主征税人组成，他们构成了这个农村社会中人数极少的上层。他们是村庄中那些从16世纪利润的上升中获得了利益，而且也从聚集土地者所形成的大中型地产中获得利润的少数人当中的一部分。这些土地的聚集者，正如我们所知道的，一般都是来自城镇，不是资产阶级就是贵族中的成员。在农村的社会框架内，这一小批上层的富裕的农场主在当地的社会等级中仅仅低于乡绅，这当然是指后者居住在当地的时候，换句话说，也就是说当他们满足于成为农村绅士时候。在胡雷波瓦，地主阶级的人数不多，也不是很富有：巴黎近在咫尺，把这些上层阶级吸纳到了自己的网络中，对这批小贵族有诱惑力，使他们不会长期居住在农村豪宅中。但是，只要人们冒险进入诺曼底和布列塔尼的这个城镇很少的被绿地围隔起来的地区，或者这片古老的土地，就会发现有大批农村绅士。德·古贝维尔爵士就是其中的一个。1550年前后，他居住在科唐坦，是他那个小社区公认的首领。这个用词指的几乎就是部落首领的意思；他也是解决各种争端的法官和仲裁人；他还是当地的医生，称作理发师—外科医生；他切开肿疖，调配草药，拥有非官方的却非常有效的领主权力，他勾引当地农民的女儿，和他居住在一起的有他自己的私生子，还有他父亲的私生子，尽管他倾向于新教，但胡格诺派的教义对他并不适合，因为胡格诺派奉行的禁欲生活使他感到寒心；我们在他身上一点也找不到他的宗教信仰本应激发出来的那种马克斯·韦伯所说的“资本主义精神”的影子。他事实上根本不知道要把成袋的粮食拿到市场上去销售。不过，他似乎也从来没有把钱花完的时候。他显然活到了很大的岁数，直到去世也没有破产。

我们还是把有关地主的这个独特但实质上并不重要的例子搁置在一边，把注意力再次转向由劳工群体所构成的这个农村社会的基本核心上去。我们发现，在刚刚提到的由富有农场主构成的很薄的层面下，有广大的普通劳工，即那些不仅 118 在巴黎等地区，而且在法国的最南端组成活跃的农业人口中绝大多数的小农。人们只要瞄一眼乔治·勒费弗尔的著作就会相信，这些农民根本就不是富裕的农村资本家或乡村企业主（只有那些已经提到的极少数富裕农场主除外），他们只是朴实和坦率的农民，而且往往是非常微贱的农民，一般情况下只拥有一匹马（因此他们被划为“劳工”，从字面上讲就是“耕夫”）。如果他们拥有的马超过了一匹（两匹以上），那也不过是因为他们稍微宽裕一些，或者与大多数人相比较而言不那么贫穷而已。在法兰西大区典型的村庄里，与这些劳工一道的，还有两类专门劳工，即葡萄种植者和手工业者。这两类人都相当贫穷，但他们的社会地位或声望与那些为数不多的劳工并没有什么不同。最后，在1550年前后，在村庄最低一层的社会阶梯上，我们还看到了一些农场帮工（*manouvriers*），他们是少数人的群体，有时人数极少。作为一个边缘群体，他们的社会地位很低，他们所拥有的东西，包括土地或私人财产，微不足道。然而，在巴黎地区，这个“穷人当中最贫穷”的群体正在面临着一个更加黯淡的未来，即17世纪的前景。

占农村人口大多数的农场工人起着主导作用。从这个层次来看，16世纪法国的村庄可以看作是一个已经凝聚得相当好的单位（主要标志是近亲结婚在地方层次上十分盛行）。承认这种村庄“统一”的存在既不是为了证明反动的浪漫主义，更不是要否认村庄内部往往存在着冲突和怨恨。但是，这里

必须强调，在1560年以前同这以后一样，农村世界阶级斗争的前沿并不在村庄的内部，也没有造成小农来反对农场短工。当阶级斗争的前线确实出现的时候（次数并不多），通常是整个村庄联合起来反对来自外部的敌人（国家或城镇的获利者），而不是村庄的分裂，自相作对。

但是，除了那些规模较大的农场里的少数幸福的村民外，一般的村民确实受到了16世纪的瘟疫和贫困化的影响。大批的农民在不同的程度上都从这个逐渐加剧的贫困中遭受了巨大的痛苦：他们因继承的财产不断分割的过程而遭受痛苦；他们甚至因劳动者的工资下降到贫困线水平而遭受痛苦，因为其中的一些人为了平衡家庭开支，不得不自己去打零工。

119

然而，我要重复说明的是，村庄内部在1560年以前几乎没有出现过阶级斗争的任何迹象。农民们听天由命，浑浑噩噩地接受了远非光明的命运（旅游者通常将他们描述为"在矮小的屋子里，像气喘的簧风琴一般，打着鼾睡着了"）。只有当来自村庄以外的危险（来自于国家的要求，或来自在这个国家中日益受到保护的富豪、金融家、高利贷者的集团的要求）威胁到农民社区的财政和经济安全时，而且尤其是在这种时刻（例如在1548年昂古穆瓦发生盐税革命的期间），他们才会醒过来。在这个问题上，保罗·布瓦对朱安党人起义所作的分析可以适用于1639年诺曼底的赤足人党起义以及1548年初发生在昂古穆瓦、圣唐奇和吉耶讷的皮塔乌起义。法国的各个村庄起而反抗各种形式的压迫，反抗"封建"统治和"领主"统治，或更多的是反对以收入和盐税形式的"资产阶级"的剥削以及城市投机商人以掠夺土地为形式的剥削，农村的反抗精神被激发起来，并发展出在各条战线全面出击的战略。

在这些条件下，农民对随着16世纪而来的精神变化会如何作出反应呢？我们从物质和经济史的角度已经看到，其中最根本的特征是恢复过去的人口和经济上的平衡：因14世纪和15世纪的大倒退而粗暴中断的"农村的生态系统"已经重新建立。这种恢复以前状态的趋势与欢迎文化革新的态度已经难以相容了。

的确，作为一般的规则，宗教改革并没有引起农民社区的关注，与他们那种冷淡接受的态度也不相吻合。受到宗教改革影响的仅仅是城市市民，还有极少数因为学会了"读和写"而变质的农村各个阶层。他们是半识字的或全识字的：资产阶级、贵族、官员和手工业者阶级——简言之，主要是来自城镇的精英阶层。至于一般的农民，他们对宗教的新发展并不感兴趣；当然，也有少数例外，主要是在法国南部。下面的特殊因素对那里发生了影响： 120

1. 存在城乡之间畅通的交通网络：例如，我们知道，在滨临地中海的朗格多克，农村的生活和城镇的生活遵循着相同的模式（请参阅莫里斯·阿居隆的著作，其中有许多方面同样与近代时期有联系）。这样的一种结构使少数精英可能受到新文化潮流的影响（不管它是19世纪的政治左派，还是16世纪的改宗者），并与希望接受新思想的广大城乡民众相接触。

2. 地方宗教生活的独特性：尽管存在广泛的例外，如莱普伊的圣堂中对圣母玛利亚的崇拜（但这些在我看来并不足以使一般的规律失效），但人们惊讶地发现古代的圣女崇拜总的说来（例如在下朗格多克）并没有多大的意义。正是由于加尔文派极端蔑视天主教虔诚中的女性偏向，因此轻而易举地在塞文山脉巩固了自己的地盘：那里的巫婆早在1500年就在

亵渎圣母玛利亚的名字，把她称作红头(la Rousse)。

3. 奥克语地区精英的集团战略：他们因为或多或少地产生了政治意识或“地方主义”的意识，奥克语地区的精英有意强化新教的力量，并把新教用作一种工具来粉碎法国北方强加给南方的政治、行政和制度上影响。早在蒙莫朗西事件之前，南方的新教派就想靠自身的力量在南方各省建立“区域性的权力”(请读者原谅我的这种表达方式，因为我没有更充分的方法来说明这一情况)。地方精英由此有了强大的动力，带领广大农民群众皈依新教。他们的努力很少获得成功，但也是不容置疑的(例如在塞文山脉)。

121

但是，如果我们把主要在拉·罗舍尔至日内瓦一线以南地区发现的地方主义问题排除在外的话，就其中大多数生活在北方的法国农民而言，他们在1560年前后，如果说对新教并不是完全不感兴趣的，至少也是兴趣不大。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只能再次求诸于雅卡尔的论著。他十分明确地指出，1550—1575年间宗教改革对法国农民的社区没有什么影响。

自然，胡格诺运动引起的“争吵”必定会影响农民。当国王命令在1561—1595年间出售教会的土地时，有些农民就试图购买教会的产业。在巴黎周围的地区经营农场(自1550年前后以来，这一地区就从事大规模的农业经营了)的比较富裕的农民表现出来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渴望获得土地。但是，当这种教会产业被拍卖一空时，这些地位卑贱的农民不得不承认失败：他们缺乏实力来同官员、资产阶级、商人和贵族等真正富有的人相竞争。他们只有能力买到比例很小的那部分被出售的教会产业。

另一方面，当人们来考察反什一税的运动时，历史的分析

立即就展现出一幅完全不同的图景。这是一场真正的农民运动，开始于16世纪50年代，60年代达到高潮；在朗格多克和巴黎盆地特别活跃，并在1565—1567年达到最高潮。但是，到了1570年以后，这场"罢缴"什一税的浪潮宣告结束，失去了动力，最终失败了。这场真正试图争取农民独立的运动最终归于失败的原因之一，不仅是因为来自主教、主教团和修道院的顽强反抗（他们的反抗是在预料之中的），而且还有低级教士和教区牧师的顽固反对。这些无论怎么说都更加勤劳、更虔诚、与信徒接触也更加密切的牧羊人（天主教教士）在他们所居住的农村中是精神和文化上的领路人，不费吹灰之力，很快就把本教区的农民引回到了正确的道路上，尤其是在巴黎地区。他们也以自己的方式推动了生态系统的稳定并阻碍了农村的任何革新。农民的反什一税运动仅仅是昙花一现。 122

总而言之，我把16世纪的法国农民看作是历史研究的客体，而不是历史的主体。作为生产者和再生产者，他们所有活动的最终结果都是为了恢复一个压迫他们甚至有时将他们碾碎的系统：在1550年到1720年的这段时期里占据着主导地位的制度平衡（虽然不无巨大的波动），之所以得以恢复完全是依赖于李嘉图所说的那些代价，即财产的一再分割，土地被掠夺，工资下降到贫困线以下。除了少数富裕的大农场主外，我们的绝大多数农民都受到了这三种祸害中这种或那种的影响，甚至受到数种祸害的影响。然而，绝大多数的农民基本上保持着沉默，成为了地方方言和民间习俗的囚徒，除了偶尔为之，他们无法参加到16世纪60年代的宗教改革、反什一税战争、出售教会财产等轰轰烈烈的历史事件中去。

我们在这里必须把那些地区性的激进分子群体排除在外：例如塞文山脉的农民，当然，还有在热尔和阿让的起义农民。他们在16世纪60年代初拒绝了领主制的枷锁，嘲弄地揭穿了"一位北方国王的小把戏"。但他们只是为数极少的特殊群体。事实非常清楚，直到1575年以后，甚至到1580—1595年以后，都没有出现农民的大规模动员。在那个时候，而且仅仅是在那个时候，在一种"波尔什内夫模式"的预演中，我们才看到了法国的反税收起义，有时甚至是反领主制的起义、反城市起义和反奸商的起义（即三大农民起义：即迟到者起义、高蒂埃党人起义和叉民起义）。某些地区（往往是最落后的地区，但有时也未必是最落后的地区）甚至开始卷入农民的真正的反巫术文化。但这已不属于本文的讨论范围。[16]

注 释

[1] 本文最初载于《经济趋势和社会结构：拉布鲁斯纪念文集》（*Conjoncture économique, structures sociales, homage à Ernest Labrouse*），穆东出版社，巴黎-海牙，1974年。

[2] 试比较塞弗·迪帕基埃（Dupâquier）发表在《年鉴》（1969年）的文章。

[3] J·雅卡尔：《法兰西大区的农村危机》（J. Jaquart, *La Grise rurale en Ile-de-France*），A·科兰出版社，巴黎，1974年。

[4] 1563年威尼斯驻巴黎大使让·科雷尔的通信；当时法国境内有1500万人至1600万人[见《15世纪威尼斯大使们之间的关系》（*Relations des ambassadeurs Vénitiens au XVe siècle*）]，由N·托马塞奥出版，第2卷，第149页，1838年版，载于《未辑法国历史档案集》（*Collection des documents inédits historiques de la France*）。

[5] 事实上，所有的资料都证实，1550年前后的法国人口超过1900万人，各个区域的人口比1700年都要多。

[6] 迪帕基埃对这个课题的一项研究成果发表在1972年《年鉴》第4期上。

[7] 这些数据来源于内弗斯的论著：《康布雷的谷物》（M. H. Neveux, *Les*

grains de Cambrésis),利尔第三大学,1974年。

[8] 根据M·雷纳尔:《世界人口通史》(M. Reinhard, *Histoire générale de la population mondiale*),1968年,第133页上的图表和表格重新制作。

[9] J·戈瓦和E·勒鲁瓦·拉迪里主编:《什一税的波动》(J. Goy and E. Le Roy Ladurie, eds., *Les Fluctuations du produit de la dîme*),穆尔,巴黎-海牙,1972年。(由法国经济史学家协会赞助出版)

[10][11] 本书由拉姆齐主编,伦敦的梅休恩出版社出版,1971年;见M·博朗(Baulant)发表在《年鉴》(1971年)上的论文。

[12] 载于1957年的《斯堪的纳维亚经济史评论》。

[13] 这些文章载于《北方期刊》(*Revue de Nord*)1953年10月号和1954年1月号,《法国和外国法律史杂志》(*Revue historique de droit fran çais et étranger*)1952年,第1期,第18—19页。

[14] J·雅卡尔:《法兰西大区的农业危机》。

[15] 尽管这些压迫力量依然大量存在,但值得注意的是,土地总亩数的30%是领主的保留地。(根据阿尔封的统计)在加洛林王朝统治下,巴黎周围的这同一地区内,有50%的土地是领主保留地。正如我们在下面将要看到的,保留地的解体过程并不快!

[16] 有关这个问题的更多资料,请参阅F·布罗代尔和E·拉布鲁斯主编的《法国经济和社会史》(*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de la France*,巴黎,1977年,第2卷,第1册)中我所撰写的内容。

123

第五章　巴尔扎克的《乡村医生》：简单的技术与乡间传说[1]

巴尔扎克的《乡村医生》(*Le Médicin de campagne*)的第一章有一个十分平淡的标题:“农村和人”,会让人模模糊糊地联想到这是一部地理书。开篇对阿尔卑斯山景色的描写其特点也有些平淡。作者对它几乎毫无感受，没有卢梭或贺拉斯·德·索绪尔的那种广阔胸怀。他的第一段以老一套的民族情绪结尾:“总之,这是个美丽的国家,这就是法兰西!”这种法国式的腔调多少有些文不对题，因为他这部小说的背景是多菲内,是一个边界省份,从当时的自然景色、经济、甚至大多数居民所使用的语言（巴尔扎克根本没有提及的一个事实）来看，它与卡佩王朝统治下的说法语的法兰西鲜有共同之处。

然而,这些实际上并不重要。尽管存在这样的一些瑕疵，但本质的内容从一开始就展现在开头的几页中，就像巴尔扎克的所有著作一样。这儿有一座多菲内的锯木厂，有木制的水槽和剥落了树皮的冷杉树干。穷苦劳工摇摇欲坠的茅舍与富裕农民和当地资产阶级的结实房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里描述的葡萄藤确实是用（矮小的榆树做的）架子支撑着的，牧人是用成捆的树叶来喂牲畜,与当地的做法完全一样,盛有少量奶酪(也许是那种圣马瑟兰干酪)的木桶悬挂在每家的门

楣上以便晾干。这些在第一段中作者就及时地展现在读者的眼前，并指出了他的目睹者，一位新来到这里的前陆军上尉彼埃尔·约瑟夫·杰纳斯塔所看到的景象。所有这些可以用肉眼（*choses vue*）看到的细节，都证明了巴尔扎克具有准确而敏锐（也许过于敏锐）的观察力。

1832年，巴尔扎克怀着引诱卡斯特里夫人的希望，在极其恶劣的天气下越过了阿尔卑斯山；尽管此行未能获得成功，但他仍留意观察。他当时做的一些亲眼观察，同他记忆中年轻时在各个省份旅行时看到的其他大量或多或少有关的细节混杂在一起，一古脑儿地写进了《乡村医生》（1833年）。今天细心的人类学家会对他用这种方法制造的大杂烩感到震惊。但是，在巴尔扎克写作的时候，他的周围并没有细心的人类学家。 124

彼埃尔·约瑟夫·杰纳斯塔，一位50来岁的陆军退伍军人，是个英俊而勇敢的人，也是我们在书中遇到的第一个人物。巴尔扎克就用他到达这座山谷作为引子来进行自己的思考。杰纳斯塔是一名军人的遗孤，自小在军旅中成长，在拿破仑的荣誉军团（*Grande Armée*）中不断晋升。这支军团的出名之处就在于它像一架强大的发动机一样，推动着人们沿着社会的阶梯步步上升，只要这个攀登者还没有沦为炮弹或刺刀的牺牲品。我们可以用巴尔扎克的话来说，这位老兵确实存在。在战争中晋升的另一名孤儿卢瓦涅上尉所写的回忆录也可以保证杰纳斯塔一生经历的可靠性，是一个完全靠自己努力而成才的经历。

彼埃尔·约瑟夫漫无目的地行走在阿尔卑斯山（严格地说是前阿尔卑斯山[2]）时，他路过的第一个农庄是个贫穷的小

农户，里面住着一位生活在贫困之中的“奶妈”(*gardeuse d' enfants*)，她是村庄里的众多奶妈之一，格勒诺布尔的济贫院将弃婴随意地分配给她们寄养。莫里斯·加尔登在一本有关18世纪里昂的书中，[3]略微详细地描写了寄养婴儿的做法。这种做法是1700年到1850年间的农村发展的秘诀之一。能够照看济贫院的孩子(或确实是来自城市家庭的孩子)，给他们喂奶，继而用汤匙给他们喂食品，对这些奶妈来说是件幸运的事情，也是一个机会，可以体会到手中随时有点现钱的快乐。由于有这些婴儿要分配给周围的人去领养，即使是最穷苦的家庭也趁此机会获得了些许现金。否则的话，这些家庭所能领教的只有聊以生存的经济，家中一点现金也没有。这种做法也许可以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加以辩护。然而，遗憾的是，如果从人口学的角度来看，就远非如此了。加尔登证明分配寄养弃婴的做法在事实上成了一种有组织地杀婴的形式。对于这一点，政府隐隐约约地或完全地意识到了。在有这些婴儿或幼童送去的村庄里，准确地说，在几天、几周或几个月的时间里，他们就会大批地死亡，死于奶妈的胸前或唯利是图的手臂中，而这些婴儿都是通过当时称作“国家援助”方式托付给她们的。

125

巴尔扎克笔下这位善良的奶妈是位寡妇，靠一块小得可怜的土地维持着生存，年龄38岁却已显出一副老态，皮肤皱得像爱斯基摩人一样；耗尽精力的生活方式使这些妇女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老。她只收容断了奶的孩子。她既能干又善良；在她的照顾下，孩子们生存下来，没有死去。因为她是村里照顾孩子的人们当中少有的几位英雄之一。她们真诚而又人道地去照顾着这些分配给她们的小孩。她让这些孩子活了下来，抚养他们长大，而不是为了赚钱就让他们死去。在社会

史这个真实而非虚构的世界中，这种仁慈的奶妈确实存在；但也像加尔登所指出的那样，为数很少，极为罕见。相对于大批置弃婴于不顾，甚至唯利是图到为了赚钱而弃死他们的那些奶妈来说，她们的人数极少。所有这些都让我们联想起小说家们往往在不向读者事先说明的情况下，选择那些不具典型性但能吸引读者的特例来加以描述，而不去描述按正常轨道发生的日常生活中的悲剧，其中甚至包括那些，或者特别是那些被当作是当时忠实的见证者来对待的小说家们。在这方面左拉与巴尔扎克相比，即使没有更多的灵感，至少更忠实于统计性的证据。他在《繁殖》一书中说明了这些寄养家庭实际上多么像是一些太平间，只不过是城镇婴儿走向乡村墓地这个最终栖息地之前的暂时停歇处而已。巴尔扎克把这一景象理想化则有他自己的理由：他想让杰纳斯塔与这位奶妈的相遇成为一种预兆，就像天使报喜那样，表明这位前陆军上尉进入了一个正在好心的医生贝纳西斯手下重获新生的地区。

在另一方面，巴尔扎克即将要塑造出一种生活方式及其背景，这时，他再一次成为一名忠实和娴熟的观察者。在描写房屋内部的陈设，特别是餐室描述上，没有人可以与他媲美。他甚至注意到了杰纳斯塔的装备上少了一颗绑腿纽扣。他描绘了奶妈和她的收养儿童生活、睡觉、做饭、吃饭的那个房间，也是唯一的房间。在他的描述中，连壁炉上、床上、挤奶器上、橱子上和栅栏的门上……的一滴滴油迹都未能逃过他的眼睛（十分奇怪的是，他竟然没有提到桌子，虽然里面可能会有一张桌子，也没有提到碗橱或椅子）。作者在这里毫不费力地为我们重现出来的是一幅被烟熏黑了的背景画面，半数以上的法国农民（当然也就是占人口一半的穷人，约为 1000 万人）过

126 日子的地方。即使是像这样的只有一个房间的茅舍也完全可能附带有其他的建筑:例如用来干附带农活的外屋和宅边地,包括一间乳牛棚、储藏水果的棚子,还有一小块堆放肥料的地方。奶妈和她的孩子们靠济贫院发给的钱以及她靠两头奶牛赚来的收入维持生活,还要靠农忙时节所拾的谷穗,晚上的编织以及"冬天"拾取的木柴(这里应该是秋天:巴尔扎克似乎不知道,冬天的阿尔卑斯山是被大雪覆盖着的)。对于旧式无产者来说,农忙季节以后的这些劳动,在一个没有煤炭或其他燃料的地区,是一种额外的却又必不可少的收入来源。这个还不到40岁的贫穷"老妇人"就是靠着这样或那样的方法设法勉强地生存下去,从未摆脱过债务的困扰。如果是在路易十四时代,她有可能会饿死。如果是在路易十六的统治时期,所有的孩子有可能会死去。但在1830年,这位非凡的妇女非但保存了自己,而且保住了孩子。她的一生都生活在最底层,但也并非无法度日。在那位医生到来之前,几乎所有的穷苦农民都生活在"旧制度"的最底层,但多多少少还能生存下去。仅此而已。

这位奶妈从一座彩绘的(怀抱着还是婴儿时的耶稣)圣母玛利亚的石膏像中得到了启示:在一生中要做善事。这座神像供放在壁炉台上。这种对圣母玛利亚的崇拜是从反宗教改革时期的虔诚信仰中遗留下来的。教士们以坚忍不拔的毅力把这种崇拜逐渐地灌输给他们的信徒,直到最贫穷的这层人。

这位奶妈处于极度的贫穷之中却依然致力于救助别人的生命。她本人就是两个村庄的特征的化身,也可以说是精华。

这两个村庄，一个好，一个坏，都位于夏尔特勒斯山的山坡上，现在正处于杰纳斯塔的军人目光的审视下。第一个是旧时代的村庄，体现出了野蛮主义在贝纳西斯这位典型的乡村医生到来以前的"前医生时代"占据着的统治地位。村里的主要街道上既有敞开的下水道，而山上下来的激流又不时地穿过这条街道。屋顶是奇特的混和物，有些是茅草，有些是木瓦；有些是砖瓦，还有一些是石板瓦[石板瓦的屋顶显然是这个村社的上层社会，即地方显要和教区牧师等人的特权，虽然据我所知，在阿尔卑斯山区为人们所知的唯一的称作洛泽(*Lauze*)的石板瓦，并没有被看作是"贵族"专用的材料。事实上，在干草仓库的屋顶上，而不是在资产阶级和乡绅的房屋顶上，经常可以见到这种材料]。把杰纳斯塔目光吸引住了的这种屋顶材料的混合，在我看来，恰恰是在巴尔扎克的想象中混合在一起的虚构。贝纳西斯医生把夏尔特勒斯山作为复兴开发的场所。那是一个半虚构的背景，是把阿尔萨斯的部分地区，巴黎和都灵周围农村的片断，再加上康塔尔山和比利牛斯山的小片地区，糅合在一起虚构出来的，实际上其中只有很小的一部分是来自阿尔卑斯山！《乡村医生》的架构与旧式的人类学著作十分相似（这种著作现在已被专家们通过精心研究后所写的专著所取代。这些专家往往要花费好几年的时间对选中的某个角落开展实地考察）。在阅读巴尔扎克这部比较幼稚的著作时我联想起了弗雷泽爵士的《金枝》，或马塞尔·莫斯的一些论文。这些文章十分认真地把非洲部落的习俗比作美拉尼西亚部族群的习俗。1830年的巴尔扎克并不像布雷顿的雷蒂夫那样执着地追求准确。雷蒂夫在《尼古拉先生》或《我父亲的生平》两本书中表现出他深刻地认识到必须把自己限制

127

在一定的范围内，只谈论他的家乡勃艮第的乡村野史。《乡村医生》的那位缺乏谨慎的作者却毫不犹豫地把阿尔卑斯山区的木瓦、安茹省的石板瓦、普罗旺斯的砖瓦统统混合在一起，放在萨瓦和多非内的屋顶上。我们应该加以反对吗？我想没有这个必要。关键问题是巴尔扎克告诉我们法国某些不发达地区的，尤其是卢瓦尔南部的法国农民的状况。他在这里给我们描绘的阿尔卑斯山的背景，虽然表现出了他那种常有的天分，但也许带有一点过多的骑士时代的风格，倾向于过分的简单和抽象。

越过那座沉浸在阴暗山谷中的、有着光怪陆离的屋顶的村庄以后，眼前的景象顿时开阔起来。巴尔扎克带着我们拾级而上，杰纳斯塔把他的目光移向附近的山顶，在他的上方，离新近成立的农场和最近砍伐了树木的场地的不远处，贝纳西斯医生以他传奇般的智慧建造起来的"新面貌"作坊正在紧张开工，锉刀发出粗厉刺耳的声音，还有锤子的敲击声。然而，众所周知，在 1815 年以后，阿尔卑斯山的人民倾向于向山下，而非向山上迁居。19 世纪阿尔卑斯山区的小型金属加工厂更需要"下降"到山下，因为它要依靠水力为动力。巴尔扎克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他根本不管重力的规律，下令把新企 128 业安置在半山腰上。他对现实的正确观察又激活了他作为小说家的想象力。在 1815—1835 年间，农村地区确实出现了经济增长，而这个经济增长却完全因为这位作者的乌托邦式的创造性和实现其愿望的心情而被拔高了。

这两个村庄外观上的对立，以自然为其下，以文化为其上，确立了这部小说的基本主题之一。同样的对比也表现在写于 16 世纪和 18 世纪的另外两本有关法国农村的人类学和

半虚构的著作中。一部是诺埃尔·迪·费伊1540年写的著作，描绘了在时间和空间上紧密相连的两个教区。在他的《16世纪法国故事员乡村对话》一书中，[4]弗拉莫村和樊德尔村分别体现了两种世界观：弗拉莫村代表着过去的黄金时代，而樊德尔村则体现了现代性的堕落。布雷顿的雷蒂夫和巴尔扎克则持完全相反的观点。他们两人都对未来满怀着信心并充满激情，就像诺埃尔·迪·费伊对过去满怀着信心和充满着激情一样。将两个农民居住区并列在一起加以比较是表达时代变迁理论的一大发明，与16世纪的讲故事的方法完全不同，萨西村那座收养过雷蒂夫家族的村庄，沉浸在自然和它的过去之中，与这位作者的父亲降生的村庄尼特里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尼特里村是向前看的，对发展持开放的态度，因此有能力向萨西村引入将会改造自然的文化。在雷蒂夫的著作中，18世纪的乐观主义压倒了我们在诺埃尔·迪·费伊的著作中察觉出来的贫穷的文艺复兴时代的悲观主义。在《乡村医生》一书中也有向前看的同样态度：在巴尔扎克看来，这两种类型的生活环境之间的对立，散见于各处，有助于揭示一些重要的差别：过去与将来的差异，落后与进步的差异，疾病（甲状腺肿大）与健康的差异，欠发达与发达的差异，野蛮与文明的差异，蒙昧与开化的差异，迷信与基督教精神的差异。（隐含在这些对立中的宗教内容所指的基督教精神，是指将各种异教清除干净了的、严厉的、并且更为现代化了的基督教精神）

在看了这两座村庄之后，我们接下来看到的是两所房屋：一所是牧师的房屋，另一所是克汀病患者的房屋。

1. **牧师的房屋**：杰纳斯塔与当地的民众接触之后，此时 129

正在贝纳西斯医生的指导下开始踏上了新的生活道路，寄住在医生的家中。这所房屋过去曾经归教区牧师所有。这使他有机会去浏览一番这所房屋的前主人，一名教区牧师，所享受的资产阶级式的舒适生活。他后来成了富裕而显要的地方人物。这种舒适的生活继续成为新主人的特权：拥有个人财产，设备完善的住宅，还有他的管家专制的管理。贝纳西斯享受着相当高的生活水平。

2. 克汀病患者的房屋：杰纳斯塔正是在这间屋子里第一次与贝纳西斯邂逅相遇，当时他正被叫来治疗这些重病患者。在这所几乎没有什么家具的茅舍里，简直就是一间小茅棚，上尉和这位医生开始相识。他们两人都来自南方，但有不同的经历，一个在军队服役，另一个在巴黎，都抹去了南方血统的痕迹。他们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成为了法国文化和资产阶级文化的代表而让对方感到吃惊，无论这种代表性的取得是轻而易举还是困难重重。他们一道致力于探索当时山区贫困中最坏的特征之一，那就是阿尔卑斯山北部的被甲状腺肿大所困扰的村庄。这位医生已经习以为常的事情在这位老兵看来却是一桩可怕的新发现。

统计上的惊人数字表明，萨瓦和多菲内的农村人口是一种特殊的饮食缺乏症的受害者。他们的饮用水是来自山上的泉水或融化的雪，缺碘。由于人们的贫困和马车运输成本的昂贵，鲱鱼和干鳕鱼等咸水鱼的供应极少；要为正在健康生长发育的儿童提供所必要的少量的碘，这是唯一可以用来补偿的食物。由于这个原因，山区的许多孩子同时出现了缺碘症，甲状腺肿大和粘液性水肿的症状，即甲状腺和咽扁桃腺肿大、侏儒头、秃顶、智力迟钝等等。由于这些饮食缺乏症，阿尔卑

斯山的许多河谷变成了口角流涎的白痴和精神病患者，即克汀病患者的聚居地。在怀有病态好奇心的旅游者的眼中，他们成了西洋镜，被这种不光彩的旅游观光形式吸引到了这里。但贝纳西斯并不是目瞪口呆的旅游者。他开始着手医治疾病，消除病痛，并将它彻底消灭。在两人互作介绍后，他向 130 杰纳斯塔解释这儿发生的事，在他身旁，他的病人，这个地区残存的最后一个克汀病患者，在这个摇摇欲坠的小茅屋里，已是奄奄一息了。或许，在巴尔扎克的种族决定论的世界中，启蒙主义与蒙昧主义之间的对立从未像这一临终的戏剧般场面那样达到如此的高度。而这是一种贫穷式的，几近残酷的蒙昧主义。当医生与垂死的男孩面对面时，杰纳斯塔的眼睛注视着他们两人，以便让我们看得清清楚楚。在炉火的照亮下，我们看到了这一边的贝纳西斯医生，有着一副充满男性欲望的脸，眉毛高耸：他年轻时在女人的眼中是一个漂亮的男人，而现在已进入晚年，对这种追求不再感兴趣了，但他从不否认在生殖方面依然精力旺盛，只是现在将这种精力转移到更好地用来改善阿尔卑斯山区农民社区的医疗、经济和社会的状况。在他身旁，那个长着畸形头颅的可怜的患者微弱地呼吸着，一位可怜的母亲在他身边放了碗水，他的双脚在这碗褐色的溪水中抽搐。

这名医生与克汀病作斗争的方法是一种蓄意的压制手段。在他到来之前，当地的农民，无论是老年的还是年轻的、无论是男的还是女的、都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待克汀病，以为在他们当中有那么多赎罪的基督。他们仁慈地对待注定只有短暂生命的身患甲状腺肿大的年轻人，尊敬他们并给他们救济金，希望自己能在天堂得到回报。人们让他们在户外自由自

在地活动，照看羊群，而不是把他们关在济贫院里等死。村民对待这些克汀病患者的态度与受过教育的城市居民有着天壤之别。例如，在格勒诺布尔和尚贝里，当局已采取残酷的现代做法来对待痴呆患者。（然而，夏尔特勒斯的这些患甲状腺肿大的地区却给予了善良的救助：所需做的事情是只要改善居民的饮食，尤其是保证咸水鱼的供应。）

当贝纳西斯来到这儿时，他决不会反对通过改善食品的供应来解决问题的想法，但他并不知道人体需要定期地摄取一定量的碘。他怎么能知道呢？无论如何，他按照一种完全不同的方法来进行诊断和治疗。我们这位好心的医生在医学方面并不总是能够跟上潮流；他按照早已过时的"新鲜空气"学派的信条来治疗甲状腺肿大的克汀病患者。贝纳西斯在与杰纳斯塔第一次见面时就对他说："如果甲状腺肿大在这个地区农民世代居住的幽谷中传播开来"，"那只是因为阳光从未照进山谷，有益健康的风也从未吹来过"。除了诅咒终年的阴暗和滞留的空气外，山谷里的当地居民也面临饮用水造成的危害。这些水直接来源于融雪造成的山洪。（在这一点上，医生是相当正确的）

其次，贝纳西斯对待克汀病患者的态度与 18 世纪和 19 世纪已经形成的强大的种族主义潮流是合拍的（早在 20 世纪以前就涌现出了种族主义）。在他看来，克汀病和甲状腺肿大不但是饮食缺乏症引起的，也是因为遗传造成的，而且更多的是遗传的原因。因此，危险在于这种疾病仅仅通过近亲通婚以及由此造成的人口增加就会蔓延到整个地区。总而言之，这位善良医生的态度在两点上是传统的。第一，他宣布进行体构疗法，这种治疗方法基于病人呼吸的空气的质量；与此同

时，第二，他还宣布采用物种疗法，从中得出的符合逻辑的结论是阉割克汀病患者。自古以来，种族主义就是西方文化中的一块疽瘤。这并非耸人听闻。它靠着农业和社会的所有实际上的习惯做法在不知不觉中滋生起来。在所有这些实际做法中，一端是牲畜的选种饲养，而另一端则是对世袭贵族的保护。因此，那种伪科学的遗传学以各种各样的形式盛行起来。我们在巴尔扎克的小说和19世纪人类学的著作中，更不用说当代的人类学著作中，都能看到这种遗传学。

这些就是贝纳西斯的社会试验和医学试验的前提（这往往让人联想起莫里哀笔下众多医生中的一个），即灭绝、抑制和精神上的阉割。我并没有低估他日以继夜地致力于治疗病人，但必须承认的是，他所开的药方看上去常常像是出自某些老巫婆的偏方（例如麦斛草皮汤！），而他所做的治疗还往往比不上莫里哀笔下的主人公普尔贡有效。普尔贡只有一帖包治百病的万灵药方，那就是禁食。说到这一点，尽管他的农民提出了合情合理的请求，他们平时从来没有吃饱过，因此他们恳求医生在传统习俗允许的情况下；即仅仅在他们生病的时候让他们吃个够，但他们的恳求遭到了断然的拒绝。这位医生毫不为之所动：什么也不许吃！ 132

在别的方面来看，他的统治方式也确实是“灭绝性的和压制性的”。正如我们听到他向杰纳斯塔吹嘘的那样：尽管他遭到了牧师、妇女、儿童与老人的普遍反对，他们都想挫败他的计划，可结果都是白费力气。贝纳西斯趁着黑夜把住在他试验地区内的克汀病患者偷偷地转移了。他们被转移到遥远的埃格佩勒的济贫院，这些可怜的人们在那里受到了“仁慈的救治”，禁止性交和生育。

更糟糕的还在后面：这个伟大的救世主和阉割者并不满足于在社区内根除克汀病患者。他还完全是出于善意地自作主张，剥夺病人的财产：没收他们家中的土地，立即把这些土地转变为社区的公共财产。从此以后，这些土地使用了阿尔卑斯山或利穆赞式的灌溉方法，变成了绿油油的草场。对于健康的幸存者来说，这是天赐之物。他们现在可以在这片曾经受到诅咒的地区内实行混合的农耕方法，使用他们自己的和公用的土地。只要目的正当，可以不择手段。为更好地达到目的，医生采取了一种双管齐下的价值观体系。首先，他抨击了以友好和亲近的态度对待克汀病患者的习惯方式。当地的妇女、儿童、穷人和老人，乃至过去的教区牧师，遵循古老的态度，都是这样做的，已经习以为常。在这一点上，贝纳西斯的做法是激发小资产阶级以贪婪为基础的新道德观，采取措施去鼓动市议会中"富裕"的（或不那么贫困的）议员否决为"白痴"提供经费的议案：他们指出数额很小的地方预算有可能因此陷人赤字。所以，所有的"富人"都支持贝纳西斯正在组织的针对头脑不健全者而实行的集中营式的流放。

除了财神，还有上帝（即他的另一措施）。贝纳西斯号召把蒙昧主义的旧宗教改变成为一种更加开明的新宗教。旧式的基督教教义劝导人们应该仁慈地对待那些不幸的可怜人，逐个地向他们提供帮助，养活并爱护他们；但现在这已不再适用了，因为它仅仅是一种迷信，在我们的这个时代毫无价值！因此，贝纳西斯求见了主教管区内的主教，要求他解除那位拒绝让他的教徒获得新生的当地牧师的职务。新任牧师应该是一位更有理解力的教士，将会清醒地认识到有必要把社会进步所必需的真正宗教的强制性与在社区实行严厉措施的必要

133

性调和起来。只要有了新任牧师祝祷，开始动手消灭克汀病才能最终成为一种可能，从而为了未受到疾病感染的全体社区成员的利益，保障社区肌体的健康。巴尔扎克在这里回想起了在18世纪有时会遇到的某种泛基督教主义。根据此种教义，教区牧师，为政权服务的天然工具，是在广大农民群众当中传播启蒙和进步思想的必不可少的力量。伏尔泰主义者和教权主义者在城市中彼此厮杀，拼个你死我活，但在农村中却往往能捐弃前嫌，达成一致：要教导乡下佬去尊重公民的财产，并从讲道坛上发出雷霆之声，训诫他们循规蹈矩，除了善良的教士，还有谁更为合适呢？正如贝纳西斯和让维埃牧师所说的，幸亏有了这些约束，为了整个社区的利益，现在才有了贯穿全村的新道路网络，过去四处乱跑的羊群践踏和损坏了农民的财产，而现在则可以沿着道路前进，杰纳斯塔作为一名老兵完全有可能说出他对牧师布道时鼓吹的“蛋奶烘饼”（色拉）的怀疑，但贝纳西斯却认为教士的布道有很高的价值，无论是精神上的价值还是物质上的价值。

假如我对这点也会表示某种程度的怀疑，也是可以得到原谅的。我想指出，这位医生所倡导的功利主义的基督教教义在教化农民方面并不是那么奏效：如果在这一课题的研究中获得的发现是可信的话，那么，很明显，在1815年到1833年间，在法国那些教会占统治地位的教区与那些农民憎恶或抵制教会的教区作一番经济上的比较，既没有取得更多的进步，也不会更加落后。总之，在这点上，我要大胆地说，我的看法与贝纳西斯及其同伴让维埃的观点相左。在我看来，这些农村牧师所起的开化作用更多地带有17世纪或18世纪的，而不是19世纪的特征。

切向克汀病患者的这第一刀简直会让我们惊讶得喘不过气来，尽管正如巴尔扎克所看到的，这只不过是"贝纳西斯手术"的第一阶段。为了投身于经济成长的冒险历程中，阿尔卑斯山的村庄必须先付出代价。他们已经这样做了。从那以后，从生理学的角度把甲状腺肿大清除和赶走了，当地的社会就能得到发展。这个村庄现在没有后顾之忧了，这位医生可以放手去创造他的经济奇迹。

134

在夏尔特勒斯省的这个地区，经济学家所说的那种"经济起飞"大致说来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这里不存在"为了革新而革新"的问题。无论怎么说，这个地区没有任何自然资源，既没有煤炭，又没有矿藏。这里也没有那种富裕、开明、手中握有资金并准备在本地投资的贵族地主。《乡村医生》所描写的地理范围是个没有贵族也没有庄园主的地区。这里只有俄国经济学家恰扬诺夫使用的新民粹派术语中所定义的那种"农民经济"，它的主要特征是，小块土地的广泛分布和拼凑；落后的分成制农业；文盲；贵族人数极少而且相当无知、懒惰和愚蠢；另外还有缺乏富裕家庭背景的居住在外地的地主。他们都没有能力领导农民，因为他们自己同样缺少魄力和胆识。也就是说，除非贝纳西斯亲自把这些贵族掌握在自己的手中，重新塑造他们，按照他自己的心愿，从这种毫无前途和希望的人力资源当中铸造出一个精英阶层来。准确地说，他就是这样做的。

这位好心的医生向克汀病发动了致命的打击之后，开始着手去完成一项在巴尔扎克看来是至关重要的任务：利用手头已有的资金去建立一个不大的市场经济，这意味着朝着正在迅速扩张的格勒诺布尔镇的方向发展。幸运的是这个市镇只有十几

英里远。能够拿到那里去出售的一点点剩余产品只有本地的农产品，但这是让农民摆脱蒙昧式贫穷生活的唯一希望。在这样的贫困中，农民心安理得，甚至从未作过任何斗争。

这个小地区的开放一旦开始，便沿着两条不同的路线进行。第一条道路并不特别壮观：只不过是栽种了一片柳林。由于注入了一小笔资本，那是一份从外地来的嫁妆，于是，一家编织篮子的工厂建了起来。现在，村民可以为他们的奶酪，一种当地的美味食品，制作小巧的容器，并送到山下的格勒诺布尔镇去。镇上的人对它简直着了迷。接着，又是在这位医生的鼓动下，他们用医生掏出来的私款作为部分资金，修筑了一条上山的道路，前任市长、一家锯木厂的老板现在可以把木材运到地区的首府。

135

事情的发展总是一环紧扣一环的。发展策略顺其自然地形成了：要运输木材，就需要马匹；要给马钉铁掌，就需要铁匠。过了不久，甚至连面包师也需要了，因为村民现在要运木材，太忙了，再也不能像往常那样自己烘制面包了。

第二阶段：如果说这是面包生产线上的一场大变革，可能有点牵强，但它毕竟把巴尔扎克和他的代言人贝纳西斯继续引向了共同发展规划的第二阶段。其目标是引进大规模的农业生产。这是个棘手的问题，因为正如我前面所提到的，这里没有地方贵族、乡绅、前庄园主、王室地产的地主或富有的农民绅士，因此没有钱投资，以便树立起榜样。昂热维尔伯爵当时正在改造他所在的比盖的当地居民。他所从事的这种教化文明的使命，在我们夏尔特勒斯偏僻的山村没有人可以与他相比。在阿尔卑斯山，一切都要从零开始。这也意味着一方净土通常所具有的优势：在贝纳西斯的帮助下，村庄淘汰了扶杆

步犁，直接过渡到开始使用轮犁。那种旧式的农具效率很低，只不过刮破了一点地皮而已。于是，医生依照法国北部地区使用的耕犁为样式，让当地生产出这样的犁。但是，真正的问题还在其他方面：即土地、房屋和资金。十分幸运地是，就在这个时候一位救星意外地降临。他就是某个称作"格拉维埃先生，格勒诺布尔省政府官员"的人。他是一位拥有私有财产的富有的公仆。由于对市镇生活感到厌倦，整日被闲置的钱、官僚公文以及他那轻浮而又没有头脑的妻子包围着，使他皈依了贝纳西斯倡导的进步论的宗教，拿出了一大笔钱来支持一项规划。这项规划的内容是开垦荒地、建造房屋、旧房重建，出租夏尔特勒斯的这个地区里尚未开垦的或没有充分利用的土地。所有这些却激起了这位医生的仿效心理，他追随在那位老官僚的后面，也拿出了自己的钱，去参加了开垦土地的计划，尽管他拿出来的钱比实际上要少多了。总共有 6 家农场建成了，其中格拉维埃有 4 家，医生有 2 家。每家农场占地约 40 公顷（约合 100 英亩），加在一起总共是 250 公顷（600 英亩）。这些农场现在出租给佃农，从而带来了无疑是受到欢迎的重大的变革，改变了过去在这个地区占主导地位的陈旧和落后的分成制，接着，又出现了另一个奇迹：由于进一步开垦荒地的结果，这些征服者额外增加了 250 公顷土地。但是，这一次开垦出来的土地成为农民的个人财产。说到这里，我们发现自己来到了这部小说当中即使不能算是最愚蠢的，至少也是最具空想的那一部分，越过了自身发展的进度。我们几乎像是来到了 19 世纪美国的边疆上或在加拿大的大草原上。正当贝纳西斯和格拉维埃忙于在小麦地打赢这场战争的时候，人口也有了迅速的增加。在一年之内，70 座房屋建了起

136

来。当地人口在6周之内增加了数百人！纯粹是一部科幻小说！这500公顷的大农田是仅用了几年的时间就从此前一直长满着灌木丛林的荒地中开拓出来的，这足以让熟悉19世纪的经济学家目瞪口呆。至于人口的"起飞"，一旦甲状腺肿大的克汀病患者被消灭，这个地区的居民人数立刻就像野兔一样成倍地增加。这个村庄的人数转眼间就增加了十倍以上，而这点时间还不够让贝纳西斯的头发转变成灰白色。那么，对此我们是否一笑置之呢？是，也不是。从短期的角度来看，巴尔扎克像众多幻想家那样过分地夸张了。但从中期的角度来看，他并没有弄错，这里更不必说从长期的角度来看了。在19世纪上半叶促进农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中，农业技术的巨大进步和人口的增长确实占有一席之地。但增长的规模比巴尔扎克所说的要小得多，尤其是在多菲内。

第三阶段：这个地区复兴中的这一阶段，与前一个阶段的"大跃进"相比，可信的程度较高。在这一时期，半商品化的并伴有手工生产的小规模农业重新出现。这两个因素曾经启动了第一阶段的"起飞"。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原因是这个地区十分幸运地邻近于格勒诺布尔镇的市场，而且就位于夏尔特勒斯地区的大门口。第二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外来投资的大量注入，尤其是来自城镇的资本，这里又有格勒诺布尔镇的资本，这两个因素便退居次要地位了。到了第三阶段，它们的重要地位得到恢复；正是因为有了这两个因素的存在，这里出现了与今天几乎各地的"合理的"发展预言家们提倡的那种发展模式相似的情况（一种建立在简单的技术和利用当地资源基础上的增长模式）。[5]格拉维埃和贝纳西斯的成功投资证明，靠外来的资金进行原始的资本积累已经成为可能。现在 137

发生了突然的变化：这种类型的资本投人已经让位更为缓慢的、更费力气、更具有小资产阶级特征的交易。我得承认，它们并不像第二阶段中资本的激增让我感到困惑。在路易－菲利浦的统治时期，法国外省生活中的典型就是内部的平缓进步。这里发生的事情与这样的典型更为吻合。在第三阶段中，一切都有可能，但都是小规模的。市场需求、劳动力的供应，从富有创新精神的农业家树立的榜样中产生的感召力，激励了现在已经摆脱了可怜的克汀病人的当地居民，去提高产量，增加品种，恰扬诺夫所说的那种家庭农场已开始生产挨家挨户上门推销或供市场出售的产品，仅仅在格勒诺布尔出售传统的奶酪已不再能够满足他们了。村民们现在也出售鸡蛋、家禽、水果和蔬菜。他们把当地的森林提供的木材做成各种形状或尺寸，迅速地运向城市。他们用赚来的钱买回铁料，让当地的年轻铁匠为农民及工匠打造工具。在经济增长各个阶段上的逐渐进步中，我们随后便看到在夏尔特勒斯地区的中心建起了食品商店和服装商店，有了杂货店、肉店和布店。山区消费者的欲望被激发起来，要去模仿城里人和本地名流的那种更“丰富”的生活方式，以便在社区中取得合适的地位。他们再也不能满足在餐桌上喝过去的那种菜汤或穿前人穿过的过时的马裤。与此同时，农业革命正在飞速进行：早在第二个阶段中，就不再种植过去那种只能用于熬粥和烘饼的荞麦了（与阿尔卑斯山区相比，布雷顿事实上种植荞麦更为普遍），改种适于做面包的良种谷物，如小麦和黑麦。甚至在牲畜饲养方面也发生了一场革命，开始注重饲养家畜。农民改进了家畜饲养的方法，并模仿瑞士或“奥弗涅”的式样建造了牛棚。（在后一点上，巴尔扎克的话完全不可信，因为奥弗涅是

·个很不发达的地区，即使是在牛棚的建造方面也绝无可能提供式样。)

由于小型金属加工厂、手工艺工业、食品店和服装店取得了成功，第二产业，也就是手工业者或工匠的部门，开始迅速发展。现在则需要第三产业部门，当然是小规模的，但实际上已经足够了。来自于四面八方的一批小文人聚集于这位医生以初步的行动建立起来的试验村。文人墨客，巧舌如簧的律师和兼职的教士纷纷涌来，任何人，只要没有工作、没有工资、没有年薪，也闻风而来。有了面包、肉和铁之后，教育便成了人们的第一需要。毕竟，人们获得的教育越多，然后生产出数量更多的铁、肉和面包的可能性就越大。因此，这座与昔日的落后状态彻底决裂的村庄，迎来了一位校长：当然，报酬很低，几乎就同村里治安员的工资差不多，只有村里牧师的三分之一。但是，巴尔扎克说，在当时，当地的牧师就是穷人心目中费奈隆大主教。他的布道对这个快速发展社区的道德风尚是必不可少的（因为他用来世享受天赐之福的前景去迷惑教区居民）。在路易－菲力浦时代首先倡导中庸之道的贝纳西斯十分清楚校长的任命中存在的问题。因此，为了不同教会发生冲突、又与法国大革命相协调，他希望把这个职位交给一位前宣誓派的教士（即宣誓效忠法国大革命的教士）。这位教士因承认《教士法》又受到主教管区内其他教士的疏远。这一地区还需要一名女教师：分配给她的任务是教育资本主义革命的受益者，即比较富裕的农民的女儿（也许将来的某一天，这些女孩将成为这个地区的小包法利夫人）。最后，若没有饮酒消费量的上升以及带酒的欢宴，就谈不上生活水准的提高。邻村的山坡不适合种小麦，因为这位医生发明的重型犁在那里

138

没有用武之地,因此适合于用锄头和手扶犁,并种上了葡萄。几家酒店同时开张，而且就设在贝纳西斯所建立的那座小城市的入口处。它们在当时还没有被看作是酗酒行为的根源，也没有意识到总有一天正是为了反对酗酒行为而涌现出了禁酒主义者。相反,它们在当时也卷进了社会进步的激流中。美酒、商品交易和新的观念都混合在这股激流中。后来成为阿尔卑斯山区生活中一大特色的旅游业现在也开始起步。有一家旅馆开张,以满足到大夏尔特勒斯观光的人们的需要。

在这个飞速成长的小小世界的中心，长出了一片可盈利的森林，就是在把克汀病患者强行驱逐的那块土地上。巴尔扎克笔下的树木长得很快,简直太快了,不必当真,但我们必须明白，他得使树木的生长速度跟上我们这位好心的医生各项事业进展的步伐,因为他的时间是有限的。渐渐地,这些高耸的树木用它浓密的枝叶掩盖了人们对原罪的记忆：一群无辜、低能而没有反抗能力的人曾被残酷地驱逐出境。一边读着《乡村医生》，人们一边会自然地想到漫山遍野都覆盖着的茂盛树林。这并不是读者的错误。但是,在这点上,巴尔扎克全然是脱离事实的:他的小说超越了现实,从而也越过了可能性的范围。在阿尔卑斯山区这个飞速发展的世界里，医生似乎成功地改变了气候!竟然连片雪都未落!巴尔扎克的地理概念也有点模糊:从这个虚构出来的夏尔特勒斯,向南望去,穿过山谷，人们所能看到的事实上是从西向东北延伸的一大片土地,也就是里昂人(位于它的西面)、多菲内人(实际情况是,在它的南面)以及莫里人和萨伏伊人(分别在北面和东北面)居住的地方。

贝纳西斯医生独自一人以宏大的气势奏完了这个地区的

139

革命交响乐的前三个乐章，现在正进入第四个乐章。第四乐章将把这个地区带入工业的成熟期。当地制造业部门的起点是过去的一家小锯木厂；不久以后又建成了一些小作坊，所生产的产品也很少运至格勒诺布尔镇以外的地方。现在，经过了那个出现了农业革命和土地租赁的阶段，“近代”工业即将形成，至少已具备了雏形。因为除了食品与衣物外，乡村经济还包含更多的内容：人们的双脚必须穿鞋，头上必须戴帽子，一家人必须住在房子里。于是，一些有企业头脑的商人白手起家创办了各类工厂，他们当中有的来自外地，但也有一些是本地人；首先建成的是一家砖瓦厂（似乎是靠它的老板过去常在夜晚出去偷来的柴火起家的）；接着，办起了制鞋厂和制帽厂，并因此自然而然地导致了制革厂和帽子集市的开办，并与瑞士和法国境内阿尔卑斯山区的市场相联系。初期城市化的第一个特征也开始出现，表现在药剂师、书商、钟表匠和家具商人开办的挂着新招牌的商店上。我们立即获得了一种印象，不久的将来，这座曾经被诅咒的村庄就能与格勒诺布尔、尚贝里及阿尔瓦等城市相媲美。

140 巴尔扎克所设计的农业和制造业的发展模式尽管散发出了浮士德式的激情，而且小说家使用夸张手法也是合法的，但这个设计确实与瑟堡—巴黎—牟罗兹—线以南的地区，即“传统的”法国19世纪前段的大部分时间的发展模式相吻合（当然，与这一时期在圣艾田、阿莱和德卡斯维尔出现的真正的资本主义发展并不相同）。在贝纳西斯医生的这座山上还没有鼓风炉或化学厂来污染巴尔扎克理想中的多菲内城市的空气。以简单技术为基础的制造业同样应归功夏尔特勒斯的这位救世主，是嫁接在企业的背景之上的小型企业，还是半农业

和半手工业的性质，正是这样的制造业推动了经济起飞。这种综合是某种经济成长类型中的典型，即小资产阶级式的和无污染型的经济成长。在19世纪欧洲的许多地区，尤其是在南部，人们都能看到这种类型的经济增长。由于在这个阶段上不适当地占据着领先位置的大规模工业和金融资本主义取得了更"辉煌"的成就，使我们陷入了目的论的盲区，因此，今天把这些全忘掉了。然而，正是在这种有效率但不引人注目的小规模的发展之上，建立起了近代社会，如在法国的中部和地中海沿岸，在意大利和西班牙。当然，那些烟雾弥漫的地区不属于这种情况，因为那里发生了"真正的"工业革命，兰开夏式的工业革命。但是，只有后一种工业革命在历史著作中得到了承认，因为这是一种最终取得了成功的工业革命。《乡村医生》称颂了手工业式的现代化道路：它处在热米纳尔谱系的另一端，是另一种类型的充满痛苦的经济成长的史诗。

然而，这样一些小资产阶级的特征并不能阻止好心的医生用了20多年的时间建立起来的社会变得极度的不平等。贝纳西斯本人也意识到了这一事实：在夏尔特勒斯他的这个小社区里，经历了他带来的巨变之后，有一些家庭致富了，虽然谈不上是奢侈；还有人数更少的一部分人可以称得上是富人；但绝大多数是贫穷的劳动者；而且从理论上讲，没有一个乞丐（虽然这看起来是不可能的）。可以说，经济成长的进程控制得相当好。这位当地的救世主一手创办的医疗事业和社会事业最终产生了一种混合物：它把只在本地出售其产品的小型家庭农业、大规模的租赁农业、手工业生产、自筹资金的制造业以及心中稍有不满的小资产阶级混合在一起。这种混合物与卢瓦尔省南部地区的实际状况极为相似，与后来卡尔·马

141

克思在那个世纪里所作的描述不同。小块土地、小商店和作坊，如果说不是在 1950 年或更晚的时期，至少在 1910 年之前，依然是西方经济的必要组成部分。

然而，如果把贝纳西斯推动经济成长的发展策略描绘得过于理想化的话，则是错误的：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这个策略存在着自身的缺点，甚至带来了贻害无穷的副产品，例如，低工资就是农产品自 1818 年以来持续保持着低价格而导致的结果。低工资在夏尔特勒斯的这个正在发展的小角落里尤为普遍。这一点没有丝毫讽刺的意味，巴尔扎克把这看作是法国经济发展的万灵药。

巴尔扎克所描述的农村生活，除了显而易见的贫困之外，还提到了缺乏性的贫穷或被社会排斥的问题，无论这是否由低工资引起，但他在这样做的时候有时把这些问题变形了：一对老夫妇靠开垦一小块土地在野外山坡上勉强度日；拉福斯（意为住在山沟里的人）是一个靠乞讨为生的女孩，也是流浪的儿童与青少年的唯一代表。他们之所以流浪是因为他们的村庄被遗弃了。以这个女孩为例，巴尔扎克试图而且不止一次地完成了他先前已完成的变形的描述，即那位不杀害婴儿的奶妈。如果是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拉福斯可能会被塑造成一个令人无限同情的人物，就像《白痴》中的那个瑞士农村小姑娘玛丽那样。然而，在巴尔扎克这位用著作为资产阶级赎罪的辩护者的笔下，拉福斯获得拯救的方式并无多大的诗意。她当上一名亚麻纺织女工，整日辛苦地劳动。贝纳西斯不仅为她谋得了这项工作，而且不断地关怀着她。

另一位遭到社会排斥的人物是比蒂费，一位打羚羊的猎人，是来自芒德兰乡的鞋子走私人。[6]来自都兰的巴尔扎克对

阿尔卑斯山当地的人并不熟悉，因此在描述他们的时候通常缺乏激情。但是，当他描绘比蒂费的时候，却灵感迸发：山里人杰出的运动才能以及匪夷所思的攀岩技巧深深地把他吸引住了，因此，我们才能欣赏到一段诗情画意的描述。比蒂费过时的生活方式以偷猎和走私为基础，十分适合山区的生态环境。却再也不能适应贝纳西斯为秩序井然的社会所规定的规范。被好心的医生改造过的这位主人公，比蒂费，现在必须去完成另一项任务，用萨伏伊山区男子汉的勇敢精神去培养杰纳斯塔的儿子(他后来成了巴黎工科学院的学生)。完成这项任务以后，他离开山区，来到一片新的大陆上，转而把他的天分贡献给了军队，即社会叛逆者最后的避难所。他在那儿赚取军俸并最终赢得了一块英雄的墓碑。

142

比蒂费住的地方，野兽出没，他在山顶上过着艰苦而乏味的生活。但是，另一个村民，贡德兰，把我们的视线引向了另一个方向，进人了政治斗争的复杂领域。贡德兰是荣誉军团的幸存者，跛了一条腿。贡德兰靠贝雷希纳冰冷的水奇迹般地挽救了自己的生命。回到家乡以后，他发现本该由他领取的残疾抚恤金被卑鄙的官僚剥夺了。这个厌烦了战争的退伍军人提出了针对政府的指控，小说写到这里才第一次展示了政治性的抗议活动向这个地区的蔓延，若非如此，这个地区并不会那么急切地参与到历史中去，或引起对它自身的注意。直到这里，这本书似乎想要说明公正和福利是贝纳西斯按自上而下的方式赐予的，而不是农民以自下而上的方式要求的。(在这点上，巴尔扎克的观点与多菲内的实际情况相差很大，即使在草根层次*上，1789年后的多菲内也是一个非常革

* "草根"在年鉴学派的术语中指下层人民群众。——译者注

命的省份。)

不过，且让我们从巴尔扎克认为是最合适的观点来观察这个事件：这是一种从几乎所有方面来说都是爱好和平的观点。确实，贝纳西斯不仅知道，而且能够准确地衡量把资产阶级从广大民众，甚至更多地是从农民中分离开来的那条相互缺乏理解而产生的鸿沟。在这位医生花了大量的时间并采用了各种策略以后才成功地与下层民众举行了一次对话，自然是家长式的对话：他们从未想到要将他转变为普选制的支持者。所有的人都认为这条“鸿沟”依然是很深的，只有贝纳西斯除外。在鸿沟那一边的农民当中，顺从多于反叛。需要有贡德兰那种通过服兵役而变得城市化了的经历，才会从这个农民社区中爆发出巨大怒火去反抗那个竟敢拒绝向一位伤残军人支付微薄抚恤金的政权。这位曾经是荣誉军团中的一名军人，到了最后却产生了不满。这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在法国的这些边远地区，以独特的方式制造出了拿破仑的传奇。这就是农民当中的政治觉醒与政治意识。 143

贡德兰揭露了新政权的一个污点。而另外一些污点有着极不相同的根源：贝纳西斯引以自豪并十分欣赏的粮食生产革命导致了借贷人和贷款人的问世，因为当时还没有农业信贷系统的运行。某位塔博洛先生通过为购买粮食种籽的人提供贷款，随后又按照极高的利息率来收回贷款，从而聚敛起大量的财富。贝纳西斯对这种做法并不反对，而且认为这是他所发起的自我持续发展体制必然导致的结果。他成功地得到了人们的合作，以便这样去做，但他从未想到要问问他们有什么看法。

根据现在的某些专家的观点，许多事例表明，发展并不是

通过习性的某些突然变化而实现的，而是通过传统文化中已经存在着的一些因素发挥作用，将其自身引向了经济增长。日本和印度尼西亚都是可靠的事例，证明了这个理论的正确性，并使研究经济“起飞”的学者为之着迷。巴尔扎克，作为一个在假日忙于追逐爱情的纯业余的民俗学家，却具备了卓越能力对民俗学进行综合的考察。他以极快的速度去研究了一两个山区或农村地区，这时，他凭着强烈的直觉，已经意识到了这所有的一切。远在阿尔伯特·赫希曼和克利福德·格尔兹用学术性更强的（有时是更冗长的）术语表达出来的这个现在已经是不证自明的真理以前，巴尔扎克早就对此有了认识。

在使现已存在的对经济起飞有利的或不利的因素发生作用的过程中，对待家庭、家族和死亡的态度是至关重要的，《乡村医生》中的那种依然在农村的、传统的、地区的框架内实行的起飞，尤其如此。

144

让贝纳西斯和杰纳斯塔再次为我们做向导，走下山去，到那个所有人都想诅咒的山谷里去。那儿阳光难得照射进来，空气污浊，满是毒雾。贫穷不堪而又无能为力的农民很快就忘却了他们当中的死者，在父亲或丈夫的尸体旁，可怜的妇人一只眼睛流着泪，另一只眼睛紧紧盯着前来吊唁的邻居，提醒他们还欠居丧人家的一两个先令。在尸体上洒上几滴圣水，匆匆忙忙地安葬，不出一星期，死者就被遗忘了。

在社区里，对待死亡的态度也可能会随社会—地理的差异而有所不同。且让我们随着医生登上夏尔特勒斯的山坡。这儿，巴尔扎克把贝纳西斯制造出来供当地居民们使用的“小博斯”（Little Beauce，原文如此）就安置在山顶上。[7]这是一片

靠人工堆起的平地。就是这块虚构的和原型的博斯被巴尔扎克用来作为精心准备好了的基础，以此为依据，兜售他从一些具体事例中构筑起来的社会学观点，再将它上升到一般定理的高度：在阿尔卑斯山这片绵延起伏不适合种植谷物（从理论上讲，这是使用这块土地的正确方法）的"敞田"（原文如此）上，格拉维埃先生办起了一些专门饲养牲畜的大农场。在示范牛棚中，有一种设计精巧的排水管，以便排走畜尿和稀粪。到了冬天，全家人和农场的帮工还可以一分钱都不花地在两行牛群之间取暖。如果没有强大而且充满了活力的结构，简单地说，这里指的就是处理死者的结构，以维持这个村落里参与租佃农场的集体事业的每个成员的努力和希望，那么，所有这些都不能正常运作，格拉维埃先生也不可能每年收到1000法郎的租金。这是他给每家农场投资的回报。在这些家庭中，每个家庭的户主，即租佃持有农的死亡，都要举办一场冗长的葬礼。这类仪式的踪迹在全国许多地方的民间歌谣和档案记录中依然可以看到。巴尔扎克在《乡村医生》一书中所描述的那位富裕农场主的葬礼，毫无疑问，要么是依据他的亲身观察，要么是依据亲眼目睹过这一仪式的某个人提供的资料，但这样的葬礼未必是多菲内地区特有的。我们可以这样来做一个摘要性的描述：为死者长时间地守灵；全家人都聚集在死者的房屋里，从死者去世那天算起，要持续一周以上；他的妻子在真心哀悼的同时又要做出仪式化的哀悼，作为一家之母的寡妻将独自一人地活下去；农场中的仆人都参加哀悼仪式，他们依然是以后的农场主扩展型家庭中的成员，不管是觉得更好还是更坏，不管是悲伤还是高兴，不管是受到了打击还是为了分享食物，除非他们被遣散，或者说直到他们被解雇。农场

145

的帮工也聚集在平躺着的尸体旁，每隔一段时间便大声哭嚎：主人去了！（应理解为：新主人万岁！）这种在去世和下葬时上演的集体仪式直接来源于反宗教改革时期倡导的家庭仪式。[8]这样做有两方面的好处。一方面，这能巩固家庭的凝聚力和家庭的连续性。与此同时，为了拥有土地的资产阶级能获得合理的利润，这样做又保证了充当租佃农场主的农民家庭得以维持。他们期望耕种由父亲传给儿子的这同一块土地，而对这块属于地主的土地又没有合法的权利。然而从巴尔扎克的功利主义哲学家的观点来看，有没有为死者举办的家庭仪式就相当于有没有资本密集型的、有效的和基础牢固的大农业。

在农民文化中，有关死亡的民间传说在来世论的思想中达到了顶点。这并非一种在任何时候都是基督教的思想。在谷仓中守夜的日子里，妇女们纺纱并做些针线活；男人们则无事可干；但所有的男女都全神贯注地听人讲故事。研究这样的守夜是巴尔扎克的民俗学的特点之一。从这个方面而言，听故事的人们在晚间这样地聚集在谷仓里，与布雷顿的雷蒂夫故事中勃艮第农民以及比利牛斯山区 14 世纪的农民并没有什么区别。所有这些人真正关心的是人死了以后他的灵魂在四处游荡。杰纳斯塔曾躲藏在大厅的楼上偷听了一个旅行者被谋杀的故事。这个故事很能说明这方面问题。讲故事的人是这样叙述的：

146

> 旅行者被杀死以后，他的尸体扔给了猪，给猪当作饲料吃掉了；后来，这具尸体又从亚麻商人的烟囱里，一片片地回到了地面上：这个亚麻商人当时十分惊恐地目击了这次谋杀的过程；但是，由于害怕，她保持了沉默，也没

有向法庭告发。这具尸体向这个妇女哀求，请她尽到责任。最终，她顺从了：向法官揭发了凶手。凶手们在公共广场上被车裂处死。这个屈死的人因此报了仇，从此可以安息于地下，灵魂得到了拯救。多么奇妙啊！由于这个亚麻商人成功地恢复了勇气，因此得到了回报，她房屋的周围从此长出了从来没有见过的那么好的亚麻，[9]获得了丰收，而且还生了一个男孩。

就这样，在巴尔扎克亲耳听到的这个乡村民间故事中，地下的肥沃和死者在彼世刚刚得到的安息是相辅相成的，在逻辑上互为补充。一报还一报；如果每个人，无论是生者还是死者，只要安分守己，就一定会得到好报。

这难道是保守和反动的民间故事吗？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顺带说一句，叙述这个亚麻商人故事的人是在挖苦过去的领主和主人，说他们常常"视农民为鱼肉"。但真实的、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领主和主人似乎早就从贝纳西斯的地区消失了。因此，这些夸张的故事所包含反领主制的宣传只是象征性地抨击了权威，仅仅是无关痛痒的攻击。但是，读者翻到巴尔扎克另一部同一题材的文学作品时，就会发现里面出现有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民间故事。我们依然是在谷仓里长时间地守夜，而且还要再一次把这次守夜看作是一个"理想类型"。这样的一种仪式也许不会像巴尔扎克所描述的那样，但它凝聚着他所做的各种观察以及别人告诉他的一些东西。

这次，在通宵守夜的后半段时间，由于戈盖拉讲故事的技巧，拿破仑的传奇整个变得栩栩如生了。戈盖拉过去是一名步兵，现在已经回到家乡，在贝纳西斯改造过的地区当上了乡村步行邮递员(*piéton*)。这位邮递员极其详细地向我们描述了

"人民的拿破仑"。他是不是把这个传奇故事中最有煽动性的内容灌输给了听故事的人呢？是的，也就是说，在谷仓里讲的第二个故事既转弯抹角地又直接地攻击了1815年复辟后的法国国王的权力；还可以说，这个满怀着激情说出来的故事预言着未来的胜利，即远在将来的1850年之后的法兰西第二帝国皇帝的胜利。然而，如果把帝国之鹰的传说夸大到说它带有进步论的主题，则又是错误的。这个传说充满了奇迹和超自然的力量；把农民的想象融进了民间传说。首先，而且是最重要的，它强调了那位科西嘉士兵是个幸运之星，从督政府到帝国的整个时期，神秘的好运气一直伴随着他。只要那个帮助了波拿巴的神秘的"红衣人"还在，这颗星就会永远照耀着，并且给他们带来好处。1814—1815年，红衣人抛弃了他的被保护人，把宠爱转到了波旁家族身上。然后，便发生了拿破仑在滑铁卢战役的惨败并被流放到圣赫勒拿岛上。

147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士兵把传奇故事带回村庄以前的一个多世纪里、早在牛仔和印第安人的幻想故事传到这里的很久以前，拿破仑在法国农村中已经是一位民间英雄了。这位"小伍长"(拿破仑一世的绰号)是法国乡村民间传说中最具超凡魅力的历史人物之一，在他之前有查理曼大帝，在他之后则有一战中的法国士兵和水牛比尔。

作为研究农村社会的历史学家，我特别重视这部小说中与农村生活有密切关系的那些方面。巴尔扎克是个不够严谨的人类学家，也是个很不准确的地理学家，但凭着他那一流记者的以及人类学综合的开拓者的犀利目光弥补了这一不足。当他匆匆经过阿尔卑斯山区的时候，眼光飞快地一扫，便抓住

了真正要害的问题，为了让住在城市里的读者便于理解，将一些零星观察集合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尽管如此，乡村对他来说还是一个格格不入的、陌生的和原始的世界。只要记住了这一点，我们便可以看到《乡村医生》一书对农民社区特殊的态度介于布雷顿的雷蒂夫直觉的同情与莫泊桑带有种族偏见的蔑视之间。像巴尔扎克所写的那种外人的评价，实际上源于合理的观察角度：向城市挥手告别，到农村去生活，在巴尔扎克看来，是退伍军人和一身珠光宝气的情人们乐意做的那种事情：当一个人厌倦了杀戮和亲吻，厌倦了战争与情人，他就退隐乡村，将他们剩余的创造能力用于教化民众的事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尽管巴尔扎克具备某些特别敏锐的洞察力，但他依然处在农村社会这个主题的边缘上。相反，雷蒂夫则能从内部入手，将农村社会描绘得栩栩如生。19 世纪 30 年代的一个真实生活中的事例，即农民彼埃尔·里维埃尔的故事（1973 年，米歇尔·福柯发表了彼埃尔·里维埃尔的传记）比贝纳西斯和杰纳斯塔告诉了我们更多的法国农村的私生活。里维埃尔是一个在诺曼底长大的男孩，杀害了自己的父母，他写的自传十分清楚地展示了法国农民迄今为止仍然隐藏着的面孔。 148

巴尔扎克所做的一切只不过是牵着我们的手，将我们带到神秘的农村的村口上；却没能让我们一览无余。

他的真正优点还在其他方面：《乡村医生》以最轻快的笔触向几乎各地的行政官员、俗气的城市居民和资产阶级提供了能用来帮助农民社区自救的方法。贝纳西斯这位卓越的实践者，也是一位新社会秩序的助产士。他用来操纵社会的技巧既不是“资本主义的”又不是“社会主义的”；而是以家庭为基础的，手工业者式的，业主式的技巧。如果将之看作是布热

德运动，那是不对的 《乡村医生》仅仅强调了源于农村需求和习俗的简单技术所具有的重要性。它充分利用了当时的人口增长，无视圣西门等空想社会主义者所寄予希望的炼铁高炉和铁路；更不去理会像急救绷带一样把长期欠发达的现实牢牢束缚住的那种宏伟但空洞的工程。《乡村医生》像是一本便览手册，没有高深的术语，它描述了在旧式的19世纪如何取得社会发展的技巧。对于今天那些认为小的就是好的研究经济增长的专家们来说，它依然可以用作一本有益的手册。《乡村医生》一书实用而不尚浮夸，对于20世纪的技术官员来说，是极有启发作用的，只要他们能拨冗读读这本书。

注 释

[1] 本文首次发表时是作为纪念巴尔扎克而给修订版的《乡村医生》所写的序言。该书由加利马尔"手稿"收藏馆出版，巴黎，1974年。

[2] 这部小说的背景是夏尔特勒斯的前阿尔卑斯山山丘下的一座市镇。

[3] 莫里斯·加尔登：《18世纪的里昂和里昂人》(Maurice Garden, *Lyon et les Lyonnais au XVIIIe siècle*)，巴黎，1970年。

[4] 诺埃尔·迪·费伊：《16世纪法国故事员乡村对话》(Noël du Fail, *Propos rustiques*)，彼埃尔·儒尔达(Pierre Jourda)版，巴黎，1956年。

[5] 阿尔伯特·O·赫希曼：《经济发展的策略》(Albert O. Hirschman, *The Strateg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耶鲁大学出版社，纽黑文和伦敦，1958年；克利福德·格尔兹：《小贩与王子》(Clifford Geertz: *Peddlers and Princes*)，芝加哥大学出版社，芝加哥和伦敦，1963年。

[6] 芒德兰以犯法和走私著名。

[7] 博斯是巴黎以南种植谷物的平原。

[8] 米歇尔·沃维尔：《18世纪普罗旺斯的巴罗克时代的虔诚与基督教的淡化》(Michel Vovell, *Piété baroque et déchristianisation en Provence au XVIIIe siècle*)，巴黎，1973年。

[9] 关于巴尔扎克笔下的农民家庭和房屋的附属建筑，请参见这部小说中有关驱逐穷人和克汀病人的那一章节所作的精彩描写。

第六章　凡尔赛一瞥：1709年路易十四的宫廷[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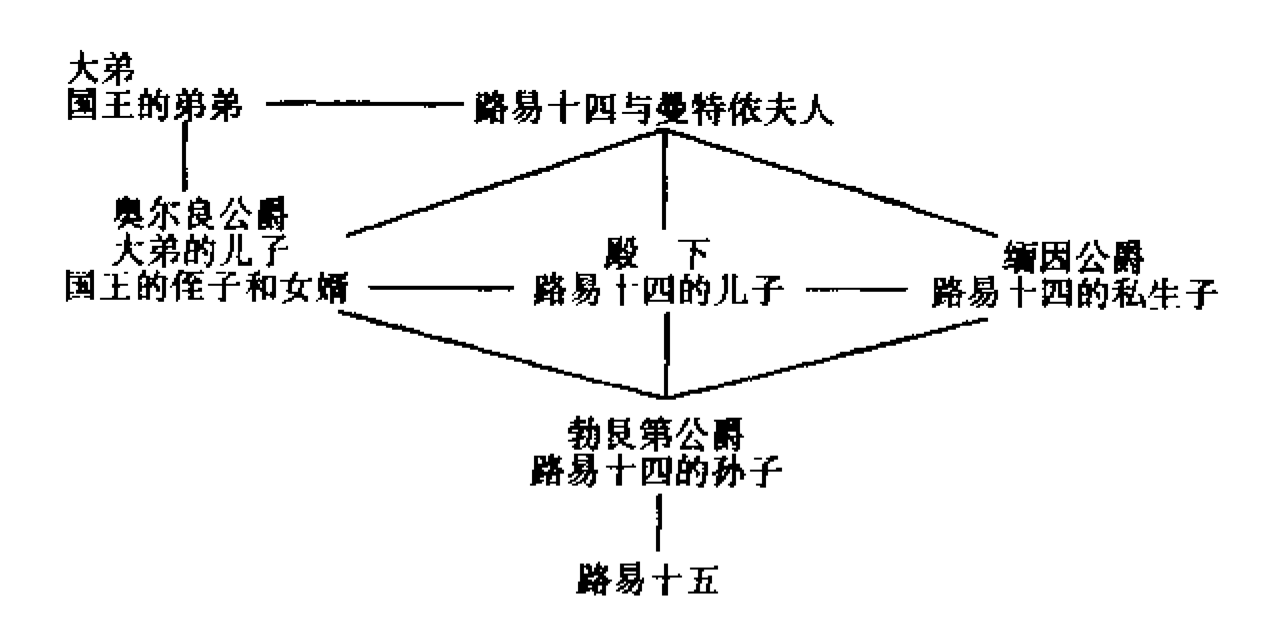
对凡尔赛宫廷的研究是把各种类型的研究，比如说对小集团的研究，或者对封闭社区的研究（这个社区可能包括几万人，但是，在任何特定的时间里，只有其中的几百人或几十人才有势力）中遇到的课题结合在一起；还有对权力或影响力问题的理解（宫廷本身并没有权力，但它构成了一个行使权力所围绕的物质性环境。这里的权力是由国王本人及大臣的活动体现出来的；因此可以把它描绘成对“决策过程”有影响力的不可轻视的压力集团）。本文可以看作是对有关旧制度的潜在“政治科学”研究的一点贡献。

目前这个个案研究的起点，是圣西蒙公爵在《回忆录》中所描述的路易十四统治后期的宫廷。我们在其中将会发现这位“小公爵”绘制的一幅“主观”图景，一幅未必与真实世界中的事实相一致的图景。人们应当根据这一点来考察圣西蒙公爵提供的资料，但这会使我们超越为这个研究而特地划出的界限，而这项研究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提出一种模型。我使用的资料是其《回忆录》的一部分，时间为1709年。圣西蒙公爵在《回忆录》中描绘了“卡巴尔”集团，即宫廷中的各个派系：

我很难找到合适的词汇来表达我要表达的事情。经历了旺多姆和夏米亚尔(这两人最后已失势)的地位和命运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后，这个宫廷的内部分裂更甚于前。说它是阴谋集团(cabal)也许有些过分,但我还无法找到一个更准确的词来描绘它。所以尽管“卡巴尔”(阴谋集团)一词太重,我还是使用它,不过同时需要提醒一句,这个词有点言过其实……这个宫廷分裂成三个派系，包括了所有显贵……[2]

下面就来评论一下不同派系的成员的自我心理或他们所缺乏的自我。

150 为了简化一下可能在读者的脑海形成的这三人派系的状况,我把他们置于纵轴线,即辈份轴中来表示。这幅还带有一根横轴线的图表达了宫廷的“分子结构”。



这个钻石形的图的顶端是路易十四和他的妻子曼特侬夫人。他们的婚姻虽然没有公开,但世人皆知。占据这个几何图形中心位置的是殿下，即路易十四的婚生子和既定的继承人(尽管后来他实际上比他父亲还早死几年)。位于图形中心的

殿下可以看作是这个系统的重心。钻石的底部是勃艮第公爵（与勃艮第女公爵结婚）。他是殿下的儿子，按照家族的继承顺序是王位的第二继承人。在图形底部本应用一条虚线指向未来的路易十五，因为当时他还未出生，但很快就要在 1710 年出生。

圣西蒙的文章中紧接下来的一段就提到了纵轴线上的三个关键人物（路易十四—曼特侬夫人；殿下；勃艮第公爵和女公爵）：

> 第一个（阴谋集团）集聚在曼特侬夫人的羽翼下；它的主要成员因为急于要从夏米亚尔（失势的大臣）的衰落中尽可能多地获益，又从他们曾极力怂恿过的旺多姆（失势的元帅）的衰败中受到鼓舞，所以与勃艮第女公爵夫人相互利用，且与殿下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教　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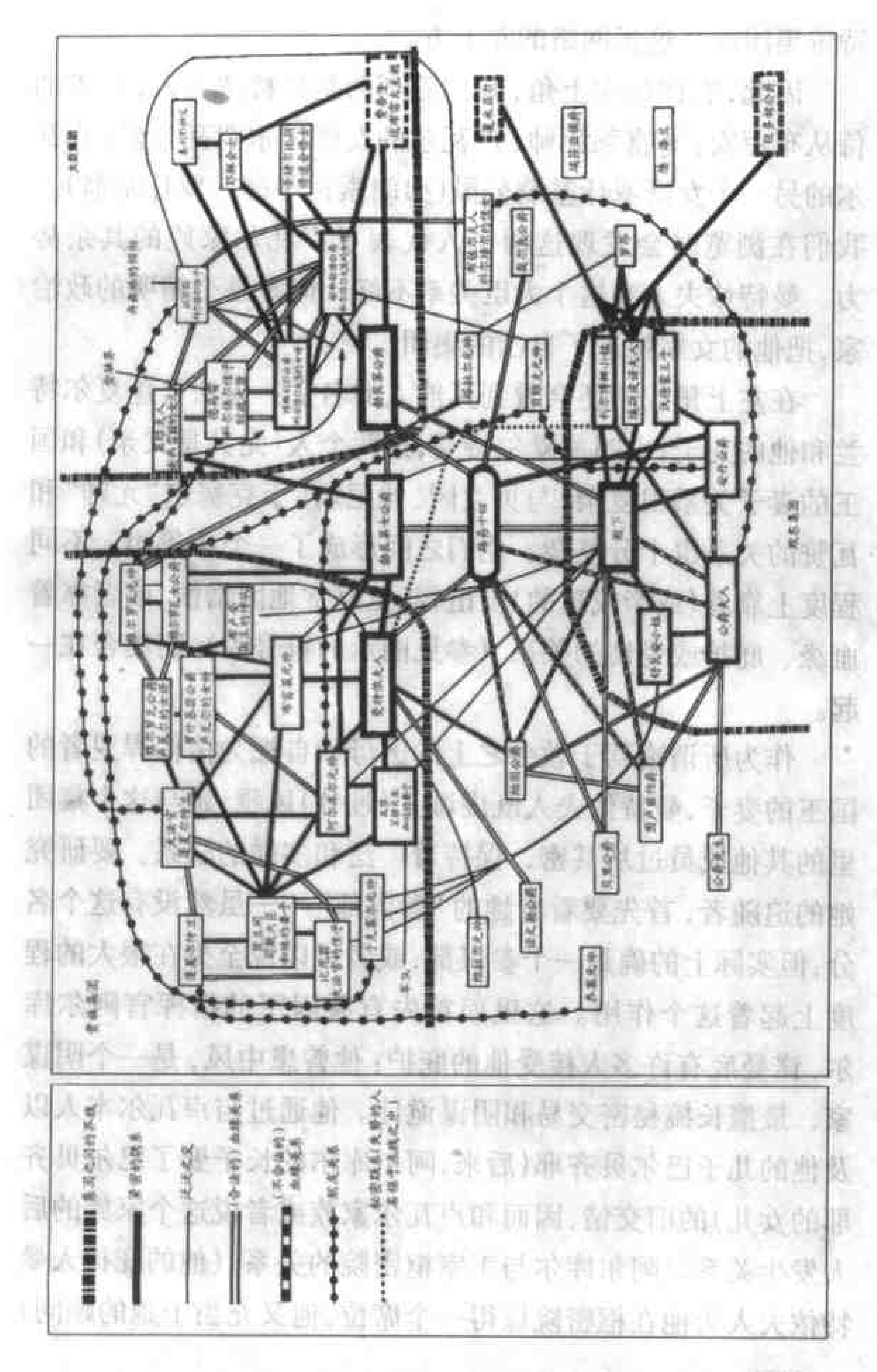
151

下文是对第一阴谋集团，即曼特侬夫人的阴谋集团的描绘；列出了该集团成员的名单及其个性，并对其中一些人作了详略不等的评述。

> 他们（这个集团的成员）享有良好的公众舆论，还分享着布富莱元帅的荣耀。集团中的其他成员都围绕在他身边，为提高自己的声望并利用他。阿尔库尔，甚至从还在莱因银行的时候起，就是该集团的引导人；瓦赞和他的妻子都乐意为别人效劳，借此从那些人当中得到支持。处在幕后的是大法官，他突然为曼特侬夫人所厌恶，随后又遭到国王的冷遇，这些［让他］极度愤慨，蓬夏尔特兰

(大法官的儿子)在暗暗支持他;司厩大臣[贝兰冈]长期以来一直在玩弄着阴谋，是他推动了阿尔库尔和大法官的联合,并煽动他们付诸行动;他的堂弟于克塞尔外表上一副学究的样子;实际上愤世嫉俗,花天酒地,欺诈成性,他的品质我已经在第380页上(即回忆录的手稿里)作了描述。他被最阴险的野心所吞噬。殿下曾经听了舒瓦安小姐(殿下的情妇)的话而对他评价极高,因为舒瓦安小姐的头脑里早就溢满了贝兰冈以及他的妻子和比尼翁对他的褒扬之词;维尔罗瓦元帅虽然失势,但从未失去过曼特侬夫人的宠幸,因为这一点,再加上由于曼特侬夫人的关照,国王可能会像从前一样宠爱他,所以他仍受到其他人的尊重;维尔罗瓦公爵(元帅之子)虽然得到父亲的鼓励,但他和父亲走的是颇为不同的两条路;罗什基翁(罗什福库尔的弗朗索瓦)总是面带笑容,什么都不说,却悄悄布下陷阱。他们通过布卢安(国王的首席随从长官)和其他秘密通道,无事不知,得到殿下的完全信任;对旺多姆和夏米亚尔的失势,他们也施加了一定的间接影响;维尔罗瓦女公爵也是这个集团的人,虽然头脑简单,但她的常识、异常的谨慎、密不透风的保密习惯以及勃艮第女公爵夫人对她的信任，都能弥补这点不足。维尔罗瓦女公爵不管怎样劝说勃艮第女公爵夫人,后者都会听从。

152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能够暂停下来加以考察的曼特侬集团。由于这个集团中的第一夫人和国王的婚姻关系,所以,可以认为这个集团与路易十四国王关系十分密切。雅尼·德弗尔德罗和我绘制了一张图来表示这三个集团的网络关系(见钻石图形)。为了便于清楚地说明他们之间的关系,我们把曼



特依集团放在这张网络的左上方。

因此，在图的左上角，我们看到的是曼特依夫人；国王的侍从布卢安；布富莱元帅；卢瓦尔的女婿维尔罗瓦公爵；卢瓦尔的另一个女婿罗什基翁公爵(弗朗索瓦·德·罗什基翁)。我们在浏览时会发现这两个人代表了卢瓦尔家族的其余势力。曼特依夫人和这个大臣关系不好，但她是个精明的政治家，把他的女婿拉进了自己的集团。

在左上角我们还会看到其他人的名字：大法官蓬夏尔特兰和他的儿子，也叫蓬夏尔特兰；这两个人(尤其是父亲)和国王的妻子关系很复杂；与贝兰冈、比尼翁、于克塞尔"元帅"和瓦赞的关系也十分复杂。他们之间形成了一个小集团，不同程度上靠着(或亲或疏的)友谊，甚至反常地因憎恨，或者靠着血缘、庇护或爱情的关系（参见图示的符号表）而集合在一起。

作为所谓凌驾于教会之上的国母和自视为信仰捍卫者的国王的妻子，曼特依夫人既虔诚又(过分)风雅，她与这个集团里的其他成员过从甚密，保持着广泛和多样的联系。要研究她的追随者，首先要看看她的"参谋部"——虽然没有这个名分，但实际上的确是一个参谋部，或者可以说至少在很大的程度上起着这个作用。这里面首先有莱因军的指挥官阿尔库尔，诺曼底有许多人接受他的庇护：他曾患中风，是一个阴谋家，最擅长搞秘密交易和阴谋诡计。他通过与卢瓦尔本人以及他的儿子巴尔贝齐耶(后来，阿尔库尔的长子娶了巴尔贝齐耶的女儿)的旧交情，因而和卢瓦尔家族或者说这个家族的后人发生关系。阿尔库尔与王室枢密院的关系（他的庇护人曼特依夫人为他在枢密院谋得一个席位，他又充当了她的顾问）

值得我们做更深入研究。他一贯与科尔倍尔家族和勃艮第公爵党的成员谢弗勒兹公爵和博维利耶，也就是敌对曼特侬夫人的人——持完全对立的立场。 154

我已经提到了可以"客观上"称之为的曼特侬集团的参谋部；还有一位元帅应该列入其中，那就是布富莱元帅，此人无比诚实，却也有可能极其愚蠢，但在首都受到百姓喜爱。他给曼特侬集团带来了一种巴黎爱国主义的支持。

这里还有一些其他的元帅，简直连巧克力奶油做的军人还比不上。他们就是于克塞尔和维尔罗瓦。于克塞尔是一个"披着刚直外衣"的骗子，他和菲利波、贝兰冈家族及卢瓦尔家族有关连。维尔罗瓦只是个作秀的将军，极其无能，因军事上连遭败绩而降级，但他仍然可以向曼特侬夫人进言。他的儿子维尔罗瓦公爵是卢瓦尔的女婿，无失势之忧；至于他的儿媳，维尔罗瓦女公爵（没多少头脑，但有常识），是曼特侬集团与勃艮第女公爵联系的纽带，虽然不是唯一的纽带。她本人与对立的集团就有联系，至少可以通过丈夫去联系。

如果说阿尔库尔代表了诺曼底，维尔罗瓦代表了里昂，那么，从某种程度上说，于克塞尔就代表了阿尔萨斯。人们不应忽视地区间的联系，这种背景下的权力基础和庇护关系。

人们可能会注意到，还有一些元帅要么同殿下的集团有联系（例如旺多姆），要么完全游离于宫廷的集团以外（他们是一帮独来独往的人，就像沃邦那样）。有趣的是，在这些联系中我们注意到了勃艮第集团中实际上没有高级军官；他们恰好就像谢弗勒兹和博维利耶的个人性格所体现出来的那样，确实是个和平主义的集团。为了取得和平，它的成员会情愿抛弃西班牙波旁家族的国王，任他去遭受悲惨的命运。

“瓦赞和他的妻子都是(曼特侬夫人和阿尔库尔的)工具，同时又从他们那儿获得支持”。瓦赞出身于一个法国上诉法官的家族。这些家族为国家提供了许多议员、总督和高级官员，他们在政府和法庭中举足轻重。如果人们相信圣西蒙的话，就会相信如下事实：瓦赞精明的妻子将他推上了政坛，因为她丈夫在1692年战役期间担任埃诺的省总督时，她曾挖空心思极为周到地款待过曼特侬夫人。他接替夏米亚尔担任国防大臣的职位以后，又当上了国务大臣，在曼特侬夫人策划的各种事情中起着重要作用。由于国王不会乖乖听从她的耳边之言(情况确实远非如此)，所以，这位“教母”的长远目标是要让她自己的亲信成为枢密院大臣，这个人可以把她想要说的话在国王同大臣们开会的时候，间接地传给国王。她曾试图让她宠幸的阿尔库尔来充当这个角色，却没有成功，但这个角色最终被瓦赞所填补。在这个统治阶段结束时，他发挥了重要作用，把国王的遗嘱和附件当作“药片”一口吞下。当上大法官后，他一直保留了国务大臣的职位。他的妻子因为给曼特侬夫人留下了好印象，从而对他的政治生涯起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

155

> (在曼特侬集团)幕后的是大法官(蓬夏尔特兰)，曼特侬夫人对他的厌恶以及随后国王对他的冷淡曾让他极度愤慨。(他的儿子)蓬夏尔特兰在远处支持着他。

这里，圣西蒙揭示了他描绘这些集团的几个规则之一：一个人不可能一再受到集团的首领——这里指的就是“教母”本人的宠幸。然而，由于地位的关系，某个人会发现由于他与宫廷里的某些重要人物有联系或反对某些重要人物，而被“钉死”在他最初加人的那个关系网里，现在不得不屈居人下。非

利波－蓬夏尔特兰的例子在几个方面来看都是有普遍意义的：这是一个在17世纪专门产生官员的大家族之一，到了18世纪，他们又占据了最高层贵族当中的位置。而且，年轻一代的蓬夏尔特兰掌握了巴黎的司法权：他参与了这个城市里所有警方的机密，又把这些机密报告给国王。对他来说，无容置疑这是权力的源泉（尽管他和昂热昂松控制的警方的关系实际上很复杂）。

“通过布卢安以及其他的秘密交往，他们无所不知。”蓬夏尔特兰家族把我们引向了曼特侬集团权力的关键之一，即警务问题。路易·布卢安是国王的贴身侍从官，又是维尔罗瓦和罗什基翁（集团的两根支柱）的密友，再一次把我们引向告密的问题，但这次是发生在宫廷，而不是在首都。 156

作为凡尔赛的主管，布卢安率领着一支瑞士人组成的卫队，还有一批告密者以及凡尔赛宫的管家。向国王递交的有关廷臣的报告都要经由他的手。

首席司厩贝兰冈，人称“第一先生”，掌管着国王小小的御马厩，这个职务的级别至少从理论上讲要低于警察。但是，凡尔赛的小马厩与大马厩之间一直处于敌对的状态。大马厩的负责人是路易·德·洛兰，官拜“法国司厩大总管”，人称“大先生”，是路易十四的密友。尽管双方的敌视并没有太大意义，但贝兰冈在曼特侬一边的关系网中占有重要地位。他和于克塞尔十分熟悉，充当了阿尔库尔元帅和大法官蓬夏尔特兰之间的桥梁。“这位首席司厩长期以来一直在玩弄阴谋，操纵着阿尔库尔和大法官的联盟，并煽动他们付诸行动。”

罗什基翁（弗朗索瓦·德·罗什福库尔第八）也是一个有趣的筹码。“他总是暗笑不已，但什么话也不说，悄悄地布下

陷阱"。他是弗朗索瓦·德·拉·罗什福库尔的儿子，和大先生一样是国王的密友，但和曼特侬夫人关系不佳。但是，这位儿子又是卢瓦尔的女婿，维尔罗瓦公爵的内弟，布卢安的朋友；他与科尔倍尔家族的托尔西和博维利耶的关系恶劣，因此与勃艮第集团关系也不好。经过这样一种无法避免的吸引和排斥过程以后——就像是化合过程一样，他还是留在了曼特侬集团内。

157

"大臣"集团

现在让我们转向第二个集团：

在另一方，最引人注目的人物是博维利耶公爵，他完全效忠于勃艮第公爵殿下，生活在后者的出身、美德和才能所燃起的希望中。谢弗勒兹公爵是这个集团的灵魂和鼓舞人心的精神力量（这两个公爵分别娶了科尔倍尔的女儿）；摆脱了放逐和失势的深渊而重新站立起来的康普利阿（费奈隆）大主教则是领航者；次于他们的是托尔西和德马雷（都与科尔倍尔家族有联系），（国王的忏悔神父）泰利耶神父，以及在其他方面相互敌视的耶稣会会士和圣绪尔比斯修道会的修士。与维尔罗瓦元帅、于克塞尔元帅和托尔西都结为好友的德马雷与大法官（蓬夏尔特兰）的关系尚佳，在罗马（即高卢教）事件上的观点一致，这样就站到了耶稣会会士以及圣绪尔比斯修道会修士的对立面上，并就此事与他的堂兄谢弗勒兹，特别是博维利耶产生争执，最终导致了他们之间的尴尬与经常的窘困。谢弗勒兹和博维利耶在必要时会形成联合阵线，

关系越来越亲密。他们经常见面，没有迹象表明他们欲剔除对方(因为他们既是甥舅，又是异教地区的天主教神父)。他们的职位使他们免受敌人弓与剑的威胁；他们的职位能让他们对事事都有直接的了解，所以他们能取笑别人的幻想，而他们挥一挥手又能让人对现实想入非非……他们对王权也是如此，以至于神父控制了所有事务，尽管曼特侬夫人赢得了内部的不少信任(接下来是对这对甥舅行为的描述)。他们的虔诚本身就令人发笑(这是个宗教集团)。时尚、优雅、雄心都在舒瓦安小姐和曼特侬夫人一边。这两大集团(一个属于王孙勃艮第公爵，另一个属于曼特侬夫人，可以说是"祖母")彼此怀有敌意。勃艮第集团悄悄地行动；另一方则相反，造出很大声势，抓住每个机会去伤害对手。宫廷和军队的所有上层人士都站在她(曼特侬)一边，其人数由于人们对政府的愤怒和反感还在继续增加。许多有头脑的人都被布富莱的刚直和阿尔库尔的才干所吸引。 158

谁是第二个阴谋集团中的重要人物呢？第一个当然是勃艮第公爵本人：殿下的儿子，路易十四的孙子。据说这位公爵曾是一个没有生活目标的年轻人，成天漫不经心地拍黄蜂和榨葡萄汁。但是，就在他青年时代的最后几年(也是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看上去长大了。他的突然死亡使他作为一名君王的光明前程因而不复可能。他去世于1712年，年仅30岁，还是一个虔诚的，甚至有点盲从的年轻人。

博维利耶公爵是科尔倍尔的女婿，一个生活有规律的人，早起、虔诚、谦恭、务实(我这里仅仅是复述或意译圣西蒙的话)。身为国务大臣，他也是出生在最显赫的(非官僚)贵族家

族却在枢密院任职的少数人之一。正是因为他、德马雷、托尔西甚至谢弗勒兹("异教地区天主教"的大臣)一直在内阁会议内,才为勃艮第集团赢来"大臣集团"的绰号。而另一集团,即曼特侬集团,(尽管有"第一夫人"的强大势力,但其成员却很难进入内阁),之所以被戏称为"贵族集团",显然是因为它囊括了相当多的公爵。

另一个显赫人物是谢弗勒兹公爵。他是博维利耶的内弟,科尔倍尔的女婿,国王的非正式顾问,他在任何时候都能"走后面的楼梯"找到国王,他可以对国王贴耳私语,说明他的观点。国王很信任他,尽管他实际上并不是枢密院的成员,却享受国务大臣的待遇。根据D·凡·埃尔登的说法(尽管他的论证实际上并不可靠),[3]谢弗勒兹是称作"几何学精神"的帕斯卡的原型;"几何学精神"与蒙特马家族中的许多人身上表现出来的"耍手腕精神"是完全对立的,特别是福佑蒙斯邦夫人和她的儿女。他们都有天赐的"蒙特马智慧"(即蒙特马精神),引起了小说家马塞尔·普鲁斯特的浓厚兴趣。

费奈隆当然也是这个集团中的关键人物。他代表了最优秀的一批自由派的反对派,无论他们是出身贵族还是贫贱。159 圣西蒙不太喜欢费奈隆,但(不太正确地)认为他是个令人愉快的人,而且有修养,可以像开关水龙头一样随意开关他的头脑,给不同场合或不同时机分配不同剂量的智慧、道德或世俗的蜂蜜或醋。事实上,他是才智最高的人。在所有集团中,勃艮第集团是最具有思想的。

我们现在简要地观察一下这个集团中的另外两个人物。他们都很重要,也是出身于科尔倍尔家族的大臣:一个是博闻强记的外交大臣托尔西;另一个是财政总管德马雷。从某种

程度上说,德马雷也是巨额资本的代表(至少通过他和显赫的金融家塞缪尔－勃纳德的对国家有益的联系可以表现出来)。不用说,这些最具实力的金融家在任何情况下都有他们自己的渠道,有无孔不入的能力:比如说,大港口城市的资本家们与蓬夏尔特兰家族有联系,因而也就间接地与曼特侬家族发生了联系(不管蓬夏尔特兰和第一夫人的关系后来变得怎样紧张)。第三个集团的(不管是静止的还是变动着的)中心殿下本人就与金融界关系融洽。

乍一发现国王的忏悔神父,泰利耶神父,也是勃艮第集团的人,的确让人吃惊。根据诚实的告密者提供的消息,这个耶稣会会士是"诺曼底的一个穷苦(?)租佃农场主"的儿子,用圣西蒙的标准来衡量,他来自"人渣"。这个刚硬的人顽固、残忍、粗鲁,是一个老练的伪装者,一个令人畏惧的人,就连耶稣会会士也难以接近他,只有四五个会士敢接近他,因而圣西蒙认为他是个天生的害人虫。

从圣西蒙《回忆录》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勃艮第公爵的集团由三个要素构成:一个是知识分子和贵族化的反对派,一个是大臣家族,还有一个是金融界的压力集团。除此之外,它还包括相互对立的两个教士压力集团:一个是耶稣会会士(甚至自己内部都分裂了),另一个是绪尔比斯修道会修士(圣西蒙经常提到他们。对"这群肮脏的、不剃胡子的神父"他只报以嘲笑;他们在神学界如此有影响,以至于可以被看作是低级神父的保姆)。但是,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勃艮第公爵的集团内也有像托尔西那样的高卢教徒,甚至詹森派教徒,尽管詹森教徒既厌恶耶稣会会士又厌恶圣·绪尔比斯修道会修士,后两派也厌恶詹森教派信徒。不过,耶稣会会士与詹森派教徒的 160

划分并不像宫廷派别的界限那样清晰。

这就是以勃艮第公爵为中心的集团,即"大臣集团";我们将它放在该图的右上方。

我们越是深入地分析，就越会清楚地发现这些集团是由血缘关系决定的,形成于王室族谱的某些交叉点上:在我们讨论了国王的妻子(路易十四:曼特侬夫人)领导的集团以及依附于国王的孙子(勃艮第公爵)的派别之后,我们将转入讨论以国王的儿子(殿下)为核心的派别。

默东宫廷的联系

> 安丹公爵、公爵夫人、利尔博娜小姐和她的妹妹，与她们形影不离的叔叔，以及默东宫中的内部小圈子组成了第三集团。

以上的概述揭示了殿下集团的两端：一端是由兄弟姐妹或同父异母(或同母异父)兄弟姐妹联系而成；另一端是与洛林家族的联系。[4]公爵夫人实际上是殿下,即路易十四的合法儿子的同父异母("生身")的妹妹,她是因为路易十四和蒙斯邦夫人之间"温柔爱情"(圣西蒙语)而出生的非婚生女儿。她也是这个集团中的另一个有影响的人物安丹公爵的同母异父姐姐，安丹公爵恰恰是蒙斯邦夫人与和蒙斯邦侯爵路易·亨利·德·皮尔塔雅的"婚生儿子"。利尔博娜小姐和她的妹妹(总是由她们的叔叔沃德蒙陪伴着)曾受卢瓦尔的庇护，他们是洛林家族的公主和王子。洛林家族依然像吉兹时代一样，只不过这时少了些浮华、炫耀和流血,是宫廷各个集团都必须认真掂量的势力，通过殿下所代表的继承关系上那个交点而

与王室发生联系。

默东宫廷内部的小圈子就是沿着这两根轴线表现出自己的力量，给那些急于想做所谓的“完美廷臣”的人制造了麻烦。任何人都不可能同时出现在所有的地方：当人们跟随国王去马尔利的时候，只要考虑到下一任国王是谁，当然也就想到了要在默东宫廷里待上一段时间，以讨好殿下(那时当然谁也不会知道他会比他的父亲死得更早)。所以，他们不得不“在访问马尔利的同时，抽出时间去拜访默东宫”。这的确是一个王朝，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凡尔赛的国王培养者们最关心和最重视的大事之一。

161

下面让我们再回到圣西蒙的回忆录中去，他接下去写道：

> 另外两个(派别)都不想同他们发生联系，既惧怕他们(指殿下集团的人)，又不信任他们，但都因为殿下(未来的国王)的缘故而和他们保持着彬彬有礼的关系，甚至连勃艮第公爵夫人本人也照此办理。安丹公爵和公爵夫人(他们是同母异父的姐弟)只不过是头脑简单的人；同样背后遭人唾骂；但他们是这个派别的首领。安丹公爵靠的是和国王一天天增多的私下交谈，他为了自己的利益又尽量表现出他同国王进行过交谈；安丹公爵和公爵夫人都依靠与殿下的私下接触。但这一点并不能阻止洛林公主们获得他的信任，至少也获得舒瓦安小姐(殿下的情妇)同样的信任，而且超过了那两个人。他们还有另一个当时以及其后很长时间不为人知的优势，这就是我曾提到的，他们和曼特侬夫人的交往，尽管这种交往难以启齿，却很牢固，而且正是因为这个理由才隐藏得这么好(其中一位洛林公主充当了曼特侬夫人的密探，定期把默

东宫发生的事情写信告诉她)。不过,她们仍侥幸躲开了打击旺多姆和夏米亚尔的双响霹雳(这两个人现在均已失势)。布富莱、阿尔库尔和他们的主要支持者都痛恨前者(旺多姆)的傲慢以及他所获得的那么高的职位和拥有的权力……第三个政治集团(殿下的集团)其实是旺多姆的集团。

我想作一点更加深入的评论,所以事先引述一些复杂的关系。第三个集团,即殿下的集团,不仅网罗了外邦(洛林)的公主,而且,作为它的巨大成就,正把两个具有亲王血统的家族,即孔蒂家族和孔德家族,都笼络进来。这两个亲王都是殿下的密友,而且都娶了路易十四的私生女。国王在他有生之年通过实施族内婚和多妻制做好了安排,成功地让他的四个子女,其中三个女儿和一个儿子,都嫁(娶)了同家族的王子或公主,他们当中的男性都有资格继承王位。孔蒂和孔德都是亨利四世的祖父夏尔·德·波旁的后代。让所有堂(表)兄弟姐妹相互联姻,虽然这从遗传学的角度来看不是明智之举,却是解决家族争端的巧妙办法。

162

在这种环境中,以殿下以及他的集团为一方与以孔德—孔蒂家族以及他们的妻子为另一方,在这之间建立起来的纽带关系有深远的意义,其效果甚至触及这位王储的私生活。殿下和他的情妇舒瓦安小姐关系密切。根据圣西蒙的各种描绘,她年轻时敦实,相当矮胖,又黑又丑,但十分机智;年长后,她变得过胖、苍老、浑身散发出臭气;但她谦虚、真诚、公正。(我在意译圣西蒙写的话)。舒瓦安小姐好比是大弟(即殿下)以及他的集团中的曼特侬夫人。她原先只是第一夫人("遗孀")孔蒂的女伴官。孔蒂夫人是路易十四和路易·德·拉瓦

利耶尔所生的私生女，因此这位夫人是殿下的同父异母姐姐，很长时间都是他的密友，直到这个角色被他们共同的同父异母姐姐公爵夫人替代（显然，殿下若无一个同父异母姐姐陪伴，将一事无成）。正是通过年长的孔蒂夫人，殿下才得以第一次和舒瓦安私通。

"殿下的关系网络"盘根错节，甚至带有更多的裙带关系。我已经提到了孔蒂夫人。在她与孔蒂亲王结婚后不久，这位亲王就去世了。提到这个寡妇时，我还提及了大弟的另一位同父异母的姐姐，即公爵夫人。她是国王路易十四和蒙斯邦夫人所生的女儿。虽然她是国王的第二个私生孩子，但毕竟是王室之女，她没有嫁给某个孔蒂亲王，而是嫁给了一个孔德亲王，公爵先生。（至于是嫁给孔蒂亲王还是嫁给孔德亲王，无关紧要，因为都是家族事务）

在殿下直接或不那么直接的圈子里，由于其他的联姻关系或非联姻关系，进一步加固了孔德—孔蒂—波旁三个家族之间的联系。小孔蒂亲王（即去世了的弟弟）娶了孔德家族的一位女孩，公爵先生的妹妹。更妙的是，小孔蒂是公爵夫人的情人。因此公爵先生被她妹妹的丈夫戴上了一顶绿帽子，而此人除了是他妻子的表兄兼情人外，还是他自己的表兄。这确实是一个纠缠不清的网络，但至少还是在殿下的圈子内部，可以说家丑没有外扬。

163

早在15年以前，大约是在1692年4月，在殿下集团中就有类似的阴谋。那时，卢森堡元帅急于想对他认为是路易十四的继承人的这个人施加影响，把他的助手加亲戚克莱蒙·夏斯特安插在殿下的身边，以实现他的目的。起初，卢森堡元帅促使夏斯特成为遗孀孔蒂夫人的情人，若能影响她则更好，

因为她反过来又能对殿下产生很有力的影响。后来，卢森堡甚至玩弄了更狡猾的手段，成功地让克莱蒙·夏斯特成为了舒瓦安小姐的情人。这样就可以和殿下建立起更为直接的联系。然而，路易十四向孔蒂夫人(她忍不住大哭)大声宣读了秘密警察(称作黑房间)截获的她的情书，从而摧毁了这个全盘计划。

如果要对伟大的军事指挥官之一、亨利四世私生子的孙子旺多姆如何一度成为默东集团的代表并使其成为军事游说集团的一部分作出解释，就得多费些笔墨了。

从外部看来，默东集团的成员是通过各色各样的关系联结在一起的，这个集团充斥着难以置信的复杂阴谋，就像是一只触须纠结的章鱼。而从内部来看，它更像是一只水母。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殿下就像是水母柔软的下腹部，是他的这个集团和整个系统的下部重心。圣西蒙言简意赅地说到殿下作为一个男人可以说是愚蠢至极；肥胖但精力不足；略具常识，但不机智；心胸狭窄；以愚蠢的方式表现出和善，对情妇们很吝啬。如果说他还有一点头脑的话，那也被过度的教育扼杀掉了，而他所阅读过的东西无非是宫廷内传阅的文件或是《法国报》上的讣告。

164

分裂和联络

对这三个集团的描述(应当说还是简要的)到此为止了。接下来，圣西蒙描述了宫廷里的众星们以及更小的人物是怎样排列的。这里我仅限于主要介绍路易十四的家族这个钻石图形的左右两角。这两个角分别是指缅因公爵（路易十四的

私生子）和奥尔良公爵（国王的侄子和女婿）。他们都和殿下处在同一条水平线上，即同一根辈份轴上。[5]缅因公爵实际上是奥尔良公爵的（非婚生的）同父异母兄弟，而奥尔良是他的嫡堂兄弟和内兄。因为后者曾娶过前者的同父异母姐姐布卢瓦小姐（路易十四和蒙斯邦夫人所生的私生女），她依据这桩婚姻而成为了奥尔良公爵夫人。"缅因先生征服了国王和曼特侬夫人的心，同时又尽可能地迎合所有的人。他只对自己忠诚，耍弄过很多人，伤害了每个他能够伤害的人。人人都惧怕他，也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正如圣西蒙所判断的那样，缅因先生受到如此完美的庇护，又那么有势力，根本不需要加入任何集团。至于"奥尔良公爵先生"，他既不愿意，也没有合适的名分去卷入任何事情。失宠于路易十四并与默东集团或旺多姆集团保持着一定交往的奥尔良，可以说是在为以后将要发生的一切"韬光养晦"。他与缅因公爵、殿下处于同一根水平轴线上，正在等待着时机的到来。

《回忆录》中也暗示了每个集团内部可能由于各自利益导致的种种分歧。这样的分裂可能起因于他们各人对待詹森派的态度不同：在依附于勃艮第集团的科尔倍尔派内部的小圈子中，反对詹森派的谢弗勒兹以及博维利耶（科尔倍尔的女婿）和倾向詹森派的托尔西（科尔倍尔的侄子）之间就存在分歧，"谢弗勒兹和博维利耶之间无秘密可言，他们不和家族成员讨论任何问题，尽管他们是托尔西的嫡表兄弟，只要一涉及詹森派，他们就会远离他。"如果倾心于波尔罗亚尔女隐修院是托尔西的弱点的话，那么，博维利耶就更倾向于耶稣会。

在殿下集团（即默东—旺多姆集团）的内部还会因为各个小集团的野心而引起分裂。这些小集团专门关注王位继承人

165 殿下的未来（虽然他的命运由于早逝而提前结束），这两个彼此对立（尽管他们不承认）的小集团，一支是蒙斯邦的子女（同母异父的安丹公爵和公爵夫人，公爵夫人又是殿下的同父异母姐姐，尽管是非婚生的）；另一支由那两名洛林公主和她们的叔叔组成：

> 安丹公爵和公爵夫人的看法如出一辙，相互需要，有共同的恶习，也有他们常去的共同地方。他们完全不信任那两位洛林公主，尽管他们在表面上以诚相待，亲密友好。但这种关系只有在国王还活着的时候才能保持。一旦殿下即位，他们将为独自占有殿下而互相残杀。

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在各个不同的集团之间存在着充当中介的某些人物，可以说他们好比"游离原子"。机敏、细心而又迷人的勃艮第女公爵就是这样一个角色。她因自己丈夫勃艮第公爵的缘故，而属于第三个集团。但是，她又受到（第一个集团）曼特侬夫人的宠爱："勃艮第女公爵夫人……漂移在这两个集团之间。"

因此，勃艮第女公爵成了有两处栖息地的双栖人。在第二集团和第三集团之间充当中介角色的是丑陋、恶毒又讨人喜欢的马里－弗郎索瓦兹·科尔倍尔·德·克罗瓦西，即布佐尔侯爵。

> 大臣集团（即勃艮第公爵集团）极端敌视（殿下的集团），尽管托尔西（第三集团）、公爵夫人（第二集团）以及后来的安丹公爵（也是第二集团）都和布佐尔夫人互相以礼相待；布佐尔夫人是托尔西的姐姐，也是公爵夫人长久的亲密朋友；她尽管相貌丑陋，却有十个魔鬼的智慧，是个令人愉快的谈话伙伴。

圣西蒙用下面的一段话结束他对宫廷所作的精湛概述：

> 这就是宫廷的内幕。在这样的两次大崩溃（旺多姆和夏米亚尔的失势）所预示的新政治风暴中，它看起来能为别人指明道路

从政治科学到有机化学

166

现在应该再次回到最初提出的问题上来：像这样的文章，当然也可以说圣西蒙的整本《回忆录》，究竟能为政治科学这门学科作出什么贡献呢？我得承认，对于这门学科，我并不熟悉，尽管我曾经应要求对学生做过一次测验：什么是政治科学？它是一门学科，但由于某种原因，它的结果从性质而言可能是不完整的。历史学家并不十分欢迎这门学科，除了那些专门研究当代历史的历史学家。每当涉及旧制度（指法国1789年前的王朝）时，他们对政治科学的普遍厌恶就会表现得更为明显。例如，大家都会同意：在17世纪肯定存在着的那些小集团、派系，甚至政党，与齐格弗里德等人所描绘的20世纪的政党完全不同。但是这种结构赖以形成的环境也和我们这个时代的环境截然不同；在这点上，当代政治科学的说教，无论是美国式的还是法国式的，对我们都没有多大帮助。

我想先把当代的各种考虑放在一旁，试一试以前面分析过的圣西蒙的文章作为起点，把这个问题重新提出来讨论。这篇文章以一个概念为基础，核心是公爵的思想，当然也是路易十四宫廷中的事实。这个概念就是集团(cabal)。集团是一种临时性的结构，虽然它可以持续20年，甚至更长时间。它的目的，就是宫廷中的各个派别，或国家的高层官员，要获取某种

优势，包括权力、声望、金钱、任命为教会中的高级职位或军队中的高级军官职位，或者在公爵、亲王等身份构成的贵族集团得到提升。在圣西蒙看来，对这些集团进行研究，而且不可避免地要对它的成员的性格进行刻画，实际已经成为历史写作的主要目标之一。他确实谴责过写于1714年左右的那部法国史的作者达尼埃尔神父，说他为了写成一部“战争的历史”而牺牲了其他所有的方面，可以说是忽视了“阴谋集团的历史”或“研究人物的历史”。

集团独立于它所依附的核心，这里指的是王朝，而本身又以一个网络的形式出现，一个由它的成员凭借血缘关系、上下级关系、友谊关系等结合在一起并交织而成的网络。敌对和争吵也许会发生在同一个家族里，但由于敌对和争吵而造成167 的消极关系，经过某些人的中介作用，会导致一个集团与另一个集团的疏远。集团可以获得各种团体或小团体的支持，这与社会的、政治社会的、机构的或宗教的各种不同势力是相对应的，例如军队、教会、财政、官僚集团、贵族、亲王、公爵或其他贵族等。

然而，圣西蒙揭示集团或集团系统所采用的方法就其本质而言是研究个人的方法，(借用化学的术语来表述)是原子研究，而原子有可能变成分子。这会使我所做的分析显得完全多余，而我的分析目的在于引进社会学的视角。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可以证明，为了进行比较，完全有必要对运行于系统内部的各个集团进行研究，而在这个系统里根本不存在正式的反对派或有组织的反对派，即或有之，这种反对派也决无获得权力的可能。人们可以使用同样的方法去研究当代法国的彼此不同的各种系统，以及与旧制度完全不同的系统：在这

个系统中，权力的获得是由一个业已形成的等级制度来加以控制，而不是通过颠倒位置的过程来实现的。这里所说的颠倒位置的过程指的就是执政者和反对派相互交换位置。例如，在共产主义的各种体制中可以找到这种以连续性为基本要素的当代统治制度的实例(连续性不能等同于"预设的和谐"*)，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据我们所知，可以通过对官僚精英的分析来获得对这种制度的了解，即称作"克里姆林宫学"的研究。另外一个例子，是在完全不同的进程背景下，可能就是戴高乐主义和后戴高乐主义或"吉斯卡尔主义"：在这里面，各种各样复杂的继承机制，到目前(1977年)为止，一直是按照既定的程序来运作的，即意味着某种非对抗的连续性，可以假定其中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障碍。这些过程，就像非常接近于圣西蒙心目中的家族谱系一样，认为在庞大的体系中存在着"集团"是一种理所当然的事情：处于它内部的每个成员总的来说在根本问题上达成了共识。

我们知道，政治科学经常从自然科学中汲取灵感。以(基佐、梯叶里、马克思)的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为基础的概念当然与古代史和现代史中的各种现象有联系：例如，在罗马时代，塞尔维·图里乌斯就按"阶级"进行过人口普查；在法国革命前，水手登记的项目中也有"阶级"；由沃邦等人提出的收税分类法中就有"第一阶级的纳税人"，"第二阶级"等等。以后，出现了林奈、布丰和图尔纳福尔的应用于植物和生物的分类体系。这样的"阶级"观念带有它们所指的那些经常存在着的严格差异，无论是社会学的还是动物学的差异(例如，鸟类和 168

* "预设的和谐"是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的"单子论"中的用语，认为单子的和谐与一致是由上帝在创世时预先安排好的。——译者注

哺乳动物之间的差异,中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差异)。但是,这样的“阶级”观念也引出了分界和相互重叠的问题,特别是在人类学的领域中。这些问题甚至连最高明的马克思主义者都难以解决。

近来,美国的社会学采用了地质类比法。美国的社会学实际上起源于欧洲,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起源于东欧(索罗金)。它所采用的社会“分层”概念可能给这种分析带来一定程度的灵活性,因为在为建立模型而提供想象力这个意义上的地质层是可以相互颠倒、断裂、析叠,彼此发生影响的,还可以随着大规模的岩层运动而滚动。即使该说的都说了,该做的也都做了,但地质学的研究对象毕竟是无生命的和惰性的物体:在这些僵死的岩层之间不存在真正的熔合、合成和交换。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必须承认,索罗金以及他的美国门徒的地质分层的思想,同基佐、梯叶里、马克思、图尔纳福尔的动物学和植物学的分类方法一样,无法让我感到满意。

吕西安·费弗尔充分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对于这种分层模型,他十分恼火,因为从本质上讲,它是以上层和下层的观念为基础(即使它们可能在岩石的运动中相混合)。他提出,把人们希望研究的社会结构比作一个大城市的复杂结构和基础设施也许更有助益:由供水、供气和供电的主管道构成的网络,以最出人意料的联结方式,把上层和下层,把不同地区和中心点都统一起来了,这样既取消了上层和下层的等级划分,又去掉了动物学和植物学中那种严格的分类方法。

不过,圣西蒙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作为他的崇拜者之一,欧内斯特·容格尔曾经作过评价,说他的研究方法在不自觉中接近了有机化学或分子生物学的科学研究方

法。容格尔写道，"在圣西蒙的研究著作中，宫廷似乎就像是有机化学中一个庞大的分子。他的思想非常新潮"。确实，从这里引用的章节中，我们就能看到圣西蒙并没有把自己仅仅局限在对集团和派别进行划分，他还注意到了各种"化合价"，正是这些"化合价"把诸如一个组织的成员同另一个集团的成员联系起来。他同样注意到在每个集团内部存在着的消极的排斥力量：老蓬夏尔特兰与曼特侬夫人的关系恶劣，至少他失去了恩宠。但是，他依然留在她的集团中。圣西蒙以这样的方式来设计，对具体情景做出具体描述，并且超越了他的三个集团的定义 他所勾画的这幅图景的大轮廓并没有掩盖（有时会相互冲突的）次要细节。可以肯定，宫廷是一个相对封闭的而且范围有明确限制的单位，其中只有几百名重要的参与者，总共也只有几千人。这就使得有关的写作变得更容易一些。 169

这又把我们带到了一个转折点上，我们应该从自然科学的领域转向社会科学的领域，再进入人类学和小社区研究等严谨的学科。这时我们就会联想到欧文斯·普里夏尔的有关非洲努埃尔人的著作，或者在一个不那么深奥的层面上，会想到劳伦斯·怀利对法国村庄所做的描绘。

时钟和台球桌

不过，圣西蒙从未听说过人类学，就像他从未听说过有机化学一样。他个人的参照系与众不同，他的模式比较像是钟表的制造，或钟表结构玩具的制造，因为这些代表了他那个时代的新技术。这位小公爵也使用了一些游戏来作类比。

钟表装置：（实际上更擅长于分析而不是搞阴谋的）圣西

蒙试图建立一个他自己的集团。从这个时候起，开始进入了绝妙的抽象。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他利用了他在文章中所描述的三大集团为他提供的网络和联系。建立这个临时构架(心中牢记他所相信的东西关系到他未来的利益)的目的是让那位“小姐”，即奥尔良公爵的女儿，嫁给她的嫡堂兄贝里公爵。那位“小姐”是路易十四的侄孙女，而贝里公爵是殿下的儿子，也就是路易十四的孙子(这又是一桩近亲姻缘)。圣西蒙为了发起这桩他从中找到某种希望的婚姻，设法使用间接手段来操纵某些女士和某个耶稣会会士。他接下来这样描述了自己的行动：

> 这就是那种机制和机制的合成，在这里面成功地发现了我与那些我所依附的人的友谊、我对公爵夫人的仇恨以及我对自己当前及未来处境的关心，并把它们组装起来，让它以规定和准确的方式运动起来，让各个部件的运动能完全地相互啮合，和谐有力。万事皆备，只欠东风。我只要等到四旬斋节，就可以启动并完善这架机器。对于这架机器的所有运作过程、故障和进展，我都非常熟悉。一切都听从我的调配，我每天都给它上紧发条，让它处于最佳状态。

170

从这个角度来看，宫廷便成了一只时钟或是一块大怀表。为了启迪我们，同时也为了让他所做的事情能引起人们的兴趣，圣西蒙把它拆开，然后又把它重新装配好。他当然意识到了这种比较本身存在的弱点。真正的钟表装置是由金属做成的，差不多可以做到永久不磨损。但宫廷这只钟表的装置却是无法预计的；它们会像“冰柱”一样，融化在阳光下。就此事而言，贝里公爵夫人婚后仅仅几天就有丑闻流传，说她酗

酒，过着放荡的生活，完全辜负了圣西蒙寄托在她身上的希望。结果，为贝里公爵的婚事而组织起来的集团以后便成了这位回忆录作者最大的遗憾之一。

圣西蒙还把游戏的世界用来作比较：首先是与赌博作比较。组织或加入某个集团实际上就是在这个集团的中心人物（曼特侬夫人、殿下或勃艮第公爵）身上押宝。（对曼特侬夫人而言）是否能在一段时间内维持住权力，（对殿下和勃艮第公爵而言）则是他们能否获得权力或至少能分享部分权力。圣西蒙非常熟悉赌博活动；确实，他曾赌过在利尔的失败（他预见到了这次失败），就国王而言，这几乎导致了他的毁灭，而所有这些仅仅是为了几个比索。由于他有时表达了对詹森派教徒的同情，可见他无疑知道帕斯卡尔的那个著名的赌注。

拿来做比较的另一种游戏是桌球：桌球的原则是，一号球通过位于中间的二号球去间接地击打三号球。我们知道宫廷里常玩这种流行的游戏：特别擅长打桌球的夏米亚尔事实上就是靠着打桌球这种卓越的技艺开始他辉煌的大臣生涯。还有一则故事是关于朗格雷主教的：他在宫廷中玩桌球时发现自己打得奇糟，就回到自己的主教区去集中训练了一段时间，然后再回到凡尔赛，把所有廷臣打得大败，令他们惊讶不已。

集团的游戏与桌球比赛十分相似。例如，人们可以从克莱蒙－夏斯特的活动中看出这一点：他在卢森堡元帅的遥控下，先后成了德·孔蒂公主的情人和舒瓦安小姐的情人，为的是影响殿下。卢森堡元帅则是采用各种不同的桌球组合方式，利用了二三个中介人对他认为会成为下一任国王的人施加影响：克莱蒙－夏斯特和孔蒂夫人；克莱蒙和舒瓦安。 171

圣西蒙本人也组织了一场桌球游戏，来推动贝里公爵的

婚事：他使用泰利耶神父、耶稣会会士和宫廷内的许多女士来影响掌权者：国王和曼特侬夫人。（未来的新娘和新郎以及他们的父母，殿下和奥尔良公爵和公爵夫人都不可能有很大的决定权。）

宫廷游戏

从社会史或谱系历史学的角度来看，我们对圣西蒙的《回忆录》的大体认识也证实了这样一种看法，他的文章显然可以帮助我们给"政治阶级"下一个定义，至少可以帮助我们确定当时的政治阶级的上层或环境，无论他们是男人还是妇女。这里并不是说宫廷"有权力"。宫廷没有权力。但是，只有从宫廷里出来的人才能最大限度地接近权力杠杆，因为所有的大臣，充当国家官员的大家族中的成员，包括菲利波家族、夏米亚尔家族、科尔倍尔家族和卢瓦尔家族，都出入于宫廷，并在宫廷里安排他们子女的婚事。那里不断地举行婚礼，因此人们经常以社交活动的方式或其他方式在那里见面。官僚和贵族的活动范围在那里相互交叉和混合。18世纪的整个高层贵族清一色地都是17世纪的"中产阶级"或所谓资产阶级大臣的后裔。

圣西蒙还有一个令人感兴趣的方面，那就是他充分使用了谱系学的分析方法：王室家族的整整三代人，父亲、儿子、孙子以及他们的妻子都出现在他的谱系中。人们还可以看到整个王室和大贵族的家族的亲缘组合方式：包括私生的子女，正宗的亲王等等。宫廷中存在着不同的等级：在王室家族的私生子女当中，凡男性都倾向于依附曼特侬夫人，而某些女性则

172

与正宗的亲王结合，他们都直接或间接地与殿下的集团发生联系；在勃艮第集团或曼特侬集团中都有公爵（当然还有其他人）。

与上述这些定义必然要发生联系的是一些更为合适的社会学分析方法，因为各种力量（包括教会、高级贵族、财政界人士和军队等）都处在某个地位上，与各个集团发生错综复杂的联系。

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主要压力集团的形成并占有一席之地的过程进行一番研究，想必会很有意思；其中的一些研究会让我们联想起，而且仅仅是在某种程度上联想起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社会群体。我这里所思考的主要是：

——法国的元帅们，他们组成一种军事压力集团，大部分依附于曼特侬集团；

——正宗亲王和皇室的私生女；

——所有那些在宫廷内可以称为“内官”的人以及发挥警务职能的人；

——公爵和其他贵族，以及笼统而言的贵族；

——大臣们；

——教会和耶稣会中的高级教士；前者进入了曼特侬集团，后者加入了勃艮第集团。

然而，这显然让我们（也许一点也不奇怪地）远远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范畴。这里根本看不到资产阶级。金融界的人士确实通过与蓬夏尔特兰家族的联系加入了曼特侬集团，而且或多或少地通过与德马雷的关系加入了勃艮第集团。甚至有人还说殿下并非完全不受高层金融界的诱惑。但

是，在路易十四宫廷的权力游戏中同样重要的，甚至更为重要的是贵族和权势官僚组成的大压力集团。

在路易十三的时代可以发现类似的模式，但"其势更猛"：包括奥尔良的加斯东，奥地利的安妮以及美第奇的玛丽，对每个集团背后的社会—政治力量或社会—宗教力量进行分析应当是可行的。圣西蒙所青睐的婚姻和谱系分析法不太适用于弗隆德运动的时期，因为1648年以后的革命力量如火如荼，以至于打碎了严格意义上的家族结构。尽管如此，一边是正宗亲王孔德与王室家族有密切的联系；另一边是亨利四世的私生子博福尔公爵；位于中间的是奥地利的安妮和她的朋友马扎然大臣，更不用提那位"大小姐"了，他们每个人都在家族权力的游戏中轮流坐庄，而且每个人都有支持他们的各种集团。（如贵族、法院、"平民"）

173

圣西蒙的这类著作的意义在于它准确地述及了各个方面：正是因为有了这位写回忆录的公爵，我们才有可能把现代"社会—经济"分析方法同发源于古代的"谱系"分析法以及因此而激发的"人类学"分析方法结合起来。

注 释

［1］本文是与已故的雅尼纳·费尔德－雷库拉合作完成的。这是在《拱形门》杂志第65期上发表的那篇文章的全文。

［2］圣西蒙：《回忆录》（Saint-Simon, *Mémoires*），普勒亚德（Pléiade）版，第3卷，第206页起；或波瓦斯利斯尔（Boislisle）版，第18卷，第5—9页。后面的许多内容与这一段有关。这里删去了法文原版中指明页码的脚注。读者若要核实，可以参见该书的法文版第275页。这里引用这一段的英文版见于路希·诺尔顿编辑并翻译的《圣西蒙公爵的历史回忆录》（*The Historical Memoirs of the Duc de Saint-Simon*, ed.

and trans. by Lucy Norton)，伦敦，哈米什－汉密尔顿出版社，1967年，第19章，第454页起。由于路希·诺尔顿的翻译缩写本，不包含这里引用的所有摘录，因此是重译的。为了便于参考，这里所使用的术语与英文版相同，例如勃艮第女公爵夫人（Madame la Duchesse de Bourgogne），缅因公爵（Duc de Maine）等。

[3] D·凡·埃尔登：《圣西蒙传记中的睿智和几何学精神》（D. Van Elden, *Esprits fins et Géométriques dans la portraits de Saint-Simon*），尼热霍夫出版社，海牙，1975年。

[4] 因此也是托尔西与老蓬夏尔特兰之间的联系。老蓬夏尔特兰也是一名高卢教徒。

[5] 参见钻石图形

174

第七章　聚焦鲁埃尔格[1]——纪念雅尼纳·费尔德－雷库拉

最早的部落

《相片中的鲁埃尔格》这部相册，收集了"从晚期达格雷照相法的作品到摄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快照"。该相册真实地展示了这些地方摄影师如何看待称为鲁埃尔格的这个法国南部的一个地区。这些都是他们给我们留下的这个旧省份"忠实于生活"的形象。这个省份早在公元前的最后几个世纪里已有建制。到 1790 年，它改称阿维龙省，基本保持了原有的边界。

这些棕色的相片：就像是苍蝇的复眼中反映出来的形象，向人们展示了这个省份的独特但多层面的状态。这本身就是观察事物的各种手法之一，但这种手法的特征是留下了日期。我的这篇"前言"无意于，至少不是为了专门"介绍"这些照片。在本文最后一部分，我将对这些照片做一个简要的介绍。无论怎么说，这些照片自己会说明一切，它们本身就带有解释。我只作为一个历史学家那样来撰稿，运用具体的实例，以简短的语言来描述在各个世纪里一些人是如何看待鲁埃尔格的。

凭着意外的好运气，或者毋宁说，或许是出于山里人环境保护的本能以及由此而产生的非同寻常的抵抗力，鲁埃尔格地区的边界自罗马时代乃至凯尔特时代以来一直保持不变，甚至在转变为阿维龙省（1790年至今）以后也一直保持不变。换言之，罗德尼人（即现代法国鲁埃尔格人）的部落在20多个世纪的时间里仍保留了自己的种族和地理特质，保持其本质不变。它仅仅是覆盖着高卢—罗马时代的外表。从这个观点来看，该地区最重大的变化发生在公元后第一个千年的前半段时期或前三分之二的时期。罗德尼人在这一时期改掉了他们的凯尔特人的口音，并且先后相继地受到罗马人和基督教的影响，使用了当地的一种口头拉丁语，并逐渐演变成为鲁埃尔格式的奥克语（中世纪法国卢瓦尔河以南地区的用语）。直到20世纪初期，当法语在当地迅速推广之前，更准确地说，就是在照相机的时代之前，几乎清一色都是使用这种语言。这里复制的褪色照片所反映的正是这个时期。

175

观察的方法也许发生了变化，但其中的主题，即鲁埃尔格，却基本上保持不变。这一内容上的统一性为我们提供了充分的理由反过来观察各种不同的景观，把我们带进了观察事物的最终的方法，即从相机背后去观察本书的主题。

我所选择的景观以及它们的观察者，从最初的时候直到19世纪，既是任意的，又具有选择性。这篇"前言"当然不能自诩为"鲁埃尔格的历史"。因此，我（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去观察，首先是通过古典学家亚历山大·阿尔邦克的眼睛去观察。他直觉地观察了凯尔特人，阿维龙省的部落时代和古代的起源，把原始的统一重新呈现在我们面前。其次，在简要浏览了17世纪的黑暗时代以后，我将着重谈谈18世纪的资产

阶级生态学家让·穆雷的本质上属于地方性的观察。随后，再转向更具社会意识的主教尚皮翁·德·西塞的比较广阔的观点。他敏锐地目击了文艺复兴时期阿维龙省的极端贫困的状况。最后，有关19世纪的一些描述将把读者带入那个使用黑色罩布、镜头、三脚架和感光板等古怪设备的早期摄影师的时代。

为了观察凯尔特人和蛮族人对鲁埃尔格的看法，更不用提高卢—罗马人的看法，并把人们带回到覆盖着一丝丝拉丁文化的尚未开化的原始时代，我使用了亚历山大·阿尔邦克的作品。阿尔邦克是罗德兹公立学校的校长，是地地道道的阿维龙人(阿维龙人更像鲁埃尔格人，而不像巴黎街头上的那些光彩照人的煤炭商人)。在他那个时代(1948年)，阿尔邦克是极负盛名的专家，对那个省的古代文物，这里指的是最深层意义上的“文物”最有研究。毫无疑问，从现在来看，他的作品

176

已经相当过时了。通过把他的作品与最新的研究作一番比较，从而增添它的时代性，并非我的目的。我也没有资格来这样做。在我看来，他的作品的重要意义在于，这部作品的视野具有非凡的统一性，从而使它成为我们所掌握的有关早期的鲁埃尔格的最有价值的“快照”。

让人们吃惊的第一件事情是它的边界的持久性。我们无从准确了解罗德尼人，即高卢“民族”、“部落”或“城邦”的地域界限。它是否与罗马时代罗德尼“城邦”的边界大体吻合呢？但无论怎么说，对于后来的历史时期，我们有相当可靠的依据：在高卢—罗马时代，罗德尼人的地域与后来成为罗德兹主教教区的边界是一致的，因为这可以从罗马帝国大规模人侵

时代遗留下来的行政结构的轮廓中追溯出来。罗马帝国毫无疑问地继承了部落的边界。这些非常古老的"边界"是依据某些地形特征形成的。东北面是奥布拉克山脉的分水岭，北端是特鲁耶尔河谷和古尔河谷，西北止于洛特河谷，向南的两面山坡分别通向大西洋和地中海。喀斯高原(石灰岩高原)对于羊群和谷物的生长十分重要，高原分成两支，分别向南和向东南方向伸展，在那里居住着各色各样的史前居民。(洛泽尔的) 加巴利人占领了默让的喀斯高原和索弗泰尔的喀斯高原。罗德尼人则获得了索弗泰尔的喀斯高原（即萨韦拉克喀斯高原和卢热喀斯高原）以西的地带以及黑喀斯高原和拉尔扎克高原的大部分。已经在朗格多克(即现在的埃诺省)定居下来的阿雷科尼的沃尔基人也要为羊群准备迁徙之地，因此吞并了黑喀斯高原的东部和拉尔扎克高原的东南部。[2]

这里存在着一个我们可以很快跨越的断裂层，在公元1世纪初，罗德尼亚(即鲁埃尔格)的一部分被罗马人划分出去，并人了高卢·纳尔波内西省。这个部分很快就失去了鲁埃尔格人的特征，尽管那里的居民一度被称作"外省的罗德尼人"。它相当于后来成为阿尔比主教教区和塔尔纳省的阿维龙的南部地区。[3]

除了这个断裂层以外，鲁埃尔格从最远古时期至20世纪初无论从行政上还是从种族上看，实际上一成不变地被保留下来了。我们已经看到，鲁埃尔格相当于罗德兹主教教区，但在墨洛温王朝和加洛林王朝时期，它又称作鲁埃尔格地区(*pagus rutenicus*)，鲁埃尔格郡(*comitas rutenensis*)。在中世纪，尤其是从13世纪开始，鲁埃尔格的若干伯爵领地在经历了一系列的事件以后成为了法国国王的属地。他们最初是蒙福尔 177

的封臣，后来通过联姻被阿尔玛涅阿克人所“吸纳”。鲁埃尔格人就在这个时期第一次成为“法国人”。然而，直到很久以后（20世纪），这种新出现的并持续下去的“法国性”并没有导致他们转而使用法语。

与此同时，直到1317年以前，罗德兹的主教教区一直保持原有的特征不变。就在那一年，塔尔纳南部的阿维龙教区从旧的主教教区中分离出去，组建为一个新的但非常小的瓦布雷教区。尽管在宗教方面发生了变化，鲁埃尔格和瓦布雷之间依然是分离的，但阿尔邦克认为，鲁埃尔格作为一个历史上的单位“依然保留在当地人的心中”，这真是历史学中的“长时段”（*la longue durée*）的突出例子，或者是“停滞的时间”以及“停滞的社会”的突出例子。究竟哪个术语最好，这要看人们的思想是倾向于变化还是倾向于连续性。（至于我的思想，坦白地说，在这个事例中，我更倾向于连续性。）

直至18世纪以前，也包括18世纪在内，鲁埃尔格在法国国王的统治下，一直是一个以罗德兹为中心的军事管辖区。[4]这个军事管辖区隶属于圭耶纳和加斯科尼的总军事指挥部。过去的“罗德尼亚”也是隶属于瓦洛瓦王朝和波旁王朝的一个总司法管辖区。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里，鲁埃尔格的三级会议定期举行，后来为旧制度下的法国国家“现代”中央集权化所取消。这个司法区本身作为一个种族司法区保存下来了，一直存在到法国大革命时期。

1790年，立宪会议认识到这样一个自古以来就成立的历史悠久的行政区具有现实和潜在的重要性，决定建立阿维龙省，从地理上来看，它就是原来的罗德尼城邦。[5]随后，从波拿巴担任执政官的时候开始，该省的长官和省议会合法地继承

了旧制度下地区司法官，也成为很久以前的鲁埃尔格地方法官的继承人以及古代高卢—罗马贵族：掌管古高卢—罗马城邦司法大权的会计官、治安官、胞族官员以及(高卢的)大法官的继承人。[6]

178

亚历山大·阿尔邦克所描述的早期历史上的阿维龙"部落"的形象与1860—1950年间的照片是否有很大的差异呢？(当然，明显的差异可以忽略不计。)无论是相同还是不同，总而言之，一种表面上的但异常突出的"现代性"占据了明显的地位，喧宾夺主地吸引住了人们的注意力。在20世纪20年代，这个"现代性"就是自治城市里的资产阶级；而在公元100年，则是指当地的一小部分引人注目的高卢—罗马精英。在以上两种情况下，人们从背景中感觉到了广大农民的存在；他们不那么引人注目，但更加重要。他们当然构成了人口中的绝大多数。然而，事实证明，不论是在考古发现中还是在很久以后摄影师的镜头中，有关他们存在的证据都大大地打了折扣。

阿尔邦克认为，在罗德尼人当中，由人数很少的高卢—罗马人组成的上层人物在这个种族原有的蒙昧之上增添了一层拉丁文化的色彩，并占据了中心位置。罗德兹，又称塞戈迪努(*Segodunum*，意为鲁埃尔格人的城堡)，在帝国晚期的统治下修筑了水渠，罗马的道路网络、有一座可容纳1.5万人的圆形剧场，还有一些华丽的郊外别墅。富人们生活在那里，死后也安葬在那里。罗马大道通往里昂、洛代夫、佩里格、卡奥尔和波尔多。公元1世纪，在格罗夫桑克有一间陶器作坊，生产成百的花瓶向东西方出口。这些花瓶的制作者是古代世界中技艺最精湛的工匠；但他们说的乃至写的仍是古老的凯尔特语或高卢语。自治城市附近的铅矿和银矿，在太巴列的国家控

制下，也只开采了很短的时间。在这整个地区，用石头建造的高卢—罗马式的房屋逐渐取代着高卢人用泥巴糊制的小屋（尽管这种小屋不可能全部消失）。近千座庄园（*villae*）出现在喀斯高原和蜿蜒曲折的洛特河谷肥沃的土地上，每座庄园的规模可能接近一千英亩。这些庄园不仅没有毁坏当地居民的小块土地和小屋，而且相反地将他们纳入了庄园制度。

单一民族的人口保存下来了。广大的"未开化"的鲁埃尔格人是当地人的后裔，大多数是前凯尔特人的后代。史前的墓石牌坊和古墓证明他们从很早以前就开始定居在喀斯高原地带。他们与征服他们的凯尔特人联姻并从凯尔特人那儿学会了新的语言。他们开垦喀斯高原的荒地，但尚未到达塞加拉地区。（塞加拉是未开垦的地区，酸性土壤，只适合种植黑麦而不能种植小麦。塞加拉即因此而得名。这种土地难以开垦，获利不大，几乎还没有人去尝试耕种。在凯尔特时代和高卢—罗马时代只有小规模的尝试。除去奥布拉克火山地区，阿维龙省大部分地区不是由石灰岩高原，就是这种未开垦过的塞加拉地貌所构成。）

179

原来的鲁埃尔格人主要是古罗德尼人。他们有自己的语言，尚未开始罗马化。他们是否在基督时代的早期已被当成了（奥弗涅地区以外的）奥弗涅人呢？因为在19世纪和20世纪，来到巴黎的阿维龙人，不论是煤商、咖啡店主还是法兰西学院的教授，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统统被巴黎人称作奥弗涅人，因为巴黎人懒得去区分种族或地理上的细微差别。不管怎么说，到了恺撒时代，罗德尼人成了一种客居的民族，也就是说依附于奥弗涅的阿韦尔尼人，或成为他们的附庸。这里的奥弗涅人是指热尔古维的奥弗涅人，在那个时代最典型的

例子就是韦尔桑热托利克斯人。罗德尼人的"附庸化"此后持续了很长的时间。在巴黎，不论你是一个来自鲁埃尔格还是来自奥弗涅的人，人们一般都把你当成奥弗涅人。在朗格多克的低地地区或在西班牙，即真正意义上的南部，无论你实际上是一个来自阿维龙省的鲁埃尔格人，还是来自热沃当的，即洛泽尔的真正的"野汉子"(gavache，或 gabal)*，人们都会把你当成"野汉子"，即指法国中央高原中部粗鲁的山区居民。

罗德尼人是农民。他们或为自己或为庄园主种粮食和饲养牲畜。罗德尼人不很富有，他们的工艺品或雕刻也没什么特别之处。高卢—罗马时代的农民在喀斯高原上种植小麦，在塞加拉的部分地区种植黑麦，几乎到处可见种有冬大麦，但绝对看不到种燕麦的。他们使用传统的高卢农具，又从罗马人那儿学会了使用转犁、镰刀、双叉锄头、长柄大镰刀和用来修剪葡萄藤的大刀。早在公元 3 世纪，最初在维维埃和波尔多地区培植的葡萄树开始在喀斯高原地区进行小规模的零星种植。大约就在这同一时期，高卢人使用的那种大木桶由于能有效地用于大宗运输，逐渐取代了罗马式的双耳细颈酒罐。阿维龙的马尔西亚克现在举行的维特—星期一的非常庆祝活动就是著名的圣布隆节。布隆(bourron，即 bourgeon)，意为葡萄树的萌芽。这个节日让人们联想到鲁埃尔格最早的葡萄园里的基督教徒—异教徒举行的大宴：在基督纪年的前 500 年里，他们信奉异教，后来才皈依了基督教。(他们种植的葡萄既可以用作圣餐酒，又用作日常的饮料。) 180

由圣阿曼传人的基督教本身在公元 4 世纪后期的鲁埃尔

---

* "野汉子"(gavache，gabal)是吉隆特省人对外地人的蔑称。—译者注

格人的"鲁埃尔格化"中起到了推动的作用。新的宗教广泛深入到这个地区的各个地方，完成了一场语言革命。凯尔特方言消失了，完全被一种当地的拉丁语所取代。这种拉丁语成为在鲁埃尔格通用的方言，也是讲奥克语的社区中最纯的语言之一。然而,除了这些,也出现了一些倒退。这个地区的比较深层的特质曾经被单薄的高卢—罗马外表所覆盖，而这个表面变得支离破碎,继而消失了。罗德兹退居到山顶。那里的人口从1万人减少到4000人。这种再度的乡村化毁掉城市中已经取得的微不足道的成就。当地的基督教圣徒,圣阿曼,亲自捣毁了罗马的偶像，试图保护当地居民免受罗马帝国残余的中央权力在治安、司法、军事和财政上的蚕食。随着这种由于教区的吸引力而发生的退缩，鲁埃尔格人越来越倾向于摆脱垂死的帝国制度对他们的控制。而且,事实证明,本应从另一个方向上吸引这整个地域的日尔曼人的影响逐步式微。鲁埃尔格人只是在5世纪中叶在名义上短暂地依附于尤利克国王的西哥特王国的统治；以后又附属于在克洛维时期得到扩张的法兰克人的国家，最后在6世纪附属于以麦茨为首都的奥斯特拉希亚。正像人们所预计的那样，阿维龙与洛林的接触并不特别活跃。由于这一时期跨区域的国家非常弱小，他们更擅长于征服和毁灭，而不善于通过行政管理的方法取得积极的成就,鲁埃尔格因此在很多方面取得了独立,或保持着独立。这个省份变得越来越以自我为中心，逐渐地进一步退入与世隔绝的状态，在自己特质的外壳掩盖下获得内部的发展，变得成熟和浓缩起来，就像罗克福尔奶酪一样。*鲁埃尔

181

* 一种羊乳制作的上等蓝奶酪,公认为法国最好的奶酪。—译者注

格在没有外界的帮助下在内部成熟了。在随后的一千多年的进程中，涉及到个人地位及财产制度的许多东西将会发生变化。但人们如果考虑到农业技术、农村的生态，或称作人与自然之间以及物种与生活环境之间的神秘的和物质的结合而言，一些东西依然如故：从犁头的形状和制奶酪的模子，到对石斧和水神的崇拜，整个的风俗和行为都保持不变。格雷戈瓦尔·德·图尔曾这样描述过罗德尼和加巴利交界处的圣安ốc奥尔湖，他写道：

"在（大约公元500年的）某个时期，许多农民来到这里向这个湖里供奉牺牲；他们竭尽所能，把做男人衣服用的亚麻布和布匹、奶酪和制蜡的模子、面包等各种各样的东西统统扔进湖里，真是五花八门，举不胜举。他们推着车子，带上食品和酒。最后连续三天地屠宰动物，摆开宴席。第四天，当他们正要离去时，一场巨大的风暴突然降临，雷电交加，大雨滂沱，大若鹅卵石般的冰雹倾盆而下；在场的人们无不惊恐万状，担心着自己的命运。每年都要发生这种同样的事情，这些无知的人们仍然盲目地相信自己的迷信。许多年以后，从城里来了一名牧师，被任命为主教。他来到湖边，向人们布道，要求人们放弃这种习俗，因为他担心上苍的震怒将要降临。但是，愚昧的乡民们却置之不理。"

最后，这个主教在湖边建了一座教堂，供奉给普瓦提埃的圣伊莱尔，把这个圣徒的遗骨安放在里面。据说，人们从此改变了信仰。从那以后（或者他们是这么说的），一年一度的风暴也就平息了。

这个故事里面有一件事情弄错了：皆大欢喜的结局是不

准确的。鲁埃尔格和洛泽尔的农民，即罗德尼人或加巴利人，[7]根本就没有放弃向圣安岱奥尔湖供奉牺牲的习俗：

182

> 即使到了19世纪，每逢8月的第二个星期天，人们仍从四面八方聚集到圣安岱奥尔湖边（就像在公元500年所做的那样），往湖里扔硬币、布匹、羊皮等物品，希望能去病消灾。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1867年。当时，参加供奉牺牲的一些人发生暴力斗殴（在这次仪式中喝掉了大量的酒），纳斯比纳尔的警察劝说当地政府禁止这种仪式。第二年，武装部队冲散了信徒。从此以后，人们只能看到偶尔有那么一两个顽固的信徒匆匆地往冰冷的湖水里扔硬币，有时也扔进一件长袍，然后，带着自己的信念心满意足地离开。[8]

这是一个有关残余异教徒的多么绝妙而迷人的事例！直到纳斯比纳尔的警察愚蠢地出面制止之前，这种仪式竟然（至少）从5—6世纪一直持续到19世纪。

外省的鲁埃尔格人

有关中世纪的鲁埃尔格社会和经济（更不用说心理）方面的全面描述，资料不多。只有一份据称覆盖了（1348年）黑死病以前的14世纪的整个阿维龙省的人口调查资料被保存下来了。这份资料表明，这个省当时的人口已经像后来的17世纪那样稠密。

至于古典时期（或"近代"），即16—18世纪，有关的资料则略为多一些。雅克·布斯凯在《1552年鲁埃尔格的日用物品研究》中所做的精彩概述，为我们呈现出一个至少从表面上

看来是富裕但并不丰产的农村地区：它可以自诩拥有55万头羊，7000头牛，其中包括在当地饲养和按季节流动放牧的牲畜。[9]若与法国南方和北方的各省做一番比较的话，这实际上是个创纪录的数字。当然，当地盛产谷类，不同的地方还出产葡萄酒、胡桃、各种水果、藏红花、布匹、皮革、煤及其他一些产品。各地都有大小不等的集市和市场。惟一的运输方式是骡运。18世纪，当朗格多克平原很快修建起了通衢大道之后，这整个地区却因其落后而被人们遗忘。低地地区因为有比较便利的大道，逐步改用马车运货，从那时起取代了以往掌握在鲁埃尔格人手中的主要使用骡队的运输贸易。

183 但是，早在运输贸易兴起之前，有些问题已经出现了；与《1552年鲁埃尔格的日用物品研究》中所呈现的比较繁荣的景象恰恰相反，阿维龙已经暴露出极度贫穷与落后的许多迹象。如果与17世纪乃至18世纪的邻近地区相比，这样的贫穷和落后则更为明显。

首先，这是一块文化上的荆蛮之地：显然值得一提的是，鲁埃尔格本来应当成为16世纪末南部最后一个不得不接受使用法语文字的地区。相比之下，在朗格多克省、下罗讷省和普罗旺斯省的一些比较发达的地区，法语作为一种书面语言的使用，早在15世纪末或16世纪前期已得到承认。这一文化上的隔绝使得阿维龙能够把优美而纯正的奥克语方言保留下来，免受奥依语（中世纪法国卢瓦尔河以北地区的用语）的侵蚀。但是，这种隔绝也表明了阿维龙的与世隔绝。没有公路、没有实质性的贸易网络，也没有与外界的联系，这个地区注定了要固步自封。这就是从此以后贫困和落后的根源。

在朗格多克低地地区的济贫院的档案和教区登记簿中可

以找到间接的证据，来证明这种贫穷和欠发达状态的存在。来到这里的极度贫穷的鲁埃尔格人不是死去，就是骨瘦如柴。许多人抱着一线希望前往南方，指望能改善命运，并非总是白费心机。在路易十四统治时期的生存大危机中，如1694—1695年，人们每天如潮水般涌人朗格多克南部的济贫院（*hospices*），滞留数小时或数日不等。济贫院的管理员把他们的姓名和出生地点登记入册。根据这些档案可以得出的统计数据清楚无误地表明确实存在着一场大迁徙，被贫困所驱使的山民，组成一支支衣裳褴褛的大军，从中央高原，特别是鲁埃尔格，涌向地中海平原。[10]其中有三个最贫穷的教区，罗德兹（占移民总数的24%）、门德（占12%）、圣弗鲁尔（占8%）。换言之，鲁埃尔格遥遥领先，接下来的第二位和第三位分别是热沃当和康塔尔。大批没有土地的农民和日工从这三个中心出发，涌上大路，向南部迁徙。他们背井离乡，除了务农之外，别无所长。但是，在他们当中还是有一些人属于手工业者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来自于鲁埃尔格人口中最贫穷的阶层。这些手工业者或半手工业者可以充当理发匠（兼外科医生）的助手、轿夫或织工。鲁埃尔格的大批织工涌人埃罗省的工业城镇洛代夫，占当地移民纺织工人总数的三分之一。

184

许多这样的鲁埃尔格人为食不果腹所驱赶，离开了山区，蜂拥到南部去寻梦，却因饥饿、劳顿或疾病而死于半道，永远无法到达理想中的终点：来自阿维龙喀斯高地的儿童，9岁、12岁、14岁不等，还有一丝尚存、佝偻驼背“形同矮人”的老人。他们因饥饿不支而倒在山脚下的教区里，距他们的目的地仅数里之遥。在1693—1694年的饥荒年代，来自鲁埃尔格和索弗泰尔高原的乞丐正是沿着这条大路，奔向朗格多克平

原。在这场大迁徙的途中,死亡人数多得惊人。埃罗省有一个村庄位于山区和平原的中点,在正常的年份,死亡人数可以达到45人左右(但1693年和1695年分别达到70人和80人)。我发现的记录表明,从1693年1月到1694年8月,有25名过路的人死亡,其中大部分来自鲁埃尔格、热沃当和奥布拉克的山区,特别是来自加布利亚、拉斯特内和基洛尔格这三个受影响最严重的村庄。死者都在20岁以下或50岁以上:(1694年8月13日的记录说)"一个名叫阿曼的8岁小男孩病倒了,他来自罗德兹的基洛尔格教区";(1964年5月18日的记载说)"一位名叫让的男孩,13岁,说不清楚自己从哪儿来。"来自鲁埃尔格的许多儿童,年龄在10至12岁之间,在朗格多克四处流浪,无人照料他们。他们临死前用尽最后一点力气嗫嚅地说着自己的姓名:"让"或"让娜",身边一个人也没有。老年人徒步迁徙,像狗一样倒毙在路旁。还有全家毙命在下山的途中,连下葬时都找不到人来在登记簿上签名:谁会在意这些陌生人呢?死者被草草地埋在一块称作"穷人之冢"的土地上。

当然,并不是所有来自鲁埃尔格的流浪者都会死在途中。许多人在低地地区的村庄里找到了栖身之所,总算得以苟延残喘,以便重新踏上征途。有时,他们靠孩子为全家赚来好运。咖里哥宇高地的一个教区牧师,名叫法布尔牧师,或费弗尔牧师什么的,留下了一份十分生动的描述,记载了18世纪初的这些移民家庭当中某个家庭的命运。扼要地说来,情况大致如下:在1700年前后,一位名叫特律盖特的鲁埃尔格人离开了他的家乡阿维龙,在拉沃纳热教区定居下来。这个教区是靠近尼姆的一处咖里哥宇低洼地。特律盖特长着密密的胸毛,眼睛炯炯有神,是个有前途的小伙子。他娶了当地的 185

一位体态丰满的姑娘为妻，她本人是个私生女。在他们的婚宴上，客人享用到一只狐狸，几只秃鼻乌鸦，满满一碗青蛙腿，还有看上去简直吃不完的蔬菜。这顿婚宴却让新郎一贫如洗，因此不得不卖掉新娘的嫁妆。新娘开始与他争吵，于是，这位牧师告诉我们，经常有一片叮叮咚咚的打架声，还夹杂着荷马式的相互漫骂和侮辱(诸如"青鱼脸"、"鳍鱼"、"鼻涕虫"、"蠢呆子"、"笨兔子"之类的话)。这对新婚夫妻身无分文，在当地被人奚落为"饿死鬼"。他们生了一个儿子，名叫让，像他父亲一样一事无成，好吃懒做。就在他父亲的生意破产前不久，他因为偷东西被人们吊了起来。让长大以后，与一个叫巴尔贝·加卢依尔的女乞丐结了婚。她"经常大发脾气，耍泼"。对他来说，幸运的是她死在了济贫院。随后，让表现出了比较强的判断能力，这一次勾引上一个地主的女儿巴尔波。她怀孕后，让娶了她，终于告别了潦倒的命运。

特律盖特和他的一家只不过是成千上万个类似家庭中的一个典型。在西班牙和法国南部的大部分地区，鲁埃尔格人，无论是称作野汉子还是邋遢汉，总的来说，带来了人口的复兴，形成了一种从14世纪一直延续至20世纪的长期的移民模式。鲁埃尔格在500年的时间里成为了移民的气流旋涡，这与布满花岗岩的塞加拉地区的贫穷有一定的关系，但不是惟一的原因。

1643年鲁埃尔格的贫困状态:个案研究

可以这样说，以上这些有关穷人迁徙的描述只不过向我们显示了"在外面的鲁埃尔格人"，是在这些流浪者离开山区

后作为他们的目的地的那些村庄里的形象。当然，这些村庄通常是在南部。因此，下面让我们来看看在自己的有数个世纪文化的贫穷家园里的“近代”鲁埃尔格人是什么样子。这些阿维龙农民的后代出现在后来那个时代的照片里，带着同样的、被太阳灼黑了的、造反者的面容。一份堪称权威性的档案 186 把我们带入了他们的生活，向我们描述了这些农民在 17 世纪的弗隆德运动之前的情况，只是为了更为生动地向我们显示将他们送入坟墓的贫穷、沮丧和动机。

那是 1643 年，也就是发生叉民起义的那一年。彼埃尔·德·莫利内尼以及国王的顾问们在维尔弗朗奇附近的鲁埃尔格进行了一次调查。莫利内尼接受了盖耶内的总督德·拉·特里埃尔的委派，参加了这次调查。他认真地巡视了鲁埃尔格的十多个教区。在每个教区，他都向农夫、农民、织工和“参议官”(即地方行政长官)仔细询问。莫利内尼发现，所有这些人，甚至包括参议官在内，全不识字。他在巡视途中就描述了鲁埃尔格根本无人识字的状况（这甚至在当时也算是丢脸的事情)，从而证明了那里根本没有任何教育设施。只有教区牧师和公证员才会签名，因为他们的职业是专门从事阅读和写作的。(确实，要长期保留住当地的以及尚未受到侵蚀的阿维龙形式的奥克语，没有教育和不识字是最为可靠的手段。岂不是天下难得有对人人都有害处的事情?)

他的一个匿名的告密者所报告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在过去的三四年里，这里经历了洪水、暴雨、“一片汪洋”，特别是几次冰雹之后，庄稼是颗粒无收。前一年，即 1642 年，“冰雹无常，以至于居民在没有一点收成的情况下捱过了一年”。萨维雅克的公证员让·加里贝尔和马尔蒂埃尔的公证员安托万·图

尔内米尔说得更加准确：他们注意到了1640年、1641年和1642年的（三次）冰雹和1643年的（"历时两天"的）冰雹所造成的灾难。1642年连种籽粮也没有收回来。除了其他人的报告外，马尔蒂埃尔的一个名叫加斯帕尔·伊萨拉的资产者的报告说到了他将自己的农场连同四头牛出租给了一个分成制的农民。除了风暴的损害以外，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鲁埃尔格的土地是块不毛之地，十分贫瘠，可以说是旧制度下最贫瘠的地区之一。塞加拉地区固然特别贫瘠，但喀斯地区也差不多。

187 1642年底出现了面包的短缺，到了冬天和1643年的春天，面包的短缺变得极为严重。那里的小麦价格与正常的年份相比上升了四五倍，而低地地区由于货币的流通比较自由，又有大道通向地中海和大西洋的港口，小麦价格只上升了一倍，因此遭受的苦难较小。在三年的时间里，譬如说在萨维雅克教区，每个塞提埃*的小麦价格从50苏上升到80苏。这可以在谷物市场的记录中得到证实。

根据这份报告，当地的民众"陷入了饥馑之中"（*sont à la faim*）。他们每周只能吃到两三次面包，当然，某些绅士和"富裕农民"赐予的除外。在拉·卡佩尔教区内的圣乔治村，"一些居民整天不吃饭"。如果他们活下来了的话，便创造了迄今为止我所知道的禁食和缺乏营养方面的记录。

用拉巴斯蒂德－卡布德纳克的一个名叫安托万·卡尔的农民比较冷静的话来说："许多居民陷入了饥饿，也陷入了绝望，他们无法耕种土地，因为他们放弃了土地，不能让家人充

* 塞提埃是法国古代的谷物容量单位，相当于150—300升。——译者注

饥，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死去。"

那么，他们怎么办呢？把农场里的牲畜卖掉去买回面包吗？圣德尼斯的牧师吉伯尔格对调查的人回答说：不可能。"我们谈到的这些教区居民除了出卖牲畜，再也没有能力买回面包了，可是就在1642年这同一年里又出现了传染病，教区里的牲畜，无论大小，统统死光了，居民们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卖掉家具，以便生存下去，哪里还谈得上纳税。"马蒂埃尔的牧师梅茹尔列举了自己的财产状况。所有的目击者都提到了牲畜的死亡，"把整个市场变得空空如也，再也没有用了"。自从文艺复兴时代以来，繁荣时期的市场或集市一直让鲁埃尔格人引为骄傲，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市场，才有可能比较合算地将牲畜运销到四面八方。

另一个负担是过多的苛捐杂税。拉巴斯蒂德－卡布德纳克的参议官拉卡萨涅抗议说，"在赋税和欠账的压力下，居民们变卖了所有的财产，他们现在只好每周吃两三次面包"。圣伊格斯特的一个名叫罗兰·库德尔克的不识字的劳工同意他的说法："居民们不得不卖掉家中最值钱的家具，甚至卖掉自己的床，才能还得起税"。根据另一个同样不识字的农场帮工 188 安托万·卡尔的说法，"由于还不起赋税的欠款，教区居民不得不放弃土地，任其荒芜。他们四处流浪，寻找面包，不顾羞耻地乞讨"。没有面包吃，被迫变卖包括床在内的家具，离开土地，甚至背井离乡，这就是在沉重的苛捐杂税，再加上生存危机和这个地区的自然贫困的压迫下的农民的真实写照。除了这些苛捐杂税，人们的指责自然要落到梅茹尔牧师称作"党徒及其代理人"的头上。这里的"党徒"就是包税人和金融家，是长着大大小小牙齿的鲨鱼。他们以国王的名义包下了各种

间接税,一向遭到人民的痛恨。

地租像"人头税"一样过重(地租是指租赁土地的费用,或指租佃农或分成制农民按一定百分比缴纳给地主的收成)。一桩桩的灾难都可以证明这一负担是多么的沉重:按照当地公证员的说法,从拉·卡佩尔寄回来的许多信件中,有一封信写道:"分成制的土地租佃减少了三分之二。"即使是比较富裕的农场主面对着高额的地租账单也不得不屈服:"凯卢斯的资产者夏雷顿得到通知说,有关加斯帕尔的分成制土地的协议已经作废。"

结果,出现了大批的欠款和抵押。因一系列灾难而破产的梅茹尔牧师"不得不把土地抵押出去,以便购买谷种"。接踵而至的是一个又一个的破产和失业。拉·卡佩尔的教区委员彼埃尔·梅叶比昂,也是一个文盲,"被迫上街乞讨面包,却让他的财产空闲在那里,因为他没有现金去买面包或经营自己的土地"。在1643年山区居民的贫困中,最具悲剧性的是为了一口面包而变卖家具。拉·卡佩尔的让·科斯特像贝斯的农场帮工让·布斯(这两个人都是文盲)一样证明了这一点:"由于要还账,甚至连那些拥有大笔财产的人大多数也要变卖自己的床。"如果没有人自愿地出售,财产就要被没收,而财产的主人不得不逃亡。贝斯的一位织工贝尔纳尔·莫利说:"因为没收了财产,他们被迫逃亡,以免坐牢。"当然,直接的目击者是那些天天派去"搜查拒不纳税者家庭"的执行官和他们的士兵。其中有一位是萨勒村的常任执行官,名叫让·莱格。他只能写自己的名字(从他的职位来看,笔划稍嫌僵硬)。然而,就是这位让·莱格宣称说:"在执行因欠债而扣押财产的案子时,我们到了他们的家中,所能看到的只有四面墙壁,凡能移

189

动的东西都不见了。佃农说他们为了买面包已经把这些东西都卖掉了或典当出去了。”真是家徒四壁，一件家具也没有。

公证员图尔内米尔进一步用细节证实了这一点：“教区居民完全破产了，因为当他被派去扣押财产时，他在房屋里找不到一件家具，在牛圈里或在牧场上找不到牲畜，无论大小，从欠债人口中得到的回答只有一个，那就是日子太艰难了，沉重的赋税让他们陷入了饥饿，使他们无法还债，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扣押。他们一点办法也没有。”

日子太艰难，沉重的赋税，这些都是确实存在着的，但是，还有铜币的贬值把平民的积蓄席卷一空。一项又一项的灾难记录在案，直指落在鲁埃尔格人头上的全面贫困的背景，那就是不毛的土地和高出生率。这种普遍性的悲惨状况是不容置疑的。莫利内尼的报告是我们的资料，其客观性也是毫无问题的。莫利内尼接受拉·特里埃尔总督的“委派”参加了这次调查。后来，就是这个总督在1643年这一年绞死和镇压了鲁埃尔格的起义者或“叉民”。拉·特里埃尔的这个部下不会对农民表现出仁慈和偏爱，绝对不会。他把农民贫困黑暗图景描绘出来并不是为了引发对他们的同情。但是，他确实想要让他的上级对造成灾难性形势的真正原因给予关注。

为了摆脱他们的困境，多少能够解除人人都描述到了的那种绝望，包括身兼执行者的目击者所描述的绝望，曾经认真地提出了三种可能的“方案”：死亡，乞讨，移民。人们可以立即就去乞讨，也可以背井离乡，“把土地、妻子和子女弃之不顾”，还可以参军或者到低地地区去寻找工作。这是鲁埃尔格人传统的解决方案，许多人采取了这种做法。

还有第四种解决方案，那就是造反。这里所说的造反就

是著名的叉民起义，而这正是莫利内尼来到鲁埃尔格的真正原因。叉民挑战当局的意愿早在弗隆德运动发生以前的几年里，已经反映在鲁埃尔格人的不屈服的精神上。

190

维尔弗朗什的叉民起义

从1643年起，在鲁埃尔格的许多村庄，因深重的苦难而绝望的叉民开始揭竿而起。[11]那年的6月，1300名叉民敲着鼓，擎着火炬，向鲁埃尔格的维尔弗朗什进军。叉民起义的领袖都是广义上的手工业者，佩蒂是一名大夫，布拉斯（人们称他拉帕耶）是一名石匠，开了一家旅馆，拉福尔克，或叫拉福尔什，是一名鞍具师傅，农村教区委员会（各地每五至六个月举行）把他称作"鲁埃尔格穷苦居民的长官。这些居民团结起来共同向税收和收费官员和当局发出通告"。总之，拉福尔什是鲁埃尔格"平民"的领袖。

这三名地方领袖的名字带有预言的味道。在法语中，佩蒂（Petit）是"小人物"的意思，拉帕耶（Lapaille）是"麦秆"，拉福尔什（Lafourche）是"干草叉"。1643年出现的所谓的诺斯特拉达姆（普罗旺斯的预言家，在当时被视为万能的力量源泉）式的诗歌往往隐含着他们的名字。这里举一个例子：

> **小人物**将战胜大人物
> 拿起熊熊燃烧的**麦秆**和锋利的**干草叉**
> 我们将赶跑吸血的鲨鱼

鲁埃尔格的叉民起义者出于本能，要求把人头税恢复到1618年的水平，废除黎塞留的"压榨之轮"。也就是说，他们要求回到昔日黄金时代的赋税状况。当时的赋税虽说也呈曲线

的上升，但至少不会超过价格的上升速度并保持着平衡。在这些“合理的”要求背后有着更具颠覆性的和隐藏得更深的动机，也不是不可能的。1627年在鲁埃尔格的维尔弗朗什爆发的前一次（针对食盐包税人的）起义中，那些“流氓和破坏治安的人吹嘘财产很快就要转手”。（尽管1627年的维尔弗朗什起义多少有些被误导了，因为引起起义的原因是某种实际上不可能的谣言，说是国王打算向每个刚出生的儿童征税。）[12]

191

在1643年，佩蒂、拉帕耶和拉福尔什把目标限制在税收上。由于对国家财政存在普遍的反感情绪，这在理论上使他们得以把反对税收的全体善良的鲁埃尔格人团结起来，结成一个神圣的联盟。他们非常小心谨慎，对于地租、什一税、高利贷、领主捐等施加在农民头上的其他税收并没有提出抱怨。

在来势凶猛的起义初期，他们这种纯财政的目标赢得了某些贵族的同情和中立，因为这些贵族也被赋税弄得心神不安。农村的年轻绅士加入了叉民起义的队伍，“官员们”，即王室派驻维尔弗朗什的官员，受到了政府的指责，说他们对叉民给予了秘密的支持。

但是，全体鲁埃尔格人的这种团结未能经受住长期的考验。当这场运动失败时，在上层阶级的仇恨或淡漠中死去的只有叉民。将佩蒂和拉帕耶逮捕起来并送到刽子手手中的，正是诺埃尔公爵所动员起来的阿维龙的绅士们。刽子手将他们活活地肢解。维尔弗朗什的这些“可尊敬的”资产阶级居民与地方行政长官和教士，在1643年10月一道发动了决定性的突袭。“他们突然袭击了正在普埃什·德·佩拉维尔的葡萄园里吃蛋的苦难的叉民军队。”他们赶跑了起义军，从而平

息了起义。在1643年10月的一个月里因叉民起义的罪名被绞死的所有领袖都是出身卑微的人，有农场帮工、织工，还有一名鞋工、一名鞍具工。被送上了绞刑架的人当中没有一个是乡绅或资产阶级。

鲁埃尔格的饥民以及他们的兄弟叉民起义者的悲剧极其典型，有助于理解黎塞留和马扎然统治时期的地方性和区域性的问题。鲁埃尔格的村民和农民构成了这个区域的人口中的绝大多数，他们遭受的命运与南方其他的邻近省份一样。192 他们也在持续着17世纪中叶的矛盾。他们的贫穷是依然在上升的出生率与马尔萨斯经济学之间对立的结果。他们依然在各种苛捐杂税的重压下呻吟，因为这个时期仍然是农村税收的顶峰时期，是“地租的黄金时代”。阿维龙的民众都是善良的天主教徒，因而都尊重什一税，饥饿的痛苦很容易转变为对税收的强烈不满。

与此同时，人们还可以看出另外一些特征，包括鲁埃尔格人不屈服的本原，它既是一个过去的高卢部族，现在又是旧制度下的一个行政区划，此外，在这个地区里还存在和持续着一个“贫穷文化”。

启蒙主义时代鲁埃尔格的生态：失调的空气与疾病

在1757—1765年之间出现了一种新的“取镜框”，去看待这个地区的生态。这个观察角度既有必要的统一性，又十分敏锐，从而使得它的质量相当于阿历山大·阿尔邦克的那种从20世纪的高度去回顾性地观察古代的阿维龙。

1760年的这个“取镜框”就是让·穆雷。大约在20年前，

我在蒙彼利埃的“皇家科学院”卷宗中发现了这一档案。这份卷宗依然收藏在埃罗省的档案馆里。[13]巴黎第一大学的马里－若斯·戈迪昂1971—1972年度的一份出色的硕士论文引用了穆雷的重要著作中的一些基本材料。[14]以下数页的内容从马里－若斯·戈迪昂的杰出而深刻的论文中获益不浅。我必须向这样一位卓越的学生表示感谢。

让·穆雷是个新教徒。他是布鲁埃尔的圣－让村的一位制帽匠的儿子。那是一个小地方，位于现在的阿维龙省的东南角。穆雷在1750年前后到法属西印度群岛去追求发展，当上了一名行政官员和种植咖啡、可可和生姜的种植园主。18世纪50年代的中期，他回到家乡，成为了一名善良的鲁埃尔格人，养活着一个扩展型的家庭。他与姻兄——布鲁埃尔的圣－让村的一名商人，住在一处。让·穆雷在那里仔细观察，处处打听。他在鲁埃尔格对周围的自然状况进行了全面观察，考察同乡的劳动、生活、疾病和死亡的状况。他很有可能受到了当时的医生和博物学家让－雅克·卢梭的影响。 193

他当时的观察站是布鲁埃尔的圣－让村。这是一个有2300人的大村庄，位于阿维龙的一个不那么贫穷的地区。“圣－让”的人口中当时有一半以上是手工业者，主要是纺织工人（马里－若斯·戈迪昂说，“如染匠、梳毛匠、粗呢布织匠和织袜匠”），农业劳工约占人口的35%。他们大多数是农场帮工，但为了不致饿死，他们通常还拥有山坡上的一小块土地，或一个宅边的果园。自耕农（富裕农民）所占的比例很小（仅2%）。在社会阶梯的上层，人们可以发现有占人口4—5%的店主和4%的地方显贵。贵族仅占2%。土地的分配很不平等，尽管还不能称之为庄园制（*latifundia*）：十分之一的地主，

即最富有的“十分之一人口”，由居住在外省的领主(*horsina*)、贵族、资产阶级和商人组成，占有表面土地的45%，而50%的地主，即小地主，仅占土地总面积的12%。村社的公用地有一部分是贫瘠的塞加拉地貌，28%的土地种粮食或休耕，20%是草地和牧地，9.9%为林地，5.6%的土地种植了板栗树，少量的葡萄园仅占1.8%，有整整三分之一的土地是山地，无法开垦和利用

在这片有时没有收成的地区，穆雷试图进行试验，建立起栩栩如生的生态图景。这是有史以来一位目击者试图实事求是地从他那个时代的角度去观察鲁埃尔格并将他所看到的事情记载下来。这样的“新闻影片”从1760年开始，按照季节和农事的节奏安排。在他的手稿中，从1757年初春开始了以下的一个周期：[15]

1757年3月21日。布鲁埃尔的圣-让村的田野上开出了金凤花。葡萄园和板栗树已经发芽，孩子们把树皮堆成堆。(3月的)月底，黄杨树，杏树和榆树开花。乡下到处都是蚂蚁。在4月份的第一周，草地完全返青。到处长出了雏菊花，梨树上的花蕾开放。黄蜂、苍蝇和好几种蝴蝶在农村里飞来飞去。苹果树的花蕾开放，还长出了几片树叶。到4月9日，人们穿上了夏衣。

194

4月20日以后，植物蓬勃生长：

李树、梨树、樱桃树、苹果树长出了树叶。燕子低飞。板栗树的花蕾绽出花朵。人们不再生火取暖。农民给葡萄园披上了第一套春装。到了月底，树篱长出了叶子。板栗树、胡桃树和葡萄树也长满了树叶。夜莺歌唱。

在5月的第一周，声音越来越大：

桑树长满了树叶，金雀花开放，柳絮飞舞。河水已经畅流，鲸后山上的雪融化了，到了开始孵蚕卵和播种大麻籽的时候，宅旁的葡萄树上和葡萄园里先后长出了葡萄。樱桃长得像麻雀蛋一般大，杏果已有橄榄那么大。梨花和苹果花落光了，果实开始膨胀。黑麦已长到2英尺高，小麦依然很矮，但稠密而油绿。谷物都开始扬花。在5月中旬，有了新鲜的草莓和蘑菇，可以食用。野狗在布朗达高地上闲逛。（1757年的5月底）旧的花朵落光，玫瑰绽放，虽然雾起得较晚，冻坏了大麻，连夜莺也不再歌唱了。

6月开始了：

黑麦正在变颜色；豌豆可以吃了；葡萄园进行第二次锄地。夏天来临（6月21日）可以看到季节帮工离开鲁埃尔格前往朗格多克的田地收获庄稼。（在家中）苍蝇弄得人们心烦不安。板栗果实长得很快，看上去已经像小刺猬了。有些谷物被炎热的太阳烤焦了。鼻涕虫正在毁坏豆苗和菜园。人们吃上了新鲜的樱桃。月底开始收割黑麦，小麦转成金黄色，很快可以收割了。

7月初：

苍蝇现在不那么多了，黄蜂也很难见到，但跳蚤太多（村民不得不拼命抓痒，就像发了疯一样）。小麦正在收割，燕麦正在转色，接下来便轮到了大麻和亚麻。

195

7月中旬，在最近的一次风暴之后：

采摘雄大麻，可以看到许多蘑菇，南瓜开花，刚刚收获过的土地立即翻耕。3月播种在河谷里的谷物和高地上的黑麦正在收割。

7月底：

覆盆子、黑醋栗和青豆可以吃了。

8月：

采摘亚麻，山坡的黑麦正在收割，在低地地区人们可以品尝刚成熟的李子。

8月下旬，如果雨水不是太多，就可以打谷了：

播种芜青，在高地开始播种冬小麦，黑葡萄基本成熟。

9月，夏天结束：

现在有时需要生火取暖。无花果完全可以吃了。第二茬种植的草正在收割，采摘雌大麻。山坡上的早黑麦返青，播种一结束就开始打谷。

秋季的日夜平分点(9月21日)：

可以看到燕子飞走了，收获核桃和苹果。第一次白雾造成了南瓜的萎缩。

10月，经常起雾：

雾水造成橡子枯萎，使葡萄树叶变黄，树茎萎缩。剥离树莓和桑树的树皮。刚成熟的新鲜板栗端上餐桌。在河谷里播种小麦。

10月中旬，收获葡萄：

芜青上面出现了蚜虫，带有黑色斑点的柠檬色的蝴蝶四处飞舞。

196

11月和12月：

鼹鼠在牧场挖洞(所有的植被都逐渐消失了，山上披上了白雪)。雪像胶水一样粘在树上(交通已经中断)。河谷里到处都有狼。它们晚上甚至跑进村庄的街道。

如此等等，穆雷连续不断地叙述着可视的生态状况，从

1757年说到1765年,年复一年,月复一月。

穆雷可以一页又一页地详细地写出这样的抒情诗，描绘出大自然的慷慨和农业的赐予。读过之后，人们不禁会留下这样的印象,鲁埃尔格真是一个物产丰饶的省份,那里有数之不尽的各种食品供应,而且随着季节的变化而不断的变换,又有园艺学作为基础,有为市场提供产品的果园,还有无数的果树。但是,其中的一些话应当引起我们的警惕:各种可口的园艺梨(*poires de doyenné*),其长相足以让穆雷垂涎不已,却是留给富人们进餐时食用的。小麦的单位面积产量很低：只能收获种籽的四五倍。这样的小麦还有可能是枯萎的、腐烂的,长满了虫子,如象鼻虫或其他的昆虫,麦秆已被蛞蝓啃坏了。然而,如果从另一个角度,即疾病的角度,来观察圣-让的生活质量，这个村庄的卫生状况实在是太糟了。圣-让村在路易十五统治的王国里绝不是特例;但是,透过穆雷编写的面面俱到的编年史，对这一状况可以了解得更多一些。圣-让村的居民在滋生细菌的泥沼里戏耍并不能阻止那里的人口增长,只不过比其他地方略晚一点,因为出生率高(年均35.6‰)和死亡率略低(1757—1765年的同期内为31.6‰)。路易十五统治时期的状况毕竟比路易十四统治时期稍有好转。剩余的人口不会自动去寻找走向坟墓的道路。就像其他许多省份一样,这个角落的死亡率依然是很高的(但鲁埃尔格并不是最严重的)。人们可以从杂志上发表的有关致命的流行病季节性发作的记录对其严重程度进行测量：1757年3月，圣-让村的流行病造成30人死亡。穆雷说:“这究竟是哪一种流行病,还不十分清楚。”据说“那是一场并发症,包括胸膜炎、胸腔感染、斑疹伤寒(即肠道感染)和恶性黄热。患者的舌头变成黑

色，嘴唇也变黑"。许多罹病者要么昏迷不醒，要么"从嘴巴、
197 鼻子和肠子里爬出虫子。服用泻药是有用的，但流血难以制止。有些患者不停地腹泻，这对年轻人倒有好处，老年人却受不了。患者没有一个康复，许多人因此死去"。刚刚去世的尸体"躺在空地上，两三个小时就变成了紫色，其他的尸体膨胀得很大，所有的尸体很快就发出恶臭味"。4月25日前后的死亡人数最多。我在这里要再次引用马里－若斯·戈迪昂的论文。根据他的说法，以上提到的某些症状表明在1757年春流行病的下半个周期里爆发了伤寒症，其特征是发高烧、舌头和嘴唇变色、腹泻。

1757—1758年之间的冬天，出现了几起眼疾。几个患有此病的人失去了视觉；"接着，卡他性黄热病使两只耳朵先后受到感染"（有可能是几起无害的腮腺炎）。[16]然后爆发了狂犬病、痉挛和肠道黄热病，伴随有胸膜炎，夺去了圣－让地区好几个人的生命。这些肠道疾病的爆发说明整个环境是有害于健康的，特别是由于食品的储藏条件不良而造成普遍流行的食品中毒。村民们本应感谢我们今天所抱怨的那种激素饲养的小鸡。鲁埃尔格人的消化组织在1758年经历了斑疹伤寒（还有臭屁）的考验。1758年的1月至6月，圣－让村有60人死于这种疾病。与此同时，直到夏季来临，孩子们还在为自冬季就开始患上的眼疾而痛苦不堪。1758年的夏季，斑疹伤寒，也就是那一年最严重的流行病，再次发作。但是，这一次染上这种病的人不多，症状也不相同：没有出现胸膜炎，而是出现了并发症，表现为绞痛，腰痛和头痛等各种症状。直到12月中旬，这些危险的流行病仍没有消失。（那么，究竟延续了多长的时间呢？）

在1759年的7月、8月和9月这几个月里，死亡的人数特别多，在圣－让村就超过40人。一种以口腔溃烂为特征的人类口蹄疫袭击了村庄里的儿童。这种疾病得自牛或猪，或者通过“人、狗、畜粪、灰尘，特别是奶”等宿主传播。到7月底，“每天死亡的儿童达5人之多”。斑疹伤寒再次与这种流行病一道并发，但这次最为可怕，引起了真正的痢疾，尤其是在儿童当中，使他们成为1759年特殊的小蒙难者。最明显的症状是“肠子绞痛，腹泻，有时带有肠闭合、肠穿孔、肠出血等致命的并发症”。[17]接着引发了阿米巴痢疾。人们也许还记得，在高级动物当中，就像在18世纪的法国村民当中一样，痢疾向来是人口控制的基本手段，使用流行病这种野蛮的方法来减少人口数量的增加，将它控制在比较合理的比例上。

198

斑疹伤寒再次与胸膜炎一道爆发。1759年9月以后，斑疹伤寒在这个地区依然活跃，但不再是致命的，只有1760年1月的一段时间例外，又有一些年纪较大的人死于此病。

1760年4月在圣－让周围的小村庄里出现了天花，造成几名儿童的死亡。另一种粘膜炎或斑疹伤寒在一段时期里暂时销声匿迹，也许是在等待时机，更猖狂地肆虐。

1760年8月12日，天花大肆侵袭圣－让村庄本身（请读者注意，鲁埃尔格的村庄［village］和小村落［helmet］有重大的差别。鲁埃尔格的村庄距离往往很远，居住很分散）。这次天花的流行导致了斑疹伤寒、感冒、红眼病，以及秋天发作的胸膜炎等一连串的传染病。在9月、10月和11月，来势凶猛的天花“夺去了约40名十岁以下儿童的生命，其中包括12名婴孩。这次天花爆发使当年死于天花的人数达到最高纪录，实际上占了当年死亡人数的50%。”（天花流行的中心位于塔尔

纳省的圣－罗马，“我们教区以西50公里处的一个居民区”。）

这就是法国旧制度下村庄的人口模式，特别是鲁埃尔格地区人口模式的实际运行状况。在接二连三的流行病的影响下（“1757年的伤寒、1758年和1762年的支气管肺炎、1759年的口蹄疫和阿米巴痢疾，以及1760年的天花”），圣－让村的人口数量“在1759年1月1日至1763年1月1日”之间下降很少，居民从2255人下降到2244人。[18]

这种数量较小的人口损失一直持续到1762年。那年的死亡人数大约为100人，大大超过了平均数。其主要原因是春季发生的斑疹伤寒。当疫情爆发时，情形十分严重，甚至连圣－让村的民众举行葬礼时也不再敲响教堂的钟了，因为每天都有人死亡，得不停地敲钟，而且会引起病人的恐慌。1762年8月，根据穆雷的记载，这种疾病（痢疾？）移向了胸部。到了夏末又发生流行性感冒，引起许多人的死亡。结果，圣－让村的人口再次出现了负增长，死亡人数超过了出生人数。

199

此后，情况有所改善。1765年，圣－让村的人口接近2500人，人口肯定是增加了，大大地弥补甚至超过了1757年至1762年这段悲惨时期里损失的人口。但是，生活水平在1762年至1765年之间却没有上升。因为1763年的歉收，1764年春天的食品很贵（黑麦价格上升了75%），但没有人死亡。谢天谢地，幸亏这发生在18世纪。从18世纪总的情况来看，这是一个人口增长的时期，只是因为流行病而发生中断。流行病在当时对人口增长造成的威胁远远大于现在。不时发生的流行病造成了“停停走走”的或曲折的人口增长模式。人口曲线上的停滞或甚至略有下降的时期，正如我们刚刚所看到的，正是由于支气管肺炎、斑疹伤寒、腹泻和天花造成的，也是由腮

腺炎、麻疹和丹毒造成的。

由于穆雷笃信启蒙主义时代的一种医学哲学，即“空气”学派，所以在他看来，有一种惟一的要素制约着他在笔记本中描述的那些现象所构成的两类秩序：一类秩序是农业和大自然；另一类则是疾病和健康。鲁埃尔格的真正主宰者正是一种制约要素，那就是空气。[19]正是空气推动着万物向前进，或把万物阻挡回来，无论是热的还是冷的，无论是稠密的还是稀薄的，无论是干燥的还是潮湿的，无论是平静的还是像风一般的，无论是凝重的还是轻浮的，都是空气决定了玫瑰花何时开放、蘑菇何时采集、大麻何时采摘。空气还使鲁埃尔格居民娇弱的支气管和肺部发炎，引发鼻腔和胸腔的疾病。当然，也是空气让臭屁弥漫在穷苦村民的肠道中。在阿维龙，空气是决定生死的主宰者，或者说，相信18世纪医学理论的人是这样认为的，但现在，这种理论早已被遗忘光了。

贫穷文化

我更感兴趣的不是空气，而是土地。鲁埃尔格的塞加尔地貌带有酸性的土壤，那里的喀斯高原地貌所带的土壤也仅仅是稍微肥沃一点，但太干燥。看来，近代的鲁埃尔格农业没有繁荣的指望。18世纪的所有迹象都已表明这个地区将保持在贫穷之中。有一份1771年的非同寻常的文件提供了正面的证据，证明鲁埃尔格人将长期处于悲惨的命运之中。穆雷在布鲁埃尔的圣-让村从事写作的十年之后，尚皮翁·德·西塞主教准确地描述了阿维龙令人可怕的命运。借助于教区牧师们为他进行的调查，这位新上任的主教对鲁埃尔格有了一 200

个全面的了解 尚皮翁·德·西塞主教刚就职就命令他的直接属下，罗德兹教会管辖区的神父们将事实和数据逐项详细地填入他发给他们的问卷表。问卷表涉及到每个教区的领地或封地、什一税、人口、教士、济贫院，如果可能的话还有学校，“贫穷”的状况，也就是说是否有乞丐，他们是否有劳动能力等等，还有农业产量，熟练技术的行业，当地的教堂，如此等等。主教收到的答卷极为详细地概括了18世纪最后30多年里阿维龙的流浪和贫穷的状态，既引起了他的兴趣，又让他感到悲哀。档案学家路易·朗佩勒尔于1906年发表了尚皮翁主教的调查文本，并附上了教区牧师们的答卷。这位杰出的学者被他所编辑和将要出版的档案中所提到的贫穷状况吓坏了，以至于他在序言中作出了一个选择，干脆把调查的问题完全回避掉。朗佩勒尔写道：“有关穷人的问卷表这一部分比较复杂，很不清晰。对这些问题所做的回答也反映了这一点，并不总是那样可能引起人们的兴趣。”[20]这是一个相当温和的评论，而且措辞委婉。

阿兰·盖利对尚皮翁主教的调查所进行的极为详细和周到的分析在“社会问题”方面实际上是最具说服力的。[21]其中的抽样涵盖了分布在整个地区内的162个教区，“共计96593位居民”，或者说占了鲁埃尔格当时人口的近三分之一。所以，这是一份颇具代表性的抽样。在这96593位居民当中，有25827人是穷人，需要依赖别人的帮助才能维持生存。在这些人当中，有1.9万人是“有劳动能力的穷人”，这些人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失业者”：他们尽管是穷人，但完全有劳动能力。此外，其中至少还有8119人是乞丐，通常连固定的住所也没有。[22]因此，把25827名“穷人”统统计算进去，人口中的27%

属于穷人,其中包括20%的完全失业者。多达8%的人称作乞丐(在大多数情况下,没有把他们计算在"穷人"当中)。把"流浪者"和乞丐加在一起,可以认为有33%的人口生活在贫穷之中。设想一下今天的法国,在总人口(1500万人)里近1/3的家庭中,家长要么是失业者,要么沦为了乞丐,那么,就会有1000万人算作是依赖他们生活的人,会受到失业的影响,其中有400万人会沦为乞丐。这样一来,也许能给我们一种概念,对于理解1789年以前鲁埃尔格的悲惨状况是有帮助的,也能使我们更容易理解无数的移民因为一无所有而背井离乡;有助于理解路易十三统治时期以后发生的严重饥荒(应当承认,饥荒在启蒙主义时代已不再是个很大的问题);还有助于理解17世纪发生一些起义;这里就更不用说流行病了。北部、中部、西部和南部的勒韦佐地貌和塞加拉地貌的主要地区是遭受贫困、失业、乞讨这三重现象影响最严重的地区。在勒韦佐的五个地区和塞加拉的四个地区,35.2%的居民属于穷人(超过当地人口的三分之一),其中包括25.4%有劳动能力却失业的人。此外,往往在绝大多数的时间里,还有12.2%的人是乞丐。 201

这份档案至今还收藏在罗德兹区的圣拉德贡德村(除布列塔尼以外,该村恐怕是18世纪法国最贫穷的村庄)。根据教区牧师的记载:"在总数为400人的居民中,至少有四分之三的教区居民是流浪汉,无论他们有劳动能力还是有残疾,都需要慈善机构的救助。大约有20户人家根本无法维持生活。由于我们靠近主要城镇(罗德兹),除了我们教区里三分之一的居民去乞讨外,我们每天还要接纳'外乡人'(乞丐)。"[23]这个不幸的村庄不禁让人们联想起西班牙的贫穷地区拉斯荷德

斯。路易斯·布努艾尔根据那个地区的情况拍摄了一部令人难以忘怀的电影《没有面包的土地》。[24]

这里并不是说即便到了1771年，鲁埃尔格整个地区肯定都是贫穷的。实际上从1771年以后，除了还存在一些特别严重的地方性困难以外，阿维龙的大多数人似乎可以描述为“非穷人”。这里以维尔纳夫地区和鲁埃尔格的维尔弗朗什为例，

202 人们发现，到了尚皮翁·德·西塞的那个时期，那里已经相对地富裕起来了。那些地区拥有大片的喀斯高地，有助于做到收支相抵。1771年的穷人“只有”30%，(17%为失业者)，还有13%的人是乞丐。这些比例在今天看来是太高了，但与当时鲁埃尔格的其他地方相比，并不算高。

但是，如果抛开这些细微的差别，把所有的情况归纳起来看，人们完全有理由说，在路易十三、路易十四、路易十五和路易十六的统治时期，鲁埃尔格始终可以列在20世纪的社会学家所说的“贫穷文化”的行列里。[25]

隧道的那一头：19世纪

因此，为了进行比较，或者出于教学的目的，或许我们可以问问自己：阿维龙在大致相当于19世纪(1780—1914年)的这段时间里，是如何摆脱困境的呢？这是一个令人感兴趣的问题。摆脱困境，这无疑是做到了，在保持住了自我特色的同时，又完全融入了最深层意义上的奥克文化。这些鲁埃尔格黄金时代的照片上，有精明的资产阶级，还有并不显得匮乏的农民。这些照片表明他们至少是部分地战胜了贫困。

1800年那一年，法国大革命(或者说，至少是它最激烈的

那个阶段）已经结束。鲁埃尔格现在与法国其他地区一道启动了适当的但又不可否认的经济增长的历程。它已经具备了一些资源：[26]在喀斯高原地区和“河岸”地区（冲积水草地）以及葡萄园（比较而言！）里的农业很兴旺。它所处的位置正在面临着无法阻挡的进步。然而，遗憾的是，仍存在一些重压，阻碍着经济成长。比如该省北部奥布拉克山区的落后状况；不过，最严重的还是前面多次提到的塞加拉地区折磨着人们的贫困，那里的居民，即塞加拉人，被人嘲笑地称作“黑肚皮”（*ventres noirs*）或“放屁的肠子”（*pétarist*）。但是，任何东西，甚至包括塞加拉地区在内，都不能抵挡19世纪变化的这股巨大的力量。汹涌的大潮已经将所有的船只托起，无论这些船只的形状如何，也无论它们有多大的动力，甚至是根本就没有动力。

应当指出的是，这个19世纪经济增长的基础无疑是在18世纪生活状况的逐步改善中（尽管还存在可怕的乞讨现象）奠定起来的。生活状况改善的证据是，路易十五和路易十六的 203 统治时期发生的饥荒在鲁埃尔格已不再像在路易十三和路易十四统治时期那样造成人们的死亡。流行病才是造成死亡的惟一重要的原因，要让贫穷的口袋鼓胀起来尚需待时日。

还是让我们回到19世纪的鲁埃尔格去：那里的农业在传统技术和生产的基础上出现了增长，也就是说依然以种植黑麦和板栗为主。无论什么革新还是扩展，要引进鲁埃尔格，有时需要走过一些曲折的道路。

首先，那里的蔬菜生产周期有了决定性的改进。到19世纪后期，一车车用煤炭烧制的石灰（这又是当时的一项创造）运到加尔莫和其他地方，装上船，然后用手推车运到塞加拉地

区。这些石灰的用途是中和原来土壤中的酸性，使土质立即得到改善，很适宜谷物、土豆和草籽的种植。有助于提高农业生产力的肥料也很快出现了。1902年，加尔莫至罗德兹的铁路开通。事实上，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对讲奥克语的地区是相当仁慈的，决不像有时所说的那么糟。石灰现在用货运火车来运输，数量增加了一倍。这场对土壤的战斗取得了真正的胜利。塞加拉地区食不果腹的贫穷一去不复返了，痢疾也消失了。

在1856—1900年间，其他的革新以同样的方法被引进，包括耙子、带有模板的犁、双向犁(尽管仍用牛拉)。双向犁与鲁埃尔格农民喜欢使用的旧式摆杆步犁（*araire*）发生了竞争并取得了胜利，但也始终没能完全替代它们。

在谷物生产周期的最后环节上(即收割)，收割机，尤其是蒸汽驱动的打谷机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这些技术突破，诸如收割机和打谷机等，是非常关键的。这些机器早在1900年左右已经出现，但直到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甚至更晚的时间才得到广泛地推广。

1850—1950年的技术变化与作物界的一场革命即土豆的引进相吻合。这种来自美洲的作物在1840—1850年前后传人高原地区，大大增加了收成：它以摄入碳水化合物的方式补充了鲁埃尔格人的饮食。在二战期间，“阿维龙土豆”曾挽救了法国南部的许多居民，使他们免于饥馁。

204

不过，阿维龙向来是个以畜牧业为主的地方。这成了第二个得到改善的领域。第一个进展是消灭了狼群；到19世纪后半叶，狼群完全消失。这有可能是一场生态上的灾难，但对畜牧业农场主来说却是一个胜利，在保护和维护羊群方面面

临的危险，特别是所需的成本，大大地降低了。(1890年以后)有选择地饲养奥布拉克牛；(从19世纪开始)发展了地区的制奶业，生产鲁埃尔格奶酪；1900年以后为鲁埃尔格和拉吉奥尔的奶酪开拓了全国市场。所有这一切都标志着鲁埃尔格畜牧业农场主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

再次，阿维龙农村取得进步的"通道"是公路网的兴建、修建和维护方面的发展。骡子驮运的方法已被效率高得多的马拉车取代。此外，随着公共教育的开展，大批的小农户(把男人、女人和孩子算在一起，人口达成千上万)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尽管教育设施不像别的地方那么好，但人们至少现在开始学习读、写和算数字，正像歌谣中所唱的："数数这些牛，数准这些牛。"国民教育逐步战胜了文盲，到1850年以前，有一半的人口接受了扫盲，到19世纪末仅有四分之一的文盲。这确实是启蒙主义的一大胜利。当然，必须提到的，在这同一时期内，在马恩河和卡尔瓦多斯等其他地区所取得的进步要大得多。

对经济的增长要做出可评估的描述，必须说明消费量的提高。正如我们所看到的，1840年鲁埃尔格村民们的食谱中增加了土豆。但这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土豆不管怎么说不过是供穷人吃的食物。但是，另一些多少带有积极意义的迹象正在出现：在星期天或节日，餐桌上的羊肉换成一只八珍鸡加蛋糕。咖啡也开始出现在餐桌上。咖啡刚刚出现时是用于医疗，后来才成为日常饮用品。刀叉出现在餐桌上，铁锅取代了陶罐。在男人当中第一次出现了酗酒，所幸的是，与西部和北部的其他省比起来，还不那么严重。除了食品以外，纺织品 205
的消费也上升了，确实，进入19世纪以后，用来制作村民衣服

的布越来越接近深黑色了（不再是旧式的红布或蓝布）。但是，在另一方面，作为进步中的奇迹，长裤完全替代了鲁埃尔格农村里的男人所穿的那种短裤，尽管有些怪模怪样，前面有一个很大口袋(就像吊桥一样可以掀起和放下)。

流浪和乞讨是17世纪和18世纪鲁埃尔格贫穷的根源。1800—1850年之后，这种现象(至少部分地)在消灭当中。在村庄和农场里、这是靠农场劳工实际工资的大幅度提高来推动的，有力地促进了在村庄和牧场里消除贫困的工作。根据政府规定，1900年，阿维龙地区有2万人获得了享受“免费医疗”的资格。如果早在1771年就有免费医疗的话，那么，这个数字肯定要高得多，也许会高达四倍。在这整整一个世纪的时间内，大批穷人的生活有了改善，许多穷人家庭的后代上升到“不太穷”的阶层，实现了温饱，甚至小康。这可以说是最为重要的社会现象。

阿维龙在19世纪取得的发展总的说来并不是资本主义刺激的结果(虽然这对该省而言是直接的，但仅仅是从外部发生影响。人们总是从鲁埃尔格的外部去看待某些事情)。相反，这些发展是通过以家庭为基础的农业活动和国内活动的制度为中介的。对于正在努力摆脱贫困的第三世界国家来说，这一事实是很有用的，甚至是必需的。然而技术型的政治家并不总是承认这一事实。他们总是认为，只要是对鲁尔或兰开夏有好处的事情，对鲁埃尔格和斯里兰卡也肯定是有好处的。阿维龙的家庭制度建立在“奥斯塔尔”(*ostal*)或家庭财产的基础上。在奥克语当中，奥斯塔尔的含义十分丰富，包含了一切，诸如房屋、农场、财产、厨房、家人、有孩子甚或有祖父母的已婚夫妻、部落，还包括当两三代以上的人们生活在同一

块土地上的时候所产生的连续性。所以，这是一个把过去和现在、传统和进步、连续和变化统一在一起的概念。家庭财产可能不是大地产的中心，有可能只是一块中等规模的地产，甚至是“小块”地产（*une “pissade” de terre*）的中心。它构成了阿维龙小村庄的村社制度的一部分。在这些村庄里，30至50名居民分成数个奥斯塔尔。我并不想要把奥斯塔尔制度理想化，因为它对农业帮工和女仆来说往往是苛刻的，我只想指出，它作为一个农业活动的单位，有比较高的效率，而且在1880年以后成为推动进步的力量，通过限制出生和限制移民，在人口控制方面表现出进步的能力。到19世纪末，鲁埃尔格已经悄悄地实现了（今天的马尔萨斯派所主张的那种至少在全世界平均数上的）人口零增长。与此同时，这个地区发生了非赤贫化。这再一次同许多流行的理论相矛盾。1800年的鲁埃尔格人，绝大多数是农村的无产者，只有少数是独立的自耕农（根据贝特耶的说法，比例大约为5万人对4万人）。但是，到了19世纪末，这个比例在农村地区颠倒过来了。农业社会，就像以奥斯塔尔制度的方式组织起来的农业社会，正在变得越来越不理想（而且远非如此），但显然更为平衡，贫困有所减轻。毕竟这才是问题的核心所在。 206

这里面看不到马克思的论断，也看不到韦伯在盎格鲁—撒克逊—日耳曼人问题上的冥思苦想，以及他的有关新教对人口繁衍和生育发生影响的论断。幸好鲁埃尔格对这类事情一无所知。直到不久以前，鲁埃尔格仍然是天主教文化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是罗马教皇在说奥克语地区南部的一块小地产，就像波兰和爱尔兰那样，是天主教的一块孤立领土，但比那两个国家幸运得多。鲁埃尔格得益于生活水平的显著

提高，这是因为它全心全意地加入了像法国这样一个比较有特权而且高度发达的国家的发展进程所致。鲁埃尔格的天主教文化在当地为教士和修女提供了相当多的工作机会，从而使得家庭财产比较容易地一代又一代地传给惟一的继承人。这位继承人不会成为职业教士，也不能独身一生，因而有清醒意识，必须承担起结婚和建立家庭的重任。拥有蔷薇花的小径、神龛和圣像的天主教圣女卢尔德本人在第三共和国时期为了保持鲁埃尔格农场和葡萄园的肥力，仁慈地给予了帮助。人们会说，我们的葡萄女神竭尽全力地帮助了阿维龙的经济成长。如果种植葡萄的农场主希望见到酒窖里塞满一桶桶和一瓶瓶的葡萄酒，那么，卢尔德赐予的那一小瓶就是他们走向富裕的保证。

207 这里还要提及推动阿维龙过去和现在发展的其他一些重要的因素：包括向巴黎的移民；鲁埃尔格煤矿工人和咖啡店主的聚会；德加泽维尔的工业和煤炭业发展；还有不可否认的是罗德兹、米劳和维尔弗朗什等城市缓慢的扩大。

最后，我们已经来到了鲁埃尔格的维尔弗朗什这个市镇。贝尔纳·迪富尔在相册中为我们收集了这个市镇从黄金时代到1930年的各种照片。我必须再次坚持指出，这里所作的简介（主要是为了显示鲁埃尔格的整个状况，因为法国读者对鲁埃尔格太不了解了）不能等同于维尔弗朗什的历史。这部历史还有待人们去写作。维尔弗朗什是按照四角形的“中世纪城堡”的形状建起来的，也就是11世纪、12世纪和13世纪陆续建立起来的新城镇（Villeneuve）或繁荣城镇，一眼就可以看到圣母院的巨大钟楼；19世纪初，确实有人用人类学家

的眼光来看待它。下面就是年轻的亚历克西·蒙特耶在波拿巴统治期间写下的一段话：

> 维尔弗朗什在历史的悠久方面根本无法同罗德兹匹敌，但在这两座姐妹城镇中，这座比较年轻的市镇看上去更加漂亮，更加悦目。这座市镇是图卢兹伯爵在中世纪建立的。它的地理位置和特权地位立刻吸引了大批的居民。1779年，包括鲁埃尔格和盖尔西在内的上盖耶纳省在这里成立省政府时，维尔弗朗什成为这两个省份的首府。法国大革命爆发后，"疆界委员会"重新划分了法国的旧行政区划，把全国分成93个行政区划，即省（*départements*），那里的财富和人口都有迅速的增长。……鲁埃尔格和盖尔西的首府地位降格，变为仅仅是阿维龙省的一个自治区（市）。它曾试图竞选为省会，但这一努力失败了，因为被选中的是罗德兹。罗德兹位于该省的中心。竞争对手的各种活动都不能动摇它的地位，因为只要用笔指着指南针就能回应所有的攻击。从那以后，维尔弗朗什只能指望从工业中来补偿它所遭受的损失。

亚历克西·蒙特耶接着指出了"8000人"的人口内部存在的差别。根据他的说法，正是这些人口组成了维尔弗朗什社区当中最集中的一部分。他写道：一半的人口由葡萄种植者和农民组成；另一半是手工业者和作坊主。这两部分人似乎老死不相往来。他们之间没有接触，装束也不相同；尽管他们都说奥克语方言，但法语知识并不相同。作为前者的农民和葡萄种植者，生活更节俭，劳动更辛苦；他们让自己的妻子像驴子一样在山坡上梯田状的葡萄园里劳动。而后者，即手工业者，能享受更多的娱乐，对法语更为熟悉，更容易接受法 208

国大革命的思想；而且，他们的妻子很少离开家庭或作坊。

一百年以后，即20世纪初，法国一家杂志的编者P·若纳，处理了一段不同寻常的文字。它出自于一个文官所写的描述维尔弗朗什的散文。下面这一段就是从中摘录出来的：

> 鲁埃尔格的维尔弗朗什，在阿维龙省，是一个拥有9730名居民的自治市，4595公顷……位于距巴黎624公里处，设有电报局、邮局和路税局。设有地区（*arrondisement*）和地方的行政中心（*Cheflieu*）。下属辖区。三个城市教区，三个农村教区。加尔梅利特女修道院。地方法院。小学督察院。一所男子高中。两所天主教中学。一所女子公立小学。六所小学。两所私立学校。图书馆藏书1.5万册。警务督察。治安队长。两名警士，一名骑警。一名税务官，一名税务督察，一名收税员，一名（财务）登记和发放贷款的官员。一名间接税的收税员。两名公路局的职员。两名负责地方公路的市政工程师。一个农业委员会；每年举办一次农业展览；一个种马场（有四匹种马）；一位治理狼群的官员；若干名律师、公证员、执行官；一个省级监狱；一个普通医院（有50张病床）；一家敬老院拥有117个床位（前身为济贫院，*hospice*）；“神圣家庭”孤儿院（有55名儿童），“优秀牧羊人之家”（有16名儿童），“幻想姐妹”孤儿院（有30名儿童），一家慈善机构……
>
> 矿产：铜矿、铅矿、锡矿、铁矿、磷酸盐矿、数个采石场……
>
> 一个小的温泉，用于洗浴或医疗；三个冷泉，含有硫磺盐和钙；另外两个冷泉，每分钟的流量为300升。

地方产品：谷物、葡萄、水果、蘑菇、青核桃、奶酪、牲畜、火腿。 209

苗圃和园艺

地方制造业：铸钟、铜锤、饭锅、捕鼠夹、熟石膏、石蜡、木屐、肥皂、麻纺、制帽、地方织品，油，特别是胡桃油，利口酒、矿泉水、化工制品、磷酸盐和高级磷酸盐，酿酒、面粉加工厂、皮革、制硝、马具制造、染布、竹藤编制。

集市：每月22日。大集市：每逢1月、2月、3月、10月、11月、12月的第一个星期四。普通集市：每逢周一、周四和周六。

教堂：圣母院（13世纪—16世纪），有塔楼（高58米）；旧的查特豪斯修道院（15世纪），现用作济贫院。

这张清单把女子学校、养马场、大麻纺纱机和土木工程师等五花八门的东西，更不用提治理狼群的官员了，全都混杂在一起。读过这份清单，确实会给人们留下一种摸不着头脑的印象，但是它却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准确地概括了维尔弗朗什的各种极端不同的功能，包括农业的、商业的、手工业的、工业的及行政管理和官制方面的各种功能。这真是一个复杂的城市单位，由相当富裕的资产阶级主宰着。从政治上看，19世纪以来，活跃的左翼力量十分积极地反对以阿维龙为牢固基地的教会权利。

贝尔纳·迪富尔所收集的相册特别关注了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全盛时期维尔弗朗什的社会盛事：有宗教的（悔罪者的队伍，大教士的葬礼）；有军事和爱国主义的（兵团的分列式）；有民间风俗的（狂欢节），有吃喝场合的（咖啡馆或盛宴）；有田园风光的（野餐）；还有传统医疗的（围观拔牙郎中的人群）。

学校（教会的或国家的）、地方贸易、卖核桃的摊子、牛羊和家禽市场、房屋和喷泉的形状，有石有水。现代为这些相片提供了想像的空间，无论这个现代是真实经历过的（例如铁路、化肥和自行车等），还是依然存在于幻想之中的（例如航天飞机）。维尔弗朗什的摄影者，无论是富裕的还是贫穷的，都把照相机的镜头对准了这些类似的场景。这种选择遗漏了城 210 市现实中的许多方面，仅仅体现了暗室里的"艺术家"们认为具有代表性的某些成分。他们的选择无疑具有对他们和我们的双重意义，也就是对相片的摄影者和消费者的双重意义。

这些照片里的农村，诸如正提着木桶的葡萄种植者、正在钉马蹄铁的铁匠、秋日里正在用连枷或第一台蒸汽打谷机打谷的农民（这是农村中重要集会），等等，都仅仅是作为背景出现的，很少被人注意，也从没有当作主要现象来对待，这与鲁埃尔格当时的农民以绝对优势的比例超过城市居民的事实恰恰相反。在这些已逝的摄影者的意识中，家庭牢固地处于中心地位上：从这些褪了色的褐色照片中，人们能够想象到玫瑰香木的气味，能够强烈地感受到一成不变的奥斯塔尔或家庭。20 世纪如同 14 世纪时一样，在鲁埃尔格如同在贝亚恩一样，家庭依旧是奥克语文化中最坚固和最核心的结构。

这里还用得着做一番总结吗？我不否认我对鲁埃尔格的偏爱。我喜欢阿维龙。我喜欢这个小小的省份在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摆脱贫穷和欠发达状态的那种方式。它没有造成污染、没有造成天翻地覆或大惊小怪、没有造成过多的人口和大批像雨后的蘑菇般涌现出来的新市镇、没有太多的冒着黑烟的工厂烟囱。它在摆脱贫困和欠发达状态的同时，对自己的结构给予了尊重：包括奥斯塔尔这种基本的单位；把异教与天

主教混合在一起的民间风俗构成了那里强烈的宗教情绪的柱石。这种鲁埃尔格的文化在过去有能力利用资本主义的环境作为衬托，更加明确地确立了自己的特质，一种既有创造性的又保留了传统的特质。今天的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有可能毁灭这种鲁埃尔格的文化。这种危险现在仍然存在。这样的毁灭是令人心碎的。我在这篇文章中一直在审视着过去，目的是为将来做好更充分的准备。我祝愿我们这个以穷苦农民占大多数的星球能与大多数未来学家所设想的乌托邦，也就是一种也许没有可能实现的农业乌托邦截然相反。我希望在21世纪看到一个更像1925年前后的阿维龙那样的整个世界。它将不会像一个极其成功的新世界那么糟糕。

注 释

[1] 本文初次发表时是为贝尔纳·迪福尔的《石头与黑麦：用业余爱好者的摄影照片和家庭相册来描述的鲁埃尔格自治城市居民的历史，1860—1950年》(Bernard Dufour, *La Pierre et la seigle: Histoire des habitants de Villefranche-de-Rouergue racontée par les photographies d'amateurs et les albums de famille 1860—1950*，初版，巴黎，1977年)所写的一篇"前言"。虽然这篇文章的写作原是作为一部有关法国南方省份鲁埃尔格的摄影著作的附录，但它涉及到说明摄影时代以前的目击者如何看待这个省份，即便没有那本相册，本文也可以单独地阅读。

[2] 亚历山大·阿尔邦克：《鲁埃尔格人》(Alexandre Albenque, *Les Rutènes*)，卡雷尔，1948年，第43—44页。

[3] 同上书，第40页。

[4] 教士埃克斯彼利：《高卢和法国的地理、历史和政治辞典》(Abbé Expilly, *Dictionnaire géographique, historique et politique des Gaules et de la France*)，阿姆斯特丹，1770年，第6卷，"鲁埃尔格"条。

[5] 惟一的不同是圣安东宁行政区不再归这个省份管辖。这个行政区于1808年划归给塔尔纳－加龙省。参见雅克·布斯凯：《鲁埃尔格的

日用物品研究》(Jaques Bousquet, *Enquête sur les commoditiés du Rouergue*),普里瓦,1969年。

[6] 阿尔邦克:《鲁埃尔格人》,第35页。

[7] 图尔的格雷高利(格里高利):《教父列传》(Gregory [Grégoire] of Tours, *De gloria confessorum*);有关圣希拉尔的一章载于图尔的格雷高利的《神迹记》(Gregory of Tours, *Le livre des miracles*),1860年版,第2卷,第344页。

[8] E·A·马特尔:《塞文人……》(E.A.Martel, *Les Cévennes*…),巴黎,1890年,第271—272页;P·若阿纳:《法国地理和行政区划辞典》(P.Joanne, *Dictionaire géographique et administratif de la France*),巴黎,1902年,第6卷,第4036页。"圣安岱奥尔"(湖)条。

[9] 布斯凯:《1552年鲁埃尔格的日用物品研究》。

[10] 从这里开始,直到有关叉民起义的那一节,包括那一节在内,我所使用的资料来自本人的博士学位论文《朗格多克的农民》(*Les Paysans de Languedoc*)的第96页起。该论文的非节选本于1966年在巴黎正式出版。《朗格多克的农民》的英文译本(*The Peasants of Languedoc*),约翰·达伊翻译,伊利诺斯大学出版社1974年出版。

[11] M·德加尔内:"1643年鲁埃尔格的起义"(M.Degarne, "La révolte du Rouergue en 1643"),载于《18世纪评论》,1962年。

[12] Y·M·贝尔塞:《叉民起义史》(Y.M.Bercé, *Histoire des Croquants*),巴黎-日内瓦,1974年,第622页。

[13] 埃罗省档案馆,登记号D150。

[14] 马里-若斯·戈迪昂:《鲁埃尔格的圣-让-迪-布鲁埃尔之研究,1757—1765年:依据让·穆雷的植物学—气象学观察》[Marie-José Gordien, *Etude de Saint-Jean-du-Bruel-en-Rouergue(1757—1765) d'après les observations botanico-météorologiques de Jean Mouret*],巴黎第一大学历史系学位论文,1971—1972年。

[15] 以下系摘自穆雷笔记的原文,我仅仅做了一些节选。

[16] 据马利-若斯戈迪昂的硕士论文

[17] 马利-若斯·戈迪昂的论文,第101页。

[18] 马利-若斯·戈迪昂的论文,第102页。

[19] 米歇尔·福柯:《医学的诞生》(Michel Foucault, *Naissance de la clinique*),巴黎,1963年。又参见德赛弗和勒鲁瓦·拉迪里等:《医学、气候、流行病》(J.-P. Dessaive, E. Le Roy Ladurie, et al., *Médécins*,

climat, épidémies),穆东,1972年,第26页。

[20] L·朗佩勒尔:《1771年罗德兹主教管区的状况》(L. Lempereur, *Etat du diocèse de Rodez en 1771*),罗德兹,1906年,"序言",第11页。

[21] 因此,我在这里引用的不仅是朗佩勒尔发表的档案原件,还依据了阿兰·盖利所做的杰出研究成果《从中世纪末到18世纪的鲁埃尔格人口研究》(Alain Guéry, *Etude démographique du Rouergue de la fin du Moyen Age au XVIIIe siècle*),巴黎第七大学学位论文,1970—1971年

[22] 同上,第131页。

[23] L·朗佩勒尔,同前书,第454页。

[24] 参见M·勒根德尔的内容极其丰富的著作《拉斯荷德斯》(M. Legendre, *Las Hurdes*),波尔多,1927年。

[25] 奥斯卡·刘易斯:《拉维达》(Oscar Lewis, *La Vida*)。

[26] 下文大量引用了R·贝特耶的以档案为依据的杰出著作《19世纪鲁埃尔格的日常生活》(R. Béteille, *La Vie quotidienne en Rouergue au XIXe siècle*),巴黎,1973年。该书附有书目。主要参见A·蒙特耶:《阿维龙省概况》(A. Monteil, *Description du départment del' Aveyron*),巴黎,出版年不详;A·梅尼埃:《塞加拉、勒韦佐、夏泰涅拉》(A. Meynier, *Ségalas*, *Lévezou*, *Châtaigneraie*),奥里亚克,1931年。

211

第八章　社会人类学家布雷顿的雷蒂夫：18 世纪的勃艮第乡村[1]

过去一百年里对法国旧制度所作的全部研究，倘若不把乡下人对自身、对他人和对他周围世界的独特看法包含进去，看来都难免是抽象的。在吉列·德·戈伯维尔的日记中，我就发现了他对 16 世纪诺曼底的生活做了生动、直接而完整的描写。关于这一点，我在别的著述中已有论述。为了获得对旧制度的最后一个世纪的同样生动、直接而完整的认识，我打算转向讨论布雷顿的尼古拉·雷蒂夫（他称自己为尼古拉·雷蒂夫·德·布雷顿）。也许我应该解释一下为何做这样一个选择。雷蒂夫并未按照保罗·波耶特原先的意向所造就的那样，成为一个反米什莱主义者，也没有成为一个反对革命的，为预先构造的幸福进行辩护，并对乡村生活带着玫瑰色田园诗幻想的人。他也不像《我父亲的一生》[2]中可能给人造成的印象那样是个充满感伤的人，除非是在表面上或在偶然的情况下。无论是《尼古拉先生》还是格勒兹的绘画都让人们为 18 世纪最后那 30 多个春秋洒过热泪，但我们必须将视线越过这些伤感的故事。雷蒂夫向我们记述了他亲眼目睹的富裕农民的生活方式。对于他们而言，幸福的观念是一种新鲜而真实的观念。然而，正如他的著作所证明的那样，他非常清楚这样

的幸福只是在贫困的环境中造成了尝试性的进步，因为贫困依然是大多数乡村人民所熟悉的状态。

让我首先介绍雷蒂夫家族的情况，特别是介绍这个家族的核心人物，埃德蒙·雷蒂夫。无论是在下勃艮第他所出生的那个尼特里村，还是在他后来移居的靠近欧塞尔的萨西教区，他都是这个家族的核心人物。埃德蒙和他的儿子尼古拉是典型的富裕农民。他们移居到了一个以种植粮食和葡萄的小农组成的社会中。这些人当中的典型人物（或者说一家之长）显然一直都是互助农，即自己拥有一支畜队的农民，或至少拥有畜队中一部分。他也许有自己的一匹马或一头驴，甚或一对牛或“半对”牛。几乎在所有的情况下，互助农必须联 212 合(或依附于)境况相似的另一个家庭或更多家庭。他们合伙使用牲畜，从而建立起了一支完整的耕作队。因此，各种形式的联合，确实就是一种扩展型的家庭，在奥文到尼维奈，莫尔旺到下勃艮第的广大地区，这一直是个非常显著的现象。尼古拉·雷蒂夫告诉我们，当他年少时，有一天的日暮时分，经过了漫长而困顿的步行之后，他曾敲开过一家这种互助农的家门。当日恰逢“三个家庭齐聚在一起，组成了有三匹马的耕作队”。这几个家庭在其中一家的屋内食用一大块咸肉，还有正在炉火前暖着的一大罐葡萄酒来庆祝共同播种的结束。

雷蒂夫并不隐讳这种互助农，或者一般称之为小农的农民所经历的相对困境。这些小农的地产非常少，却是农村人口中的绝大多数。他记述了他们的贫困，或者说对贫困的持续性的恐惧。他一针见血地说道，一家人靠3顷地，实行三年轮作制，却仅可度日，而与其说是度日不如说是挣扎。农民们

不得不拼命劳作，收获时节向别人租佃土地（也就是说，从每年的收获中交纳地租或以分成的方式交纳地租）。他们不敢结婚，就像躲避瘟疫一样。如果男人非要跨出这致命的一步并被拽到圣坛前不可的话，他也会尽可能让这一天晚些到来。因此，这里没有早婚的情况。结果，等到孩子出生并开始长大之时，父亲的精力也开始衰退了。只有等到他的生命结束时，他的儿子才能长大到可以干活并替父亲还清部分债务的年龄。雷蒂夫说，实际上，由于贫穷和父母的辛劳，婴儿或儿童的死亡早在此之前就已给父母造成巨大的伤害。为了补充家庭收入，妻子往往给别人家的孩子当奶妈，在这期间，为了不影响孩子的健康，她和丈夫至少在理论上需要禁欲。[3]正如雷蒂夫所说的，这不仅是一种艰苦的生活，而且简直是造孽！其中根本没有婚姻的慰藉可言。

当然，除非陷入了极度的贫穷，人们总是要设法熬过年关，并设法做到收支相抵。这毕竟是在18世纪。在萨西村，某些家庭往往兼营多种活计：有些村民既是石匠，又种葡萄；还有些小农兼做织工；有的小农在不下地干活的时候就作鞋匠修鞋。沉默寡言的布莱斯·格雷奥就是一个既干农活又做瓦匠的人，[4]他的儿子雅克给埃德蒙·雷蒂夫当牧童，也就是说，他属于男劳力中最低等的一种，地位还不如扶犁耕地的庄稼汉和种葡萄的工人，仅仅高于两个女仆，农夫的"母狗"弗里格特和他的"马"布来桑。一般说来，互助农必须给更富有的农民做日工，或派一个儿子去他的地里干活，才能不至于入不敷出。像孔文那样高个子的和喜欢炫耀的村庄民兵和他年轻的妻子玛格丽特·米内那样把家境弄得较好一些，甚至使生活能达到某种安逸程度的农民，往往把好运归之于自己有多

方面的技能：他们有两顷地，其中一部分生产谷物，用来做面包。他们还有半顷地种葡萄，能给孔文换来一些零用钱和饮用的酒（玛格丽特只不过是在水中加了一点酒而已）。小葡萄园的收入还可以用来纳税。丈夫和妻子一起在家织布，以支付偶尔的奢侈消费，孔文娶玛格丽特是出于真心的爱；因为她家比孔文家穷。玛格丽特织的布，养的十只母鸡所下的蛋，以及奶牛产的奶、黄油、奶酪[5]都能为她挣得一些家用。她还在厨房外边的园子里种植蔬菜；这对夫妇还拥有一幢不大的住宅（这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

这样的家庭，即比较穷苦的小农和葡萄种植农构成了萨西村当地人口的大多数。但他们并没有什么家具。这里所说的是一般意义上的家具。他们的家产清单上只有价值大约200图尔锂的可动产：一张床，一个旧箱子，一个揉面钵，几个酒桶，一些锡餐具和铁锅。18世纪的经济增长为乡村人民提供了铁和白锡，却没有让他们生活得更安逸些。1789年，他们毫无保留地拥护萨西村的第三等级所提出的要求，实际上，这些要求是他们拟定的。《老爹的学校》一书中提到一个富裕农民图斯勒约尔。从他的口中可以看到这些要求的最初形态。图斯勒约尔（他本人就是另一个埃德蒙·雷蒂夫，只不过没有那么富有和老练）说，"被收税官榨干了的"萨西村居民强烈要求"降低人头税和葡萄酒的消费税"。他们对"领主捐"表示不满，这可能是指欧塞尔的主教和教会对收获的谷物十二抽一的什一税。但是，图斯勒约尔也说，"如果没有宗教"，"萨西村的生活就像是人间地狱"。可见，基督教的信仰仍然是这个教区居民的麻醉剂，对宗教来说，这是多么好的一件事啊。 214

这些对18世纪的某些背景下的贫困状况所作的描述并

没有什么特别之处，那时的贫困并不像17世纪那么严酷，但由于农民的"期望值"提高了，因而也被体会得更加深切了。在前几章科伊内尔上尉写的回忆录中，也可以找到这种极为相似的内容。然而，这类资料对于本文的目标却是至关重要的。它使我们能够在尼古拉先生所详细描绘的贫困的群岛中，准确地识别雷蒂夫家族成功地为自己建造的安乐小岛。根据对勃艮第这个地区的地理状况做过研究的J·P·莫林的说法，这个家族在其最富裕的时期拥有布雷顿大农田内的整整50公顷土地。这并非是幻想中的黄金国度，但至少是一个"勉强度日的"农民所拥有的平均土地规模(即拥有这一最低限度的土地，农民才可能做到自立)的10倍；这个家族的财产比普通的互助农所拥有的"手绢包着的财产"多出了25倍或30倍，更不用提那些穷苦的日工了。就在那时，当埃德蒙·雷蒂夫买下布雷顿时，就已经实现了那么多哪怕富裕到既有马又有钱的租佃农也不敢奢望的梦想：自己成为土地的拥有者，拥有阳光下的一块土地。埃德蒙·雷蒂夫不断聚集土地，并因为养育了14个孩子而免于纳税，可以看作是与夏隆附近的布雷西一位富裕农场主相当的人物。那位农场主在当了30年的租佃农之后，在1720年"把贫穷农户手中最好的土地都占为己有，而他们却敢怒而不敢言"。他也是因为养育了12个子女而免于纳税，[6]所不同的只是雷蒂夫更为积极并富于同情心。换句话说，富有的雷蒂夫家族显然不是这一地区的那种普通农民。村里所有人都以洗礼名相称，只有埃德蒙例外，被称呼为"先生"，因为按他们的话说，他有"后台"：他是个富有的人，拥有能够说明其社会地位的各种象征。他的住宅用的是瓦屋顶，还有马车的入口。他的第二个妻子，原先是一个

婢女，她的丈夫已故，而她却未婚先孕了，但"现在却穿着晨衣"，也就是说，在本村的社会圈子里，她是个举足轻重的人。 215
埃德蒙，作为地方领主的一名官员，被尊称为中尉大人，他的妻子芭尔布也被尊称为中尉太太。他的儿子都是牧师或神父，也被尊称为先生。正如我们从《尼古拉先生》这本书中所知道的那样，作者本人之所以被称作先生，是因为他比教区内的那些衣衫褴褛的人"穿得稍好点"。至于埃德蒙第一次婚姻生下的女儿们（芭尔布在一次又一次的大吵大闹之后确立了自己的权威，将她们先后赶出家门），这些可怜的女孩无权被称为"小姐"，因为她们的母亲（尽管是个富裕农民的女儿，却是不识字的乡下女人）"从未穿过晨衣"。

可以肯定，在独立农民（拥有5顷土地）和互助农民（拥有1顷土地）之间有一个经济上的分界线。但是，更值得注意的是社会的差异，这个差异把村里的"先生"和"非先生"区别开来，而那些"非先生"仅仅被直呼其名，如汤姆、迪克或哈利（或许还有让、保罗、彼埃尔）。尼古拉·雷蒂夫就他自己的方式而言确实是一名人类学家。他抱怨那些听说过易洛魁人、休伦人或阿尔贡金人的生活风俗的巴黎人却对法国农村的一些细节一无所知。中尉大人在他的教区里就是一名族长，享有与众不同的地位和声望，其方式同萨西村的那位接生婆一样，但层次却不相同。那位接生婆也享有特殊的地位，尽管有可能不那么称职，但全村人都唤她为"好妈妈"。族长和接生婆都在各自的领域里达到了某种"不称职的水平"（埃德蒙亲自下地去收获的粮食决不会超过6英担，尽管他的儿子为他画过一幅画，以表现他种庄稼的本领）。这种村庄中的显贵，地位稳固，在同村老百姓的尊重仰慕中逍遥度日。

尽管埃德蒙·雷蒂夫颇有架子，但他实际上还不能称为资产阶级。可以肯定，他与同村较不富裕的农民兄弟并没有处在不同的社会阶层上。他尽管处在这个村庄社会的顶端，但依然还是一个农民。正如他儿子指出的那样，他知道怎样与其他的农场主交谈，怎样与雇工交谈，怎样与他的马、狗和牛交谈。这样的特权地位可以让他毫不困难地加入已经开放的与其他农村居民的交流网络中去，也使尼古拉先生能够向我们提供精彩的第一手报道，因为他本人在农村社会这绿色的涤罪所里也据有同样优越的地位。

216 尽管埃德蒙在他所在的村庄、教区以及好几个教区里都是一个突出的人物，但他本人只不过是个卑微的箍桶匠的孙子。他的祖父死于1687年，生前在故乡尼特里镇已经取得非正式仲裁人的地位：他调解争端，调和冲突的双方，在尼特里镇是位著名的"公正的人"。[7]作为领袖王朝的一员(领袖只能出身于雷蒂夫家族，否则就不成其为领袖)，埃德蒙，尤其是他的父亲彼埃尔，为这位箍桶匠创造出了许多神话，却将任何与桶有关的事情悄悄删去。他们为他编造了一个传奇式的家谱，称其祖先是佩蒂纳克斯皇帝和骑士唐普拉·让·德·蒙特罗瓦尔。这位骑士因性格执拗，而获得雷蒂夫("抵抗者")的绰号。

彼埃尔·雷蒂夫是箍桶匠的儿子，也是族长的父亲，既预示了将来的埃德蒙与他一脉相承，又与他截然不同。(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彼埃尔同他儿子一样，说起话来整个就像是个重农主义者。[8]他是一个富裕的乡村农民，但与其说是位地主，还不如说是个租佃农。不知怎么地，他从一个箍桶匠的卑微地位上爬了上去，开始出人头地。彼埃尔确实具有一种无法

抗拒的魅力。这似乎已成了这个家族的基本特征。这一特征在他的孙子尼古拉身上，以一种不同寻常的方式显露无遗，倾倒了（他所说的）所有倾心于他的女人。彼埃尔当时就使用了他的魅力和能力去取悦每一个人，无论男女，从而确立起他的作为村庄政治家的地位。彼埃尔当上了领主的官员和尼特里地区的负责人，就如埃德蒙后来在萨西村那样。在他的教区内充当“上述地区的部分领主的收税官”；有一段时间他还当上了“财政官员”。这些官职合在一起又使他成了领主法庭的公诉人，成为同一领地的赋税、代役金、什一税和租金的收税人。彼埃尔有权有势，既富有，又快活，在尼特里名声大噪。他的葬礼就是对他显赫地位的极度赞颂，是无可比拟的巨大成功：全村人都以一声虔诚的“阿门”（这就等于是三声欢呼）来祝祷他的灵魂进入天堂，而他显然是应当进入天堂的。他获得如此崇高的声望是有充分理由的。彼埃尔像后来的埃德蒙一样，公正地处理摆在他面前的每一件诉讼案，不用一丝一毫的奸诈。他在饮酒和吃肉的间歇执行司法，给所有请愿的人，无论是委托人还是犯人，都提供酒喝，因为尼特里镇上没有酒店。“听证会就在他的家里进行，而且总是由他来支付费用。在尼特里，除了这位法官，再也没有别人会供应酒”。彼埃尔死于 217 1713 年，欠下一笔债务（但在 1709—1710 年以后的那些年里又有谁不欠债呢?），为他的后裔留下了一份破败的家业。

彼埃尔风流放浪，对朋友出手大方，精于蛊惑女人，但关起前门来，在自己的家中却是个暴君。让全家人惊恐不安显然是他的第二天性。他的那位苦恼不堪的妻子（自称出身于一个地方行政长官的家庭）受到他不顾体面的虐待。然而，她却对主人顶礼膜拜，尊崇到如此地步，以至于哪怕轻轻地说一

声客气话也会让她像一只受到宠爱的猫一样趴在他的脚边呜呜作声。当他去世时，她对幸福的惟一祈祷就是指望死后与他合葬一穴，她对极乐的向往就是要在天堂里守护在他的身边(除了天堂，他还能在哪儿呢?)至于他的女儿们，按照彼埃尔的说法，则属于"最难管教的那种女人，就像最难驯服的动物"。因此，她们是在父亲极其严厉的管束下长大的(像18世纪的大多数法国农民一样，她们的父亲是最顽固的大男子主义者)。陷于对彼埃尔的恐惧之中，她们受到的教导是决不要说"是"或"不"，而要永远说"我也应该这样想"，"大概是这样"，"或许"等等。她们的母亲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嘱咐她们要"温顺，勤快，别多嘴"(尽管这些教导未能阻止她们当中的一些人在后来的生活中与丈夫争吵)。要为这种严厉苛刻地对待女儿找到正当的理由是很容易的，至少在雷蒂夫家族的传统中并不难。彼埃尔、埃德蒙和尼古拉坚信的一个信条是"无论如何也没有比一个执拗的女孩更有悖常理了，她是一头怪兽"。彼埃尔·雷蒂夫对待他的儿子埃德蒙(他的专断性格毫无疑问是法国农村社会的典型)就像一位典型的阉割狂父亲。他儿子对村中漂亮的女孩最无恶意的言辞举止，哪怕是交换一下眼神，都会招来父亲一顿鞭打，而且打得满身是血(也许人们会在无意中注意到，或在其他地方也同样是这样，在这个教区里，严格的道德戒律往往是由父亲而不是母亲强制实行的，尽管这实际上更多的是一个说教的问题而不是实践的问题)。然而父亲的惩罚并未减弱他们之间的父子之情。在尼特里，"害怕"一词通常被当作"爱戴"的同义词："在这个地方，当谈及上帝或某人的父母时，这是很普遍的说法。"

218 埃德蒙当然自称爱戴父亲，并把父亲的死当作他自身的

悲剧，在新修好的坟茔前洒泪不止。村里人把他的泪水比做是圣水奔流。在勃艮第的这位富有的农民家里，父亲令人生畏的形象在妻子和孩子心里都激起恐惧，但这种恐惧和爱并不相互排斥。不过，全家人真挚情感的焦点却集中在母亲安妮·西蒙身上，尽管她如果说不是身体上但至少是在精神上受到了丈夫的伤害。她对孩子们十分慈爱，孩子也以爱回报她。埃德蒙·雷蒂夫和芭尔布·费尔莱后来结为夫妇，至少从理论上来讲，也建立在同一个原则上：父亲炫耀其权威（尽管年老后变得宽容了些），母亲充满慈爱（尽管她是个本性专制又非常实际的小个子）。

然而，这个原型的专制的父亲，对待儿子严厉而对待女儿则更加严厉的家长，在当时的欧塞尔乡间并非是所能找到的惟一范例。例如，芭尔布·费尔莱（人们称她比比），出生于1703年，自小受到生父的宠爱。她的父亲是种植葡萄的农民，也是阿克雷领主城堡的佃户。在家中，比比是全家人的掌上明珠，一个宠坏了的小公主；她在与比她年长的情人、第一任丈夫，欧塞尔的一个资产者布雅一道生活时，依然重复着这样的角色。他娶了芭尔布为他的续弦，对这个年轻鲜活的新娘同样非常溺爱，只顾得上高兴，自己的缺点并未让妻子在意。埃德蒙与芭尔布后来的这次婚姻所生的儿子尼古拉·雷蒂夫毫不掩饰他对母亲所受到的那种舒适的抚育并不赞赏。埃德蒙在娶了这个娇宠惯了的芭尔布之后，不得不用别的习俗来训练她：他将勃艮第农民反女权主义的准则强加在她的身上。这里只要随意引用两句话就可以说明勃艮第的农民对于父权和夫权是多么的迷恋。正像尼古拉先生所描述的那样，农夫们总在不容反驳地吼叫着："女人，去把你的女儿领过

来”,“女人,给拿些香肠来”。

至于孩子们，年龄渐长的埃德蒙对他的第二次婚姻所生的年幼孩子们表现出来的宽容，并没有得到芭尔布的大儿子尼古拉的赞许. 尼古拉先生写道：“雷蒂夫家族的性格太固执”,以至于无法从一种宽大的抚育中获得益处，就像倒着生长出来的葡萄枝一样,需要坚决地将它剪去。尼古拉先生说：不用鞭子，是不符合乡下的规矩的。(请记住，这里指的是勃艮第人!)

总而言之，如果说彼埃尔对埃德蒙而言只能算是个部分成功的原型，他比儿子更加专制，但在财运上又不如儿子，毋庸置疑，是他给这位继承人提供了一个典范：一个富有的农民兼收税官、教区的显贵和家庭暴君。不管埃德蒙是否愿意，他都得模仿这个典范，只不过将这个典范的一些棱角磨光，并用钱袋子来为它增添某些东西。尼特里—萨西地区与社会结构更为封建的波萨耶迥然不同。那是个树木很多的落后地区，位于现在荣纳省的西南角。那儿“还有裹着皮绑腿和穿着平头钉的靴子去打猎的贵族，他们还佩戴着古老而锈迹斑斑的剑，住在摇摇欲坠的城堡里，尽管饿得要命却高傲得不肯工作”。与此相对照，可以看得出彼埃尔是个发家致富的平民：他是村中的长者，是个充当农场主的农民，也是教区的法官和公诉人，已经完全融入领主制并从中获得了很多好处。他辛勤劳动，亲自耕地和播种，而且纳税(尽管因为他的一些朋友身居高位而不必多纳税)。一句话，彼埃尔是“中等阶级中的一员，而那个宝贝阶级得到了善良的国王的钟爱”。[9]埃德蒙只能虔敬地观望着他父亲所表现出来的那种令人敬畏的但从未被真心仇视过的形象。当他割舍了巴黎人的爱与野心之梦

219

以后，也重塑了这个典范，并把它丰满和完善起来。

两个村庄

与他的父亲相比，埃德蒙·雷蒂夫（如果不是理论上，但至少在实际上）不那么专制，却更富有。他像彼埃尔一样在骨子里都是一个尼特里人。在雷蒂夫家族的观念里，萨西和尼特里这两个村子之间有天壤之别。他的岳父多代恩的家乡萨西村是块处女地和原材料，埃德蒙可以在那里进行实验，以期将它变得富饶起来。尼特里则相反，它是埃德蒙的家乡，是雷蒂夫王朝得以在其中形成的母体，而埃德蒙和尼古拉都属于这个王朝。"萨西的方式"与"尼特里的方式"之间的差别是值得研究的，尽管这在普鲁斯特的作品中有所反映。或许正是由于有了普鲁斯特式的共鸣，才值得加以考虑。

大约在1540年，一位早期的作家诺埃尔·杜法伊曾对他那个时代的两个邻近的村庄，费尔列米奥村和温德雷斯村，做过比较和对照。这两个村庄分别代表了两种不同的世界观念：费尔列米奥村代表着旧式的黄金时代，而温德雷斯村代表着当代的颓废。杜法伊眷恋着过去，雷蒂夫却对未来充满了信心。他用两个教区之间的对比阐释了一种非同一般的有关时间流逝的理论。萨西村与尼特里村的鲜明对比就在于萨西村深深地植根于过去，或者说被过去所束缚，而尼特里村却向往着发展。确实，尼特里村为萨西村所提供的是把自己文化中的活力输送给它而使它受益，并唤起了那里的新生（然而却意外地加速了自身的衰落）。在雷蒂夫的著作中，18世纪的乐观主义压倒了元气耗尽的文艺复兴的悲观主义，在诺埃尔· 220

杜法伊的作品中就可以看到这种悲观主义。

彼埃尔·雷蒂夫在他去世前不久，就以轻蔑的态度打消了埃德蒙的巴黎之梦和对城市姑娘的渴望，为了儿子的利益而结成了萨西村和尼特里村之间的姻亲关系（可以说这是自然与文明的相遇）。这为他将来担任族长的生涯提供了一个起点。因为彼埃尔已经做出决定，埃德蒙这个出生于充满空想的尼特里村的孩子应该娶萨西村的一个富裕而务实的女孩为妻。她是当地的一个名叫托马斯·多代恩的财主的女儿。多代恩是一名经商的农民，也是那个村庄里的地方行政官，是个"严厉的人，带有一副令人望而生畏的面孔，即使他那个地方的居民都健壮如牛，但人人都认为他有超人的力量"。埃德蒙早已认识托马斯·多代恩，但并不喜欢他。托马斯·多代恩的财富完全是用自己的力气赚来的，当然也是靠了他的勤劳、具备常识和节俭的品质，这些品质在他一生中所起的作用是为顽固的头脑补充了智慧。当人们探询与萨西村联姻的事情，雷蒂夫总是回到同样的见解：萨西代表土壤、静谧和生命力，它像黑面包一样有益健康，像大自然本身一样纯朴。

埃德蒙去拜见岳父之后，第一次见到了他的新娘玛丽，即雷蒂夫—多代恩协议或者说尼特里—萨西协议赐予他的新娘。他俩的第二次见面就不像第一次那么让他兴奋了。玛丽·多代恩的这位求婚者第一次看见她时，她正在大麻地里劳动。她是一个"体格健壮的女孩，外形很有男子气"，"正在绑扎一大捆大麻，力气大得惊人"。与其说她是个大个子美女，还不如说更像是个雌人猿，但是毫无疑问，她"会成为一位出色的家庭主妇"。这个年轻妇女同"巴黎的轻佻女子"迥然不同，她的主要品质突出地表现为因不识字而产生的令人敬

畏的沉默。这样一种自然力量所具有的另一个特征就是谦虚和仁慈。因此，彼埃尔为儿子觅得门当户对的人家并安排了这桩婚事之后，便可以安心瞑目了。玛丽给埃德蒙生下了7个孩子；然后，在履行了旧制度下的家庭实际上应当遵守的规则之后，她去世了。她的死结束了对埃德蒙·雷蒂夫17年的束缚。在这次婚姻的整个时间里，他一直生活在他岳父多代恩压迫之下的"扩展型家庭"中，屈服于岳父的钳制，不敢有任何抱怨。然而，尽管玛丽撒手人寰，却在她孩子脸上打上了抹不去的烙印，那就是"多代恩家族泥土般的肤色"。多代恩家族无疑是"大地的子民"，已与土壤融为一体，他们无法与土地分离。这第一次婚姻所留下的儿子托马斯·雷蒂夫神父"既没有雷蒂夫家族的灵魂，更没有雷蒂夫家族的风采，[10]他有一个与土地紧紧相连的灵魂，长着一付多代恩家族泥土色的面容……他的皮肤是木头的颜色，布满黑色的斑点和皱纹，很油腻，……他结实强壮，但外表看不出来。他是个急躁、情感强烈、好色的人。但通过献身宗教，他已经能够自我克制"。神父托马斯，这个勃艮第的富饶土地和森林的孩子，为了控制礼拜堂中的这个卡利班*的世俗激情，不得不穿上詹森派教义**的紧身衣。但惟一令人苦恼的是，当这个神父运用拳头和鞭子，拼命想把同样的詹森派教义灌输给年轻的尼古拉先生时，却发现完全是徒劳无功。尼古拉觉得根本不需要这种教义，此后还没完没了地对他的同父异母兄长报以最恶毒的诅咒。

---

* 卡利班是莎士比亚戏剧《暴风雨》中的人物，一名丑陋而凶残的奴仆。——译者注

* * 17世纪詹森教派的神学主张，认为人性由于原罪而败坏，人若没有上帝的恩宠便为肉欲所摆布而不能行善避恶。——译者注

这件事情可以解释尼古拉为什么在他的一生中始终对近代的乡村信徒圣赛兰不信任，尽管这种不信任有时被掩盖在甜蜜的伪善外表下。在这一点上，雷蒂夫·德·布雷顿的宗教观念从幼年起就从未改变过：也就是说，“詹森派的教义对多代恩家族倒是再合适不过了！”再合适不过了的意思就是说，它对于缺乏像尼特里村的雷蒂夫家族和费尔莱家族那种优雅和礼貌的乡下佬来说是再合适不过了。对于雷蒂夫和费尔莱这样的家族而言，一种更加宽松和随意的宗教是更为合适的。这种宗教对民俗实行宽容，而且确实宽松到了几乎要达到反基督教的地步。善良的神甫福德里亚和皮纳尔所信奉的就是这种宗教，正所谓“每个羊群都有自己的牧羊人”。对此，后面将做更详细的讨论。

尼特里—萨西的对比，就像尼古拉的著作中所反映的那样，最终超越了两个家族之间的对立（随后才有了两家的联姻），并得到发展，最后成为一种比较生态学的宇宙观系统。在空气和粒子哲学以及结构医学的时尚过后，这种宇宙观得到18世纪末法国的维克·达齐尔以及一些博学的医生们的推崇。

222

雷蒂夫描述了地理—医学方面一系列的对比。尼特里村的轮廓是圆的，像个磨盘，是个实行敞田制的村庄，周围一望平川。这里的空气非常清新，一直在流动着，激荡着，避免了污染。尼特里村的商品贸易有助于发展它与城市的交往，有助于它了解文雅的社会。土壤肥沃，空气新鲜，收入高而物产丰，村民们有的是鸡蛋和牛奶，礼拜日和节日还有肉吃。尼特里村的社会也出现了多样化，不像萨西村那样只从事农耕。由于同外界有广泛交往，尼特里人所说的法语也比萨西人的

纯正。由于面包的质量高，妇女们的血液循环好于其他任何地方：所以她们讲起当地话来带着一种“无法言说的优雅”。男人们精力旺盛，好取乐，善于以丰富的辞令表达自己的意思，不论是对街坊四邻还是对他们的马，说起话来滔滔不绝。

萨西村则截然不同，十分糟糕。这里多为山丘起伏的林地，几乎全由“阴湿的山谷”和“岩石裸露的山坡”构成。前者散发出难闻而有害的沼气，后者则造成了污染的空气，从河谷里的“深邃的峡谷”中盘旋而上，汇聚成气流。这使所有的萨西人都形成了永无餍足的性格。这种恶果是如此严重，以至于不论是性欲还是个人的不幸都无法忘却这种无尽的贪婪，从而使每一个人都因村庄贪婪的特征而遭到咒骂。不幸的萨西人因其本性而命中注定要食用成吨成吨的黑面包。这反过来又使他们的身体变得粘粘糊糊，笨重而不灵活。这里的年轻妇女完全缺乏魅力，长得像男人，说话粗声粗气。此外，吃黑面包的萨西人对口味细腻的陈酿葡萄酒不感兴趣。他们认为这种酒只适合城里人的口味，或者像埃德蒙·雷蒂夫那种食不厌精的人的口味。埃德蒙的儿子告诉我们，萨西村粗俗老实的乡下佬只需要一种叫皮克特的榨汁酒，那是一种“从刮剩下的葡萄中滤出来的”酒，能“把喉咙揭掉一层皮”。[11]在萨西村，“人们毫无教养，就是在德国也无法找到他们的同类”。萨西—尼特里的对比（即野蛮与文明的对比）似乎成了法国—德国对比的缩影。不用说，对于雷蒂夫想象中的德国而言，这并非言过其实。他在想象中把萨西村（一个远离莱茵河的村庄）拿来代表德国，尽管是一个不太可靠的代表。萨西村的这种“德国性”的典范就是附近的布雷顿农场的那个“耕童头目”杰曼（既无礼又荒谬）。这个大个子的家伙“有一种真正的条

223

顿人的味道"。脸有半英尺宽，一点肥肉都没有。虽然(或许恰恰是因为)这个村中的巨人力大无比，却是个极为和善的人，孩子们很喜欢他，总想拉他来一道做游戏。杰曼说的是儿童的语言（就像埃德蒙·雷蒂夫说的是马的语言一样)。此外，萨西村在它那令人生畏的外表之下把我们拉回到大地之母的基本价值观，拉回到取之不尽的自然资源，充满了生命的活力，并回到童真时期。杰曼，这个一生从未离开过法国的勃艮第的耕童，被提升为一个高贵的野蛮人的角色，而且确实成了高贵的德国人的角色。正像《我父亲的一生》所刻画的那样，这个萨西人是一个沉闷和凝重的人，有一副高大的身材，无论他是根本不会说话还是只会发出笨拙的口齿不清的声音，只不过是一只刚刚学会用后腿行走的笨重而行动迟缓的生物。他也不是没有优点：干起活来像头牛，身上有永远使不完的力气，储藏在他身上的潜能将要由魔法师的弟子埃德蒙·雷蒂夫来开启。他就像一只忠心的狗，会完全献身于他的主人。埃德蒙，这个布雷顿的族长，在他一生的操劳和家庭经济中试图改变的就是这种不成器的人类原材料，就像摩西将米开朗基罗画笔下的奴隶从束缚中解放出来一样。他的父亲阻止他将他所向往的巴黎作为事业的起点。"既然不行"，于是，埃德蒙就选择了萨西村。

人们必须承认这个挑战也是同样巨大的。当人们破译了雷蒂夫把有关空气对土壤的基本想法作为一种解释性的医疗方案之后，就可以很容易地认识到萨西村这个法国旧制度下的典型村庄，把乡间的山区和林地两个方面的特点结合在一起。这个村庄的居民都不识字，生活水平很低：居住在石板或茅草搭建的屋顶下的人们与邻近的莫尔旺有许多共同之处，

他们根本没有合理的饮食，仅以黑面包果腹，而不是吃鲜肉和红酒。可以肯定，在18世纪法国的3万个教区里，即使没有数千个，至少也有上千个教区跟萨西村一样［在《父亲的学校》中，雷蒂夫的观点与此类似。他将萨西—尼特里的反差看作是“全国农业的缩影”，因为在（少数）发达地区和（多数）落后社区之间确实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埃德蒙·雷蒂夫必须在萨西村这块生面团上狠下工夫。当尼古拉在谈起他父亲为了开发和改造萨西村而付出的劳动时，其言辞之热烈，甚至超过了后来为“殖民地展览”撰写目录的作家们在描述洛提治理摩洛哥和加利昂尼开化马达加斯加所作的努力时所使用的言辞。 224

埃德蒙·雷蒂夫命中注定要在萨西村去完成的开发使命（或者说内部殖民化的使命）有一个痛苦的开端。在他第一次婚姻的17年间（生下了七个孩子），埃德蒙不得不为岳父“拼命干活”。他全家一直同岳父住在一起。后来，“令人尊敬的玛丽”去世，最后留下了他鳏夫一人，也把我们的这个主人公从那个老人的束缚下解放出来。萨西村的转变终于可以开始了。

这场转变实际上是三个人的直接成果或间接成果：其中包括我们已经认识了的埃德蒙；还有当地的教区牧师。关于他，我们稍后再说；还有一个人就是埃德蒙的续弦芭尔布·费尔莱。

芭尔布·费尔莱，就是那个“可爱的比比”，自称是贵族贝特罗家族的后裔，但实际上她仅仅是勃艮第的贵族贝特罗家族地产上一个佃农的女儿。芭尔布在这个农民兼葡萄种植农的家庭中被家人的宠爱和童话喂养。她在一个不专制的而且

比较随和的家庭中长大。她家里根本没有那种笼罩在雷蒂夫家中的官家气氛(这里就更不要说多代恩家了)。当费尔莱家的房屋被烧毁时，她的父母亲（他们在这场大火中失去了一切)所担心的惟一的事情是芭尔布是不是受到了惊吓，而这场大火实际上正是芭尔布无意中引起的。

芭尔布是个意志坚定的姑娘，渴望着爱情(尼古拉却不隐讳他是父母两人相互取乐才生下来的)。她一开始就陷入了逆境：她为欧塞尔的一个资产者布雅生了一个孩子。在他的家中，她不过是个奴仆，一个年轻和行为轻率的人。尼古拉在《我父亲的一生》中觉得需要用一桩虚构的婚姻来掩饰这段时间。事实上，这桩婚姻是后来的事。芭尔布在一次受到殴打之后，作出了决定：像她这么年轻，最好还是找个人出嫁，哪怕是嫁给一个老头。她想要"明媒正娶"，任何向她示爱的人，如果不答应结婚，都会遭到她的拒绝。"心爱的，不给我戴上结婚戒指，就别想吻我。"因此，芭尔布嫁给了她的老情人，那时刚刚丧妻的布雅。她很快就将他送进了坟墓，继承了他的财产。要扮演一个充满哀伤但仍然漂亮的寡妇一点也不费力。她把哀求的目光投向了教区牧师福德里亚。这个牧师毫不迟疑地将她许配给了瘦削难看的鳏夫埃德蒙·雷蒂夫。三年前丧妻的埃德蒙·雷蒂夫起初与母亲住在一起，后来自己一个人过。因为农民不习惯禁欲，没有妻子自然会导致邋遢的生活。他的母亲性情和善，但不会理家。她去世以后，埃德蒙逐渐陷入肮脏的境地不能自拔，没有人给他洗衣服和床单，看上去像个流浪汉。教区牧师将芭尔布送上门给他作妻子；她长得漂亮，怎么看都很有魅力，而且还是个理家好手，比埃德蒙强多了。[12]当时在他的眼里，她肯定就像天赐的礼物。这个勤俭的

225

家庭主妇还有另一样优点：她在萨西拥有一所从布雅手中继承下来的房屋，这对她的第二任丈夫无疑也是件天赐之物。她处理家务总是井井有条，一丝不苟，在举行了由福德里亚匆促处理的婚礼之后的第九个月，就为这次婚姻生下了第一个孩子。

然而这个新的家庭也并非没有问题。"比比"觉得自己完全是个外来者，十分没有面子。尽管她在萨西村拥有一所房屋，但那个教区不是她的出生地，她在那儿既没有朋友也没有家。村子里的女人们肯定在流传着关于她和布雅的私生子的闲言碎语。甚至在她自己的家中，面对着已经长大了的埃德蒙前妻所生的女儿们时（她们视她为一个充满威胁的后母），她也总是不知所措。她一度受够了他的女儿们的敌视，但又得为这个只会表示同情的丈夫留点余地。然后，她突然间发动了政变，夺取了家里的权力。根据她的条件，埃德蒙在这个事件中完全可以表现出他是这个家族优良传统意义上的残忍的父亲。他将四个桀骜不驯女儿赶出了家门：一个出嫁，一个送去巴黎，剩下两个被送去同令人害怕的外祖父多代恩一道生活。还有最后一个孩子也不能放过，最小的科瓦涅在这一时期经历了悲惨的放逐。他受到了后母的残酷虐待，成了一个饥饿的放牛娃，浑身长满虱子，睡在树篱下过夜，多年不让回家。他恨自己的父亲，更恨那个邪恶的后母。 226

经过那场政变之后，芭尔布成了蜂巢里的蜂后，尽管她对从此赋闲的"君王"埃德蒙·雷蒂夫还给予了尊重。他们共同给这个家庭带来了无可置疑的富裕。7个孩子的出生虽然造成了一定的波动，但并无大碍。孩子们出生的间隔很短，因为芭尔布把他们都交给"结实的"奶妈去照看，结果她可以连续

地怀孕。像那个时代的大多数农民一样，埃德蒙似乎不太考虑计划生育的问题。这位养育了 14 个孩子的父亲看来不属于 1750 年以前法国农村中实行最低限度避孕这种“罪恶秘密”中的那一小部分人。

开拓者埃德蒙

埃德蒙续弦娶妻，自己当家作主，手中有土地，有老多代恩原先的陪嫁，又将去世的布雅的财产、房屋，还有他的床，都据为己有。他现在有充分的自由不仅可以利用双臂的力量和天赋的才智，还可以利用两次婚姻给他带来的地产和各种动产。他不久就买下了布雷顿的大农庄；然后就把他个人进行的农业革命所带来的利益介绍给萨西村的当地居民。不用说，他的农业革命（取消休耕地，改种红花草、芜青或此类的其他植物）用英国人的标准来看算不上是什么创新。埃德蒙所做的一切只不过是挽起袖子，在通常的做法上增加一些人工而已。他清理好土地，种上葡萄，做了些许小规模的改良。在小地产众多的地区，所有这些都带有当代的特色。18 世纪并没有重大的革新，只是比 17 世纪更能适宜环境，效率更高，产出更多而已。

埃德蒙的第一步是将他地里的石头清理掉，并用这些石头垒起墙，当地人把这种墙称为石墙（*mergers*）。在法国的整个东南部和中东部地区，这是一种古老的做法。为了满足人口增长造成的需求和市场的压力，农民们又设法开垦了多石的边角地。在今天法国勃艮第的一些地区仍然立着许多这种早

227 在 18 世纪的“美好时期”就垒得相当完好的墙。在启蒙主义时代，将地里的石头清理掉（对于埃德蒙或任何一个真正在勃艮

第生活过的人来说）是开垦处女地的必要步骤。[13]随着价格的上涨，市场的刺激和人口的增长，人们现在开始开发利用这些多石的土地，以期在小农庄有目共睹的较低收益之上再增加一些利润。《我父亲的一生》中的各个章节都描写过，埃德蒙以精明的眼光注视着谷物价格以及土地成本的变化。埃德蒙以及许多像他一样的人在这些多石但阳光充沛的山坡上开始种上葡萄，不再种植不合算的谷物。其他一些萨西人，或许是模仿埃德蒙的做法，或许是与他同时采用了新的做法（我们并非一定要接受尼古拉所做的偶像化的叙述。他把父亲描述成先锋的形象，也许完全出自于他的想象），在 1720—1780 年间尽快地种上了葡萄。这种“给土地穿上衣装”的做法一旦开始，就一直持续下去，直到萨西的葡萄产量最终接近，甚至超过了小麦的产量。从那个世纪起，贫穷如乞丐一般的萨西人把整个社区转向了葡萄的种植，从而变得富裕多了。由于埃德蒙的发动，这场变化激发了勃艮第的葡萄种植。引起这场变革的一个基本原因是巴黎的市场需求在增长。1720 年的经济复苏以后，巴黎民众饮用的葡萄酒略有增加，而首都近郊的葡萄园却开始减少（被谷物种植所取代），从而刺激了来自荣纳河谷和下勃艮第的葡萄酒贸易。值得注意的是，这是生产的区域专门化和合理分布的一个正面事例，因为巴黎的葡萄酒的消费总量在 1635—1789 年间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达到了 24—25 万桶的最高点（实际上，到法国大革命前夕，在这个数字之外还应该加上所消耗的 1 万桶烈酒，或者相当于 6 万桶的其他各种葡萄酒）。埃德蒙·雷蒂夫是个不自觉的经济学家。在约翰·劳事件之后，他抓住了摆在当地葡萄园面前的新机遇：1725 年，他前往巴黎，并“带去了葡萄酒的第一批

样品，其中有他自己酿制的，也有他邻居酿制的"。这些邻居当中有的是模仿他的榜样，有的则是同时受到了他的启发。在这次旅行中，他戴着旧假发，穿着乡下人的衣服，使他看起来就像个"在圣伯纳门口卖葡萄酒的勃艮第农民"。他那饱经风霜的脸和手肯定会让他以前的巴黎情人无法再认出他来了（如果尼古拉慷慨赠与他父亲的这些爱慕者确实存在的话）。带到巴黎的这批样品取得了成功。这次旅行对此前和此后的葡萄种植产生了有益的"副作用"。从《我父亲的一生》中，我们读到，为了开垦山坡上的新的葡萄园，需要更多的牲畜来干重活。而卖葡萄酒换来的钱使这些总算比以前富裕些的萨西的农民们有可能以现金价格买牛、绵羊和山羊。牛羊的肉和奶"放松了生活"，或者说改善了它们主人的饮食。他们以前可没怎么见过这类奢侈品。牲畜还给庄稼带来更多的肥料。不过它们当然也需要饲养。这不成问题：埃德蒙提供了人工饲养的方法，而他的方法是（受到莫里诺尖锐批评的）英国式的农学家绝对想不出来的：拔除了山坡上的老葡萄树以后，到再种上幼苗之前，有七到八年的漫长的休耕期，埃德蒙和他的邻居们就在那里种上红花草。

228

埃德蒙感兴趣的不仅是开垦多石的山坡，还着手开发阴湿的河谷。他筑起水坝，把溪流周围的草地变干，于是，这类土地上几乎每年都发作的洪水消失了，转变成为种草田。他的所有这些工程都是相辅相成的，把开垦土地时清理出来的石头用来筑坝，地里的产量也增加了。如此这般，不一而足。与同时代的其他作者相比，雷蒂夫更清楚地说明了农业上的细小改良之间的内在联系。他的初衷是扩大葡萄的生产，结果却把村民们从贫困中挽救出来，尽管未必能够完全消除他

们的困苦。按照埃德蒙的设想，而且正如法国很多地方肯定经历过的那样（现在已证实，没有农业的改革，就无法用别的方式去解释18世纪的"小富足"），革新包含着选择地方传统中最有价值的成分，从而对市场的直接或间接压力作出反应。有人拼命地劳作，挖出石头，筑起石墙；有人增加了家畜，排干湿地，等等，就这样把全体人口中迄今为止几乎陷于木讷冷漠的人们身上所储备的可观的劳动利用起来了。实际上，这些人口早就准备着投入劳动，只要以上提到的革新确实带来了工作的机会，他们便会毫不迟疑地用自己的力气去完成丰功伟绩。我们所知道的萨西村村民的事例和其他例子至少可以说明这一点。[14]

229

我想一开始就通过改变着的经济环境，通过两个村庄的对比，把埃德蒙·雷蒂夫和他的一家人置于他们的家系背景所提供的环境下。现在，我们可以更加贴近地来观察雷蒂夫家族的日常生活了。这使我们能够从人类学的角度进一步了解在旧制度下的一个富裕农民的家中，家庭的私生活究竟是什么样子。根据观察到的结果我们无论如何都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它即使不能说是全法国的典型，至少也是勃艮第某个地区的典型，而这里至少是个开端。历史可能是官修的。这种历史根本就不值得一提；如果需要的话，我将利用家具的清单。[15]埃德蒙家里的财产与任何一位富裕农民家中能够看到的财产没有什么两样：主室里有12张带灯芯草坐垫的椅子，两张桌子和两个橱柜，还有一座祈祷台和一幅圣母玛丽亚怀抱圣子的画像。院子里放着一盘大石磨。谷仓里有无法计数的谷物：小麦、大麦、燕麦等等。地窖的拱顶下是一桶桶的葡萄酒，还有箍桶的工具。银器保存在主人的卧室里。所有这些物件，正如

吉尔贝尔·卢热尔对莱纳的公证记录做过富于成果的考察以后所确定的那样，一般来说，构成了中等富裕农民家庭的世间财物，在法国的许多地区，从朗格多克到奥文，从普罗旺斯到皮卡迪，大致上相同。我们无需强调在雷蒂夫家里看到的那种富裕和舒适的水平是在勒南兄弟时代社会地位相同的家庭中找不到的。

但是，有多少人可以期望获得这样的特权地位呢？有一项研究追溯到早于18世纪70年代（也就是埃德蒙晚年编写财产清单的时候）之前。它或许有助于我们对这个问题形成一些看法。1682年，"第三等级的总代表"弗朗索斯·阿尔托正好经过欧塞尔地区。在这次旅途中，他对非常接近萨西村的一个名叫佛蒙顿的小村庄中居民的生活状况进行了认真的调查。[16]在这个村庄的公民所居住的365座房屋中，除去40座

230 弃置或"毁坏"的房屋，只有9座房屋有"体面的家具"。倘若埃德蒙·雷蒂夫生活在一个世纪以前并且编写了他的家庭财产清单的话，那么，他大概就会属于这一类人，即"幸福的少数人"，因为他们在所访问的人当中仅占3%。接下来还有27座房屋有"相当好的家具"；但另有126座房屋只有"一些旧床架，上面铺着破旧的床垫"；还有133座房屋有"粗陋的床榻，上面铺着草褥子和破布缝的盖毯"；最后还有70座房屋的居民就睡在铺着草的地上，没有褥子和盖毯。最后这70座房屋属于最穷的一类，根本不会列入公证人的清单，因为这些清单只记载农村社会的上层和中层。

17世纪的这些有关佛蒙顿贫困状况的统计数字能够告诉我们的是，在1682年，在12个家庭中至少就有两家相当于现在住所谓兔棚或贫民窟的法国人。从温饱这个词最起码的

严格意义上来说，根本就谈不上。在每12个那种有"旧床架"或"粗陋的床榻"的家庭中就有9个家庭的居民生活在接近于或完全低于某种贫困程度以下，这种贫困程度让人们联想起勒南的绘画中所描绘的那种农民家里的境况。最后，在毕竟还有小资产阶级的小村子里，在12个家庭中仅有一家享有某种最起码的或者还说得过去的舒适生活。最富裕的十二分之一的家庭，或2—3%家庭（尽管1682年的这2—3%的比例，到了1770年我们这位主人公晚年的辉煌时期或许会有所提高），像埃德蒙·雷蒂夫和他的朋友、教区牧师安托万·福德里亚等那样一些乡村显贵肯定属于这个阶级。福德里亚的家中自然是一幅资产阶级景象：他有一张四柱床，嵌在红木框里的镜子，一些版画，还有一个气压表。所以，埃德蒙·雷蒂夫既典型又不典型。说他不典型是因为他和村中普遍存在的贫困形成了巨大的反差。1682年以来的农村经济的重大成长未能消除这种贫困。关于这方面的证据，只要读一读雅美拉·迪瓦尔的描述。他出身贫寒，却是个天才少年，对他所谈论的话题十分熟悉。根据他的描述，1752年到过托内罗瓦河畔的阿森纳去访问的人只看到了几间（只适合养牲畜）茅草屋，里面住着衣衫褴褛已沦为乞丐的居民。在旧制度的最后一个世纪里，勃艮第农村总的来说，正如最近的一篇论著[17]以悲剧性的细节所描写的那样，是一幅非常黯淡的图景。 231

然而，埃德蒙又是典型的：他尽管富有，却仍然是个真正的农民，而不是个双手细软并拄着文明棍在自己的地产上走来走去的地主。作为一个种粮食的农民，他只做他主张的事情。在漫长的耕作季节，他每天早晨都赶着自己耕畜群中的一头耕畜去地里干活。在平常的日子里，他是一个满手老茧

的庄稼汉，到了周末，又身兼他职。从星期六的中午开始，他履行法官和村社领袖的职能：他要忙于地区法官和公证人的事情，回答咨询，宣判案件。他从未停止过体力劳动，直到73岁时，因为在淹水的地里割草湿了脚而染上风寒，在艰辛的劳动中死去。

埃德蒙是一个具有双重身分的人，既典型又不典型，既是一个普通的村民又高于普通的村民，在他的私生活里，还要充当一个双重的角色：丈夫和父亲。他是一名鳏夫，有一个“破裂的家庭”，完全是旧制度下人口状况的典型代表。所有的孩子都混合在一起，共同住在他第二次婚姻组成的家庭里，直到其中一些孩子被赶出了家门：他们当中包括第一次婚姻所生的孩子，有第二任妻子和另一个男人所生的私生子，还有第二次婚姻所生的孩子。在每次婚姻中，配偶双方的年龄也很典型：埃德蒙第一次娶妻时只有23岁，是个小伙子。但事情似乎本应如此，因为他的父亲突然去世，他不得不立刻肩负起责任。玛丽·多代恩25岁，完全符合当时女孩结婚时的一般年龄。鳏居的埃德蒙和守寡的芭尔布的第二次婚姻在1734年举行，当然，两人的年龄都分别超过了40岁和30岁。还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事情就是埃德蒙让他的两任妻子每次怀孕之间的间隔在时间上都非常接近。从他的社会背景来看，埃德蒙肯定是个聪明、富有和有教养的人，他显然一点也没有显示出要限制生育子女数量的倾向。他的第一次婚姻所娶的那个身体结实的乡下姑娘分别在1714年，1715年，1716年，1718年，1720年，1723年，1727年，和1730年为他生下了孩子。在第八个也是最后一个孩子出生的六周之后，母亲去世了。至于芭尔布·费尔莱，她已有过做母亲的经历，无论是婚外的还是婚

232

内的。她已经有了一个私生子，并活了下来；另外还有两个婚生子死在襁褓中。她对当时旧制度下的高死亡率自然是非常了解的，正是这种高死亡率夺走了她的两个孩子，并在1733年让她成了一个鳏夫的寡妇。再婚之后，在1734年，她在31岁的时候又留下了一个夫妻关系方面的典型记录，尤其是成为了富裕妇女的代表，能够雇请奶妈，而不必亲自给孩子哺乳。从31岁到41岁，她八次怀孕（包括双胞胎）：1734年，1736年，1737年，1738年（双胞胎女婴），1740年，1741年 1743年，1744年。在不讲究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法国村庄里，41岁是母亲生育最后一个子女的典型年龄。迷人而生育了许多子女的芭尔布也是在这个岁数上将摇篮收了起来，也就是说，从此再没有生育子女。埃德蒙那时已经54岁，许多做丈夫的人在这个年龄上已经衰退，进入老年。到那时为止，他们的所有记录都与旧制度下的那个世纪（有人或许会说那几个世纪）人口学的规范相吻合。例如，当芭尔布她把孩子送去让别人哺乳时，她自己并未沉醉于一个富裕妇女的异想天开之中。她得做饭，收拾房子，整理花园和场院。在布雷顿，她要干的活非常繁重，她可以找别的妇女人来干，因为她付得起钱，这样可以减轻她的劳动。从劳动时间的角度来看，这项劳动的成本是很高的，因为她要给刚生下的孩子哺乳。[18]

但是，当人们把视线从埃德蒙家的出生率和生育率转到死亡率的问题上时，就再也找不到这样一种现成的模式了，相反，人们只会发现某种具有超前特征的具体的迹象。虽说长寿在18世纪并不稀罕，但雷蒂夫家的人寿命却都比较长，这使雷蒂夫家族跻身于一批（人数相当多的）“长寿精英”之中，而不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普通老百姓。埃德蒙的两次婚姻生

下了17个子女，其中只有3个在年满周岁之前死去[19]。这个新生儿死亡率（176‰）低于当时法国，但也并非可以忽略不计。然而，更加值得注意的是，他家的青少年死亡率（在1岁至20岁之间去世）几乎为零，而在路易十四时代，不止一个地区的青少年死亡率可能高达250‰。在埃德蒙的子女中，我们应当把查理·雷蒂夫（1743—1760年）看作是例外。他在巴黎的一家公证处当职员，然后参军，加入了奥弗涅步兵团，17岁在汉诺威阵亡，他的死亡实际上应当列入军事统计数字。除他之外，在这17个子女中惟一可以列在青少年死亡率项目下的是让－巴布蒂斯特·雷蒂夫（1740—1755年）。她去世的时候只有15岁。在"太阳王时代"，达到成人期的每个男子或女人都要生育两个孩子。[20]在雷蒂夫家中，在17次生育中，有12个长大成人；这17个人的平均寿命是50岁。（第一次婚姻所生的子女的平均寿命为62岁，第二次为40岁）

233

这些值得注意的数字非常有意义：它们或许代表了农民劳动者家庭所获得的最佳成就。这样的成就虽然未必都像雷蒂夫家族那么突出，但它造成了18世纪的人口起飞。这些成就是否可以归因于18世纪医疗条件的改善呢？看来不像。萨西人也许会吹嘘他们当地的一名接生婆，她是不是称职，水平究竟如何，不得而知（人们称她好妈妈，她村子里的人都待之以遵从和景仰之心）。[21]但是，对于盖有大学医学院印章的真正的药品，他们则说："谢谢、不用了！"落后的萨西人在这一点上得到了来自发达的尼特里村的埃德蒙的支持。不论人们认为他有多么开明，但他依然像莫里哀一样瞧不起医生，就像他瞧不起妇女一样。萨西村像尼特里村一样根本就不要什么医学。埃德蒙有一次与妻子谈到钱的时候，希望他的孩子们节省

各项开支，其中就包括“根本就不要再相信药物和医生”。[22]照理说，在18世纪初，医疗或许能在减少死亡率方面发挥很大的作用；在贵族家庭这样一种真正的上流社会中，医学能够发挥的作用远比在农民当中明显（英国的人口学家对王室的人口和医疗状况已做过研究，圣西门也有过描述）。[23]对医生的偏见，无论对与错，在这些农民当中似乎总是占据着上风。勃艮第的农民当然不能例外。实际上，在雷蒂夫这样一些富裕农民或“先进的”农民家庭中，18世纪的死亡率确实下降了。如果将医疗因素排除在外，那么这有可能是饮食的改进带来的结果，或者从一般的角度来说，是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大大优于过去所导致的结果。尼古拉肯定是这么想的。他认为，在他出生的地区，在贫困的父母所生的孩子当中，死亡率高。这是父母造成的，无论是因为他们的贪婪和贫穷，还是无知，他们总是“在匮乏中”抚养着子女。[24]

米歇林·鲍兰对莫斯地区的研究[25]以及布耶兹对利尔附近村庄的研究[26]都证明，劳动农民家庭中新生儿死亡率和青少年死亡率高于做日工的家庭。这个事实告诉我们，由于没有发生现在正在第三世界发生的那种挽救了大批儿童生命的巴斯德式的革命，生活水平以及饮食的调整和改变“造成了”各个阶级和各个时期之间死亡率方面的“重大差异”。 234

所幸的是，我们对长寿的雷蒂夫家族的饮食情况十分了解。与此同时，我们对那些不那么富裕的人家的饮食习惯也有一些了解。尼古拉在《父亲的学校》[27]中对那些穷人，或者他所说的“不那么富裕的”农民的朝不保夕的生活作了描述。这些人通常是吃大麦或黑麦做的面包，喝的汤里放的是胡桃或大麻籽榨的油（在法国中部，如勃艮第、安茹、奥弗涅等省，

比较贫穷的乡下人烧菜时用的基本成分是胡桃油，最穷的人家才用大麻籽油）。[28]尼古拉说，“劣酒是他们能用来支撑生命以从事无休止的繁重劳动的惟一东西”。这里并不是指责作者透过茶色眼镜去观察世界。然而，雷蒂夫当然非常明白，比较富裕的农民，也就是人口中那些不可忽视的少数人，吃得相当好。这是一个令人感兴趣的因素。它涉及到饮食习惯的改善在民众中的传播。清晨五点钟是早饭时间，[29]一家之主同他的儿子和帮工们在动身去耕地之前，坐在“一锅烧好了的里面有咸肉、白菜和豌豆的汤面前，接着再吃一片咸肉和一盘白菜加豌豆”（正如尼古拉所描写的，咸肉，或火腿，还有白菜，也是乡村牧师通常消费的食物，每天只用一口锅和一个盘子，并让邻舍的妇女来洗涮。这确实是一种节俭的伙食）。耕地的人们拂晓时吃的这一餐，只要是在斋戒日，或在没有咸肉的时候，还可能会有“用洋葱和黄油做的汤，接着吃煎蛋卷，煮老的鸡蛋，或者一盘蔬菜，或者一块相当好的白干酪（一种凝乳酪）”。以后的几餐属于快餐：首先是“主餐”，用餐时间各异（耕地的人有时在早晨吃主餐，经常会带到地头上去吃；平常日子是在八点钟吃，礼拜日则在十点钟。它相当于现在的农民和工人们所说的那种大约在上午的中间吃的“快餐”或“耕夫的午餐”）。[30]耕地的人下一顿饭是正午吃的“点心”（这个名称是指现在类似英国的下午茶的那种午餐）。[31]对于这两

235 餐的食物是什么，我们不清楚，但我们知道被派去看守田里晒在席子上的谷物的雷蒂夫家的孩子的“主餐”（或十一点午餐）有牛奶和新鲜鸡蛋做的羹。[32]至于耕地的人“在秋季或春季耕作一直要持续到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所吃的主餐和点心明显包括“面包，一些干果和一片奶酪，每人有 4 品脱葡萄酒，

装在柳条壶里,还有满满一瓦罐的水,因为新鲜的空气让人口渴"。[33]

另外,马匹也能分到一份珍贵的面包和水:"正午吃饭的时候,在给马喂燕麦之前",萨西的耕农"会将罐子里的水倒些在他们的帽子里,再把面包撮碎,放了进去,弄成一种给牲口吃的糊,让它们恢复体力"。然后,这些牲口嚼着干草和燕麦,它们的主人则"手持镐头,打碎土块,挑出石头,一边干活,一边不停地吃黑面包"。可见,这顿在我们应当称作午饭时间吃的恢复体力的点心非常俭省,是在干活中吃下去的。耕农用一只手耕地,另一只手把面包送入口中。如果运气好的话,在短暂的休息时间还有干果或奶酪,那确实让人感到愉快。

晚上吃的第三(或第四)餐仍然坚持俭省的规则(但比中午吃的营养价值高)。晚饭一般是在"夏天的一天劳动结束之后,冬天则在八点钟"。勃艮第人的节制似乎已成了一种规矩:在下地干活的所有人当中,埃德蒙·雷蒂夫作为一家之长,从理论上讲应享用最好的酒和食物;但他和他长大的儿子们却都以胃口小而出名。他晚上只吃"一个新鲜鸡蛋,大约4盎司的面包,再加上两杯上好的陈酿葡萄酒"就够了。在社交场合,晚饭也许会更加丰盛。尼古拉记得有一次同三家互助农坐在一起吃晚饭。他们是小农户,合伙组成了一支有3匹马的耕田队。他们在"庆祝播种季节的结束",所以吃起了新腌制的猪肉(咸肥肉),[34]还有"一大罐酒放在火炉前温着"。大概是因为他们的朋友和恩人、令人尊敬的埃德蒙的儿子来访的缘故,他们为了表示一番,还为每个人上了黑布丁和新鲜猪肉[35]("女人,去拿黑布丁来")。小农户和富裕农民的饮食中都有咸猪肉或火腿,但他们的饮食之间所表现出来的社会地

236

位的差别则表现在面包的颜色上:地位低下的人吃黑面包,而在埃德蒙家里,全家人,包括仆人,都吃白面包。"谷糠是谷物中最粗的部分,用来喂马,喂牲口,喂长膘的猪和产了仔的母羊。"[36]这清楚地表明,在法国北方,白面包不单单是一种奢侈品,摆阔气的消费,在大农场里,还是副产品的副产品;也就是说,吃白面包是用谷糠饲养牲畜所产生的结果。这是18世纪畜牧业(尤其是养猪)小小的进步之一。

因此,人们得到了这样一种印象,那就是在农村社会的比较富裕的成员当中,肉食的消费充足,但决不过分。雷蒂夫家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雷蒂夫说,农民们吃肉时总是充分咀嚼,吃得非常慢,就像是在一边走路一边说话。(后一种动作是很明智的,为的是在穿过田地时能节约能量,有时他们要走很远的路才能到达干活的地方)

记载了这些描述性的资料之后,我们现在应当有勇气用双手去尝试进行一些量化:尼古拉在《农夫的妻子》中描绘了他的父亲。[37]他的父亲估计,住在布雷顿的全家人每年的肉类消费是4头猪,每头猪提供120磅(60公斤)肉(骨头不计算在内);加上葡萄收获季节时吃的10只成羊,每只羊产肉20—25公斤;每周还有5磅牛肉。全加在一起,每年的肉类消费最多为600公斤。由住在布雷顿的全家22名常住人口享用。当然,在这个数字之上还要加上许多很喜欢吃肉的季节工人,尤其是在葡萄收获的季节。全家的常住成员(家人和仆人)每年的人均份额大约为27公斤,[38]这只有1789年巴黎的相应数

237 字的一半,也是现在发达国家的一半。此外,人们还应当记住,肉类的份额有很大一部分实际上是咸肉,所含的脂肪多于蛋白质。

确实，在肉类的份额外还应该加上鸡蛋（当季时每天一人一个；或者说，每人每年182个）和乳制品。农场里养了大约20头奶牛，[39]给全家人，尤其是孩子，提供了营养。这些东西还拿到市场上去出售，每年带来963锂的现金收入。[40]

所有这些鸡蛋、乳类食品和肉的份额加在一起，尽管不像现在这样大量长期地食用，但足以防止孩子们和农场工人患严重的营养不良症。另外，在布雷顿，维生素的摄入似乎是充足的。每当埃德蒙·雷蒂夫一身大汗地回到家中，[41]芭尔布立刻递给他"一大杯用银制高脚杯装得满满的葡萄酒"，此外还有"他喜欢的点心、乳品和水果；这个农妇结婚几年以后，在果园里种满了各种令她丈夫垂涎不已的水果：有草莓、覆盆子、醋栗、南瓜、甜瓜、梨、杏、黑刺莓、苹果、腰果和其他可以做菜的水果"。一年到头，餐桌上都有胡桃油搅拌的色拉，虽不像现在那么丰盛，但几乎每餐都有。[42]

在18世纪，像雷蒂夫这样的富裕农民家里的菜果园艺的发展当然无法同现在相提并论。但是，它防止了维生素A和维生素C的缺乏症，从而让全家人和同桌吃饭的仆人不再遵循某些死亡率的模式。为了做到这一点，并不需要农业革命。我们知道，早在17世纪和18世纪的"农业热"之前就发生了一场"园艺热"（这可以从指导播种蔬菜的各种书籍和年历中得到证明），标志着这两个世纪里人们的生活习惯发生了逐步而深刻的变化，而18世纪才真正收获了它的第一份果实。

城里人和中产阶级对于水果和蔬菜的爱好增强了，这带来了饮食习惯的变化，开始对埃德蒙和芭尔布这样一批年轻时经常去城镇的先进农村居民发生影响。尼古拉喜欢吃水果。他告诉我们，只要有地方能摘到新鲜的黑草莓，他就总是

吃个不停,经常吃得消化不良。在烤面包的日子(每周2次),芭尔布总要给全家人作菠菜馅饼,给帮工做韭葱馅饼;给收葡萄的人做生面发酵的热蛋糕;在初夏,还要给打谷子的人做奶糊点心。[43]

芭尔布出生于一个乐于接受时代变化的种植葡萄的农民家庭,后来在一个资产阶级的家庭做过女佣。她有可能在巴黎生活过一段时间。她做过一个小资产者的妻子,最终嫁给了一个富裕的农民。她的经历绝非一个特例。还有很多年轻妇女也去过市镇做工,作为重新返回地里干活前的一项过渡性的职业。她们回到村里的时候,还带回了她们新近从所熟悉的(往往是微不足道的)"上等人"那儿学来的一套作风。这种文化输入通过饮食质量的提高对人口素质产生了影响。当然,勃艮第农民所吃的并非都跟地主一样,或者吃大量的甜瓜和菠菜馅饼(后者含有丰富的铁和微量元素,所含的维生素不会在烹饪中受到破坏)。我前面所描述的现象只限于严格的范围内,这个范围十分狭小,而且不那么稳定,但与17世纪相比,它造成了重大的差异。

238

农村居民的着装,无论是雷蒂夫的全家人还是萨西村的其他居民,也属于这种情况。他们毫无疑问穿得比较少,不足以让他们抵御寒冷。尼古拉在某些地方记载了农民和他的家属,即使比较富有,也只习惯于"穿很薄的棉布衣服",他们宁愿在房间后部用"橡树枝、葡萄茎和枝、以及木炭"生起旺火,以便晚上取暖。[44]埃德蒙这个族长本人平常穿的是牛皮马裤、长罩衫或灰帆布的无袖衫。只有到了礼拜天他才脱下这些穷酸的衣服,换上"埃尔伯夫外套,平纱领巾和钉银扣子的衬衫"。[45]不过,在这方面,不仅是在礼拜天,也有了逐步的进

展，人们渐渐地不再穿着勒南兄弟画中人物所穿的那种带补丁的衣服。雷蒂夫家的一位年轻人（徒步）去巴黎时，穿了一身灰色的亚麻罩衫，鞋套，不穿袜子，也不穿有三层鞋底厚的钉平头钉的靴子；背上的袋子里装着"六件粗布衬衫、几条领巾、手帕和礼拜天穿的棉袜"。还有一次，我们得知，这个年轻人还是背着背包，但这次是用小羊皮制作的，能防雨；他备用的衣物包括"1件干净的外套、2件短上衣、2条马裤、8件衬衫和几双袜子"。当尼古拉－埃德蒙到了巴黎或在巴黎住下来以后，收到母亲的信，上面说："亲爱的埃德蒙，我给你寄去了几双丝绸短袜，还有家纺的绑腿、2件短上衣和羊毛大衣，这样，你在礼拜天和假日里就显得漂亮了。衷心地拥抱你，你的妈妈，芭尔布。"对于这个不谙都市风范的农村女子来说，她对儿子的爱就意味着让他穿得讲究。在这个意义上，芭尔布·费尔莱，这个世俗女人，与她的好心而邋遢的婆婆安妮·西蒙完全不同，就像格勒兹画中的人物不同于勒南所画的人物一样。 239

他们的穿着让我们联想到了卫生问题以及不同的社会阶层在不同时期的死亡率问题。我们对雷蒂夫家族所做的人类学研究提出了这些问题，但没有作出回答。奇怪的是尼古拉对个人卫生和洗澡的事情绝口不提。这让人们怀疑可能是不大讲究个人卫生，也不常洗澡。毫无疑问，这家人散发出这一时期的一名医生所乐于赞赏的那种"健康的人们身上令人愉快的味道"。[46]就是这名医生有时也认为，富人们（他们开始认真洗澡，结果身体也更健康，但究其原因更多是为了取乐而不是为了讲究卫生）"洗干净身体是以奢侈和享受生活为名义进行的，这样做的目的是要驱除男性的味道"。[47]

雷蒂夫家族显然属于"从不洗澡的富人"这一类社会群体。[48]但他们还有一个惟一的优点，那就是勤换内衣（有2名女佣负责洗衣和缝补）。因此，他们免受侵袭着勃艮第人的各种体外寄生虫的危害。[49]雷蒂夫家介于遭受虱子叮咬的穷人和已经合理地讲究卫生的富人之间，他们对自己家中"男性的味道"安之若素。他们正确地将自己定义为他们希望成为的那种人：中等阶级。

由于不洗澡，换内衣就成了他们保持起码的个人卫生的关键（尽管这个关键并不牢固）。冬天，当埃德蒙从外面替领主收税回来时，芭尔布会用烧热了的煤炭为他暖好木屐（而不是拖鞋），让他暖和冻僵了的双脚；还有一杯热葡萄酒也会给他准备好。[50]但是，在收获季节，"如果他浑身汗湿地"回来，芭尔布就会"替他准备好干净的内衣[51]……她让他换了衬衫，穿上短上衣"。至于那两个女佣，"女主人让她们为家中的男人们缝补内衣和劳动穿的衣服"。[52]我们对于洗涤衣物的细节一无所知，但是，毫无疑问，芭尔布比100年前的家庭主240 妇更讲究干净的内衣。还有一个细节告诉我们，雷蒂夫家族在讲究卫生方面有了相对的进步。今天的医疗史表明，[53]即使在18世纪后期，农民家庭中，一家人挤在一起，睡在久病的病人或孩子等弄脏过的床褥上，仍是很普遍的事情。但雷蒂夫家却不是这样。尼古拉从小就尿床，直到12岁。他因此受到其他男孩子的嘲笑，但他的姐姐们却对他表示出友善、同情和开明的理解，不让别的孩子同他睡在一起，或睡他尿湿过的床。[54]禁止别的孩子睡他的床，这一点根本就不会被认为是特殊的事情或标新立异。如果需要证据的话，这里就可以来证明，有关寝具使用的"现代"观念已经深入到外省的中心城

市和富裕农民的家中。当然，无知、落后和肮脏的布列塔尼人和普瓦图人，同勃艮第的贫穷居民一样，仍然睡在被同伴弄脏的床褥上。

肉食、维生素、清洁的内衣和床褥，所有这些都是明白无误的因素，至少可以部分地解释为什么雷蒂夫家族和类似于他们的那些家族在出生和死亡的记录上是健康的。在更深的层次上，这无疑是一个文化输入的过程，其最终的根源是已深入到朴实的勃艮第乡村的城市化和资产阶级化过程。然而，真正的医疗仍是处于最高层的上层社会的特权；医生们不愿意屈尊去为那些农村的富裕农民治病。反过来，这些人也不相信市镇和城市里的那些郎中。

出于社会效仿的作用，[55]雷蒂夫家族以及同他们类似的家庭受到了邻近的不如他们富裕的农民的模仿。或许，其中难免东施效颦。这样的努力推动了大多数人的进步，提高了孩子的存活率。埃德蒙和芭尔布不仅是农村道德的楷模，也是一个榜样，为同村的人们树立了模式。

孩子们存活下来并长大以后，父母们就得让他们安家立业，帮助或鼓励他们找到安身之所。埃德蒙·雷蒂夫期望能像他的父亲一样成功。作为一个继续存在下去的大家庭的父亲，他迫切地希望他的孩子们能有地理上的流动，如果可能的话，还要有社会的流动。按照他的想法，家里的地产只能留给其中一个儿子。其他的儿子以及所有的女儿都必须寻找自己的归宿。那么，为什么不到巴黎去呢？在埃德蒙的眼里，首都的优势在于它与古代和现代都有着联系；与其他城市相比，“那儿有浓厚的宗教，更加平等，更加健康(?)，也更讲科学”。埃德蒙不喜欢外省的小城镇：在他看来，当地的一小撮显要， 241

诸如地方行政官、贵族或官员们，就足以保证让该城镇余下的城里人备受践踏和轻蔑。“我的孩子们，要么是巴黎，要么是我们的这个村庄；但巴黎比这个村庄更好。”埃德蒙曾经离开过农村，但从未在别的地方扎下根来，因此他非常希望孩子们能在巴黎取得事业上的成功，取得他年轻时未能获得的成就。在路易十五时代，有成千上万的父亲鼓励儿子们去巴黎追寻美梦或（更多的是）噩梦。他是不是其中的一个典型呢？我不敢那么说。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总的来说，雷蒂夫家的子女都遵从了冬天晚上围在火炉旁父亲所提出的进行地理流动的劝告。这些进行流动的孩子实际上不过是顺应了18世纪的新潮流：与17世纪不同，这个时代属于现代，有相当数量的年轻人倾向于不在他们的出生地结婚并安家立业。对雷蒂夫家族的14个子女（包括芭尔布的私生子和尼古拉的同母异父兄弟埃德蒙·布雅）的一生，我们大致上有所了解。其中只有一个孩子留下来守着这个家。他就是彼埃尔·雷蒂夫（1744—1778年）。他是个“农民兼商人”，继承了埃德蒙在布雷顿的产业。有5个孩子（4个女儿和1个牧师）迁居到萨西村附近的村子或小镇上，受雇于或“嫁入”第二类家庭（箍桶匠、刀匠）或第三类家庭（女子学校教师、乡村牧师、牧师的管家，或商人）。还有8个孩子（其中有4个是儿子：男人有能力在更大的范围内流动，这使他们受益匪浅）到巴黎或巴黎的周边地区去碰运气。这里面有5个孩子从此再也没有回到家乡，包括从印刷工成长为著名作家的尼古拉；他的一个兄弟成了外科医生；2个女孩结了婚（一个嫁给了珠宝商，一个嫁给了糕点商）；一个女孩当了修女。埃德蒙的另外两个女儿（一个嫁给了回乡种地的马车夫，一个当了学校教师）回到了欧塞尔，确

切说就是回到了萨西村。最后一个孩子在巴黎的一家公证处当文书，后来阵亡于军中。

这就是高度地理流动的社会背景和家庭背景。尽管与整个人口相比，这只是少数人的特征，但这样的流动不无典型性。人们只要想一想16—18世纪从巴黎盆地的敞田上向巴黎 242 的大规模移民，你就会明白这一点。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离家外出并不是因为与父亲发生了对抗，恰恰相反，他们得到了父亲的衷心赞许，而且实际上是出于他的近乎于命令的请求（人们也许会发现现在也有类似的情况，比如说在科西嘉，那个具有浓厚的移民传统的地方）。所有离开家庭的雷蒂夫成员都永久性地（只有一个例外，是暂时性地）割断了与农业的联系。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取得过卓越的成就，甚至包括这个有非凡才能的作家（他在生前并没有获得应有的承认）。他们当中的任何人，无论是在城镇还是在农村，都没有获得父亲那样的作为一个杰出的农村社区的领袖所获得的少有的道德威望。众所周知，离乡背井往往招致挫败。当一个人离开家乡，有可能在社会的阶梯上爬上去一到两级，那也无非就是从农村移居到城镇罢了。但是，作为第一代移民，他们往往会发现自己是处在城市社会的最底层，而他的父亲在家乡完全有可能是位重要人物。这就是为什么追求社会等级所带来的喜悦在大城市里却会让位于对平等的要求。埃德蒙发现了这一点，尼古拉也认识到了这一点。要求平等的愿望包含对村社生活的怀旧因素，这种村社生活的象征就是全家人围坐在农家的大饭桌前，或者，甚至表现为父辈一视同仁的庇护。[56]在这方面，雷蒂夫和卢梭有共通之处，但没有卢梭的那种错误意识。

这种家庭内部组合的结构、或者更笼统地说，这种“家内

群体”正是我们现在要加以考察的对象。在尼古拉所描述的农民世界里，家庭的含义总是大于家庭本身。当然，彼得·拉斯勒特相当正确地揭示出了扩展型家庭是一种神话。[57]这种类型的家庭曾一度被错误地认为在过去几个世纪里的农村生活中是一种占据着主导地位的家庭模式。但是，核心型的家庭规模太小，从统计上来看，家庭人数减少到只有四五个人，不足以满足任何规模的农事要求（例如犁地）。所以，如果过分拘泥于字面上的意义，核心家庭同样也会成为一个神话。不够谨慎的人口学家正是因为被家庭名单所迷惑、结果落入了陷阱。实际上，在小农户当中，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58]同另外两家、三家甚至四家互助农联合起来的做法是十分正常的，因为一个家庭太穷，连耕犁也成了无力提供的一种奢侈品。他们可以相互共用劳力、工具和耕畜，组成一个可以轮流在各家的土地上耕田的耕作队。以这种方式联合起来的几个

243 家庭的儿子们，或者称作一个组，还可以在一周的几天里轮流为“合作组”干活和牵马。与此同时，核心家庭的家长，由于儿子替代了他，他就可以把全副精力用于干自家后院的活，譬如打谷，给葡萄修核等等。[59]当播种季节结束，或其他重要的农事忙完之后，合作组的全体成员，或称合作农，就相聚在一起，饮宴作乐。

如果我们转向像布雷顿这样的大农场（大约50公顷，在18世纪的法国，这样的面积是相当典型的普通大地产），人们就会发现，由必不可少的家庭成员所组成的家内群体的人数比核心家庭还大。在布雷顿，家内群体由大约20来个人组成：父母两人，子女10到12人（最大的孩子已离家自立），还有帮工和女佣。子女的等级当然是依据年龄来划分。这也决定了每

个子女在晚餐桌上的座次。帮工和仆人也要排列座次，以耕夫的地位最高。接下来才是葡萄种植工。在葡萄种植的季节，他们在葡萄园里干活，在冬季的几个月里，他们要打谷脱粒。布雷顿的用餐座次就像路易十四的宫廷一样严格（所有的公爵夫人都坐在折椅上）。最低一级是牧童，2个女佣则坐在末位。其他各种各样的区别将这个小小的社会划分开来，就像带有纹章的衣服一样。例如，还有男女的差别。埃德蒙用亲昵的“你”（*tu*）来称呼儿子和男帮工，他们也用同样的方式称呼他；但是，同妻子和女儿说话的时候，他用的是正式的称呼“您”（*vous*），她们也一样用“您”来称呼他。在各种农活上有伦理的等级差别：在道德价值观念的天平上，耕夫被视为这班农夫中的“军士”，在人们看来，他们比葡萄种植工有“更高的道德”，[60]而葡萄种植工的品德，在人们的看法里，又高于派去照料牲口的少年。这些少年中，地位最高的是牛倌。可以有把握地说，在这群少年中，处于最低位置上的是羊倌。人们常怀疑他们有巫术和邪恶的魔法，[61]比牛倌“更缺乏诚实，更坏”。甚至连“自然界”也有好和不好之分：从谷物到葡萄形成了一个阶梯（种下葡萄确实很难照料）；接下来，在植物之后才是牲畜的王国，依次下降，从马到牛，最后是羊（从牲畜驯化或驯服的角度来看，这样的划分颠倒了史前的和历史的编年顺序）。 244

由高到低的等级顺序（依据不同的劳动对象）：		
谷物 葡萄	植物产品 动物产品	耕马 公牛、奶牛 羊

正像人们所读到的，雷蒂夫家中处于最底层的是女佣们，她们的职责是"缝补男人们的内衣和干活穿的衣服"。这个农场里的所有男人们都毫无例外地享有高于女性的地位。在这一点上，他不过是承袭了他们家乡地区的普通智慧而已。

地位还可以用第三种差别来衡量，即饮酒。埃德蒙20岁的时候饮用牛奶和水。他只是成为一家之长以后才开始饮用葡萄酒。儿童和年轻人不喝酒。年轻的妇女即使是生孩子的时候也不能犯戒。40岁以上的年长的母亲可以饮用"搀在水中的几滴酒"。帮工们则喝皮克特。然而，适度的饮酒而不是喝那些常常被污染的水对村民们还是有好处的（例如在朗格多克，干活的男人和女人们都习惯于每天喝一升酒，不会误事）。然而，在产酒少于南方的勃艮第，人们宁可将酒留下出售或用于特殊的节庆，如庆祝收获，或仅用来作为地位的象征：家长喝酒、女人和年轻人喝水，帮工们喝皮克特。

整个农场里所干的活儿也分成等级。孩子们得和羊倌一起去放羊，或独自去照管蜜蜂。尼古拉先生，小时候就是这样。有关巴黎盆地的农村孩子的一份报告这样说，[62]"当乡下孩子长到了7岁以上时，就可以分派去干些不需要太大力气的活，[63]给一头牛或几只羊让他去照管；他还要捡树枝和草叶，扎成一捆捆的柴火；等他的身体逐渐地适应了弯曲；他就开始试着搬运重物，增长力气；到了15岁，他已经是个劳力了，到了25岁就要娶妻成婚"。勃艮第的大批儿童都是这样过来的。至于农村的劳工们，我们看到他们有明确的劳动分工，当上一名耕夫是他们的最高追求。埃德蒙本人就是耕夫组成的社会地位群体中的一员。他总是很早起身并亲自犁地，而且以此为荣。然而，他从不到葡萄园去劳动。他也经常会到葡

245

萄园去，却是用主人的眼睛去监工。这种奇怪的区别并不难解释：在整个巴黎盆地的葡萄种植地区，在葡萄园里干活被看作是次一等的劳动，因为它比耕地累得多，身分也低得多。耕夫即使不能因耕地而真的变得高贵起来，但起码也给了他些许尊严。[64]今天仍然可以看到相当于埃德蒙所作的这种区分。今天的一位富有的农场主绝不会因为被人看见开着自己的拖拉机而感到耻辱。相反，他却让季节工人，来自葡萄牙的移民，为他锄甜菜地，就像埃德蒙让葡萄工去葡萄园劳动一样。

妇女的劳动也有自己的等级。在那两个作缝补的姑娘当中，有一个也要到葡萄园去帮忙，另一个则要"照管奶牛和挤奶"。在法国所有的奶牛农场里，这项工作传统上都是留给妇女去干的。锄草和挤奶也属于不那么高贵的劳动，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些活儿专门让妇女去干(参见前面的表格)。她们还得屈从于或许很暴戾的女主人的权力，而女主人又得随时听候家中男主人的吩咐。

做妻子和母亲的职责是十分繁重的，这份职责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那就是做饭。女佣根本不用管做饭和备餐的事情，她们的全部工作只是养牛，到葡萄园去工作，并负责内衣。这与我们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所有传统相反，可见这些传统在这个富裕而质朴的勃艮第的农场里显然不适用，除了女儿们偶尔来帮帮忙，家中的女主人要负责所有的饭食，菜园和果园(孩子们会来帮忙)；她还有另一个负担，那就是至少有一些家畜得靠她来喂养（尼古拉并没有说这样的家畜有几头）。作为一家之长的埃德蒙只负责喂养"高等"的家畜：狗，马，公牛，这些动物在他眼中仅次于最低等的帮工和女 246

佣，但高于奶牛、猪、羊、鸡和蜜蜂，这些都由孩子和牛倌去照管。确实，在埃德蒙的眼里，妻子似乎既是他本人的延伸，又是一种最高等级的动物。（他有一天非常认真地说，伤害他的妻子就像把手放在他宠爱的母狗身上一样可恶）

在这个有高度等级化的和严密结构的制度中，以下犯上的问题，例如年轻人反抗长者，帮工反抗雇主，或女人反抗男人的问题，几乎从未出现过。在农民家庭中难免有女主人与女佣之间的争吵，[65]还有妻子和丈夫之间在家中的吵闹。梅斯里尔神父在村中到处打听别人的秘密，收集各种流言蜚语。他不止一次地注意到了此类事情。但最终总是男人在家里占上风。尼古拉像他父亲一样是个大男子主义者，常带着嘲讽的口吻谈论起巴黎的贵族或富有的资产阶级，说他们竟然让女仆去招呼大家来用餐："太太用餐应当让别人来伺候。"（这倒恰恰证明城市社会中存在着更为浓厚的女权主义，[66]而这种女权主义确实是因为让女仆去做饭而造成的。）埃德蒙的家中正好相反，太太要伺候别人用餐。她不仅是男主人的性对象，更是一个什么事情都得干的女佣。

作为一家之主，埃德蒙仍然背对火炉，把肚子贴在桌子边，注视着全家人。[67]这种父权制的家庭模式即使趋向于消亡，或者说失去了过去的统治地位，但它在农民的意识中仍然是一种并未过时的模式。我们知道，埃德蒙曾两次生活在扩展型家庭中：第一次是在岳父家，第二次是在母亲家。埃德蒙死后，芭尔布接过了以前掌握在丈夫手里的权杖。这支权杖一直掌握在这位女性的手中，直到她的去世。在雷蒂夫家的子女中，至少有一个依然与母亲生活在一起。在她的有生之年，这些孩子从未想过要将继承的遗产分开。他们这样做仅

仅是为了遵从勃艮第的习俗。这种习俗就是将财产不加分割地一代一代传下去。埃德蒙作为领地法官，就是传统的解释者，多少是成功地维护了这种习俗。母权制在他的家里确实存在过，但不过只是一个摄政时期，是两届男性统治之间的过渡体制而已。

作为一家之长，这个富裕农民的权力着重体现在对子女的统治上。尼古拉有快乐而亲近自然的童年，整日里和村民们以及跟他一般大小的孩子们厮混。但是，他从很小的时候起，就受到父亲严厉的斥责，在记忆中留下了对男性的长久的敌意，也留下对较为温和的女性世界的情结。母亲和姐妹们更多地表露情感，而父亲则疏远而具有威严，兄长们以打人取乐。在上一代人当中，埃德蒙和父亲彼埃尔的关系更糟。他有一次擅自开了一个小的玩笑，结果，这个已经长大了的儿子仍被打得头破血流，然后，痛悔之下，匆忙躲到厨房后的菜园里流下自责的眼泪。 247

但是，在埃德蒙这儿，教养孩子非常讲究方式，靠的是奖励和惩罚。埃德蒙从不在事发当时打孩子。对儿子们的惩罚总是在事情发生后的一个星期(因为责打女孩的是母亲，而且常常是口头上说要打而实际上并没有责打)，或许还会拖到更晚的时候。但是，埃德蒙也会把孩子打得流血，或至少留下"永久的伤疤"。如果有哪个孩子学着狗叫赶走了闯进家门的动物，比如赶走狼或别人家的四处瞎闯的牲畜，或者，如果有哪个孩子对穷人或对拾麦子的女人表示善意，因为这两种人都被认为是基督在人间的化身，他就会受到奖励或表扬。

笼统地说来，家长垄断了发言权、用餐时间和晚上围着火炉的时候，实际上就是他滔滔不绝讲话的时间，讲得越多，

吃得越少（他总是吃饱，但绝不过量）。雷蒂夫的全家人一边听这位家长唱他的独脚戏，一边还在忙着于某种活计：男孩们在“削篱笆桩”，女孩们则在“剪麻或纺纱”，母亲“边听边做针线”。埃德蒙偶尔感到累了，也会把这个权力交给芭尔布，算作是一段插曲；于是，她就给大家回忆她所读过的东西（芭尔布是个识字的妇女，至少对小故事书里的宗教传说和通俗故事比较熟悉），要不，就唠叨些女人们的这家长那家短。

埃德蒙在家里对发言权的垄断几乎从未受到过挑战。帮工们都是萨西村的，就像门桩一样默不做声。他们在布雷顿从不开口，除非谈论起了葡萄、耕地、羊群或老鼠夹。雷蒂夫家的孩子都静悄悄地吃饭，因为这样比较合适。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埃德蒙以某种方式起到了现在的大众传媒的功能：他就像一台只有一个主持人的电视机，发布着天气预报；对农事进行点评；传达着他在欧塞尔、佛蒙顿和诺瓦耶道听途说的当地新闻；他还不知疲倦地为大家读新约和旧约，郑重地告诉全家，他这样做可以直接受到圣灵的启示；就寝的时候，他要念一篇冗长的祈祷文；他还是个民间歌手，圣诞节时演唱通俗歌曲单上的老歌。他的所有用语和音乐素养大多数来自于他放在书架上的那些小册子或类似的文学书。这可以冒昧地称作他的图书馆，主要有《高卢旧约圣经》和《法兰西圣诞节大圣经》，是家用“圣经”和赞美诗，是怀着虔诚之心保留下来的而且是至少可以追溯到17世纪的一种版本。

248

家长制的宗教

埃德蒙是一个严厉的父亲，也是《旧约全书》上说的那种

家长。他在自己家里还是一名神父。这一点毫无疑问。在近代法国，或者更准确地说，在梵蒂冈第二次宗教会议以前的20世纪，宗教似乎往往是女人们的领地，因为她们构成了宗教会众的主体。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世俗文化中，男人们总的来说即使谈不上是什么自由思想者，但对宗教是相当淡漠的。但是，17世纪情况截然不同，到18世纪也没有多大的改变。[68]宗教是男人们的事情，或者说主要是男人们的事情，尤其是在农村里。在家里诵读圣经以及在圣诞节唱颂歌或念诵主祷文的是埃德蒙·雷蒂夫，而他的妻子则跪在床边，一边做自己的祈祷，一边履行她的家庭职责：把暖炉放到双人床上，以便让她尊贵的丈夫会感到舒适一些。

宗教是这样，伦理无疑也是这样。至少在尼古拉所描述的勃艮第的这个角落里，道德的盛世是在17世纪，尤其是对性生活的严苛态度，到了18世纪则有所削弱。这种道德和对性生活的严苛态度主要是称之为（父亲的或兄弟的）"男性恐怖主义"造成的结果。假使宗教有女性更多地参与，它就不会那么严酷。正是彼埃尔不顾其妻子安妮·西蒙怯懦的抱怨（"瞧！你都对他干了些什么！"）抽打他的儿子埃德蒙，让他记住，对一个年轻的农民单身男子来说，在父母允准的婚姻之外，任何性事都是不合法的，即使是最暧昧的也不行。至于埃德蒙·雷蒂夫，他将对旧约式的宗教的偏爱以及一种绝不允许轻慢的伦理准则深深地印在孩子们的心里（但是，他的妻子芭尔布因为有过过去的那一段经历，表现为一种比较隐蔽的原罪观，但她现在已经为后来的虔诚所掩盖，30岁以后她就从大量阅读过的宗教经典中汲取了营养）。尼古拉的兄长们在他小的时候也常常揍这位未来的作家，只是为了让他明白，

249

没有压制，没有打人的和被打的人，道德规范就不会得到承认。

支撑着这种严苛的伦理准则的基础当然是某种基督教，但究竟是哪一种基督教呢？《我父亲的一生》的作者在出色的“前言”中透露，[69]埃德蒙实际上是个新教徒。因为他所喜爱的“圣经”是希伯来文的“圣经”，不做礼拜，不过宗教节日。大约在1580年，欧塞尔确实有一个叫雷蒂夫的人是胡格诺教徒。当然，如果按照这样的算法，那么，有一半的法国人在某个时期都有可能被称为是加尔文主义者。我认为事实要比这更复杂。按照我的看法，在他那个时代和环境下的真实生活的文化中，埃德蒙·雷蒂夫的宗教信仰有两条可能的发展道路。这样一来，我们又回到了尼特里村与多代恩家族所在的村子萨西村的对比

甚至在路易十五的统治时期，整个尼特里村仍然在怀念着他们所热爱的牧师皮纳尔。[70]18世纪前期，皮纳尔允许村里的男孩和女孩一起玩耍，对在学校操场举行的竞赛、跳舞和摔跤也持宽容的态度。他以宽宏大度对待这所男女混合的乡村学校，虽然这引起了从诺瓦耶移居到这一教区的市镇居民的不满。皮纳尔的传统延续下来，而且被当上了萨西村助理牧师的安托万·福德里亚老爷所发扬光大。正是他同埃德蒙一道着手让这个村子得以开化。

福德里亚出生于勃艮第，回到家乡当牧师之前在巴黎的圣巴尔布学校读书。尽管他喜欢追逐女人，但依然得到了教区内的男女教徒的爱戴。他们愿意为他赴汤蹈火，当一封又一封匿名信寄向主教那里告发他时，他们都站在他一边，为他作证。福德里亚是一个无神论者，唯物论者，是培尔的信徒，

总而言之，他是又一个梅斯里尔神父，却更为随和，更热爱生活，但没有共产主义思想。在自己的教区内，他对教徒们玩游戏和享乐持宽容的态度。他的那些故作正统的同事，在他看来，不过是些伪装虔诚、故弄玄虚、欺骗老百姓的人。他从不掩饰反教权的观点，甚至反基督教的观点，在晚餐桌上，也当着埃德蒙和尼特里村其他朋友的面直言不讳。[71]他担任的牧师教职，在他看来是教育农村百姓和宣扬一种伦理规范的手段，而不是用某种崇拜来束缚他们。但是，他的教职不断被解除。 250

埃德蒙很喜欢福德里亚，因为福德里亚为他寻觅到了一个妻子；当教区的居民们抱怨他们的这位地方主管本人只管去处理法律案件，以致不常上教堂，福德里亚总是不断地支持他。他们两人虽然是朋友，但无神论者福德里亚从不过问埃德蒙每天做两次祈祷的事情，也从不干涉他对宗教教义的独断讲述以及他永无休止地念诵"圣经"。皮纳德那种宽容的基督教义或许很适合他，但福德里亚的无神论却不合他的胃口。实际上，埃德蒙已经被詹森派的宗教模式深深吸引，这是因为他第一次婚姻所生的两个儿子对他的影响造成的。一个是在库尔吉当教区牧师的尼古拉-埃德蒙；另一个是剃发修行想当牧师但后来却当了学校教师的托马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尼古拉·埃德蒙认为詹森派非常适合多代恩家族的倔强脾性，而这种脾性必须加以克服。而作为学校教师的托马斯·雷蒂夫所信仰的奥古斯丁主义则采取更为粗暴的和攻击性的形式。库尔吉教区的这个牧师的布道总是长篇大论，即使是最虔诚的听众也要昏昏欲睡，最健康的膀胱也无法忍受。尽管如此，埃德蒙的这两个儿子勇敢地坚持着教化周围

的农民，确实值得称道。这种教育肯定要比学校里三心二意的老师所给予的教育优越得多。尼古拉从坐在教室里上课起就牢记他的教师。当时他一只眼睛看书，另一只眼睛却盯着手里切着的麻或削着的葡萄桩。托马斯开办了一所免费的但男女不混合的学校。他在不自觉中以活生生的做法驳斥了伏尔泰和卢梭等其他辩护士所说的"质朴的无知"。他希望穷人的思想得到他们原来由于贫穷而被剥夺的开化。这样，他们在今世就能获得对来生至福的某种憧憬。库尔吉的这位教区251 牧师的无限的慈善行为也是令人感动的。他自己像乡村牧师那样过着严格的苦行生活。吃的是咸肉白菜汤。这两兄弟之间似乎建立了一种奉行严格的苦行但又带有令人感动的虔诚的形象。埃德蒙为大儿子骄傲，将他作为全家学习的榜样。他不无得意地期待着子女中出现更多这样的人。与此同时，人们可以想象，这位老人又是一位谨慎的政治家。他谨慎从事，以免得罪在萨西村有农场的耶稣会士。在必要时，他还就农耕方面的问题给他们提出一些明智的建议。但是，埃德蒙在内心深处是一名罗亚尔港（17 世纪詹森派的中心）的成员，与极端詹森派的欧塞尔地区德·赛勒斯主教大人为首的小团体交往甚密。

埃德蒙的宗教所采取的形式不是经常去做弥撒和领圣餐，而是退回到家庭的私生活中去，独自一人或全家一道默想，诵读"圣经"，主要是读《旧约全书》。正因为这样，埃德蒙同许多不那么严密，甚至有些癫狂的詹森派一样，自己也变得像是个闪米特教徒。布雷顿的这位家长的宗教毫无疑问是从一种乡村式的奥古斯丁主义的模子中铸造出来的。这种教义在 18 世纪后期的法国广泛地传播开来。

米歇尔·沃维尔证明,在启蒙主义时代,农村宗教信仰的淡化乃至反基督教倾向的产生有两条发展道路。一条是逐渐地疏远教会(就像安托万·福德里亚牧师暗暗提出的那种模式)。另一条道路是詹森派所主张的朴素以及对圣餐的抵制。这种方式经过一个很长的阶段以后,也可以鼓励对宗教的淡化,以至于把宗教仪式逐渐转变为对家庭的令人窒息的束缚。事实证明,这两种方式在1730—1760年间雷蒂夫家族所在的勃艮第地区都存在。在米歇尔·沃维尔曾学习过的普罗旺斯地区也存在。埃德蒙差一点走上了福德里亚牧师所指引的无神论的道路,但是,在两个大儿子的压力下,他最终下定了决心,转向了詹森派的内心反省。从这个意义上讲,埃德蒙是那个世纪典型的产儿。他已经走上了那条道路,越来越偏离了反宗教改革的潮流,如果说这一潮流确实在勃艮第的这个地区扎过根的话。他不自觉地转向了18世纪初尚未形成的那种詹森派的态度,转向了后来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欧塞尔地区出现的农民对宗教的淡漠,甚至是反基督教的倾向。这种倾向是过去的直接延续。 252

无论如何,多亏了尼古拉的著作,我们才能了解到一个农民的大家庭以及它的一家之主是如何与那个时代的文化发展相联系的。并非萨西村的每个家庭都有我们在雷蒂夫家中看到的那种热情的(以"圣经"为基础的)精神生活和(以《蓝色藏书》小册子为基础的)文化生活。由于埃德蒙是领地法官,而且人们公认他是一个善良而公正的人,因此雷蒂夫家族可以看作是一个参照群。朴实的互助农毫不迟疑地把他们的孩子送到布雷顿去作耕童,接受训练,这样他们就能学到手艺,或许还能在学问和品行上有所长进。"在埃德蒙的家里,他们学

会了好习惯，多少知道了些许文化，还有菠菜馅饼"等等诸如此类的东西，在萨西村的村民当中，似乎都是尚未用文字表达出来的智慧，完全取决于他们对物质和精神的爱好。

家庭社会主义

雷蒂夫的家庭确实被人们视为榜样，而且不仅仅存在于圣徒编年史家的充满幻想的思想中。雷蒂夫家族与莫来利以及其他少数人都是在 18 世纪第一次出现的乌托邦社会主义的著名的先驱者。他们设想的那种未来理想社会的组织，正如《堕落的乡下佬》一书所设想的那样，受到了那种作用于整个村庄环境的农民社区民主结构的启发。这是一个非常诱人的观点。尼古拉年少时就看到了这种结构是如何运行的。历史学家从这个意义上来解释雷蒂夫家族，把这样的农民社区本身就看作是很久以前的某种形式的"原始共产主义"的顺理成章的遗产。（在历史上，或在史前时期，这种"原始共产主义"事实上是否存在，本身就是个问题）

尽管尼古拉宣称信仰乌托邦社会主义，但实际上，他给未来设计的爱尔翁的真实模型根本不是农村公社，而绝对是一个完全封闭的家庭单位。他虚构的"乌顿村是由生活在一起的雷蒂夫家族组成的"（与泰勒姆神父的设想相比，尼古拉的设想更加严厉），就是以埃德蒙为家长的那个家庭，只不过有了无限的扩展，扩大到占据了这个家庭的人口增长所需要的空间，按照奥维涅和莫尔旺的兄弟会的模式永恒地存在下去。尼古拉对这些肯定是十分熟悉的，因为无论是在空间上还是在时间上，都与互助农群体非常接近，其中的许多人家就

253

住在莫尔旺边界的附近。

我们知道，埃德蒙和芭尔布相继去世之后，雷蒂夫家的子女就分了家，瓜分了父母的财产。分家的结果“很不好”。所以，尼古拉在他虚构的乌顿村中没有让分家的事情发生，兄弟姊妹们“决定”在乌顿的这块很大的地产上过着公社生活，繁衍了许多子孙，很快就发展成了一个村庄。

在乌顿这块土地上，已经死去的家长有力的阴影仍然飘荡着，仍然是最高的道德领主。在公社餐厅里，无论是布雷顿还是下勃艮第的习俗依然不变：平时吃咸肉，礼拜天才吃牛肉。一日四餐，即早饭、主餐、下午便餐和晚餐，用餐时间固定，不容更改。妇女和女孩不准饮酒，只能喝白水，年长的男人允许喝半瓶酒。埃德蒙十分重视的奖惩制度仍然在实施：大孩子玩掷铁环套桩，掷铁饼，（老式）网球；小孩子玩拔河。女孩们也纳入了这个奖励制度。她们同应该受到奖励的少年伴着风笛跳舞。在这种情况下，老年妇女坐在旁边谈论着刺绣。某种类似长嗣继承制的规则保留下来了，因为这个大家庭的牧师是从乌顿的每一对夫妻中的长子中按规定遴选出来的，长子们是埃德蒙的某种集体化身，被当作是这个村庄里的“公社之父”。乌顿的农业生产不是按照严格意义上的集体农场的模式进行的：每对夫妇都有一块20阿尔品*不可剥夺的世袭土地，其中的一半种粮食，一半种葡萄。公社制度只局限于消费方面，一进餐厅的门就开始执行。毋需赘言，男性拥有绝对的至高无上的地位是个准则：挑选妻子的事情完全由男人来决定。每年选举产生两个执行委员会，或者说是参议

---

* 阿尔品，法国旧土地面积单位，相当于0.84至1.28英亩。——译者注

会、任期为12个月，从而把一丝民主的气息引入了这个公社。

254 不过，真正的实权依然掌握在族长长子的儿子和他们后代的手中。因此，决策程序仍然是家长代理制，而不是公社式的。这种男性统治的、等级制的乡村社会主义与资产阶级农民埃德蒙的理想并无冲突。按照他的理想，“男人应当是妻子、子女、住宅和地产的绝对拥有者”。在这里，我与吉尔伯尔·卢热又一次产生了分歧。他在这项研究中过多地受到了现代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等范畴的影响。特别是在这个实例中，过去的这些范畴同现在有很大的差异。实际上，雷蒂夫的这种古典和严格的家长制的共产主义只不过是一种手段，其目的是通过后代子嗣神秘身体的人神交会，让埃德蒙的父亲借尸还魂，获得永恒的生命。在雷蒂夫家族的后代当中，所有的成员成为共同生活在一起的互助农，此外，根据尼古拉的性哲学，也是一个实行族内婚的公社。

人们一定会说，正如尼古拉自己的一封书信所证明的那样，他本人也会在这个为了纪念他的父亲而设计的农村乌托邦中烦闷至死。因此，他明智地宣称，雷蒂夫家族中那些已经被城市败坏的空气所污染的人们将会自动地排除在乌顿村之外。他自己自然是其中之一。

不过，尼古拉对农村社会的看法，不论是在现实的层面上还是在空想的层面上，都不仅仅局限于阐述一个家庭单位。他的著作中所隐含的社会学研究也涵盖了整个村庄。无论它的论点是什么，尼古拉的“社会学”绝对不可能使用社会分化的范畴，不管是分化为阶层(order)还是划分为等级(estates)。尽管这样的范畴笼统地来说是有用的，但在对某个村庄进行个案研究时（例如像怀利所做的那类研究）却没有太大的意

义。在1730年的萨西村，根本就不存在重要的土地所有者，更不用说有贵族身份的人，即乡居世俗贵族。即使有人能够找出这样的人，但单凭他一个人和他的家庭也不足以代表萨西村有贵族等级或地主等级。同样的道理，教区牧师福德里亚住在这个教区也不等于说当地有一个教士等级。确实，教区牧师福德里亚是个复杂的人。他养牛，种葡萄，近乎是个农民；他的生活方式又接近于小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据说是因受到培尔的启示，他持有无神论的观点，因此又甚至近乎于启蒙主义时代一种哲学上的"准贵族"。

雷蒂夫并没有完全忽视等级的社会学，但他对社会等级 255 的看法更接近于神话（如迪梅泽尔的那种神话），而不像譬如说莫斯尼尔精心写作出来的专著。埃德蒙死后，福德里亚牧师的年轻继承人直接照搬印欧文化的范式把这位已故的族长转化为民谣里的人物。这个牧师说，埃德蒙建立了一个由三个等级组成的王朝，这三个等级是雄辩者（*oratores*）、健美者（*bellatores*）、劳作者（*laboratores*）。他设计出了勇敢的战士、虔诚的牧师，以及属于不同阶层的好公民（更不用提善于生育的女人）。[72]尼古拉确实提到了将社会分为三个或四个等级（包括农民），这时他指的是整个国家，而不是这个教区，而且还涉及到一个召开等级会议的方案。[73]

农民的权力

雷蒂夫记述了村庄的社会学，描绘出了一个富有吸引力的领域，意思是说这个领域完全超越了等级的范围。这种社会学所关心的问题是凌驾于农民社区以上的，又是农民社区

内部的权力的结构和权力的分配。

对萨西人来说，最传统和最重要的权力是由高级教士构成的"三大领主"，即欧塞尔的主教、教士会以及与耳他骑士团所行使的权力。主教和大教堂教士共同征收过高的、不得人心的什一税：每二十捆抽一，然后每阿尔品再加一捆。（幸运的是，这项苛税尚未摊到葡萄上；由于萨西的葡萄产量在18世纪达到历史上的最高纪录，如果需要征收这项税的话，便成为了更加迫切的理由。）

另一方面，欧塞尔附近的索尔斯的骑士首领（作为这里三分之一土地的最高领主）征收的代役税却很少，[74]每朱纳尔（Journal，相当于一天的耕地面积）仅收取6德尼埃*。对这项税收，长期以来，居民们似乎并无怨言。我们又一次在旧制度下世俗的，但更主要的是教会的领主制里，看到了什一税与代役税之间的明显区别，前者是一种沉重的负担，后者则相当轻松。

可以肯定，这三种教会领主都是外在领主。他们与村庄只保持偶尔的直接联系，要么是通过间接的关系。埃德蒙因此成为了他们实际上的代理人，成为了实际的权力和教区的权力之间必要的中间人。他作为地方行政官员的一生，甚至有人会说，一个地方政治家的一生，就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尽管他仅仅是领主的代理人，是地主手下的管理人，却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他曾经在岳父多代恩的家中受到了束缚，但是，在此期间，凭着他的社会关系，凭着不算多的财产，加上又能写一手漂亮的字，因而当上了社区的律师，因为只有

256

* 德尼埃，旧时在法国及西欧使用的一种小硬币，原为银质，12个德尼埃等于1苏。——译者注

受过教育，又在巴黎见过世面的农民才能写出这样漂亮的字。后来他又升为财务检察官的位置（其职责是在领主法庭上向不履行义务的人提出公诉）。最后，他在萨西村又得到了他的父亲曾在尼特里村担任的职位，他本人反过来又当上了领主法庭的法官，这个村庄的领地主管、欧塞尔主教的收税官。所有这些职务加在一起，使他成了三大领主的代理人；在一个司法领地内将三种不同的权力（主教的、教士会的和骑士团的权力）集合于一身。他回旋于这些领主之间，统治着这个村庄所构成的领地。令人吃惊的是，他被任命为法官一主管并非出自于马耳他骑士团首领的随意决定，而是萨西村当地的纳税人在任职达 40 年之久的前任法官去世之际主动发出请愿，要求由他来担任这一职位的。一封要求任命他担任这一职务的请愿书呈交到了马耳他骑士团首领的面前，上面有这个教区的 12 位德高望重的村民的签名。这表明领主的权力可以由一位像埃德蒙这样的富裕农民来行使，因此这种权力的性质是不明确的。这些权力源自于这个村庄的外部社会，却牢牢地掌握在外在地主的手中，并处于由于距离而被削弱的松散的监督之下。一个富裕的乡下人掌握了这些权力，从而努力地把司法领地的权力重新加以整合，并纳人他自己的世界。对他来说，这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因为担任财务检察官（后来继任了他的这个职位）的是玛丽·多代恩（埃德蒙的前妻）的侄子。这位检察官只听叔叔的吩咐行事，因而不会受到主教或教士团等上级的过多干预。

埃德蒙起初担任律师，后来当了检察官，最后做了法官，在经过这一系列官职的变迁之后，我们的主人公获得了村庄里真正的权力：以他所担任的主管这一职务而言，就像他的前

任一样,实际上是不可解除的;他依据良心和经验来审案。领主允许他随心所欲地行使法官和仲裁者的职权，只要他定期地按照领主的要求把从萨西村纳税者手中征收来的什一税和其他捐税交给他们。这使他得以主持和统治该村的村民大会。于是,地主得到了地租,主管得到权力。如果从村庄的内部来看,这个“小小的法官”所表现出的特点与他在领地档案中留下来的抽象形象完全不同。在这些档案中，他只是一名收税官,降低到了无以复加的卑微地位,对他的权力和声望等细节却没有做出充分的描述。埃德蒙十分明智，他从不榨取那些曾被他审判过的人以及他主人的属下，以便保持他们的信任。他与教区牧师,他的朋友和合伙人,互相合作,监视着每个家庭的内部事务；甚至在他的小法庭上处理母亲和儿子之间的纠纷。他一方面尊重当地悠久的法律，特别是涉及到家庭地产赎买的法律,另一方面,他不断地收买因案件而转手的小块土地(由于他的特权地位,他对村庄里其他公民的财运状况，无论是赚钱还是亏损，都了如指掌)。他不打算也没有足够的实力去通过夺取土地来摧毁他领导下的这个农村社区,因为他来自这个社区,这个社区又是他的权力的基础。他还会把钱借给同村的人,不是以此为借口去放高利贷,而是用这样的小额借款作为手段来获得权力和影响。埃德蒙成了社区的支柱,最终在本村确立了地位。礼拜日和宗教节日,他就在自己村庄里开庭审案,即使是在周围的村庄里,他也确立了一位仲裁者的无与伦比的声望。耶稣会的人吹捧他，詹森派的人拉拢他。总督的代表（如果说不是像尼古拉所吹嘘的那样,是省长本人的话）实际上豁免了他大部分的税金,因为他是一名养育着 14 个孩子的父亲（如果是在西班牙，他有资格

成为名誉贵族，即成为一个"多子女家庭的骑士"）。每当礼拜天举行晚会，即当地显贵讲究排场的时候，布雷顿的农庄总是人声嘈杂，刚刚送到的母鸡、小鸡等各种家禽，这些都是送给法官的礼品，正忙着给自己找栖息的地方。

埃德蒙并不是村庄里惟一的领袖，远非如此。他也不是当地权力的惟一代表。他必须同另外几个人分享权力，这当然免不了会不时地产生摩擦。当然，因为他是领主的代表，自动地成为了每个礼拜日大弥撒之后敲钟召开的教区大会的主席。但是，在教区大会上，他还得同其他几个教区官员竞争。这些教区官员并不是简单地由领主任命，而是由村民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在这些更加"民主的"官员中有两名选举产生 258 的行政官员，就像古罗马的执政官一样，任期为 12 个月，此外还有看青员（看守粮食作物的人）、公共仓库管理员、收税员。所以，埃德蒙的权力受到了自下而上的蚕食；还有可能最终受到自上而下的挑战，因为教区大会的任何重要决定都必须得到总督的批准。

我们可以猜测到其中的一些冲突：埃德蒙一方面对自己的领主（教会领主）非常尊敬，同时要同社区（世俗的）领主进行合法的斗争。他通过提起诉讼收回了本属于萨西村社的、但被现在的占有者的祖先夺走的一些林地。赢得这场官司之后，萨西的村民们用林地的收入为村社修建了一座泉水池，向村民们提供比井水更纯净的泉水（这在当时是一种典型的卫生措施）。在与拥有土地的绅士们打交道的时候，埃德蒙确实善于运用胡萝卜加棍棒的策略：作为对那片归还给教区的林地的回报，他在教堂里为输掉那场官司的领主设置了专用的座位。

这场对外斗争表明，向领主提出挑战在一定程度上是完全可能的。除了这种外部的冲突之外，在农村生活的表面之下还存在着各色各样的内部斗争。尽管尼古拉只是拐弯抹角地提起这些事，但毕竟还是说明了村社内部各种社会力量分布的某种模式，而这在法国北方并非是独有的模式。乔治·勒费弗尔在《北方的农民》中描述了类似的现象。[75]萨西村的人头税征收员多次试图向埃德蒙这位领主的手下和村庄的领袖征税。这位征税员是自治村的代表（自治村是指一批中农和富裕的互助农，他们组成选民团）。他们对富人和穷人一视同仁，对最贫穷的村民也强索赋税。埃德蒙的财政政策却恰恰相反：首先，作为 14 个孩子的父亲，他直接从总督那里获得了免税权；其次，他在教区牧师福德里亚的支持下，秘密地帮助那些被收税员征收过多赋税的最贫穷的村民交纳人头税。

对旧制度下的农村社区权力分配的研究往往介于人类学和政治学之间。这种研究实际上尚未大量开展。因此，我们在此并没有一个合适的研究领域。依此类推，尼古拉作为一名

259 人类学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比人们通常能够发现的更为复杂的社区模式。与地方性上层社会（指领地行政长官、富裕农民和教区牧师；在雷蒂夫的乌托邦里，他认为这些人实际上已经取代了领主）的权力相对峙的是中等阶级的力量。这种力量并列在一起，以一套缜密的方式相互平衡。这种力量不那么持久，也不那么突出，但正是从这个中等阶级中产生了地方官员。即使是最贫穷的阶层（卑微的劳工和葡萄工，赤贫的互助农和乞丐），他们一方面构成了慈善活动的对象，但另一方面又不时地被动员起来去装点富人的政治基础。我们暂且把有关农民社区的过于简单的画面放在一旁。在这种画面里，

农民社区完全是由富有农民主宰的，或者由市镇里的资产阶级瓜分殆尽(似乎村庄就其本质而言，已经不是农业世界中的居民社区。在那个农业世界里，低下的生产力造成了剥夺的可能性、但不可能将其居民驱除)。研究农村社会的历史学家已经过多地接受了这样的想象。与许多有关地方辩论档案记载(而且是经常受到篡改的记载)相比，雷蒂夫的人类学更具有权威性。它代之以三个阶层的社会划分：处于顶端的是掌握权力的人(A 组)，这里所说的是绝对意义上的权力；接下来是拥有某些权力的人(B 组，地方性的阶层或中间阶层)；处于最下层的是没有权力的人(C 组)，是最穷的底层。(但他们有可能被 A 组利用，在围绕着税收问题的共同斗争中，A 组与 C 组联合起来反对 B 组)

与法国大革命前的制度及其周围的社会相比，这种农民权力的分配在一个村庄的内部十分微妙，并维持着一种自相矛盾的态度：一方面，尽管有少数农民确实获得了贵族的权力，但他们不信任贵族，另一方面却势利地为自己赝造贵族头衔(这也许是向下的社会流动带来的副产品。对家境败落的回忆，依然活生生地保留在可以追溯到几代人以前的家庭传统中)。这两种现象同时并存着。雷蒂夫家族的人常常自称为德·蒙特罗瓦尔；安妮·西蒙则自称出身于德·科尔德罗瓦家族；芭尔布·费尔莱是德·贝特罗家族的后裔；尼古拉则比较明智，称自己为雷蒂夫·德·布雷顿。更加可以理解的是，这些在地方上掌握权力的人，对具有压迫性质的什一税以及对公共林地的侵占都持反对的态度，却能接受不成其为负担的领主捐。领主司法制度尽管有封建和荒唐的方面，但实际上却赋予了某些农民以一定程度的权力；法官和公诉人双方

260 对这种权力表示出来的出自内心的容忍程度甚至超出了人们的想象。

农民的权力在整个村庄相当广泛的分配；由于人们有机会使用方言和土话进行交流，由于在一个教区和多个教区内存在着血缘关系的模式，从而使得农民的权力得到进一步的伸展。无论贫富长幼，也无论他们之间究竟有着什么样的血缘关系，但大家知道随时都可以相互地说："你我同一血脉。"然而，城市化不管指的是什么含义，都威胁着农民的权力，甚至连领主们也逐渐倾向于将法官的职能从富裕农民的手中转移到来自于小城镇的受过更多教育的"专家"手中（直到埃德蒙死后，这种事情才发生在萨西村）。村民们比较愿意保守家里的秘密。他们十分遗憾地发现，这些专家开始处理那些与他们有关的事情时，居然不征求他们的意见。

埃德蒙·雷蒂夫所描述的形势比较有利于农民保持他们的权力：在他所描述的那些省份明显有一些乡居领主。尽管如此，农村社会中的某些群体却成功地获得了某些控制权，得以控制压迫他们的形势。在别的地方，形势往往对农民不那么有利。但事实依然是，在18世纪的法国，某些权力掌握在大约2000多万种庄稼的农村居民手中。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总督和官员们选择用何种方式来对持农民的权力，如何规定他们之间的关系。在黎塞留和马札然时代，所采用的方式是极为残忍的。科尔倍尔上台以后则逐渐变得理智起来。他的政府往往同地方社区联合起来反对那些在巴黎法院和其他地方身居高位的债权人。实际上，在1789年前法国的农民当中，像埃德蒙这样的人很多。他们起着联系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桥梁，是诚实的中间人；他们把包括穷人在内的农民社

会为一方与(包括政府、教会、贵族和名流等在内的)整个社会为另一方，紧紧地联系起来。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并没有让这些"诚实的中间人"，即地方的领袖们感到突然。像几乎所有法国农民一样，埃德蒙也在心中深藏着一种代代相传下来的反对政府财政的怨恨。[76]他有时将这种怨恨掩藏在规劝别人交税的诚恳态度中。这完全是一种柏拉图式的规劝，因为他本人可以免交人头税。如果他能活着亲眼目睹法国大革命，那么,在起初做出的震惊和谣言过去之后,这位族长肯定会持欢迎的态度。当然,他并没有活到那一天。人们能轻易想象到他会买下国家产业。换句话说,勃艮第的领主制,就像英国的领主制一样，是培育农村资本家的温床。他们在领主制的羽翼下致富,同时,一旦有需要,他们也有能力照看好自己。即使领主制崩溃了,他们依然能够生存下去。

261

以雷蒂夫家族和它的族长,一位勤劳的富裕农民为线索,探讨了旧制度下的农村社会、家庭和农民权力等问题之后,我们现在依然要以目光锐利的尼古拉为向导，来简要地考察一下爱情和性生活、民谣与地方文化等问题。

道德、民俗和文化

首先，在萨西村，人们是如何求爱的?("求爱"一词的含义,根据《特雷武词典》的解释,就是"寻求去取悦某人并使自己为别人所爱；向一个姑娘或女人求爱就是期望与她共结良缘"。)[77]

尼古拉先生小时候是一个聪明早熟的孩子，对人对己都非常了解;他从一开始就对纯洁无邪的幼年之爱所知甚详,在

他身上也发生过幼儿期的性问题。对此,人们并不十分拘谨,允许他们观看甚至参加性事,这完全是因为这种事情在孩子的眼中根本算不了什么;相反,年轻人却受到了严格的监视,因为对他们而言,性事有可能带来严重的后果。尼古拉先生回忆起他还很小的时候曾目睹布雷顿邻家的一对年轻农民夫妇在他眼前调情的场面,他们几乎发展到性交的地步,却没有丝毫尴尬。有一次,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那刚满10岁的姐姐命令他在萨西村的葡萄园里与一个小女孩模仿性交。他还承认,在做完礼拜天的弥撒之后,村庄里的姑娘们会亲吻和拥抱他,[78]而他也不止一次地把手伸到她们裙底下乱摸,虽然这样做是很不应当的。这些姑娘们慷慨地让他提前品尝了她们的恩惠,而这种恩惠一般只能给予教区里那些有节制的和慎重的小伙子。

但是,这种童贞的时代并不长久,如果以此作理由来说明农村的道德松弛就大错而特错了,因为它所能说明的恰恰相反。到了15—16岁之后,生活中的各种事情必须更加严肃地对待。年轻异性之间的关系变得非常谨慎。酷暑时节,一个名叫芳琼的姑娘“口渴如焚”,但她向男孩要水喝时也必须彬彬有礼,尽管她认识这个男孩,也要说“对不起,埃德蒙,我实在太渴了”。男孩和女孩举行了一种仪式后就标志着进入了青春期和后发育期。在特殊的宗教节日,村中年满15岁的全体姑娘要在教堂里献祭,献上一枚银币。尼古拉还提到这与“古代斯巴达人的一种风俗”有联系:“当姑娘完全成熟时,就要在围成一圈的预备娶妻的青年男子中裸体跳舞。”在这个方面,萨西村与斯巴达不相同,但目的是一样的。献祭之后,萨西村“长大了的”姑娘们一个跟着一个慢慢地退出(专为妇女使用

262

的）中殿，"站在唱诗坛和甬道上的本村男子们"可以注目这些鱼贯而过的未婚女子，就像是在评判选美比赛。在男子们刺人目光的注视下，她们一个接着一个地把银币放在圣坛上并亲吻圣餐盘。行进的队伍让专家和有关的各方有机会在一瞬间就看出这一婚姻市场的不远前景，尽管这个仪式是在教堂里举行的，但带有一种与神圣的场所不协调的民俗气息。埃德蒙的大儿子，即那个库尔吉的詹森派牧师，对此很清楚。他规定只有当天领圣餐的姑娘才有"献祭的权利"，从而去除了这种婚前游行所暗含的意味和用途。这是逐步根除民俗的办法之一。托马斯·雷蒂夫是一名严谨的牧师，也是詹森派当中有关这方面教义的忠实信徒。他不赞成经常举行领圣餐的仪式。

15 岁是姑娘们献祭的年龄；而对欧塞尔的男子们来说，15 岁则意味着他们要去圣米歇尔山朝圣；那是男子青春期的麦加圣地，往返有 142 里格（旧时法国的里程单位）的路程。

于是，15 到 20 岁年龄之间男孩子们都要前往那个著名的"海上之山"朝圣，举行了这一仪式之后，就置身于年轻男子构成的封闭群体之中。在这期间，隔着篱笆与姑娘们进行婚前的调情即使不被禁止，至少也受到了严格限制。到 20 岁时又要举行另一项仪式，目的在于推迟不可避免的婚礼。20 岁的年轻男子在捐献了一锂银币后所获得的回报是允许他们加入"年龄更大的男子"群体。由于这个地区人们手中的钱很少。这一锂银币可能意味着整整一年的辛苦劳动和拼命的节省。晚上 9 点之后是蝙蝠和狼人出没的时候，也是饭后玩耍的时间，他们得到允许去"向姑娘们求爱"。即使在这种时刻也有严格的仪式，至少在理论上是这样（人们可以设想，实际上 263

会发生很多越轨行为)。每个男孩会选中一个他所钟情的村里的姑娘(如果遇到了对手,就抓阄来决定)。在萨西村和雷蒂夫的小小世界里,选择姑娘差不多永远都是男人的特权;当然这并不妨碍某个精明的姑娘使用一些小手段,比如在教堂里领圣餐的时候会做出一个优雅的姿态,引起某个男孩来选择她。一旦某个男孩确定了他的目标,就要使出所有的花招、计策和易于理解的手段,进入他心爱的人工作的牛棚(如果她是个挤奶女工的话),并最终进入她的家中。如果进展顺利,第二年就要提起婚事,而第三年大概就要举行婚礼了。在求爱的整个阶段,这个姑娘的父母随时都可以干涉。这完全要看父亲的态度了,他或许会鞭打这位未来的女婿,从而戏剧性地结束这件婚事。如果通往真爱之路平坦的话,双方会在礼拜天接吻。大多数姑娘都会保持婚前的贞操;为了强调她们的这个决心,她们甚至会去祭拜当地姑娘的保护神,艾利丝的勒内圣女。[79]在当时,这整个仪式都与晚婚制度的礼俗或"做法"相吻合,其中包括保持婚前贞洁;历史人口学家现在已经对这种晚婚制度做了量化研究并有了详尽的描述。这种制度还造成了另外一个后果,可以在同族通婚的村庄里防止社会所反对的那种婚配,譬如说,一个租佃贵族地产的富裕农民的女儿与一个以前在镇上当仆人的家伙结婚(这是绝对禁止的),或者与一个开面包房的佃农的儿子结婚(他被看作是"佃农的佃农",因此在适婚的人选中地位很低;对于他所追求的富裕农民女儿所抱的期望而言,他的生活环境实在是太差了)。这种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确实在村庄里也时有发生,表明背离这一制度的迹象,如果不以结婚的方式加以解决,偶尔也会造成私生子的出生。

这种求爱仪式还有它的另一方面，那就是强化了女孩是一种宝贵财产的观念，未来的心上人或求爱者必须以某种方式去获取她或攻击她：成年男子为了表明爱心，或许会粗鲁地夺下心爱的人手上的戒指、花束，或者她正在采摘的果篮。只有在城镇中长大的有教养而浪漫的情人才会给他们的心上人献上鲜花或水果，而不是夺走她们手上的这些东西。勃艮第的小伙子施加于村里姑娘的这种可能的或部分的抢夺，介于古罗马人强奸萨宾妇女和美国大学生抢夺女生短衬裤的胡闹行为之间，但有一条规则是决不能破坏的：被看中的姑娘“只能由另一个男人交到她的求婚者手中”。这个男人是她的父亲，如果必要的话，也可以是她的兄长。婚前怀孕的情况很少发生。这个事实并不能像人们常做的那样用宗教伦理的思考来加以解释，真正的原因是未婚姑娘的父亲就像一名心怀妒意的卫士，用鹰一般的眼睛监守着女儿的贞操，甚至监视着儿子的童贞。只要发现一丝非法引诱的迹象，他们就会立即抡起棍棒，就像地狱的猛犬一样。旧制度下的贞操观所依据的准则是“把女儿锁在家里”。道德风尚在18世纪后期出现了些许松动，可能的原因就是父母的监视有了一定程度的放松。

264

求爱期结束之后，未来的女婿就来正式向岳父要求迎娶他的女儿为妻：为了表示庆祝，通常要举行聚餐：食品一般会有咸肉煎蛋、奶酪、半瓶夏布利酒或甜酒；年轻人往往要答应住到岳父的家中并为他干活。正式订婚以后，很快就举行婚礼：举办福楼拜在《包法利夫人》中描写的那种名副其实的盛宴：有咸肉、牛里脊、鹅、火鸡、腌制的兔子，甚至还有一只狐狸腿。“在打霜的日子里，将狐狸腿拿到屋子外面的李树上挂两个星期，就会变成美味的食品”；人们伴随着风笛声和直笛声，

享用着这些美味。勃艮第的传统舞蹈是婚宴上不可缺少的，舞蹈具有特殊的吸引力，因为每隔几分钟就可以来一次紧密的拥抱。年轻姑娘们"像轻风一样起舞"，她们的红色衬裙"像伞一样起伏"。新娘穿的是黑色的衣服，以后她去参加葬礼以及她去世后躺在棺材里的时候，也穿这件衣服。结婚之后，她再也没有跳舞的机会了："一个女人只要结了婚，就放弃了一切，陷入了家庭生活的忧愁和艰辛之中；婴儿的哭泣是她惟一的音乐，抱着孩子踱步是她唯一的舞蹈；不论她去哪里，都得抱着孩子，逗孩子说说话就是她与别人的交流。"总而言之，265 婚礼在完成了把一个年轻的姑娘引入一场合适的婚姻的功能之后，欢笑和嬉戏就戛然而止了：它们再也没有用处了。这一点上，雷蒂夫的乌托邦是坚定的，就像萨西村的现实生活一样。

当然，还有另外一些与婚姻的必然性关系不那么紧密的娱乐和游戏，尽管这些娱乐和游戏会产生婚姻生活哲理的幽默联想；这就是最广义的民俗，诸如歌谣，儿童和年轻人的游戏、故事和民间传说。

尼古拉提到了在勃艮第一带大家传唱或者毋宁说喊叫的几首民歌：一首是年轻姑娘的爱情悲歌；一首夜莺赞歌；还有一首是耕夫唱的颂主歌。这些歌谣实际上是用当地方言传唱的异教的太阳颂，此外还有源自《圣诞节大圣经》或其他此类书籍的赞美诗；这些书，就像在埃德蒙家一样，按照宗教传统父子相传。萨西村和尼特里村的这些民间歌谣大致说来可以追溯到16世纪。那显然是一个当地风俗正式形成的时代，也是农民的音乐和民谣出现新风格的文艺复兴时代。

儿童的游戏往往是直截了当的，带有近乎恶作剧的质

朴，譬如接替福德里亚职位的一名更为严厉的牧师来了之后，就不再允许玩耍的一种名为"少女"的游戏。这个游戏的玩法是，以这种方式取乐的一群男孩必须抓住一个躲藏起来并且不准移动的女孩（说是"在塔顶上"）；在被抓住、成亲和奉献给她的丈夫之后，她被告知她将"像玫瑰一样被撕碎，像李树一样被摇晃、像田鼠一样被吃掉，像银莲花一样凋谢"。还有一种名叫"狼"的游戏，就像是颠倒过来的"少女"游戏。它的玩法是，"狼"被捆绑在黑暗中，不允许移动，他必须猜出女孩身上穿的是什么衣服，猜对的奖赏是他可以亲手去摸这些衣服。接替福德里亚的牧师朱利维也禁止玩"狼"这种游戏，尽管它在萨西村已经有了"500年的历史"。（显然，到18世纪，在攻击性很强的天主教和后来詹森派的双重影响下，萨西村的民俗有些已进入消失的过程。）另一个游戏名为"继母"，它所玩的既不是初婚也不是装模作样的强奸，而是死亡给婚姻带来的痛苦，游戏一开始，母亲去世了，一个残忍的继母娶进了家门，她虐待可怜的女儿，给她吃长霉的面包。荡秋千却是一种气氛轻松的游戏，男孩和女孩轮流推秋千，但这种娱乐也得罪了严格的卫道士，尤其是当尼古拉那样（现在已是个大孩子）的无赖拼命把女孩荡得高高的，足以造成"很不雅观"的时候。 266

最后还有一种游戏名为"山羊"（一种投靶游戏）和套环游戏，在尼古拉看来纯粹属于体育性质的消遣。当他本人还是个小孩的时候，就拥有村庄里独一无二的特权[80]，即拥有自己的玩具：一辆巴黎马车和一只纸板做的马。

研究农民文化的社会学对于研究自古以来流传在萨西村的民间传说抱有特别大的兴趣；而且还要研究说故事的人和

听故事的人。在萨西人所知道的口头文学中可以十分明显地看出两个社会层次。

基本层次是传统的民间传说。它们是由妇女，无论是年轻的母亲还是年迈祖母，以及农场劳力中的一部分奇特成员，如牧羊人，一代代相传下来的。牧羊人口若悬河，与那些沉默无语和反应迟钝的帮工完全不同，会一边照顾着羊群，一边对尼古拉讲述他们的爱情冒险经历以及被他们引诱的姑娘的父亲或哥哥所作出的强烈反应。他们还讲一些"巫师的故事，鬼怪的故事，卖身于魔鬼的故事，被逐出教会的人如何变成动物而且吃人的故事，以及会魔法的牧羊人的故事，例如有一个牧羊人让自己长出了翅膀，像山鹰一样飞了起来"。

到了晚上，当人们坐下来剥大麻的时候，仅靠燃烧着的大麻秆照明，年轻人倾听着老奶奶讲述鬼怪的故事，就像是从永不枯竭的口头文学的魔桶里倾倒出来的一样。其中一个最频繁的主题是鬼怪化身为一种动物。如果一个男人(或女人)生前不诚实(例如，一个农民在交纳什一税时欺骗教士，或一个磨坊主的老婆用短斤少两的方法掠夺穷人，或许一个女人偷偷将灵魂卖给魔鬼以换取财富和欢乐)，那么鬼就会来索取这个罪人的身体，不管是死的还是活的。神父当然有驱逐魔鬼的咒语书，但是，如果他不出面干预的话，这个做错了事情的人的身体就会暂时地或永久地变成野兽。男人有可能变成打不死的和吃人的狼人；女人则有可能变成一条蛇或供魔鬼驱使的黑母驴。一个稍有勇气的男人只要干预一下就可以打破魔咒；在不那么严重的情况下，就可以证明那实际上不过是一场恶作剧(例如强盗装扮成鬼怪的故事)。萨西村的故事，或者更笼统地说，莫尔旺和勃艮第地区的故事，都有一种永恒不

267

变的结构，在我看来恰恰证实了普洛普令人信服的和质朴的理论[81]：民间故事的最初意图是讲述人死了以后，他的灵魂以某种肉身或轮回的形式不断变化的历程。尽管教会暧昧地试图利用这类故事（偷漏什一税的人因为他犯下的这种罪行而变成狼人的故事即其中一例），但这些故事带有更多的异教特色，是宣扬鬼怪的，而不是真正地教化民众和反映基督教精神的。基督教至多不过是一种装饰。这些故事有时会和一些本身就是毛骨悚然的真实故事混合在一起，并且以更加毛骨悚然的方式讲述出来。例如，铁匠让·皮奥的儿子，也叫让·皮奥，他诅咒父母，"谩骂"母亲，殴打躲进妈妈怀抱的两个妹妹。不久以后，他死了，被埋在姑娘们春天来采紫罗兰的一堵墙下。有一天，她们在坟地上发现了让·皮奥的牙齿。这些牙齿曾咬过为他哺乳的乳房。其中的一个姑娘很傻，竟然将这件事告诉了父母。他们顿时悲恸起来："啊，我的主，我们可怜的孩子遭天谴了！"

在教堂的墓地，死者埋葬在很浅的墓穴里，为的是方便他们复活。在大麻秆的照明下讲述的鬼怪故事中，或在布雷顿的深夜，埃德蒙已经就寝，牧羊人终于找到机会给尼古拉讲那些令他毛骨悚然的故事。在这些故事里，死者的村庄如此接近于生者的村庄，紧紧地窒息着它。鬼怪就在身边：就像布里的牧羊人那样，好色的彼埃尔·库图考在照看羊群之余，为了换换口味，常常根据宗教小册子上的符咒把鬼怪召唤出来。

这就是底层的村庄口头文学，无论是大声嚷嚷的还是交头接耳的。但还有另一个文化层面，情调更高，更为正式。它与古老民风的关系并非不总是那么融恰。

这第二个层面主要存在于像埃德蒙那样受过更多教育的

农民当中；也存在于村庄里那些或许出去读过书的年轻显贵当中。他们当中有大法官的儿子，公证人的儿子，还有牧师的侄子；他们有时装扮成鬼怪的样子去嘲笑那些鬼怪故事，吓唬老太太。他们有时也讲些诸如男人变成驴的荒唐故事。埃德蒙本人也讲故事，但他的故事不是来自内容丰富的民间记忆，而是来自通俗文学，如《魔鬼罗伯特》这样的小册子。他的故事明显比前面提到的故事更为“现代”：这些故事不是起源于那个遥远的不可知的古代，而是来自有书面文学的中世纪。削大麻的老妇人所讲述的故事与高雅文化相距几千年，而埃德蒙的故事离现在只有五百年。像尼古拉这样的孩子都喜欢恐怖刺激，他们更喜爱牧羊人所讲的色情或无稽的故事，而不喜欢受过更多教育的家长所讲的更为庄重的冒险故事。

268

我们依然要在这个较高级的层面上来讨论一下“藏书”的问题。在这里使用“藏书”这个词未免有点夸大其词，但对于埃德蒙·雷蒂夫，以及他的父亲和他古板的岳父多代恩这样的农民而言，拥有或曾经拥有一些书籍却并非稀罕的事情。这些书大多是有关宗教信仰的著作：祈祷，仪式或圣徒传记之类。这些书籍的主人渗进了多少带有詹森派的基督教文化，这完全取决于当地的教区牧师的个人倾向。他们反对迷信和民俗，但对拉丁文明，例如古代农艺学家加图和瓦罗以及世俗的历史，又一无所知。埃德蒙之流对这类事情也一无所知。然而，埃德蒙确实喜欢让他的妻子大吃一惊，就像牧师一样，喜欢在做弥撒时让质朴的听众瞪大眼睛。他曾郑重其事地对芭尔布讲述过罗马皇帝如何征服卡帕多西人（其中隐含着的意思是：我就是皇帝，而你，就是卡帕多西人），就好像他亲身经历过的那样[82]。埃德蒙还模仿历书编写了一本所谓实验用的

年历。据说，这本年历可以为他和萨西村的其他葡萄农预测干旱和春天的霜冻、最好的葡萄收成以及该买多少酒桶。因此，他的文化包含了气象学，像其他农民一样，这种气象学是他为自己创造出来的。

这个村庄实际上不存在第三个层次的文化，即完整意义上的启蒙主义的文化。肥猪和瘦猪的寓言告诫了农民，即使他富裕了，也不要把自己摆在与贵族平等的地位上，否则会遭到贵族的嘲讽，说他们缺乏教养。只有福德里亚读过培尔的书，但那是在巴黎的圣巴比学院读书时出于一时的激情去阅读的，或者是回乡之后感到寂寥空虚时才阅读的。福德里亚的无神论是否对萨西村或其他地方的村民们产生了影响呢？虽然在雷蒂夫的书中，通常都有很丰富的细节，但根本找不到任何证据来证明这一观点。应当指出的是，福德里亚个人身上的第三层次的文化(启蒙主义文化)出于善良的本性而接受了第一层次的文化(传统民俗文化)，而第二层次的文化(当地的精英文化)虽然更加接近于当地的民俗文化，却明白无误地表现出对它的反感，真所谓“你的近邻就是你的死敌”。

注释

[1] 本文最初发表时是作者为G·杜比和A·沃伦主编的《法国农村史》(G. Duby and A. Wallon, eds., *Histoire de la France rurale*, 巴黎, 1975年)撰的稿。

[2] 我在全文中使用的雷蒂夫·德·布雷顿的《我父亲的一生》(Rétif de la Bretonne, *La Vie de mon père*)是1970年由巴黎的加尼埃古典书局出版的吉尔伯尔·卢热尔(Gilbert Rouger)的版本；以下凡引述此书都用字母R代替。文中的大多数引文均直接引自该书。

[3] R.，第185页

[4] R.，第194页

[5] R.,第186—187页。

[6] P·德·圣雅可布:《旧制度最后一世纪北方勃艮第的农民》(P. de Saint-Jacob, *Les Paysans de Bourgogne du nord au dernier siècle de l' Ancien Régime*),巴黎,1960年,第187页。

[7] R.,第56页。

[8] 尼古拉让下面这句话由彼埃尔亲口说出来:"人类最有价值的技艺就是农业……除非以这种途径获得,否则财富将不成其为真正的财富",R.,第56页。当然这句话也完全有可能是出自魁奈的著作。

[9] R.,第57页。

[10] R.,第288页,注104。

[11] R.,第131页。

[12] R.,第84页。

[13] 参见P·德·圣雅可布,前引书。

[14] 雷蒂夫特别强调了萨西村的特征。

[15] R.,第30页起。

[16] M·昆丹:《佛蒙顿镇的历史和制度研究》(M. Quantin, *Recherches sur l' histoire et les institutions de la ville de Vermenton*),1876年,引自R.,第23页,注39。

[17] P·德·圣雅可布,前引书。

[18] 关于里昂的类似做法,参见M·加尔登:《18世纪的里昂和里昂人》(M. Garden, *Lyon et les Lyonnais au XVIIIe siècle*),巴黎,1970年(里昂铭文学院图书馆系刊,第18卷)。

[19] 这三个早夭子女当中,两个是死婴,另一个婴儿只活了两个半月,名叫托马斯-彼埃尔。

[20] 彼埃尔·古贝尔:《1600年—1730年的博韦和博韦人》(Pierre Goubert, *Beauvais et le Beauvaisis, de 1600 à 1730*),巴黎,1960年。

[21] R.,第188页。

[22] R.,第84页。

[23] 关于18世纪初以来王室新生儿、婴儿、青少年期和成年期的死亡率的下降,参见格拉斯和埃弗斯利出版的研究成果:《历史上的人口》(*Population in History*)。圣西门在回忆录中提到了法贡医生所做的不懈努力,却未能劝阻路易十四不要携带怀孕的情妇或王室中怀孕的女人进行不必要的出游。在通常的情况下,只要接受了简单的和常识性的建议进行治疗,就可以大大减少像路易十四那样的因

某些个人的野蛮习惯而引起的妇女和儿童的过多死亡。至少在尚能听取医疗建议的上流社会中，路易十四过时的行为方式是属于17世纪的，而不是18世纪的典型

[24] R.，第185页

[25] 正在写作中的有关莫斯(Meaux)的论文。

[26] 尚未发表的论文。

[27] R.，第191页。

[28] R.，第191页；参见埃马丁克尔，《食品供应的历史》(J.-J. Hémardinquer, *Pour une histoire de l'alimentation*)，巴黎，1970年(年鉴集刊)；A·勒布伦，《17世纪和18世纪安茹的人口与死亡率：论人口学和历史心理学》(A. Lebrun, *Les Hommes et la mort en Anjou aux XVIIe et XVIIIe siècles. Essai de démographie et de psychologie historiques*)，巴黎，1971年；《科瓦涅上尉回忆录》(*Les Cahiers du capitaine Coignet*)，巴黎，1968年，前面几章，第3—45页。

[29] R.，第191页。

[30] 库尔吉的教区牧师却不同，他吃的像农民一样，但用餐的时间却像资产阶级，在正午或1点钟用主餐。

[31] R.，第183页。

[32] R.，第145页。

[33] R.，第192页。

[34] 腌制的猪肉所含的脂肪多于瘦肉。

[35] R.，第149页和第186页。

[36] R.，第130页。

[37] R.，第31页，注54。

[38] 即使是对雷蒂夫农场的人均食物份额进行最粗略的估算也是很有价值的，因为要找到一个完全由农民掌握的农业单位的此类数据，是极其困难的。

[39] 数量多少，不能肯定，参见R.，第31页。

[40] 这块地产的酒和谷物自给自足，剩余产品的出售，每年出售价值100埃居的胡桃，每周能出售144只鸡蛋，换来盐和香料。

[41] R.，第190页。

[42] R.，第31页。

[43] R.，第191、289页。

[44] R.，第189页。

[45] R.,第 32 页。

[46] 埃马丁克尔,《食品供应的历史》,第 153 页。

[47] 同上书。

[48] 关于 18 世纪的卫生状况的进步，最珍贵的几组数据见于 R·利克的有关库坦斯镇的著作：在 1750—1753 年间，家庭中几乎没有"瓷罐和瓷盆"（在这个乡村小镇家庭的财产清单上出现的几率为 2%），但到法国大革命前夕，却在几乎所有的地方行政长官、贵族和富裕商人的家庭中出现（在财产清单中出现的几率达到 14%）。尽管这一增加是十分可观的，但事实仍然是 86%的家庭财产清单中，也就是在大多数普通民众的家庭中，甚至在一部分中产阶级的家庭中，到 1788 年还没有瓷罐和瓷盆。见 R·利克:《库坦斯镇亡故者的财产清单》(R.Lick, "Inventaires après décès de Coutance")，载于《诺曼底年鉴》,第 4 期,1970 年 12 月,第 293—316 页。

[49] 参见《科瓦涅上尉回忆录》。

[50] R.,第 140 页。

[51] R.,第 190 页。

[52] R.,第 131 页。

[53] 古贝尔和彼得的论文,载于德塞弗和勒鲁瓦·拉迪里主编的论文集《18 世纪末的医疗、气候和疾病》(J.-P. Dessaive und Le Roy Ladurie, eds., *Médecins, climat et épidémies àla fin du XVIIIe siècle*)，巴黎，1972 年。

[54] 《尼古拉先生公开的个人情感》(*Monsieur Nicolas ou le coeur humain dévoilé*),巴黎,1959 年,第 1 卷。

[55] 莫里斯·阿古龙:《村庄里的共和国》(Maurice Agulhon, *La République au village*),巴黎,1970 年。

[56] R.,散见书中各处。

[57] 彼得·拉斯勒特:《我们失去的世界》(Peter Laslett, *The World We Have Lost*)

[58][59] R.,第 184 页。

[60] R.,第 130 页

[61] R.,第 225 页。

[62] 无论是雷蒂夫的《尼古拉先生》(第 1 卷)还是科瓦涅著作的开头部分，都说明穷人家的孩子从 10 岁起就开始干打谷之类的体力劳动

[63] 阿涅斯·苏里亚克和凯瑟林·罗勒:《19世纪初塞纳河和马恩河地区的人口和社会》(Agnès Souriac and Catherine Rollet, *Démographie et société en Seine-et-Marne du début du XIXe siècle*), 巴黎-索邦大学论文,1970年,第2卷,359页。

[64] 葡萄种植地区现在的情况恰恰相反:葡萄种植者(在他自己眼中是小资产阶级土地拥有者)羞于被当作"农民",即种粮食的农夫看待。这里应当对耕作的劳动做出更精细的区别:如果说耕地并非是不光彩的,但肯定也不是贵族从事的活动。16世纪真正的贵族,例如吉尔·德·古贝维尔,就从未亲手扶过犁。但他会去修剪和嫁接苹果树,因为在这些领域中,他把自己看作是一名创新者。因此,势利偏见会采取多种形式。

[65] N·莫根森,《18世纪奥热的居民》(N. Mogensen, *Le Pays d'Auges au XVIIIe siècle*),巴黎第四大学学位论文,1972年。

[66] 与男人在农村占据的主宰地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女性在城市社会中占有较高的地位,参见《尼古拉先生》(第1卷和第2卷):当年轻的雷蒂夫试图将他的那种男性至上的农村偏见强加于(欧塞尔和巴黎的)城市姑娘时,她们都报之以讥讽。

[67] 彼得·拉斯勒特,《我们失去的世界》。

[68] M·沃维尔,《18世纪普罗旺斯的巴罗克式的虔诚和基督教信仰的淡化》(M. Vovell, *Piété baroque et déchristianisation en Provence au XVIIIe siècle*),巴黎,1973年("文明与心态"丛书)。

[69] 吉尔伯尔·卢热尔为雷蒂夫的著作所写的前言。

[70] R.,第164—165页。

[71] R.,第86页,第164—166页,第256页。

[72] R.,第152页

[73] R.,第249页。

[74] R.,第86页。

[75] 乔治·勒费弗尔:《法国大革命前的北方农民》(Georges Lefebvre, *Les Paysans du Nord pendant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第4版,巴黎,1971年。

[76] 请与《父亲的学校》一书中的图斯勒约尔(埃德蒙·雷蒂夫的另一个化身)以及雷蒂夫的《我父亲的一生》一书中的布拉斯达根相比较。

[77] 《特雷武辞典》,引自R.,第197页

[78] 有一点似乎是相当清楚的，那就是尼古拉的童年之爱伴有强烈的俄狄浦斯的恋母情结（见《尼古拉先生》，波维尔版，第3卷，第215—230页）。作者声称，当他仅有10岁的时候，就在布雷顿的马厩里曾让一个叫"南妮特"的姑娘怀孕。他后来提供了这个姑娘的生平（在巴黎作全职女佣，当过一年老雇主的仆人兼情妇，实际上就是他的妻子），与年轻时狂野的芭尔布·费尔莱极为相似。这证明了尼古拉将南妮特认同为他的母亲的理论。

[79] 在17世纪，她们通常会在心上人的陪伴下去祭拜圣女勒内；但是，在路易十四的统治后期或路易十五的统治初期，一个教区牧师禁止了这种做法。当时达成了一种妥协：如果有两个姑娘要离开萨西村，其中的每个姑娘必须由另一个姑娘的求婚者陪伴；等到他们离开了萨西村，再交换陪伴者。这是规避新清教主义的一种方法。（参见《尼古拉先生》）

[80] R·利克，《库坦斯镇亡故者的财产清单》，第308页。

[81] 弗拉迪米尔·普洛普：《民间故事的形态学》（Vladimir Propp, *Morphology of the Folktale*）。

[82] R.，第138页。

第九章　危机与历史学家[1]

270

在以下的内容中，我的原意并不想直接涉及未来，也不想涉及现在。我更关注的是"过去的历史意义"。无论如何，在我看来，认识过去有助于理解今天的事情，确实也有助于理解未来。从这个意义上讲，虽然我不敢以波苏埃自居，但历史学家可以毫不困难地把他们对今日危机的感知转而写成一篇世界史的论文。

这里还需要作一点事先的声明："危机"这个词含义十分广泛，以至于被滥用了，结果反倒失去了它的用途。因此，我要把对"危机"这个概念的分析严格限定在（历史学）普遍认可的经济学的和人口学的意义上。这样的限定并不妨碍对我们文化的未来发展作一些观察。

对经济史学家和（或）人口史学家而言，"危机"总是表现为某种类型的突破，即长期趋势或趋向当中的否定阶段和短暂阶段。它可以指延缓，即整个成长时期中的停滞和崩溃的阶段。它也可以指稳定时期中的（与之相反的）衰落。这种现象（延缓，停滞，或崩溃）当然会对价格发生影响；但或迟或早也总会影响到生产和其他活动的指标。在这些多种多样的情况下，危机会以好几种方式开始运动起来：或许是由价格的下降所推动，从而使生产者失去信心，然后，就像1929年的情况

那样，又反映在经济中的其他因素上。在比较早的时期，人们认为危机像恩内斯特·拉布鲁斯所描述的那样是由于18世纪80年代酒的低价格引起的，或者像在17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那样由于科尔倍尔实行的通货紧缩引起的。我们可能会注意到，自从1929年以来，这种通货紧缩类型的危机在现代要严重得多，但它在17世纪和18世纪带来的破坏性要小得多。它虽然在当时引起了忧虑，但不是灾难性的。在那个时代（在以经常发生战争和流行病为特征的背景下），它指的是粮食歉收，或指连年的歉收，并因此引起了最严重的"危机"形势（例如宗教战争和弗隆德运动期间的粮食紧缺，或路易十五统

271 治后期的连年饥荒）。人们将会注意到，当前的危机（1973—1975年），至少是部分地，或在它的最初阶段上，似乎与暂时的、也许是人为的，但不可否认地与石油供应短缺有联系。这一短缺为当前的世界经济萧条提供了最初的推动力（当然决不是惟一的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讲，1973年以后的经济萧条与1929年那种因需求不足引起的状况完全不同，而是由于石油供应的封锁引起的（哪怕仅仅是暂时的封锁）。反过来说，这与旧式的生存危机倒有某些共同之处，也是由于某种物质供应的短缺引起的（不过在当时是由于粮食供应的短缺引起的）。如果罗马俱乐部的预测证明是正确的话，我们未来很有可能会越来越趋向于回到由于这类或那类战略部门（食品、石油、肥料、磷酸盐、以及各类原料）的供应短缺而引起的危机中去：换句话说，就是回到旧制度中去。

17世纪和18世纪的各种类型的危机，无论是因为通货紧缩还是由供应短缺引起的，都会转变成为整个社会总产量的绝对下降和相对下降。总产量的下降不会超过一年的时

间，严重一些的话，也不会超过几年的时间，但是在相当长期的危机中，总产量的下降会长达几十年，有时长达一个多世纪。

此外，可以想象，危机会对人口数量产生影响，虽然并非每次都会如此。换言之，经济危机可能会转变成人口危机，因而变得更加持久，或者以人口危机反映出来，因而变得更加严重。这样的联系在当前的西方社会中是十分明显的：开始于1973—1974年的经济萧条加剧了出生率的下降。出生率的下降开始的时候与经济萧条无关。人口危机也有可能由于诸如流行病等非经济的因素而启动。

在许多情况下，人口危机表现为死亡率的上升。死亡率的上升是因为饥荒和(或)战争造成的，或者因为瘟疫，或有可能因为暂时的贫困所导致的身体健康的恶化而造成的。当前的经济危机大多数属于这种情况，过去也出现过这样的危机。或者说，人口危机有可能是某些社会使用了各种方式的生育控制手段来自愿地限制人口所造成的结果，或者是普遍实行的晚婚或大批人的终身不婚造成的。

现在我要按照年代的先后顺序来对危机做一番考察，既从可能成立的类型学的长期角度，又从其怵目惊心的外观的短期环境来加以考察。

18世纪以前的危机 272

1. 跨越若干个世纪的危机

为了达到我们的研究目标，这里有必要将几种不同的时间尺度区分开来。某些“危机”持续了一个世纪以上，或连续

地跨越好几个世纪。这些“危机”相当持久而且严重，简直可以将它与文明的崩溃等量齐观。其中最引人注目和最悲惨的是在16世纪这个“长”世纪(1492—1650年)里打击美洲印第安人大陆(the Amerindian continent)的生态灾难。在这整个时期里，大约90%的当地人口（在加勒比海地区的某些地方甚至达到100%)死于从欧洲传入的疾病。[2]至少在过去的1000年内，旧大陆上还从来没有发生过与此相当的大屠杀。

这样一个巨大的危机，或危机链，导致了墨西哥和秘鲁的文化在混合种族的新基础上进行全面的重建。从某些方面来看，这个新秩序确实具有创造性，但是，为这个新开端付出的代价也是惊人之大，无论从哪个标准来衡量都太大了。

另一场不同的危机，从流行病的角度来看，并不像美洲印第安人的悲剧那么具有灾难性，但持续的时间更长。这就是与罗马帝国在大入侵的影响下发生崩溃时相伴随的一场危机。这场危机的最初征兆出现于公元3世纪。距离“入侵”还有相当长的时间，它的所有力量，包括破坏性的和建设性的力量，都被制服了。当这个创伤在大约11世纪最终“抖落”出来时，挪威人的侵扰已经过去，开始了中世纪更大的一次经济增长。苦难的年代将致命的打击转变为罗马帝国的成就，在早期阶段上明显地表现为长期的入口和产量的下降，除此之外，还表现出社会—文化系统解体的特征，一个新的或比较新的社会—政治系统开始建立起来了：其中除了其他的东西外，人们会联想到封建制度的兴起。在法国的北部(说奥依语地区)有可能从拉丁语的“日耳曼化”或“法兰克化”中看到新文化的表象，而这些今天已融入了法语。社会学家让·巴奇勒尔认为[3]，罗马帝国和加洛林帝国这些大帝国的相继崩溃提供了

一个创造性的基础,封建制度就扎根于其中(这个观点很少受 273
到反驳)。但是,从一个相当长期的观点来看,他还从里面看到了近代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起源。在任何一个帝国社会中都带有维系其秩序的"正常"力量,城市和商人阶级总的说来是安分守己的,处在卑微和从属的地位上。但是,在西欧,从11世纪以后,商人群体开始利用以帝国上层建筑的解体为代价而获得的城市机构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这个人数日益增多的群体早就像溪流里的鲶鱼那样成倍地增加。从长期的角度来看,在经过连续的但有时不平衡的进展以后,他们在很晚以后的某个时候终于成功地把世界上的一大部分地区转变为他们自己的"资本主义"。[4]在公元一千纪的第二个三分之一的时间里,或在它的后一半时间里,发生了后帝国大危机,因此成为了孕育崭新的社会—经济模式的母体,它的视线跨越了中世纪,预示了现代资本主义并为它奠定了基础。

2. 长达一个世纪的危机

现在我要转而讨论短期的危机,这类危机持续了大约100年,或者稍微长一点的时间。这类规模的危机中最为重大的事情发生在中世纪末(14—15世纪)。它的特征很容易确定。7世纪以后,农业性质的西欧经历了人口的巨大增长,10—11世纪又有很大幅度的增长。到了1300年以后的那些年份,或者更加笼统地说,在14世纪的前期,某些相反的因素第一次出现了,以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并遏止了这一增长。首先,西欧人口的巨大增长似乎像是临近发生爆炸的银河系:他们的后代奔向各个方向,甚至奔向中亚和中国(当时的中国本身也处在人口的激增之中)。与此同时,在欧洲和中国之间,横亘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和土耳其斯坦,成吉思汗的蒙古人的

世界帝国正在建立起来，保障了交通的安全。这个帝国由此推动了西方与东亚之间的接触和短暂中断。一队一队的蒙古士兵和商人车队在热那亚丝绸商人的组织下，行进在广袤的欧亚平原上，穿过土耳其斯坦及其邻近地区瘟疫的原发地带。最终有一天，不可避免的事情终于发生了。这些不谨慎的长途旅行造成了细菌学上的汇合：1348年的黑死病从中亚传播到了热那亚人设在黑海之滨的商站，又从那里传播到意大利的各个城市，然后传播到整个西欧，肆虐于意大利、法国、英国等国的人口。从1348年以后的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以黑死病为开端的一波又一波的瘟疫侵袭着欧洲大陆。此外，这场人口危机在法国因为百年战争而大大加剧。这个时期的军事冲突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这不仅要从军事人员的伤亡来衡量，因为这个数量是不大的，而且还要从士兵以及大批为逃避战祸而流落他乡的难民带来的流行病所造成的结果来衡量。他们身上的跳蚤带来了瘟疫，虱子带来了伤寒。不仅如此，士兵们还到处抢劫马匹，破坏磨坊，毁坏大量的农业资本投资，由此引起了饥荒。简言之，一个中世纪研究者把所有这一切描述为“广岛模型”。人口数量急剧下降：在相应于现在法国边境内的范围里，人口数量从1330年的1700万人或1800万人下降到1440年的1000万人以下（甚至还要少得多），即在“公正”的腓利普统治时期到圣女贞德的时代，人口发生了大幅度的下降。

274

这场持续百年以上的危机导致了任何创新或创造性的成就吗?在我看来，人们可以尝试着从三个不同的方面来回答这个问题：

(1)一种回答可能会考虑到，这场危机对社会中的人口和

经济方面带来的打击，把此后的历史进程，即1500年以后的全部历史进程，延缓了整整一个世纪。换句话说，如果不是因为这场危机以及一连串的打击（削弱这个有机体的"放血"），那么，我们这个社会至今为止几百年来所经历的人口和经济增长的现象的开端将会大大地提前，比如说不是开始于实际上的1715—1720年，而是开始于1600—1620年。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正带着种种忧虑而如此考虑的那个历史进程的加速，或一往无前地前进，起点本应在时间上再向前移。根据这个理论，"我们"，毋宁说人类，现在正在与未来学家告诉我们的本应在21世纪才出现的（或许是无法解决的）问题进行着斗争。（我并不赞成罗马俱乐部所提出的那些多少有些过分简单化的分析。但是，所有的人都会同意，某些相当严重的矛盾，那些因无规则的经济增长和消费的浪潮所造成的矛盾，将会在2050年至2100年之间以迄今为止尚未经历过的尖锐程度表现出来，尽管警示的征兆在我们这个时代已经出现。）

275

（2）不过，以上这种"反事实"分析或许是机械的和虚幻的。设想未曾发生过的事情是困难的，就像是做人类心脏的移植（参见1975年10月2日《纽约书评》第34页上对罗伯特·福格尔的批评）。且让我们再来看看14世纪和15世纪那场危机的真实情况。人口的大幅度下降相反地伴随有大量农业资本的残留，也就是在1450—1500年间被放弃的大批可耕地。到了1450年，这些土地还没有改变它们的荒芜状态，因此比起清理原始森林来说要容易得多。正因为如此，1450—1500年的危机造成了土地资本的大量剩余，由此带来了生活水平的大幅度上升以及城市和海上经济的多样化，从此以后得以满足从葡萄牙到德意志的西方社会不断增长的复杂的物质和

文化需要。

众所周知，土耳其的征服者（是在那场危机造成的人口真空时期完成的）也把希腊的学术和希腊时代的文稿传播到西方。在这个背景下发生了15世纪和16世纪的在不同程度上改变着欧洲和世界面貌的三种现象：知识的文艺复兴，意义更为重大的印刷术，以及美洲的发现。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危机像有的时候那样发挥了创造性的功能。15世纪数量已经减少了的欧洲人口，不再像过去的13世纪和14世纪初居住在同一块土地上的社会那样受到生存问题的困扰。结果，中世纪后期的人口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恢复能力并开始朝着新的方向迈步。

当然，（虽然在这一点上我们基于熟悉的理由）正像胡伊

276 津加在《中世纪的消逝》中所描述的，那场危机也造成了一些重要的文化现象，其中包括人们所熟知的对死和尸体的观念。透过这种观念特别有助于窥视中世纪后期的心态。这种观念的产生有许多理由，而且从那时起一直持续到我们这个时代，尽管其中的一些理由与14世纪和15世纪非常特定的环境有关。虽然我们已经成功地延缓了死亡，但谁也没有试图去征服死亡。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们即使生活水平较高，但他们同样也知道其中的许多人注定要在几年内的某次无法避免的瘟疫爆发中死去。正像腓利普·阿里埃斯所说的，对于生活在“中世纪消逝”时期的男人和女人来说，对死亡这个最终的失败进行思考是一件正常的事情。[5]就像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一样，他们到达了一定的年龄，比如说40岁，便会从年轻时未能实现的抱负的角度去思考自己的一生。

14世纪和15世纪的危机是否仅仅影响到欧洲呢？显然

不是。何炳棣的有关中国人口的研究著作，论证了中国人口在1400年前后像欧洲人口一样跌到了历史的最低点（6000万人），[6]而在12—17世纪之间，中国登记在册的人口最多时达到了1.3亿人。这个情况与欧洲人口的长期状况大致相似。不过，有一点是明显的，那就是这个天朝帝国人口的大幅度下降并没有为东亚带来有益的后果，因此与我们所认为的同一时期在欧洲发生同一现象并不一样。中国文明在中世纪末仍然有能力取得重大的成就。虽然这个中央帝国有它的一些优点（也许我可以说得更明白一些，并提醒读者注意到中国人是世界上第一个拥有指南针和印刷术的民族），却没有取得重大的突破，像在1500年前后给予西方以夺取其他大陆并将其烙印印在它们身上的“使命”（不用说，这本身是有疑问的）那样。在所有这些突破中，最为典型的是发现新大陆；当时的靠大众媒介即印刷出版物的交流手段和交流对象在同时增加；知识革命和后来的科学革命，这两个革命一部分是产生于对某些概念的重新定义，并通过在古典文化推动下的文艺复兴而传播到了整个西方。

作了这个同期的历史比较之后，让我开始对我过去谨慎 277
提出的某些观点产生了疑问。我的那些观点认为14世纪和15世纪的危机具有创新的作用。那场危机在漫长的时期内从某种程度来说确实带来了一些成果，大大地提高了西方人口的生活水平，虽然这一提高只是短暂的，但给予了他们发展超越自然经济的再生产及其数量所需要的缓冲时间和活动空间。不过，令人惊异的是，西方是如何抓住这些机会的呢？因为中世纪后期的危机只能起着催化作用，刺激了过去占统治地位但毕竟是处于等待状态中的活动结构。在中国，虽然同样存

在着这样的催化剂(危机),但缺乏的恰恰是它所需要的背景,否则就有可能创造出一个由中国推动世界经济、创立一个交流的、工业的、资本主义的和科学的社会。(这里本应对这样的“有利”环境给出一个定义和表述,以满足进一步划分的兴趣,但这已超出本文篇幅所允许的范围。)

1500年以后,人类再也没有经历过其灾难程度可以与14世纪和15世纪的危机相比拟的西欧生态—人口危机,虽然有一个例外可以证明这个规则:那是一种大规模的但独特的状况,即17世纪三十年战争期间的德意志。17世纪后期或最后三分之一世纪的时间里,德意志的人口减少了大约一半,这当然是因为战争造成的;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流行病及其引起的死亡造成的。只要人们用庞洛西的观点来看世界,那场危机使德意志社会的重组成为了可能,平衡起来看,它还是发挥了积极的功能。能否用这种“危机类型”的重组来解释17世纪末德意志某些地区辉煌的洛可可时期以及18世纪接近于彻底重构的那个时代呢?不可能。但我们同时应当注意到,只要把278 这个想法放在适当的范围内,同样可以解释17世纪的俄国人口在“麻烦年代”的急剧下降:这场危机并不能阻止俄国在18世纪的重建,并再一次地沿着某种专制主义的模式和惯性发展,从蒙古帝国到20世纪一直保持着俄国社会的特征。危机提出问题,文化解决问题。或许如此吧?

3.中期危机和长期危机的结合:17世纪

前面已经提到的德意志三十年战争和俄国的“麻烦年代”,直接把我们带入了17世纪的(长期)危机以及构成了长达整整100年时间的各类危机的问题(这些危机持续10年、

20年，或更长的时间)。“延长的”17世纪事实上是指1560年至1720年，至少在法国是如此。从人口数量和农业总产量来看，这是一个停滞和时而衰落的时代。相反，在工业方面，特别是城市、国家和科学方面，1600年至1700年却有持续的发展

如果更仔细地观察那个时期，人们可以区分出三个困难或危机的长阶段，每个阶段都有明确的界限，有助于解释这个在“延长的”世纪(1560—1720年)里的经济和人口的停滞。

第一次危机与宗教战争相吻合，持续了30或40年，各个地区不同：大致上是从1560年到1595年。

第二次危机在时间上相当于三十年战争，对法国东部和阿尔萨斯造成了破坏，特别是弗隆德运动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在1560年前后给巴黎地区带来了灾难。

第三个阶段结束于路易十四的统治后期，持续了整整20年的时间(1692—1715年)。

这三个阶段中的每个阶段所造成的后果都有可能使“法国”的人口减少100万人到200万人，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还要多一些。与此同时，农业产量出现了暂时下降的趋势。这与某些年份的农业歉收结合在一起，造成了粮食短缺和饥荒。然后，在这三次长期的重大危机之后，人们发现了经济和人口方面的复苏现象，或者说是恢复。每个危机的第一阶段，即衰退阶段，都以那个时代进行的三次战争(宗教战争、三十年战争、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带来的后果占据了统治地位。人们必须记住这一系列的破坏，特别是由这些战争带来的流行病和赋税的负担。这些重大危机有助于揭示深层的结构，引起了重大的社会冲突，包括动乱、起义甚至革命。我所考虑的特

279

别是鲍里斯·波尔奇涅夫和罗兰·莫斯尼埃所研究的(法国)弗隆德运动前著名的"民族叛乱",还有弗隆德运动本身,以及1640—1650年这10年左右在那不勒斯、加泰罗尼亚和葡萄牙,特别是在英国发生的革命。

人们可以说17世纪的这些革命有任何意义上的创新性,就是说它们导致了革新吗?

任何人都不可能对这一问题提供满意的答案,但与此同时,至少有可能提出一两个观点。首先,17世纪(在法国是指1560年到1720年,在其他国家是指不同的时期)总的说来是危机的时代:既是结构上的危机,又是从前面已经提到的三次战争所积累的效应来看的危机(至少在法国是如此)。其次,这一点与前面第一点所作的陈述并不矛盾,因为17世纪又是知识上有重大创造性的时代。例如,彼埃尔·肖努对这一矛盾现象作出了有力的论述。因此,我们认识到了这两种现象即高级文化与经济和人口方面的无所成就的并存和明显的差异。悲惨的并与人类为敌的17世纪毕竟产生了笛卡尔和牛顿以及科学的重大突破,特别是在数学方面。哈札德所说的"欧洲意识的危机"恰恰发生在1680年至1720年,而这个时期的人口数量和总产量处于历史的最低点。看起来似乎是在经济的废墟上出现了像凤凰一般辉煌的知识文艺复兴。

不仅如此,正是从1680年到1720年的这几十年最困难的时期,为一个崭新的现象奠定了基础。这可能是自从11世纪和13世纪以来无可比拟的一个现象,即经济和人口方面的真正增长,这不仅仅是萧条之后的复苏,而且是创纪录的增长:那次增长在法国开始于1720年以后的某个时候(其他国家开始于不同的时候)。那个真正的增长一波又一波地不间

断地持续下去，一直持续到了我们这个时代，准确地说一直持续到 1973 年。不久以后还会有一段时间的重新增长，也决不是没有可能的。 280

那么，还是让我们回到“古典”时期，也就是危机本身的时期（即整个 17 世纪，但特别指 1680—1720 年的危机时期）。当时，最终导致危机结束的条件悄然地聚集在一起。正是由于这些条件，革新和增长会在 1720 年以后开始。经济和人口的复兴，是创造性的复兴，而不仅仅是恢复，是在 1650 年至 1715 年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危机的阵痛中已准备就绪。以美洲的秘鲁，特别是墨西哥的印第安人为例，他们几乎被残忍地尤其是被病毒消灭殆尽（死亡人数达到哥伦布来到之前墨西哥居民的 90%以上）。这些病毒对当地的各个民族而言都是外来的，是由西班牙殖民主义者通过皮肤、血液和行李带进来的。在 1650 年，当地的人口（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同白种人相混合了）数量下降到了最低点，然后才开始回升，虽然是从 17 世纪中叶人口暂时下降到零的基线上非常缓慢地回升。与此同时，不人道的奴隶贸易开始把非洲的黑人俘虏运送到了巴西以及生产蔗糖的西印度群岛。

这样一来，完全是通过人口的回升，在美洲建立起了欧洲纺织品的消费市场。欧洲的纺织品能够出口到新大陆。印第安人的人口现在再度增加，再也不会完全赤裸着身体。即使他们穿着极少的衣服，但由于这一人口数量的更大增加，使得法国的、加泰罗尼亚的以及其他地区的纺织工业，或纺织“制造业”再次兴旺起来，或从 18 世纪第一次起步，甚至更早一些从 17 世纪后期开始起步，尽管这时仍存在着“危机”。此外，墨西哥新提供的劳动力或半繁殖的劳动力以及巴西的黑奴，在

这些国家拥有了开采贵金属的工具(有的是第一次,有的是第二次,因环境而定)。墨西哥的白银(产量落后)和葡萄牙人在路易十四的危机年代发现的巴西黄金，使欧洲的整个经济重新活跃起来。这一复兴通过法国的中介在18世纪处处可见，281 从伊比利亚半岛到英伦三岛。不久以后，从西印度群岛进口的、提炼的和再出口的白糖,给南特和波尔多等法国滨临大西洋的城市带来了新的生命，使它们在启蒙运动的时代达到了空前的繁荣。

因此,在17世纪长期的停滞过程中,正是这个构成"临界质”的因素有的时候在漠不关心甚至是在受到敌视的环境下产生出来了。它们包括工业和城市的发展;黎塞留、马札然和路易十四统治下的赋税增加和国家的成长；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这个哺育着新贵族的苗圃的发展。在这一点上，还应当提及教会对拉丁国家的创造性影响。(例如新教占统治地位的北部地区,由于有了马克斯・韦伯的著作,对宗教伦理的创造性影响就没有必要再作进一步的论述了。)

在反宗教改革运动的影响下，天主教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17世纪和18世纪危机的高峰时期接受讲习班的训练并成长起来的教士们(就像法国以后的时代里从学院,即师范学校培养出来的小学教师那样),投身于对农民的道德和知识的教育。如果说这只在有限的程度上的话，他们至少可以教会农民认字。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在17世纪的扩大了的危机中具有激发作用的理论，经过某些细节的修正后可以适用于古典和启蒙运动时代詹森教派的事例，甚至可以适用洛可可—巴洛克时代的各种天主教教派。在各种不同因素的影响下，在1600年至1750年的那段时期里已经可

以看到资产阶级的各种成分，如商人、国家官吏、最初的技术官员等，不仅有了物质的，而且有了精神和知识的发展：贵族也有所长进，正在成为知识上开放的以及有创造性的阶级。最后，农业和林业也有了深层次的发展。在富裕租佃农场主和富裕农民组成的上层农民当中，他们接受了更良好的教育，更有能力，更加富裕，因而更有效率。所有这些现象集中在一起，不知不觉地结合起来，甚至就在17世纪经济和人口停滞 282 的时期就组成了一个"雪球"，或一个"临界质"。但是，我必须强调，那个停滞仅限于经济和人口的范围。

在这之上还必须加进同时出现的动荡，更严格地说，或更狭义地说，是保罗·哈札德所列举的那些文化动荡：批判地阅读圣经，挑战天主教的教义；随着培尔和丰特内尔等人的出现而在哲学中出现了新的趋势。由于宗教（虽然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是作为人们和农村地区推动进步的力量）的传播，同时也因为非宗教和反宗教的传播而被超越或遭到反驳。无论是非宗教还是反宗教也都是有创造力的，但这次却是贵族的"高阁"。最终，浪潮举起了所有的船只，包括渔夫的小船和富裕贵族的游艇。不管人们使用什么样的比喻，也不管这些比喻是否恰当，所有这些相反的现象都在相互强化，相辅相成，它们的重要性在危机时期都已经得到增强，在危机行将结束之际，大约在1715—1720年以后的摄政时代和约翰·劳的经济实验时代，将要发挥出它们的全部效力。这个在危机阶段中积累起来的"临界质"等到这个阶段一旦过去，就会发生爆炸；但是这个爆炸决不是单一事件，而是多年以来相互呼应的现象。1715—1720年以后所出现的是持续的增长，或者说是自我持续的增长，与17世纪相比，或者与1300年到1700年的那

整个时期相比，确实是根本不同的和崭新的。我们还应当注意到，或重复一遍，这个史无前例的“成长”的开端时间最先落在了英国、比利时、加泰罗尼亚和法国的重要海港（马赛、圣马洛），而不是在法国的内陆地区。

也许我们现在应当停下来扪心自问，至于17世纪，长期危机的创造性究竟可能有多大？我们可以这样说，在这个时期，在精神、知识、科学、文化、行政、城市乃至工业领域中的那类增长，能够把不断增加的人均利益分配给全民，他们完全是因为被经济萧条或恰好被生态—人口危机横向“锁定”，并未认识到这一点，处于理想的地位上，得以利用这类成长所带来的非常特殊的现象。如果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危机有可能造成某些变化并鼓励“临界质”的积累，这并非是因为危机本身，而是因为危机将某种特别的力量给予了那些恰好在危机期间处于单方面和非对称的扩张中的部门。

283

1720—1973年的危机

1720—1973年在欧洲和亚洲，在北美和南美的广大地区，是全面成长的时代：尽管如此，其中不时出现各种类型和时间长短不同的危机使全面成长发生着波动，虽然这些危机从不会持续到一个世纪那么长。（这也是这一时期与1300—1720年的那个时期之间的本质区别。）

从这二三百年的范围内（1720—1973年）来观察，这些危机都可以定义为“成长的危机”。但是，人们依然可以将它们区别开来。第一类是生存危机，1740年的危机就是其中一例。这些危机时间短，只持续一两年的时间。从1740年到1794

年的长期角度来看，它们的发生越来越少，严重性也越来越小，直至逐渐完全消失，最后变得缓和或没有危害（法国革命时期就带着1795年危机复发的特征，接近于一场饥荒）。这些危机或小危机的创造性效应实际上等于零。但是，在18世纪期望值正在上升的背景下，它们确实发挥了作用，鼓励了新型政治鼓动的出现和发展，例如在18世纪的英国和法国经常发生的面包骚动，推动了广大民众当中对社会问题的新意识的产生。这类意识在农村中达到了一定的程度，但更重要的是在市镇中。这种面包骚动与导致法国革命和英国的激进主义的一系列事件有着直接的联系。

第二类危机甚至在18世纪就存在，而到了19世纪和20世纪变得越来越普遍。这类危机就是工业和商业部门的周期性经济危机。这种危机的运行依据通货紧缩的原则，生存危机则相反地依据通货膨胀的原则（谷物价格的飚升）。众所周知，这类周期具有潜在的进步含义，它们甚至推动了工业结构的现代化。

第三类危机要严重得多，持续的时间也更长，更加广泛，既出现在18世纪，也出现在20世纪。这类危机按不同的比例 284 把各类危机结合起来，包括（"旧式的"或"准旧式"类型危机中的）生存问题，（现代的各种）经济萧条、流行病、战争和出生率的下降。

这样的一些危机处于或可能处于某些节点上，处于社会历史或历史本身的战略要点上。因为这是一个整体的成长时代，18世纪、19世纪和20世纪的发展包含着迄今为止未曾经历过的可能性，导向了新的方向，无论是好的方向还是坏的方向。最典型的例子是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

先说法国革命：它所发生的时期既没有极度的贫困，也没有赤贫化的趋势(虽然旧制度下的法国仍然有大批穷人)。相反，在1789年之前的五六十年的时间里，其特征是公认的低下的生活水平有了微小但不可否认的提高。那个时期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特征，就是民众对未来的期望值正在膨胀式地上升，即著名的“上升着的期望值”。18世纪80年代的经济危机给了这些期望值以致命的打击，触发了革命的反应，其尖锐程度大大超过了17世纪，因为17世纪的期望值根本没有上升，人们完全是死于饥饿，因此不大可能举行起义。他们选择的道路是通向葡萄园，而不是通向街垒。

从经济和社会方面来看，法国革命又发生在贵族和教会拥有并由租佃资本家经营的大地产不断繁荣的一个长时期内。这些大地产所起的“客观”作用是为市镇提供粮食。法国革命也发生在制造业和商业经济长期增长的时代背景下。最后，那还是一个自由贵族从上层社会内部涌现出来的时期。

正是这个前面作了极其简要描述的整个系统在18世纪80年代和18世纪90年代在不同的层次上陷入了危机。一些流行病在1775年至1790年之间延缓了人口增长的速度，拉布鲁斯在他的杰作中第一次描述的那次经济萧条开始于18世纪80年代。1788年的农业收成极其糟糕，在极短的时间里造成了形势的恶化：潜在的生存危机为全国的不满提供了一个关键的因素，并于1789年7月14日在巴黎达到了顶点。

285

在这个关头，即法国革命期间，人们被迫作出了某些选择。这是在危机发生之后接踵而至的民众起义和战争的时候，起义和战争也是危机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些选择并不意味长期增长的终止，但肯定会部分和暂时地、在短期和中期内

中断增长。这将决定它未来的方向并将按新的模式为它导向。(我使用"选择"这个词时当然是在历史学家的意义上使用的，即假定其中的大部分内容和最重要的那部分内容可能起源于集体的无意识。)

那么，比如在农业中，"选择"意味着从资本主义农场主类型的发展(即靠1789年以前的贵族和重农主义者)转向拥有家庭农场的小农类型，造成了19世纪的一种倒退。与所有的预期相反，小农成功地巩固了自己的地位，而且抵制住了曾经由贵族地主拥有的资本主义大地产。这一胜利至少有部分原因是法国革命在农村采取的形式。

因此，顺便地说，我们应当注意到，谈论这个时期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对立，特别是农村中的这种对立，并没有太大的意义(城市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在18世纪，这两种生产方式完全不是相互对立的，实际上在相互接近，结成了与小农家庭农场经济相对抗的统一阵线，属于同一个联盟。于是，面对它们的法国革命在这一方面遇到了障碍：这并非致命的障碍，却是一个严重的而且无疑存在着的障碍。

1789—1799年那10年中的革命危机也意味着贵族和民众或至少是他们当中的某些部分的命运开始分道扬镳。其中不仅包含一般"资产阶级"的兴起，还有法律界的资产阶级的兴起。这个阶级在当时的重要性超过了(典型的资本主义部门的)工商业资产阶级。因此人们有必要抛弃"庸俗的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我认为它未必代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解释)。

革命的危机对于自由贵族而言也是具有灾难性的。贵族群体并没有完全消失，但再也不能占据它在1789—1790年所

286 占有的那种政治统治地位。另一方面，革命的新事物将它自己的具有持久意义的发明，即雅各宾派的思想，注入了国家政体的血管内。

至于小型家庭生产或手工业生产方面的革新，革命的危机切断了某些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而这些趋势曾经构成了整个经济增长中一个有机部分。例如，我这里所考虑的是工业，大型制造业部门和对外贸易的发展；这一发展也由于革命及其余波而在此后的几十年里延缓下来了。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弗朗索瓦·克鲁泽和莫里斯·列维－勒波瓦耶得以将法国革命描述为一场全国性的灾难。对于大规模的现代类型的企业而言，这无疑是一场灾难（虽然是短期的灾难），但对于小规模的生产单位、手工业作坊，特别是对农民的小地产而言，则并非如此。

因此，事实证明，从 1789 年到 1799 年的那 10 年间，或者更长一点的时间，从 1789 年到 1815 年，是个重大的关键时期。从这个观点来看，经济增长时期的重大危机（在许多方面不同于停滞时期的重大危机）可能带有创造性的功能，而且从潜在的角度来看这一功能是十分强大的。

后来又出现了另一个转折点：我认为俄国革命在这个方面绝对是个典型。它发生在极为迅速的经济增长时期之后。这个经济增长（至少）在 19 世纪的最后三分之一个世纪里对俄国产生了后果。这个往往被人们忘却的经济增长遵循的是美国的道路，只是基点要低得多，其成就因此也自然不及美国。然而，正是因为这个经济增长是迅速的，也许比斯大林时期的苏联更为迅速，相比之下，从各个角度来看，成本也肯定比较低。这里可以把 1900 年至 1917 年在沙皇俄国出现的经

济增长—危机—革命所构成的链条与 1789 年以前的 18 世纪的法国进行一番比较。这样的比较是可行的，而且由于现在讨论的是 20 世纪，则更应当加以强调。俄国的革命危机（1905 年，还有 1914—1917 年）基本上与战争联系在一起，也同战争有关的生存问题、士气以及其他各种问题有联系。危机和革命带来了革新，无论对革新这个词作何种解释，包括好的和坏的。1917 年的革命使社会有可能作出真正的选择（这里所说 287 的选择当然不是指自由的选择）。这里的选择相当于创造了崭新的社会发展模式。1905 年错过了的但在 1917 年又成功抓住了的危机（或转折点），从事后看来，对整个人类来说，或者至少对处在这个制度下以及处在各种类型的同类制度下的数百万人来说，显然是个具有根本性的重大意义的事件。

至于 1929 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如果它未曾发生，希特勒就决不可能取得政权。那么，纳粹主义（无疑是贬意上的"革新"）也是这场可怕的危机所导致的结果：它中断了但没有完全停止两百多年来的长期增长。假设希特勒赢得了战争的胜利，尽管这是上帝所不允许的，那么，德国 1929—1933 年发生的转折所产生的后果就会延续到今天的欧洲，仍然伴随着我们，而且是令人害怕地伴随着我们。

作为结论，我们应当努力朝前看：我已经提出，目前的危机（1973 年—？）表现出李嘉图—马尔萨斯所说的某些内容，因为至少在它的早期阶段是由于暂时的石油短缺引发的，而这一短缺从某个角度来看，又是人为的。同样，在 20 世纪行将结束之时，特别是进入 21 世纪以后，随着某些基本原料的耗尽，人类很有可能再次遭遇这类事情，当然从性质上来说也是属于李嘉图—马尔萨斯式的。

人们曾经认为,"短缺"危机自18世纪以来已被一劳永逸地克服了。但这种类型的危机会再次出现。它会取代定期发生的紧缩危机(暴跌)或与这类危机相结合。而紧缩危机恰恰是1800年或1830年以来的我们这个一往无前的工业世界的特征。这样的短缺危机造成的后果会像20世纪的大多数重大革命那样带来那种朝着专制主义方向的"革新"吗(如果这个词的使用是得当的话)?这是一个无法使用合法的方式来提出的问题,虽然目前谁也无权作出回答。危机会像货币一样服从同样的规则吗?坏的革新必然会压倒好的革新吗?未必。未来的革新无疑会倾向于强化专制主义制度,会缩小自由主义的支持者目前仍在世界上拥有的那些区域。如果专制主义制度实际上能够取代自由制度为人民提供面包、和平和秩序的话,这也许并不是严酷的罪恶。这样的可能是存在的。但是,我们也不能忘记,自由是革新之母;人们越是对专制主义有更多的了解,就越是危险,很有可能会采取杀鸡取蛋的做法,而这只金蛋就是自由与革新的结合。因此,我们的目标是避免事先对未来的危机(实际上是倒退性地体现出了过去被压制住的趋势)可能造成的专制主义表示过分的大惊小怪;与此同时,努力在一切正当可能的领域中保持创造性的解决方案,按照我们自己的信仰促进自由主义和自由的气质。

在所有能够用来说明危机的比喻中,我最倾向于使用地质学的比喻。危机就像是1906年旧金山的地震。[7]这场地震首先是圣安德鲁斯断层两边的岩石质量形成的紧张造成的结果;然后才是伴随着这场突然而恐怖的调整造成的能量释放带来的结果。地震本身不会创造任何东西:它们仅仅揭示了隐藏在地下的力量。这些力量有可能是倒退的,也有可能是

288

进步的。它们带来了广泛的破坏，使现有的上层建筑化为乌有，但它们又无疑地给予了建设者在如何选择和设计重建时驰骋其想象力的自由

这无疑应当是当下一次大地震袭击城市时（他们说洛杉矶的可能性最大），我们看待这个事情的方式。这也是将要在危机中产生的那种方式，而这些危机无疑在今后的100年里将威胁着我们的文明

本文结束时所追索的思路可能比开始时更加清晰可辨一些；现在已经清楚表明了的是，我仅仅是从一个征兆来开始论述，即经济和（或）人口连续性的中断。[8]更为清楚和更加明白的征兆总的说来并非像"小说危机"、"信仰危机"或类似的文化危机那样一直存有争论的现象。事实证明这个连续性的中断远不止是个征兆。这个连续性的中断把我们逐步引向我们称之为"危机"的那种现象的核心：它以最经典的面貌表现出强大而看不见的力量之间的碰撞（从外部和当时可以看见）的迹象。 289

注 释

［1］本文首次发表于1976年第25期《交流》。我要感谢安德鲁·贝京在我写作本文期间给予有益的帮助。

［2］参见本书第二章。

［3］载于《欧洲社会学档案》(*Archives de sociologie européenne*)，1968年，第2期。

［4］伊曼纽埃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Modern World-System*)，纽约，学术出版社，1974年。

［5］《中世纪以来西方的死亡史论文集》(*Essai sur l' histoire de la mort en Occident, du Moyen Age à nos jours*)，巴黎，1975年。

［6］何炳棣：《中国人口研究》(Ping Ti-Ho, *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马萨诸塞州，1959年；又参见彼埃尔·肖努：《历史学，社会科学》(Pierre Chaunu, *Histoire, science sociale*)，巴黎，1974年，第303页。

[7] 读者将会注意到我把战争——现象纳入了我的危机——现象的定义中：当然，这是历史学家的而不是经济学家的做法和反应。

[8] 我没有触及到今天人口数量急剧增长的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具体问题。迄今为止，由于事实证明了这种伴随着与人口的扩张（自动减少人均资源）成反比的经济进步的中断，因此这也表现出真正的长期危机的状况。

英文版译者注

在本书的某些阐述中，特别是有关法国历史的阐述中，某些法语词汇显然没有与之准确（或完全）对应的英语词汇。为此，我们保留了这些法语词汇。尽管通过上下文或通过解释，这些词汇的含义是清楚的，但是在本书后面还是备有一份完整的小辞典。

小 辞 典

重量、度量、货币

图尔锂（*livre tournois*）：法国旧制度时的结算单位，铸于图尔，最初价值1磅白银，但是到1801年开始实行十进位制的法郎时，图尔锂已严重贬值，价值不足5克白银。

苏（*sou*）：20个苏等于1锂或1法郎。

德尼埃（*denier*）：12个德尼埃等于1苏。

塞提埃（*setier*）：谷物计量单位，在某些地区相当于150升至300升。

穆伊德（*muid*）：容量单位，等于大桶。

公顷（*hectare*）：土地面积单位，等于1万平方米或2.47英亩。

阿尔品（arpent）：土地面积单位，相当于1英亩。

区（arrondissement）：省以下的区划或大市镇（如巴黎）。

旧制度（ancien regime）：用以指法国1789年以前的历史时期和统治制度。

《年鉴》（*Annales*）：由马克·布洛赫和吕西安·费弗尔创办的杂志，全称为《年鉴：经济、社会、文明》，这个名称亦指法国的一个历史学派。

大法官（*bailli*）：以国王或某个贵族的名义主管司法的长官。

大法官管辖区（*bailliage*）：大法官的司法辖区。

城堡（*bastide*）：设防的城市，尤其是在朗格多克。

蓝皮书（*bibliothèque bleue*）：蓝色封面的通俗丛书，内容一般为改写的中世纪爱情小说或骑士故事，17世纪首先在特鲁瓦出版，到大约19世纪中叶依然拥有大量读者。

国民财产(*biens nationaux*)： 法国革命期间被国家征用的私人或集体(如教会)拥有的财产

扭拧阉割法(*bistournage*)： 紧捏公畜阴囊并扭转来阉割动物的方法

波卡日风光(*bocage*)： 法国西北部地区的典型风景，田野被丛林或树木围隔。此意的延伸指其他地区类似的风景。

选区(*canton*)： 省内的行政区划，现代通常是指为选举的目的而划分的区。

实物地租(*champart*)： 分享收成的权利，由封建地主征收

领地(*chatellenie*)： 在领主或庄园主司法管辖权下的城堡及其土地。

朱安党人(*Chouan*)： 反对法国革命的保王派叛乱分子。朱安党叛乱是法国西部的一次叛乱，其首领之一是一名绰号为"雅克·朱安"(即猫头鹰)的人。

公社(*commune*)： 法国最小的区域和行政区划，相当于"教区"或市镇。

义民(*Croquant*)： 亨利四世和路易十三统治时期的起义农民。这个名称可能源自于农民使用的"叉子"。

本堂神父(*curé*)： 教区神父

宣誓派教士(*curé assermenté*)： 法国革命以后在实行国内教士法规时期向国家宣誓效忠的教士。

省(départment)： 法国的行政区划，1790年开始置省，由省长管辖。与英国的郡大致相当。

事件的历史学 (événementielle (histoire))： 字面上是指叙述事件的历史学，常常用于指传统的叙事史或人物传记，与计量的和跨学科的历史研究相对立而言。有时但并非总是用作贬意。

绳索阉割法(*fouettage*)： 使用绳索阉割公畜的方法

盐税(*gabelle*)： 旧制度下征收的盐税

伽里哥字群落(*garrigues*)： 常绿矮灌木丛分布的地区，主要指由岩石和石灰岩组成的土地贫瘠的朗格

多克高原地区。

邋遢汉(*gavache, gavot, gabale*)：平原地区的人对来自比利牛斯山脉的山民的蔑称，或指奥依语人对奥克语人的蔑称。

乡村警察(*garde - champêtre*)：农村的警察。

高蒂埃党(*Gautier*)：1587年诺曼底的起义农民，此语源于地名夏佩勒-高蒂埃。

荣誉军团(Grande Armée)：拿破仑的军队。

总督(intendant, intendance)：旧制度下的王室行政职务，总督对旧制度下的省份拥有广泛的权力。

扎克雷起义(*Jacques*、*jacquerie*)：扎克雷一词来源于雅克，即法国农民的传统称谓，扎克雷起义特指14世纪的农民起义；以后用于泛指农民起义。

自耕农(laboureur)：按字面指耕地者，可以指在自己的土地上劳动的耕地者和农夫。在使用中常指"富裕农民"，以区别于贫穷的农民或日工。

审查官(*maître de requêtes*)：旧制度下的司法等级机构中的官员，往往外出巡回审查。今指法国行政法院的审查官。

日工(*manouvrier*)：为他人劳动的农夫，区别于自耕农。

显贵(*notable*)：显要的、有势力的、地位高的人物，通常是指地方的而不是全国的著名人物。

赤脚党(Nu - Pieds)：1639年诺曼底的起义农民，字面意思是"赤脚"。

奥克(oc)，奥依(oïl)：奥克和奥依分别是法国南部和北部方言中对"是"一词的不同发音。奥克语地区统指南方，包括朗格多克。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朗格多克地区操有全部的奥克语方言。(近年来，对奥克语地区以及当地的文化的兴趣有所复兴。)奥依语指法国北部的方言，也指

区域。这种方言最后接近于标准的法语。

供奉(*offerte*)：给教区神父的供奉，由教徒在举行供奉仪式的过程中提供。

奥斯塔尔(ostal)：法国南部的家财或家产，该意的详细说明参见本书第七章。

法院(parlement)：指旧制度下的省法院，是主要具有司法功能的机构，定期举行会议，不同于现代意义上的议会。

老式网球(Paume)：一种网球游戏。

步兵(piêton)：步兵。

酸味酒(*piquette*)：用葡萄果渣加水酿造的一种饮料。

英雄(*poilus*)：原意为“勇敢的士兵”，在法国现今特指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作战的军人。

布热德运动(*poujadisme*)：20世纪50年代由彼埃尔·布热德发动的代表小商人和小经营者利益并反对征税的政治运动，具有右翼的倾向。

女雅士(*précieuse*)：原用于指17世纪时孀妇女试图通过文学沙龙或文化沙龙的方式影响时尚的运动。莫里哀等人曾著文加以讽刺。有时用于贬意地指矫揉造作。

财政代理人(*procureur fiscal*)：国家或领地的财政当局的代表。

小贩(*regrattier*)：商品零售商人，特别是指小盐贩，通常作贬意使用。

保留领地(*réserve*)：领主非法拥有的那部分封建领地，通常为自己使用，或一直为自己使用。又称作“家内农场”，但通常是大农场。

司法总管辖区(*sénéchaussée*)：与宫廷司法总管管辖的司法权力相应的区划。司法总管在默洛温王朝时是宫廷财产管家，后来转变为宫廷派出的官员。

人头税(*taille*)：旧制度下的赋税，主要按照人数缴

纳。

迟到者(*tard - venus*)：字面意思是"迟到的人"，用以特指14世纪法国东部的拦路抢劫者。

第三等级(tiers état)：旧制度下的第三等级，其他两个等级分别为贵族和教士。

大法官(*vergobrets*)：古代高卢每年选举产生的法官。